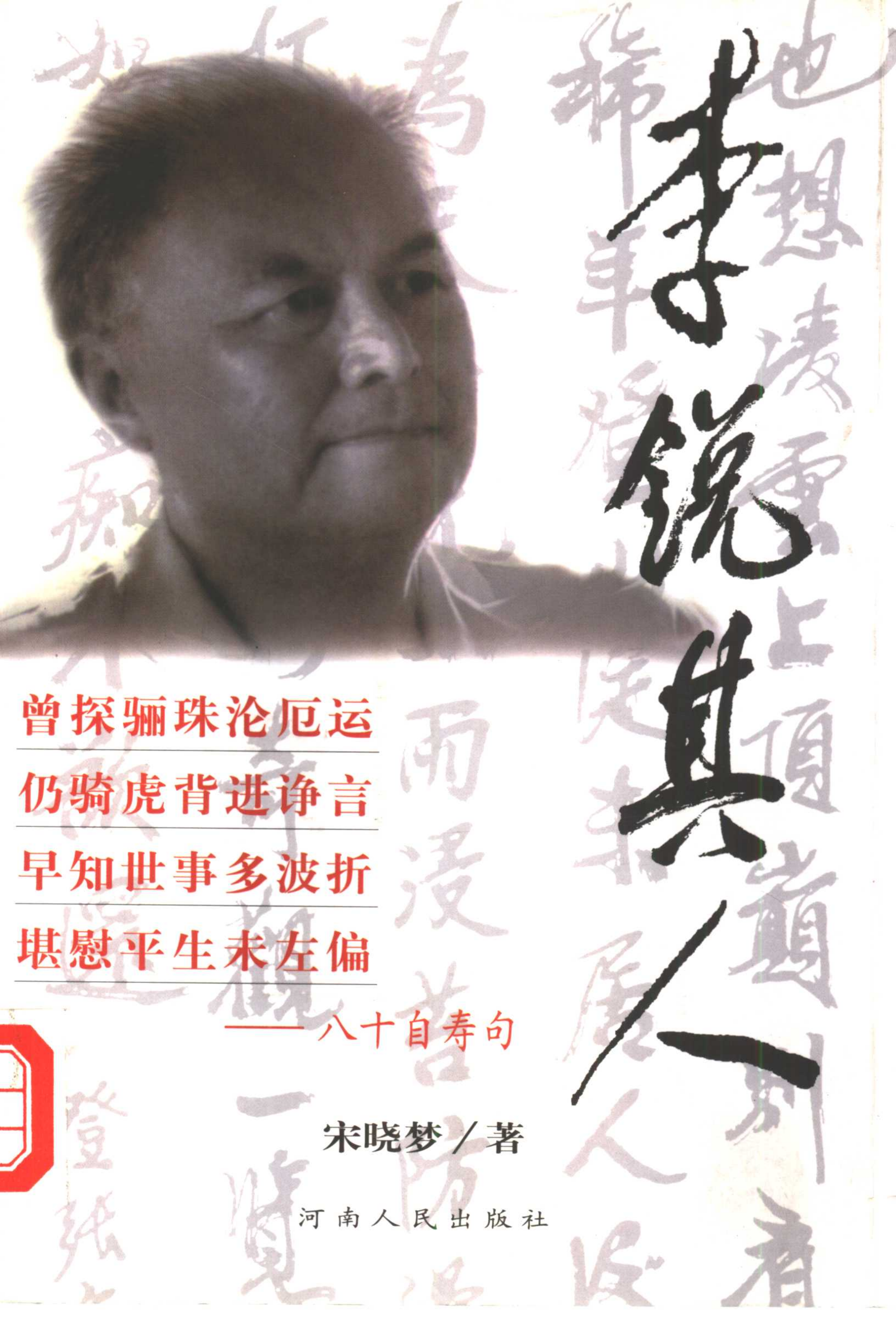


李锐其人

曾探骊珠沦厄运
仍骑虎背进诤言
早知世事多波折
堪慰平生未左偏

——八十自寿句

宋晓梦／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李锐其人
宋晓梦／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XWTS 0029103
K827=7
L2035
3760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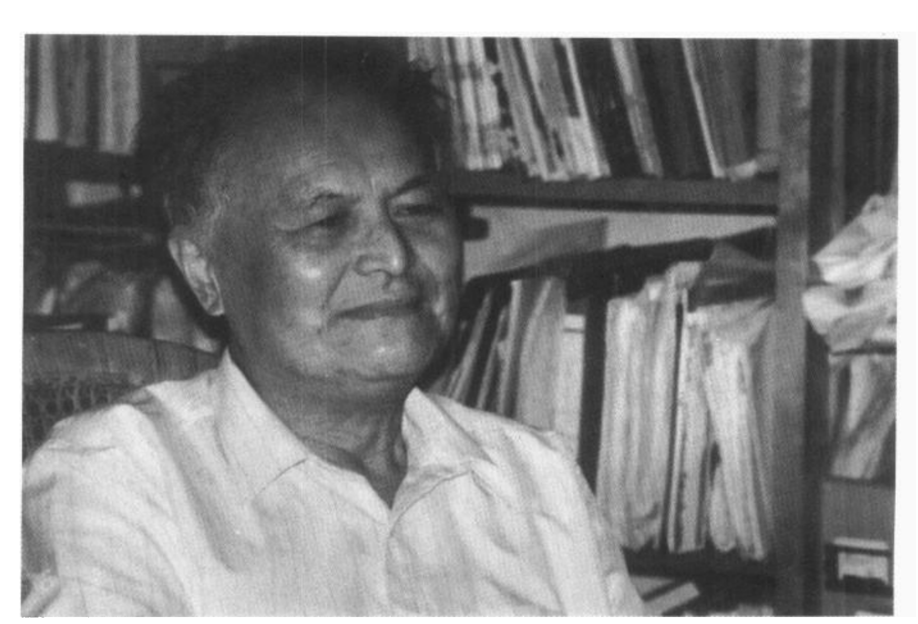
李锐其人/宋晓梦著. -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 6
ISBN 7-215-04471-8

Ⅰ.李… Ⅱ.宋… Ⅲ.李锐-生平事迹 Ⅳ.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1999)第05624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郑州市农业路73号)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　插图8页　字数326千字
1999年6月第1版　1999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 000册

定价:28.00元



1984 年在家中



李锐著述甚丰



父亲李积芳(1882-1922), 1905年
留学日本，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



母亲李张淑(1890-1980)
1913-1917期间在北京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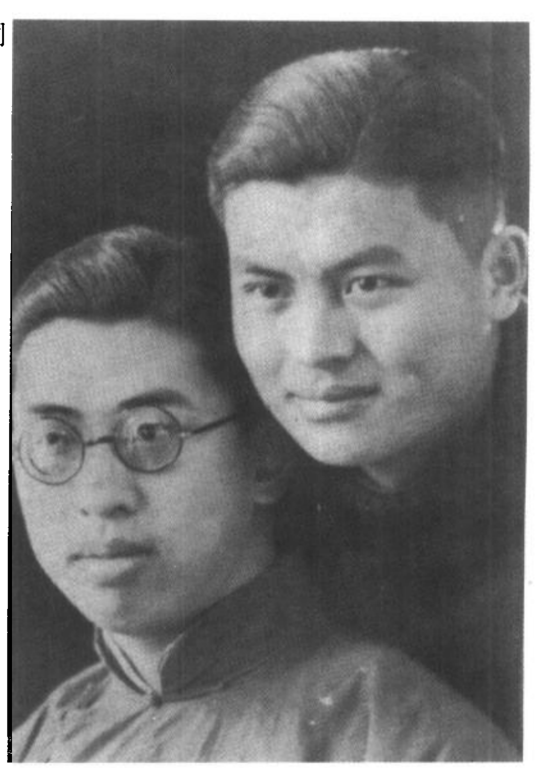


父亲李积芳（右）送七叔李积芸赴法留学，1918 年于北京留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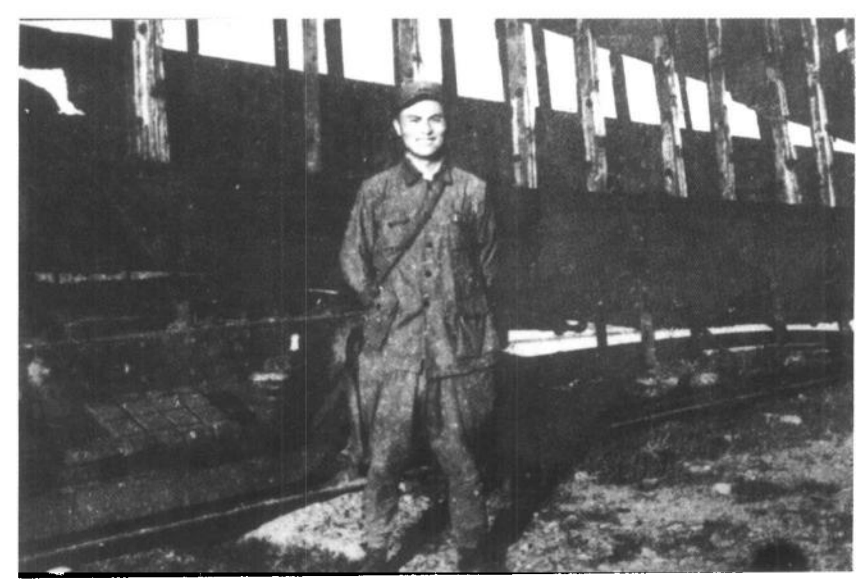
1934年在武汉大学东湖小石岛上

1936年1月，与小学同班老友黄乃在长沙相会





黄乃（右）与李锐（左）1944年8月在延安王家坪



1947 年 5 月，在热河乃林车站被炸毁的车箱前



1947 年在热河林西乡下，旁立者为《冀热辽日报》总编辑朱九思

1949 年冬在长沙





1956 年水电展览会上为李富春讲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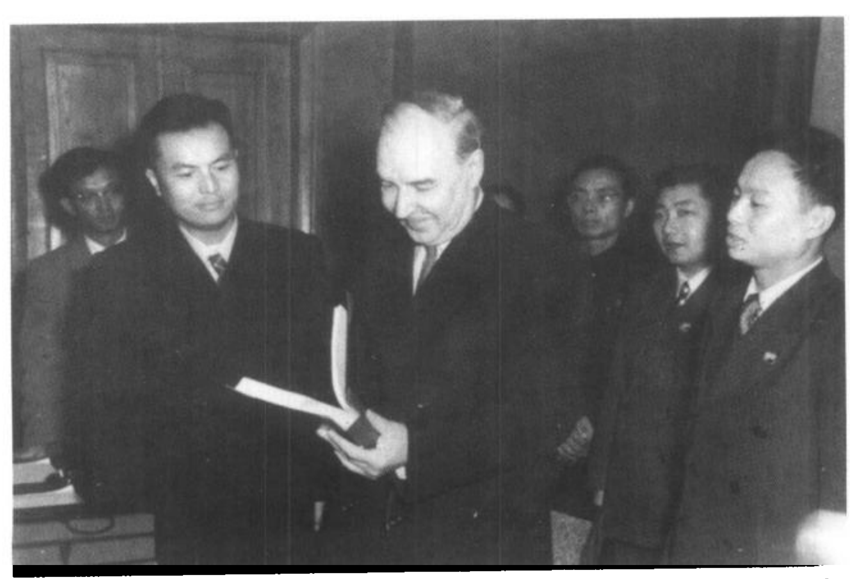
1956年陪同苏联水电代表团查勘三峡，与团长瓦西林可、水电部副部长冯仲云等在船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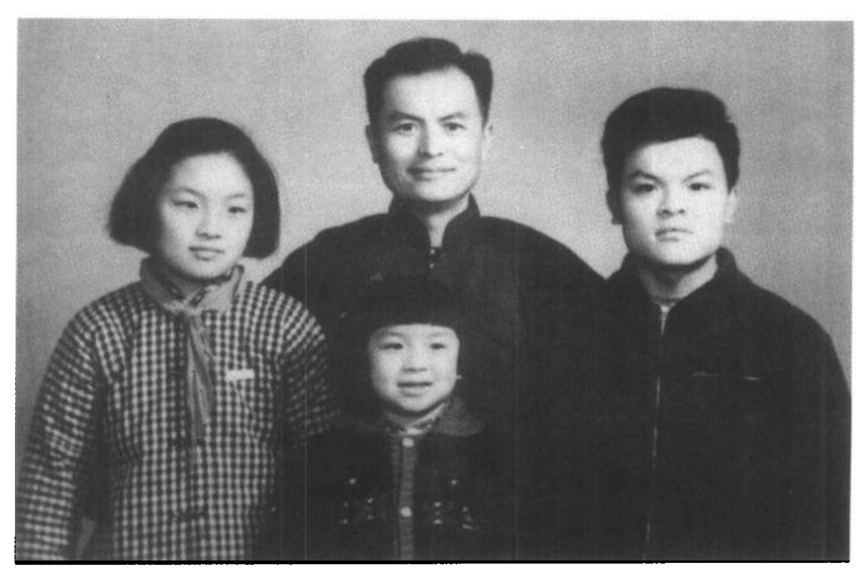
1956年查勘三峡时，与水电总局副总工程师张昌龄、水能计算专家陆钦侃在三斗坪坝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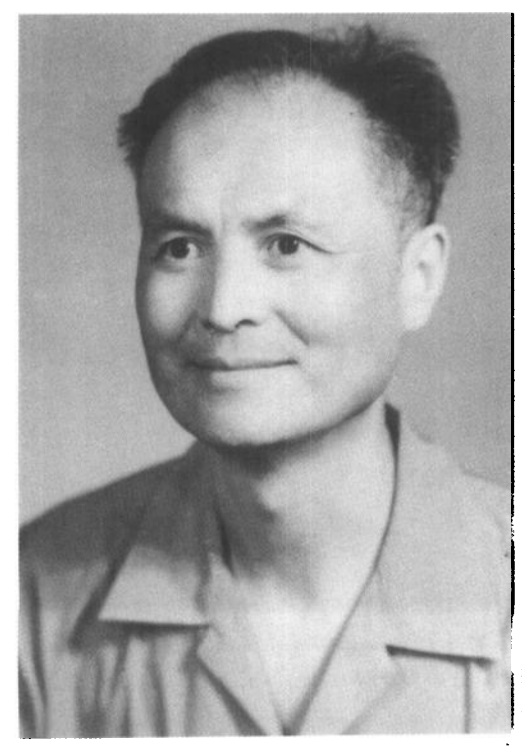
1958 年 3 月查勘三峡坝址时，与周恩来一起看地质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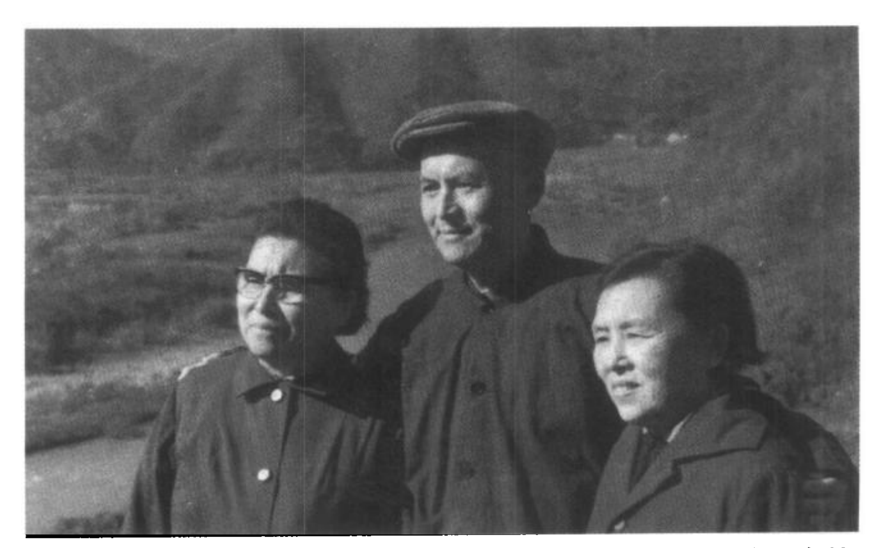
1959年11月，率水电代表团赴苏联时，会见苏联水电设计总院院长伏兹涅先夫斯基



1963年11月23日，下放安徽磨子潭前，与儿子范苗、长女李南央、幼女范茁



1975年5月30日自秦城监狱释放，第二天仍下放安徽磨子潭水电站，过蚌埠时摄



1975年5月出秦城监狱后，仍回安徽磨子潭水电站劳动，与从长沙来看望他的大姐、二姐在一起



1978年夏，与女儿南央在安徽磨子潭水电站



1980年，陪同美国水电代表团参观三峡



1983年与丁玲、陈明夫妇并老伴在北京家中



1984年在北京一个会议上



1984年同黎澍参观一个影展



1985年与老伴张玉珍、油画家王申生在北京玉渊潭公园



1986年在家中



1987 年，与老伴张玉珍在家中



1989 年应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所邀请讲学，同费正清老人和所长麦克法夸尔在一起



1993 年 5 月，在美国波斯顿接受美国电视台采访



1993 年应美国科罗拉多、明尼苏达等几所大学邀请开会并讲学，在哈佛大学会见麦克法夸尔、史瓦滋、斯拉姆三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

序

邵燕祥

李锐:这个名字今天广为人知,总是与他对中国革命的历史记述相联系,与他对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的研究相联系,与他对“左”的倾向(已经从“左派幼稚病”恶化为“左”倾顽症)及其各种表现的探讨相联系。

人们读过他写的书,现在要来读写他的书了。

李锐生于一九一七年,正是俄国发生十月革命,开始把社会主义从理论形态转付实践的一年。一九九七年,李锐在《八十自寿》诗中写道:

曾探骊珠沦厄运,仍骑虎背进诤言。
早知世事多波折,堪慰平生未左偏。

他走过的八十年人生旅途,大体上可分为前后两个四十年。他在《六十自寿》诗中说过,“生涯岂料虚前席,逆境常因好妄言”,第一句说的是在水电建设和三峡问题上接受毛泽东的咨询,第二句说的是在庐山会议上因言贾祸。其后的二十年间,他经历了从撤职查办、开除党籍、离婚破家到流放坐牢一系列的打击,“抛掷华年如废纸”,乾坤只剩一头颅。可贵的是,这颗头颅没有停止思考,这样,到了八十年代新时期中,我们就从他笔下陆续读到围绕中国革命的正剧和悲剧所作的反思。

李锐是中国共产党内的高级知识分子;在三十年代中后期从学校进入社会生活,他既与同一代的共产党人走过几乎同样的道路,又与同一代的知识分子有相近似的心路历程。如果说所有的人的幸福都是相似的,那人们的不幸,却因各人的经历、资质而有同有不同。少年时就在五四运动影响下向往民主和个性解放的李锐们,成长于三十年代,启蒙和救亡的声音同时呼唤着他们,追求真理和献身革命统一在他们的行动中;目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面临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他们别无选择地投身于共产党号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李锐们到达延安的时候,中共中央正好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作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当时党中央机关领导层(其中多数是知识分子),懂得“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这一道理。新来者一时受到了重视以至重用。随后,包括李锐在内的一些在中央青委工作的年轻的知识分子干部,办了“轻骑队”壁报,对边区的现实作出某种批评性的反应,锋芒毕露,招致了不满之声。接着而来的整风运动,自然有清算王明路线及至抵制共产国际的更大背景,然而对干部的审查,则把怀疑对象首先集中于来自城市的青年知识分子,有陕甘宁边区(后来扩大到敌后根据地)“特务如毛”之说,遂以“抢救失足者”为名,弄得人人自危,这可能受到斯大林肃反扩大化模式的影响,而与当时革命队伍中农民成份占压倒优势,自发形成的反智倾向,恐怕也不能说全无关系。这是李锐进入延安这一“革命圣地”后最初受到的挫折。这也许正是李锐此后几十年从未以“左”的一套待人处世的缘由之一。

当时在边区的革命者包括“抢救运动”中被伤害的人,几乎都没有把它如实地视为一次政治迫害,流行的看法则是当做革命进程中难免的失误,而据说革命队伍内部的阴暗面,在复杂的阶级斗争形势下不宜暴露在敌人面前,于是轻轻掩盖过去,谈不到从中汲取教训。可能李锐当时也停留在这一认识上,他是受过传统的和

革命的双重影响的人。儒家正统中所谓不计个人毁誉得失，委曲求全，以德报怨，和共产党人誓为革命的集体的组织的利益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直至鲜血和生命……加上战争形势逼人，这使他一经平反，来不及抚摸身上的伤痕，就如人们常说的“轻装上阵”，义无反顾地走向新的工作岗位了。

大约在一九四九年进入长沙后，李锐便有机会看到国民党领导特工的高级官员唐纵的日记，从那里知道，在延安惊呼“特务如毛”自相惊扰，大搞“抢救”自相残杀，闹得一片混乱乌烟瘴气的时候，国民党则正为在延安“没有一个内线”而遗憾。但这时李锐还没能进入对党史和革命史的回顾。他忙于大量的实际工作。在个人处理上下左右人际关系时，也一仍其旧，毫无城府，“直道事人”，直言不讳，即使在毛泽东面前，也坦陈己见，无多顾忌，可谓“书生气十足”了。

我想是一九五九年反右倾后，把他推入“六不怕惟头尚在”的深渊边缘，继之以“文革”中长年的单人监禁，这才最终促使李锐在回首平生的同时，在重新咀嚼马克思主义经典的同时，清理了自己的思路，从而清点几十年中国革命实践留下的“遗产”。

当李锐走出秦城监狱的时候，他给人们带来狱中用棉花签蘸龙胆紫写成的诗稿。不久，我们更看到一系列史实准确、观点鲜明的著作，他属于最早一批走出个人迷信、闯入“左”的禁区的共产党人。

在历史反思中，李锐早年接受的以自由主义为代表的五四精神的熏陶起了主导作用。李锐在过去的半生，一直属于思想活跃之列，其中就有自由主义的潜在影响；如果说苏东坡自由出入格律之间，是“曲子词缚不住者”，那么李锐喜作独立思考，则是教条主义所缚不住者。本来意义上的自由主义（不是毛泽东《反对自由主义》文中说的那个自由主义），其实是人类埋葬封建主义进入资本主义的条件，当然也是在中国实现民主和法治的精神条件。它与

马克思要对一切现存的社会秩序、现存的学说理念都给以批判性的审视和重评是相通的；它同政治上的独裁、思想上的专断不相容；它的宽容表现于承认多元，保护个性，它的革命性则表现于不断地探索，由怀疑始，通过证实和辨伪，使认识不断地接近实践，接近真理。

也许事实将会证明或已经表明，李锐年轻时已形成的性格，天真、热情和浪漫的一面，使他适于成为一个直抒胸臆的诗人，务实、求是和执著、穷究的一面，使他适于成为一个秉笔直书的史家和思想者；而他晚年仍有精力伏案，也许是他的幸运，又是我们这些读者的幸运。

从这本传记里，我们可以大致了解李锐之为李锐。李锐成为今天的李锐，是时势使然，这里有历史的必然，也有历史的偶然在。我们通过李锐的一生，可以看到半个多世纪中国历史风云的翻卷，我们从中国以至世界历史的背景来看既是共产党员又是知识分子的李锐，也才更能看清他“这一个”的意义。

一八四八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一百年后，一九四九年，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取得政权。现在到了一九九八年，在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五十周年之际，我们要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百五十年的经验，更要总结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尤其是执政近五十年的历史经验。这是一个大的工程，需要大家共同努力，让我们感谢李锐同志，他已经为此献出不可磨灭的劳绩。

一九九八年五月二十六日

目　录

引　子

至今想来，我也不能完全说清楚，为什么在那一刹那，我会决定去写李锐。

当我面对着十几个要去采写的人名时，我这个长期和文学作品打交道的编辑，还不太能说得清楚，李锐到底是干什么的。当时，《庐山会议实录》这部书还是内部发行，我尚无缘拜读。

但是如果说这个选择完全是出于无意识的偶然，似乎也不尽然。

我在一个朋友家里看到过李锐亲手书写的诗。这位朋友在一次政治运动中，为保持作为一个人的尊严和气节而受到冷遇。

李锐把他在秦城监狱中做的那首诗赠给这位朋友，以表示对他人格的赞赏。

我觉得，一个赞赏别人气节的人，自己也会很讲气节。在讲求实惠的今天，这样的人已经不多见了。惟其如此，他们的人格才显得更具魅力。

我喜欢有气节的人——这大概就是我当时作出了那个决定的原因。

从那一瞬间的决定开始，我便走进了李锐的世界。

最初我到处找他的书和文章来读。李锐八年多的新闻工作生涯使他的笔头特勤。一九五二年，他离开宣传部门改行搞水电以后，仍然经常在写，毛泽东正是看中了他的文章，才点名要他来做

兼职秘书。待遭贬黜，他又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以诗明志，以文寄情，留下一部古今诗坛上的奇书——《龙胆紫集》。晚年，一部《庐山会议实录》、一本学术专著《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研究》，都将使他名垂史册。

然而，在大量丰富的文字资料中，我最为珍视的，还是李锐在被贬黜、发配的日子里留下的一套相当完整的日记。这使我在后来的写作中，有可能真实地再现几十年前他的心理活动、生活细节、思想感情。

后来我和他的朋友聊，得知这个喜欢穿红绸夹克衫的老头儿一生广交游。他的朋友有出版界的、新闻界的、党政界的、学术界的、文学界的、美术界的……个个很有思想，人人忧国忧民。他们对我了解李锐固然很有帮助，但他家里川流不息的客人也使我对李锐的采访常常受到干扰，以至于每当我去采访李锐的时候，就诅咒他们最好此时个个都在家生病。

"李锐一生都在反'左'"。这是他的朋友们对他的评价。后来，我在《随笔》一九九二年第五期李锐的两首题为《七五自寿》的诗里看到了他对这一评价的认同。诗中写道：

有客来时一碗茶，
纷纭世事扯麻纱。
乱谈仍是老毛病，
听说还当夹尾巴。

风雨途中七五春，
何时做个自由人？
又闻蒂固根深语，
堪慰平生不"左"倾。

在"左"倾路线占统治地位的几十年中,一个处在政治漩涡中心的人,一个一生几度身居要职的人,要想做到"平生不'左'倾",这需要怎样的清醒,又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啊!在他的同代人中,又有几个能在自己的晚年享受到这种"堪慰"呢?

有朋友认为,李锐的反"左"生涯可以举出三个最突出的时期:庐山会议上反对"大跃进";十一届三中全会复职后在工作中反"左";从领导岗位退居"二线"以后,对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的研究。

如果把这三个时期比作"浪潮",那么每一个浪潮的到来都把他推上了一个生命的高峰,而每一个高峰之后,又往往会跟着一个或深或浅的"浪谷"。李锐就在这一个又一个波峰浪谷之中,走过了他的七十五个春秋。

然而我又觉得,这个概括并不尽然。因为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贯串了李锐大半生的、为阻止三峡工程早上马而进行的论争。李锐认为:这场论争并不仅仅局限于工程本身,而是反对经济建设中"左"的倾向的斗争。尽管有的朋友(包括有些赞同李锐关于三峡工程基本观点的朋友)说他把问题看严重了,认为这不过是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的具体方案之争,李锐并不放弃他的观点。

现在,就让我们从这个影响了李锐一生沉浮的地方楔入吧。

第一章　不惑之年

第一节　在毛泽东面前的一场争论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八日。早晨，一架专机从北京接了电力工业部部长助理兼水力发电建设总局局长李锐，中午飞抵武汉机场，又接上了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兼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林一山和他的秘书魏廷琤，又继续飞往南宁。（魏廷琤说当时自己未去参加会议，也没有去送林一山。此说与李锐所记有出入）

水电和水利本是两个密切相关的部门，在外行的嘴里，一不当心就会把两个概念互相替代。然而这两家“近亲”的负责人，几年来却在笔头上论战不已。今天，是谁让他们坐到了一起？此行的目的何在？所有这些，都得从他俩珍惜如命又彼此结成“冤家”的长江说起。

与“三峡”结缘

长江，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那戴在母亲头上的一顶顶桂冠，是她每一个儿女的骄傲：亚洲第一大河、黄金水道、世界三大峡谷之最的三峡风光、无比丰富的水力资源及由上游的巴蜀文化、中游的荆楚文化、下游的吴越文化和分布在全流域的名胜古迹组成的中

华五千年文化宝库……

但是,正如某些具有严重缺陷的伟人一样,多少年来,长江性格暴戾,喜怒无常,动辄异想天开,失去理性,一意孤行。严重的水患给两岸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于是,治理长江,兴利除害,便成了中华民族世世代代的课题。本世纪初,一个在长江上游末端的三峡筑坝拦洪的方案便提了出来,从此,是耶?非耶?利耶?害耶?引出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论争。

从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开始担负全国水电建设领导职务的李锐,被卷入这场论争,是很自然的。然而被急流冲进这场论争的漩涡中心,以至又冲进了中国政治的最高层,却是因为一个偶然的机遇。从此,他的后半生便与这场论争结下了不解之缘。不管后来他走到哪一个岗位,只要这边"烽烟"一起,他就立即挥戈上阵,伏案不已。

难怪一位作家说:如果没有李锐,中国的长江可能早不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样子了。

新中国成立的头几年,千疮百孔的国民经济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人民的温饱问题虽还需要进一步解决,但饿死人的事情毕竟已很少见了,具有雄心大志的领袖和坚信"人定胜天"的各级领导者决心趁热打铁,着手完成这项继万里长城之后、中国第二个超世界水平的巨大工程,一举解决长江的洪水灾害。

一九五三年二月,毛泽东视察长江,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向他汇报了修建三峡工程的设想;当听说即使修一大批梯级水库拦洪蓄水,也还是抵不上一个三峡水库时,毛泽东对这个毕其功于一役的大工程深表赞许。

一九五四年,长江遭遇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武汉被围困四五十天。洪水过后,林一山再次向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汇报了关于三峡工程的技术问题和坝址查勘情况。他说,如果中央要求三峡早上,中国的技术力量加上苏联专家的帮助,在技术上是可以保

证的。

一九五五年，中苏专家多次对三峡坝址进行了查勘。

一九五六年，三峡工程的上马之风掀起了一个不小的高潮，这不仅是因为年初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正式成立，该机构的主要任务便是对三峡工程进行研究设计，还因为这年夏天毛泽东在畅游长江后，咏成著名的《水调歌头·游泳》。词中“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那浪漫的情调，豪迈的气魄，优美的意境，使林一山们深受鼓舞。

同年九月一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便醒目地刊出“长江流域水利资源查勘工作结束”的特号字标题新闻，副题为：“开始编制流域规划要点，争取年底确定第一期开发工程方案，解决三峡大坝施工期间发电、航运问题的研究工作即将完成。”

神州大地，热气腾腾。热气蒸腾着冲天的干劲，热气的迷漫中一切恍恍惚惚，热气熏得人头昏脑涨。

然而，就在这高昂焦躁的主旋律中，始终夹杂着一支不和谐的低调。声势不大，却不屈不挠；势单力薄，却绵延不已。它的演奏者，就是李锐。

一个刚刚结束了百年战乱的国家，财贫力弱，科技落后，任何一种宏伟的理想都要考虑这一现实。李锐选择了一系列在当时与众不同的思维视角：在需要与可能之间，他更侧重以科学的态度严密地审视后者；在解决需要的途径中，他要选择更符合现实的捷径；在考察需要本身的含义时，他看到的是一个综合的整体——一个具有超越时代的理性的人，能属于这个时代吗？当然，这一点至少在眼前，以至后来一段短暂的时间里，还没有成为一个明显的问题。

一九五四年林一山催促中央将三峡工程尽快上马那会儿，远在苏联考察的中国燃料工业部电力代表团，接到国内来电：水利部要上三峡工程，征求你们的意见。团长刘澜波（燃料工业部副部

长)、副团长李锐,当即回电:现在还没有力量顾及如此遥远之事。

在三峡问题上,李锐和林一山一直存在着不同的意见。然而直到一九五八年一月南宁会议以前,李锐一直没有林一山那样的机会,可以当面让毛泽东了解他的观点。他同林一山论战的文章都发表在专业刊物上,毛泽东未曾看到。所以毛泽东对这个问题上的反面意见一直知之甚少。只是在国务院一次关于三峡工程的会议上,在几乎众口一词的三峡工程应立即动工的呼声中,李锐又一次提出了不同看法。这看似微弱的声音总算有了回应,周恩来大声说:有一个人说困难,这很好。

一九五五年年底,传闻三峡工程要在七八年之内修好。李锐于一九五六年一月写报告,经电力部部长刘澜波转周恩来总理等领导,说明长江的防洪、发电等综合开发都要逐步进行,三峡工程不是十年内所能办到的。七月,又经刘澜波转毛泽东和周恩来一信,从经济与技术两方面,说明我国短期内还难以修建三峡工程。

《人民日报》发表三峡即将上马的大标题新闻之后,李锐又给《人民日报》写了一篇三千字的文章,认为三峡工程急于上马的主张带有很大的主观性、片面性和随意性。报社已经排出了小样,但因周恩来不同意公开争论此事,未能刊出。

李锐当然不是不知道毛泽东对三峡工程的态度,他之所以坚持自己的看法,并敢于公开论争,一是坚信自己的看法符合实际:按照当时的国情国力,三峡工程决不可能、也不需要立即上马。这项巨大的工程各方面都太不成熟,勉强去做,只会干扰水电资源的正常开发。至于防洪,三峡工程既不是惟一的选择,也不是最佳的选择;二是他认为毛泽东之所以急于上马三峡工程,是因为只听了一面之词。他要做的,就是让最高决策者能听到他的不同声音。

反右派斗争刚刚过去,难道李锐就不晓得一再发表这种与“大跃进”的主旋律相左的见解,会冒怎样的风险吗?然而,逻辑思维的力量和责任感就像一股巨大的惯性,推着他沿着求真求实的轨

道向前运行。

与别人有所不同的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让李锐在被这种“惯性”推进深渊之前,先被它推上了一个峰巅。

这个机遇便是一九五八年南宁会议上那场后来被戏称为“御前论争”的一幕。

御前论争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七日,李锐突然接到中央办公厅通知,请他第二天乘专机赴南宁参加正在那里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奇怪的是,来人说,电报上写的是去讨论三门峡问题,飞到武汉时还要停一下,接林一山同去。

李锐是参加了三门峡水库工程决策的,对情况当然很熟悉,然而三门峡工程正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紧张施工,这时还没有出现什么需要讨论的问题。忽然,“林一山”三个字使他茅塞顿开:一定是去讨论“三峡”问题,电报中多了个“门”字,他和林一山一直是在三峡问题上唱对台戏的嘛!

狭路相逢,李锐不敢轻敌。他带上了以往写的详陈自己对三峡工程、对加快全国水电建设看法的长篇报告(这是一九五六年中央通知各工业系统的部和总局直接向毛泽东写的报告,但电力部有位领导因报告内容涉及到同水利部的关系,而没有送上),并请负责水电规划的工程师程学敏赶制了一张全国待开发的大中型水电站示意图。李锐带的资料并不多,然而从后来的结果看,这两件“武器”都非常符合“实战”需要,因而均发挥了最佳效果。

李锐虽然信心十足,但他也深知对手的优势。

山东文登县人林一山,比刚过不惑之年的李锐大七岁,一九三五年就读于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南下前,任辽南省委书记。一九四九年赴南京接管国民党的“长江水利总局”,从此改行搞水利。

就像李锐在大学学工科却也酷爱历史，并能在社会科学领域中成就卓然一样，林一山学历史转行搞水利以后，也在不长的时间内便成了这一领域的“技术权威”——都是智商极高、才华出众的人才嘛！

从经验和资历来看，林一山不仅比李锐早从事水利工作三四年，而且他曾出色地主持过新中国第一个大型水利工程——荆江分洪闸的施工。

果然，专机在武昌机场着陆时，林一山和他的秘书已带着一大箱资料在那里等待了——对手也没有等闲视之啊！

他们礼节性地打过招呼之后，便一路无语。大战前夕的平静也不一定都是表面的，充分的准备和对自己方案合理性的信心，足以使人坦然。

可是，要在毛泽东面前对簿公堂，实在前途难卜！无论“胜诉”“败诉”，都将和毛泽东一手导演的这出戏一起载入史册。

抛开政治背景不谈，这将是一场思想方法、工作经验、专业实力、论战技巧的较量。

然而政治背景能抛开吗？

这次南宁会议，是毛泽东为在全国掀起“大跃进”高潮进行思想理论准备和具体部署的一次会议。会议后期，毛泽东主张修建三峡工程，薄一波反映，此事有反对派，还讲了水利与电力之间有很多矛盾。毛泽东当即决定：那就将两个部合并，把林一山、李锐都找来，当面各抒己见。

载着一对“冤家”的专机，近中午时分到达南宁。

刚刚住进宾馆，李锐的好朋友、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就找上门来，急切地向他介绍会议情况：

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大批“反冒进”。原来，一九五六年年初，周恩来曾针对经济建设中急于求成的“左”倾苗头，提出既不要

犯右倾保守又不要犯盲目冒进的方针。并同刘少奇、陈云、李先念等一起,在克服急躁冒进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压缩了基建规模,控制了过高的增长速度。这些都在一九五六年党的八大通过的报告和有关决议中反映出来。毛泽东却认为"反冒进"给"大跃进"泼了冷水、泄了气,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会上毛泽东还当面点名批评周恩来、陈云,气氛十分紧张。

田家英说,他自己和胡乔木(中宣部副部长)、周小舟(湖南省委书记)都为李锐捏了一把汗!

李锐对自己观点的不合时宜不是没有思想准备,但要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却是事先没有料到的。晚上就要开会,剩下的几个小时,他便专心准备发言。

晚上,会议在毛泽东的住所(现在叫"明园")一间不大的会客室里举行。中间一张长桌,大家围桌而坐。李锐和林一山坐在毛泽东的正对面,在座的还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中央领导人,中央几个工业部、几个大区和中南各省的负责人,陈伯达、胡乔木、吴冷西(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社社长)、田家英等也在场。

毛泽东问林一山要讲多长时间,林一山说要两个小时;问李锐,李锐说只要半个小时,并请林一山先讲。

林一山的学识丰富、口才出众,在水利同行中是很有点名气的。今天他更是从容不迫,口若悬河。他的自信是有根据的。在此之前的两三年中,他已数次就长江规划和三峡工程问题与毛泽东交谈过,其想法是得到毛泽东赞许的,毛泽东的思路他也十分熟悉。就像答辩前已和主考教师通过气,给主考教师看过论文,此时宣读起来自然底气十足。

林一山从汉朝贾让治水谈起,二千多年间,长江洪水为害,平均十年一次。辛亥革命以来的四十年中,平均五年一次,可见长江洪灾越来越严重。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五四年发生的四次大水灾、

特大水灾,少则淹死四五千人,多则淹死十四五万人。长江的荆江河段则更为险要:一八七〇年千年一遇的特大洪水曾在这里决口,如果今天悲剧重演,淹死的将是成百万人。

林一山说,长江汛期来自宜昌三峡以上的洪水占全流域洪水量的百分之五十以上,一九五四年为六百多亿立方米,近几年还要多,所以如果在上游末端的三峡修建一个库容为一千亿立方米以上的巨型水库,就能将上游川江(长江从四川宜宾到湖北宜昌河段俗称川江)涌来的洪水控制住,而只有在三峡修水库才能有如此巨大的库容,宜昌以下的支流则找不到一个有如此控制效果的库址。

以往在专业刊物上论争时,林一山的文章也谈综合开发,但他的"综合开发"总被李锐批评为"把问题过于简单化了,在实质上是回避了河流综合利用必须考虑的种种技术上和经济上的复杂问题。"林一山今天要在毛泽东面前阐述得全面一些。谈完防洪问题之后,他把话题一转:

长江流域也有旱灾,全流域丘陵区占百分之二十二,其灌溉必须由大型工程远距离引水才能满足。长江有充足的水量,有超流域的全国意义。华北黄淮平原缺水,需要由汉江和长江引水灌溉,如按远景规划,这个地区大量改种水稻,黄河水源留灌蒙古沙漠。此外,从长江引水,还可以洗碱,更是永久效益。而这些都要靠以三峡水利枢纽为主体的流域规划来实现。

林一山动情地描绘着一幅河渠纵横,沃野千里,沙漠变绿洲,稻菽千重浪的田园风光。长江,就像孩子手中的一根跳绳,可以任他拉来引去。

在治理长江的诸多效益中,林一山这次侧重发电了。他大谈水电是我国工业动力的主要来源,这也是他在过去的论争中语焉不详的。

林一山先用了一大堆数字说明毛泽东最热衷的钢铁工业的发展与电力增长的比例关系,又用了一系列数字,说明其他耗电工业

对电力增加的需要。而要促使水力发电"大跃进",关键就是要建三峡这个超巨型水电站。

林一山认为:三峡蓄水位二百米最好,这样水电站至少可装机一千三百四十万千瓦,年发电量达一千亿度,耗电工业可以集中在它的周围。

又是一幅一挥而就的宏伟蓝图。

至于黄金水道的航运,林一山自然不忘提及:三峡大坝建成以后,三峡以上的长江将变成我国的"地中海",终年通行万吨海轮,以目前铁路运力计算,长江至少可以代替二百条铁路的作用。

至于有多少地方会变成"海底世界",以及由此会引发的移民等问题,大概是因为"不在话下",全都没提。

田园图、大电站、"地中海"……此时的林一山好像不是身在会场,而是还在飞机上,从云端看大地。

至于技术上的可能,林一山认为现有的三个方案,其施工难度同国外类似工程相比,没有什么不可克服的困难。

他估计投资总数约七十二亿元。这个数字,按当时电力投资占基建百分之十计算,国家负担得起。毛泽东这时追问:你会不会在中央决定上马之后又说不够?林一山答:不会,我们都算清了。没算清的从多不从少。

至于开工时间,林一山说:由于三峡枢纽的各项经济效益非常显著,因此我们不应当推迟兴建,而应尽早兴建,我们所用资料偏于保守,所以开工时间,宜在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前期,即一九六三年正式开工,一九七三年大坝全部完成。

林一山的口才,李锐在一九五二年参观荆江分洪工程时领教过,可是他觉得对手今天发挥得不够好:从内容看讲理想多,而分析理想与可能之间的关系很笼统,时常离题较远,听来显得驳杂,缺乏系统;从技巧方面看,他引用了外行不易明白的数据,"行话"过多。

林一山讲的时间,超过了两个小时。

李锐发言的特点是简洁扼要,针锋相对。

针对林一山上三峡工程的首要理由防洪,李锐首先论证三峡工程不是防洪的最佳方案。他将三峡水库与正在施工的三门峡水库对比:三门峡水库处于黄河中下游,能控制黄河流域面积的百分之九十,对防洪起决定性作用。而三峡位于长江上游末端,故只能管住上游到宜昌以上的洪水,控制长江流域面积的百分之五十,对处于中下游的几大支流则无能为力。据记载长江发生洪灾的原因,不一定是由于其上游来洪,主要还是由于其中下游各支流流域连续暴雨,江河猛涨,泛滥成灾。

李锐说:在长江广阔的流域面积内,汛期往往不在同时发生。有时中下游汛情严重,上游并无洪水下泻,有时上游闹洪,中下游却并无汛情。所以靠一个三峡大库防洪,作用是有限的,而且它将要在好多年内吃掉几乎所有水电基建投资,使其他多项对长江水患的支流治理有很好作用的水电工程都被挤掉,这只能妨碍长江防洪设施的总体建设,甚至影响全国水电事业的发展。

针对林一山手上的"荆堤一破,将死上百万人"这张王牌,李锐指出:它是没有根据的。李锐说,自古以来,北有云梦,南有洞庭,吞纳长江洪水。唐诗有"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之句。但后来云梦泽消失了,逐渐围成了沃土。引起人们关注的荆江大堤位于江北,由于明朝张居正(张是湖北人)采取"舍南保北"的政策,北堤历来比较坚固高大,而南面诸堤却低矮弱小。因此历次长江泛洪,到这里总是向南泛滥,即使是一八七〇年那样的千年一遇的特大洪水,处于江北的荆江大堤也并未被冲开,而是向南冲开松滋口,经洞庭湖入江。而今天的荆江大堤比八九十年前要强大得多,因此荆堤决口要死上百万人之说,实为危言耸听。

李锐认为,解决长江洪水灾害的办法,从战略上讲是先支后干,因为长江干流的洪水与支流息息相关,在支流通过修建水电

站、水土保持等措施进行治理,等于将长江洪水分而治之。这样既解决本地区的水患,又减轻了干流洪水压力。而逐步修建这些大中型的工程,国家财力也承受得起。

从战术上,李锐主张加固堤防和修建蓄洪区。李锐认为,堤防是我国自古以来也是世界各国行之有效的最好的防洪措施,决非落后不可靠之物。宋朝以前的荆江河段有九穴十三口南北分洪,所以那时是有河患无江患,如今已修的荆江分洪区也很起作用。历史与现实说明,长江最重要的防洪措施是加固堤防和分蓄洪水。

在李锐看来,靠大坝"拦"洪,大水库"蓄"洪都是在"堵",这对于解决洪水量极大的长江干流是很不适宜的,而修建堤防和修建分洪蓄洪区,替洪水找出路,找安置的地方,采取"导"的办法,才是解决长江洪水的正确途径。而且又是最省钱的途径。

对于林一山只字未提的移民问题,李锐做了特别强调:如按坝高二百米修建三峡水库,估计移民至少要一百零五万,这是极重要、极困难的问题。

可以看出,李锐和林一山有一点是一致的,即都强调了水力发电是我国工业动力的一个主要来源。但是在如何发展水电事业的问题上,看法又截然不同。

李锐主张用国家有限的资金积极修建那些投资少、工期短、见效快、规模适当的水电站,以解国家经济迅速发展而对电力需求的燃眉之急。他当场在桌子上铺开那张全国水电开发示意图。标在图纸上星罗棋布的水电站,令人一目了然,引起毛泽东和其他与会者的极大兴趣。

随后李锐强调:三峡工程技术问题很复杂,比如单就弄清地质情况就还需要多年的时间,何况一九五七年全国用电的总需求只有一百九十亿度,三峡一个大电站就要发电一千亿度以上,即使按当时预测的十五年后全国用电量将达到二千亿度,这个电站的发电量占全国发电量的比例也太大。

李锐曾和别人打过这样一个比喻：就像在一座城市建一座大型商场，它的规模同全城购买力应有一个适当的比例，全城各区还应分布有其他百货商场。如果一个巨型商场就占了全城购买力的二分之一甚至全部，甚至超过全城购买力，就很不合理。

李锐说：按苏联经验，最大电站的极限可达全国电力的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三峡一个电站就发这么多电，国家就要同时拿出巨额投资，在电站周围建一大批耗电企业；而建这些耗电企业的投资，就相当于电站本身投资的五至十倍，所以，左右三峡工程修建时间的是国家的财力，是经济发展的需要。这样的大电站中国几十年后才会有此需要。其他如多级船闸、电站机组容量、施工等技术问题，都是超世界水平的。

李锐接着谈到国防问题，又正中毛泽东的心事。毛泽东插话：这样的工程当然会吸引敌人注意，决不能遭敌人破坏。它关系到下游几千万人的生命安全啊！

李锐的发言，显然引起了与会者情绪的呼应。几小时前还为他"捏一把汗"的人们，神态都宽松下来了。

李锐讲的时间，没有超过半小时。

最后，毛泽东说：讲了还不算数，你们俩各写一篇文章，三天交卷。

第三天一早，胡乔木跑到李锐住处，着急地问李锐文章写好没有。此时林一山的文章已经印发。胡乔木接过李锐刚刚完成的文稿看了一下开篇，便说：主席在这次会上要求文章要准确、鲜明、生动，你的开头还不够鲜明。李锐又对开头作了些润色，便交卷了。

晚上，仍在原处开会，两人的文章已印发给大家。

林一山的文章两万字，李锐的文章八千字。

李锐文章有这样一些文字特别令人深思："三峡水电站所有重大的技术问题，可说无一不超过当前世界水平很远，当然这一点吓不倒我们，但问题是需要时间。""在实际工作中，有些技术问题允

许冒一定程度的风险,但有些技术问题绝不可有丝毫的冒险……"

时隔三十多年回顾五十年代在三峡工程问题上的林、李之争,我们不难发现,李锐对问题的思考和研究,的确有许多更深刻更独到之处。尽管他当时对泥沙问题、生态环境问题等都还没有接触,但他在战略上的"缓上"主张,为进一步研究、认识三峡工程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时间。

毛泽东称赞李锐文章写得好,意思清楚,内容具体,论点能够服人。批评林一山的文章"大而无当"。其实,林文作为一份长江流域远景规划的概要,虽有不足,但也有一定价值和见地。

会议不到半个小时就散了。其实胜负会前即已明朗。

毛泽东明确宣布:中央并没有要修三峡的决定……太集中了也不好,还得有别的电站。还说他对三峡还是有兴趣的,如果今后十五年能建成,那是赶美国的问题。

"超英国,赶美国。"对西方经济了解甚少的毛泽东,却时时把赶超这两个西方强国当做决定中国经济建设战略的出发点和归宿。这种"大无畏"的精神,深深影响了一个时代。

会后,毛泽东把三峡工程的问题交周恩来处理。五十年代这段三峡"公案"至此告一段落。至于同年二三月间,李锐在周恩来主持的三峡会议上又一次"舌战群儒",那已是一个月前那场交锋的余波了。

三十多年前的中国避免了一场灾难

就这样,在"大跃进"的紧锣密鼓声中中央作出的关于三峡问题的决议,是当年惟一的一份不符合"跃进精神"的决议。这份题为《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枢纽工程和长江流域规划意见》的正式决议,是在南宁会议两个月后那个掀起全面"大跃进"的成都会议上作出的。李锐列席了这次会议并参加了这个决议的起草。毛泽东

在这份决议的草稿上作出的“积极准备、充分可靠”的八字批示，完全可以理解为毛泽东认为这项工程的准备还不够充分，条件还不十分成熟，态度虽可“积极”，却不宜立刻上马。因此它成了成都会议上通过的三十几个“跃进”决议中惟一没有给那场即将爆发的国民经济重大灾难火上加油的决议。李锐固然功不可没，但这也说明，毛泽东当时还是能听进一些不同意见的。对于这一点，李锐后来在他的回忆文章中，总是不忘提及。

当世界科技水平已有了和当年不能同日而语的发展，当国内外修建巨型水电工程已有了丰富的经验和惨痛的教训，当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已大大深化，从而发现三峡这一超巨型工程原来竟还有那么多难题没能解决，而且至今解决起来难度仍然很大的时候，许多人感叹：如果当初三峡工程上马，将是中国的一场灾难！

第二节　福祸相生

毛泽东说:“你来当我的秘书”

李锐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比喻:有的人就像一幅油画,远看同近看效果是不大一样的。他说,我同毛泽东的关系,是经历了远看、中看、近看的。

李锐的比喻,虽不是人际关系上的绝对真理,却讲出了一个具有广泛意义的哲理。

对于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赞扬,李锐是持保留态度的。他认为自己在这场三峡之争中所以取胜,主要是因为对水电建设与国家经济发展的关系,作出了正确的分析。应当受称赞的是符合实际的科学态度和正确的经济观点,而不是词章。毛泽东呢?“但说文章好,未言经济长。”

毛泽东可不管李锐怎么想,他反正是看上了李锐这支笔。三峡问题的讨论结束之后,毛泽东指着李锐,“我们要有这样的秀才”,“大家都要注意培养秀才”。后来又把这个思想写进了《工作方法六十条》,其中第四十七条为“要培养秀才”。

在国家急需经济建设人才的时候,李锐在这方面的才能被毛泽东忽略了。散会前,他干脆对李锐说:你来当我的秘书。李锐忙说:恐怕不成,水电业务忙得很。

别人只当李锐是出于谦虚而推脱,纷纷讲赞成话。毛泽东又说:是兼职的嘛。事情就这么定了。

散会后,能够理解三峡工程轻重的人都很高兴,周小舟几次对李锐戏言,称他被毛泽东点了状元,大家觉得南宁会议出了两个“史无前例”:毛泽东让一个反对派的意见改变了自己的态度,是一

个“史无前例”;毛泽东这样选秘书,在党史上也是一个“史无前例”。

五十年代,毛泽东已步入神坛,李锐能获得如此殊荣,在世人看来是何等幸运!然而李锐却被这突如其来的结果,弄得忐忑不安。

谶语

在李锐的熟人中,父执李六如在延安时期当过毛泽东的秘书长;好友周小舟抗战初期当过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自一九四八年起任毛泽东的专职秘书。

李锐和田家英是四十年代初在延安相识的。当时,李锐在《解放日报》评论部,田家英在中央政治研究室。田家英有文章来,都要经过李锐之手。他们之间的友谊是始于文字之交,终成莫逆之交。后来李锐在有关田家英的一些文章中,多次讲过类似的话:多年来,我们之间可以随便谈心,没有什么顾虑。这是真正的交心,当然也是“危险”的交心。

所谓“危险”的交心,就是有时难免对毛泽东有所议论:如毛泽东的任性、多变,有时出尔反尔,捉摸不定,高深莫测,令人无所措手足等。因此,对于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难处,李锐是早有所了解的。

田家英和周小舟对李锐当毛泽东的秘书却很赞成。田家英觉得,毛泽东不熟悉经济,尤其不熟悉工业。现在毛泽东要亲自抓经济,李锐来了,可以在他的秘书中加强这方面的力量,多个帮手。

李锐一直十分清醒,他告诉田家英,自己那个心直口快、心里藏不住东西的脾气,自己认定的事情就要坚持到底的秉性,并不适合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尤其是自己不善于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对高层人事关系更不善应付,在这个位置上很容易惹祸的。

回北京以后，李锐向刘澜波、黄克诚这两位既是领导、又是忘年交的朋友再次袒露了心底的不安，说自己一定会“碰鬼”（湖南土话，惹麻烦）的。

他当时就有一种预感，预感到自己没有好下场。

想不到，这些都像谶语，在一年半以后的庐山会议上应验了。

第三节　庐山风云

近些年，当三大战役、开国大典等许多重大历史题材成为中国大陆银幕上的“主旋律”的时候，就有人半调侃、半认真地说过：庐山会议也是重大历史题材，而且人物个性鲜明，情节起伏跌宕，事件本身，就极富戏剧性，拍片子肯定精彩！

当然，真要把这类“重大历史题材”搬上银幕，还需要时间。也许，时间能使人们对历史更加超脱。

从“大跃进”到庐山会议

“大跃进”一词始见于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三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新高潮》：“有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跃进。”

毛泽东在为这篇社论写下的批语中，热情赞扬了这个词的发明者：“建议把一号博士头衔赠给发明‘跃进’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这篇社论是针对周恩来、刘少奇、陈云、李先念纠正经济建设中盲目强调加快进度、不注意综合平衡的一系列措施而发的。

毛泽东认为：一九五七年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低于一九五六年，是反冒进反错了。如前所述，在一九五八年一月的南宁会议上，他点名批评了周恩来和陈云，说他们反冒进犯了方针路线性的错误，离右派只有五十步。在三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今后只能提反右倾，不能提反冒进。五月，周恩来、陈云、李先念、薄一波在

八大二次会议上作了检查。不久,毛泽东在和田家英、谭震林的一次谈话中拍了桌子:"难道只有陈云能管经济,我就不能管?"同一时期,毛泽东对李锐也说过:"世界上还有比打仗更困难的事情吗?"周围的人都觉得,毛泽东当时那种兴奋的精神状态,很像抗战初期。

于是,毛泽东以统帅百万雄师的自信与诗人的热情、浪漫亲自到台前来抓经济了。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毛泽东在莫斯科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会议期间,提出了一个惊人的目标:中国要在钢铁和其他主要产品方面十五年超过英国。

毛泽东的决心,很快变成了中国经济建设的一场"大跃进"。

首先是各项计划指标的"大跃进"。

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标,比"反冒进"中周恩来、陈云主持制定的、八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二五"指标,工业方面普遍翻了一番以上,农业方面提高了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五十。

仅仅过了三个月,在北戴河会议上,"二五"指标又比八大二次会议翻了一番,要求在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二年这五年中工农业指标以年平均百分之四十以上的速度增长。十五年内超过英国的计划,八大二次会议跃进为七年,在这次会上变成了三年。

所有这些,既不是天方夜谭,也不是信口开河,而是确确实实的中央工作会议的决议!今天许多人或许会对当年中央最高领导层制定的这些指标感到不可理解,其实只要换一个角度去想就会明白:这不正是"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豪情诗意在指挥经济建设的具体体现吗!

毛泽东自有毛泽东的思路。周恩来、陈云南宁会议挨批后,一时,大家对毛泽东的思路都尽量去理解、去适应,去迎合与发挥。"反冒进"的话,再没人敢提了。

生产关系也实现了"大跃进"。按照当时非常流行的"生产关

系公有化程度越高，越可以大大促进生产力发展"这一理论，这年八月，毛泽东一句"人民公社好"，两三个月内，全国就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为了体现人民公社"公有化"体制的"优越"，随之而来的是大办公共食堂，是"一平二调"和越刮越烈的"共产风"。公社有权对农民的粮食和各种农产品统一集中，统一上调，靠行政手段无偿支援，不计得失，硬性摊派。所有这些，都等于把农民的劳动果实想拿走就拿走。

中国人起名，有体现时代特征的喜好，赵解放、田援朝、孙文革，还有李卫星、张卫星、沈卫星……如今，只要你遇到四十岁左右名唤"卫星"的人，便可以立即断定他(她)出生于"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

一九五八年是全国的"卫星"年。

河南小麦亩产七千斤的卫星刚刚放过，湖北水稻亩产万斤的卫星就腾空而起。安徽、江苏、湖北、河南成为早稻千斤省的卫星，四川、河南、安徽、甘肃人均粮食超千斤的卫星相继"升天"。

工业方面也在"大跃进"。钢铁产量一马当先。周恩来受到毛泽东批评后，咬咬牙把当年钢铁指标提高到六百二十万吨。谁知，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突发奇想，干脆翻一番，搞一千零七十万吨！

毛泽东的热情使下面大受感染。不久，广东放出了一年生铁产量(八十七万吨)一天完成的卫星；河南更是放出日产生铁一百三十多万吨，日产钢十万吨的卫星……

一九五八年的人民日报、各省省报以及各类新闻媒介，均为各种"卫星"的发射基地。那一连串套红的耀眼的通栏标题，即使不是诗人，也不难将其联想为卫星发射升空时的火焰。

上面的"高指标"是下面"浮夸风"的动力，下面的浮夸虚报又成为上面将指标一再提高的依据。国民经济很快陷入一片混乱。

在农村，高指标造成的繁荣假象使许多地方盲目乐观，把家底

都吃空了。上面又根据虚报的产量普遍实行超越农民承受能力的高征购。为了创造“奇迹”,大部分地区不顾效果,在耕作中盲目推行高度密植,使粮食大幅度减产。“公社化”以后,自留地、家庭副业又随之取消,这就使得农民在灾祸面前连个回旋余地都没有了。

全国出现了严重的大面积粮荒,那几个宣称亩产粮食千斤、超千斤的省份,都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

工业方面,“全民大炼钢铁”的方针,使数十万土高炉遍及全国城乡,炼钢大军占用了农村九千多万壮劳力,是这一年农业产量下降的另一个原因。过量的砍伐,使森林资源遭到严重破坏,上亿吨的矿石,上亿吨的煤炭,国家几十亿元的巨额补贴,几千万人的劳动,换来的是堆积如山、没有多少工业价值的“土钢”“土铁”。

在水电部门工作的李锐,对水利方面的情况体会更为深切。在“大跃进”浪潮的裹胁下,许多地方提出一年实现水利化,甚至几个月实现水利化。大量的大、中型水库、灌渠,在既无勘察设计、又无设备资料的情况下,投入大量人力、财力,大规模施工,白白挖掉大量耕地,结果建成后毫无效益,或者成为半成品。国家计委干部李云仲在滦县扒齿港亲眼看到该县为了修一条一百多里长的灌渠,挖掉了即将收割的一万亩小麦。由于事先未作勘察,雨季一到,整条渠全淤死了。负有“言责”的李锐,于是接连三次上书毛泽东,向他反映工业方面出现的混乱。

毛泽东对“大跃进”给经济建设带来的严重局面逐渐有所察觉。为此,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他连续召开了郑州会议(两次)、武昌会议、上海会议,研究解决农村中的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等问题,并且压缩了钢铁产量的指标。上庐山之前,毛泽东又视察了河南、河北、湖南、湖北,对“左”倾冒进的恶果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所以,庐山会议本来是准备纠“左”降温的。但是,毛泽东对自己钦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仍然绝对肯定,因此即使后来不发生彭德怀上书引起的逆转,庐山会议也不可能从根

本上改变当时的“左”倾局面。

庐山会议前期短暂的“反‘左’纠偏”

李锐是一九五九年六月三十日接到去庐山开会通知的。

上山前，彭真传达了会议准备研究的问题。李锐觉得，从毛泽东到地方负责人的头脑已开始冷静，想好好总结经验教训了。

在专列上，李富春召集北京上山开会的人开了一个短会。李锐在会上发言说：去年的教训是没有了综合平衡，万马奔腾实为野马脱缰。经济活动本身自有其规律，无论怎样“跃进”，也摆脱不了客观规律的制约。

火车上，李锐和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社社长吴冷西交换了意见，几个人对“大跃进”都基本上持否定态度。

初上庐山，大家游兴很浓。经济方面问题虽多，但想到只要能够反“左”纠编，找到正确方向，形势还是会很快好起来的，大家心情也就比较放松。

这种情绪，从李锐最初的三封家信及后来所做诗词中谈到的游山、跳舞、看戏等内容中不难看出。研究中共党史的人也都把从上山到七月十六日彭德怀上书前的这段时间称作“神仙会”。

会议开始后，按大区分为六个组讨论。李锐被分在中南组。广东、河南、湖北、湖南这几省的负责人都在这个组。刘少奇和朱德也都参加了这个组的讨论。

刘少奇在发言中说：“五八年跃进，吃了五七年的库存，预支了五九年。因此五九、六〇年都要补课。”但他又强调：“要革命就会出问题，不能怕出乱子。所以‘大跃进’可以搞。”这种观点很有代表性。

朱老总发言质朴而深刻：要认识农民还有私有者这一面。农

民对私有制要看得重些。供给制是共产制,工人还得发工资,农民就那么愿意共产吗?食堂自负盈亏,公家总吃亏,办不起来不要硬办,全垮掉也不见得是坏事。要让农民富裕起来,不会成为富农路线。这是有关五亿人的安定的问题。

陶铸是中南组组长。“大跃进”初期,这位广东省省委书记还是比较冷静的,但是一九五八年七月的中南五省协作会上,各省之间互相攀比高指标,广东省明显地“保守”了。开完会回来,陶铸就对省委其他负责人说:“再不浮夸,就是态度问题了。”于是广州地区也放出了蔬菜、甘蔗“卫星”和亩产水稻三万多公斤的特大“卫星”,特别是在高征购中开展的“反瞒产”运动,更是加重了人民生活的苦难。一九五八年广东粮食产量比一九五七年降了百分之三十五点六,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〇年三年消耗了森林资源可伐量的四分之一,而一九五八年全省合格的钢产量,只有四点二万吨。

但是陶铸在发言中认为这些都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仍然坚持要鼓足干劲,对“三面红旗”不能动摇。这个观点在当时也是很有代表性的。他对李锐说:我这个人是只左不右的。

在中南五省协作会议上高指标的攀比中,河南省提出的指标最为吓人。这次讨论中吴芝圃承认:河南共产风刮得厉害,虚报浮夸也最厉害。但讲到具体问题时,却只是避重就轻。

湖北王任重在上庐山前一直陪同毛泽东视察,他的心情是沉重的,讲了湖北的许多实际情况:“大跃进”掩盖了水旱灾情,五百万亩亩产几十斤仍报千斤,干部群众在“右倾保守”帽子的威胁下,不讲假话不好过日子。

湖南周小舟讲话就不客气了,他在会下就对李锐说过:农业的高指标是由上而下压上去的,“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根子还在毛泽东。因此去年讲大话、吹牛皮的一些人,一个时候很吃得开。会上发言时,周小舟更是直率地提出了对形势的看法:“不可估计太乐观。过去农业提出要赶日本,可见头脑发热的程度。”湖南省领

导所以说话这样气粗，是因为他们在这一年里对“大跃进”的许多荒唐做法是做了一些抵制的。因此这年湖南的生产形势比其他省都好，这一点连毛泽东也承认。

自从做了毛泽东的兼职秘书，李锐列席了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除郑州会议外的各次中央会议。身为会议工作人员，他在会上从不发言。然而对于“大跃进”，他在实际工作中的感触实在太多了！这一次，李锐破例在小组会上发了言。

李锐认为“以钢为纲”的指导思想不科学，使其他方面都失去了比例，结果钢铁本身也上不去。而且“以什么为纲”这种口号容易导致简单化、片面化、单打一，滑出界限。工业发展速度由钢来决定也未必合理，应该注意经济发展的综合平衡。

李锐的这些观点同毛泽东指导经济建设的思想正好相反。在毛泽东看来，李锐这种“综合平衡”是“消极平衡论”；在李锐看来，毛泽东是把“不平衡是绝对的”这一哲学观点绝对化并用来指导经济，因此喜欢人为地破坏国民经济的平衡关系，以为留出缺口的平衡才能带动经济发展。

对于毛泽东在“大跃进”中的这类想法和做法，李锐和田家英私下常有议论，他们感到：毛泽东对经济工作太外行，缺乏这方面必须具备的知识，在经济理论方面尤其没有钻研过。因此毛泽东处理经济问题就远不如处理军事、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

毛泽东也听信专家的意见，他要从他们那里找到“大跃进”的根据。有些人便投其所好，结果更加误事。地道的农民出身，下过地、种过田的毛泽东，何以会相信亩产过万斤？李锐在武昌会议时曾经向他提出过这个问题，毛泽东说，是看了某专家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里面讲太阳能利用了百分之几点几，就可能亩产万斤，因此就相信了。

在这一阶段的会议中，尽管大家对形势的看法不尽相同，李锐等人批评“大跃进”问题的发言有时会挨顶；田家英反映农村调查

情况的发言在西南组还受了批评；护短，对问题轻描淡写的情况也还不少，但反对浮夸风、共产风的总趋势还是明显的。这同大家在实际工作中的切身感受，特别是同毛泽东为会议定下的“纠偏”的基调有关。

南宁会议之后，李锐有过多次同毛泽东单独交谈的机会。每次交谈，李锐总是有什么说什么，从未感到拘束。“大跃进”这段时间里，李锐在同毛泽东的接触中，仍然对自己的观点直言不讳。

上庐山前毛泽东视察湖南时，李锐知道毛泽东曾向王任重讲过：去年计划搞乱了，“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便乘机进言：财经工作还是由陈云同志挂帅为好。当时在场的周小舟、周惠也当即附议。毛泽东不但没有表示反感，还说了陈云当总指挥好之类的话。

由于毛泽东最初也想在庐山会议上纠“偏”，所以对于一些反映“大跃进”问题的话也都听得进。七月十一日晚，毛泽东找了湖南人周小舟、李锐和在湖南工作的周惠一起谈话，戏言开个“同乡会”。在一片融洽的气氛中，李锐再次进言：去年是唯心主义，小资产阶级急性病大发展的一年，敢想敢干起了许多副作用，“以钢为纲”、“三大元帅”等口号不科学。毛泽东当即同意。还说，以后不提这些口号了。周小舟还讲了“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这句直接批评毛泽东的话，谈笑中，毛泽东也并未对此介意，甚至还自我批评，说自己有时也胡思乱想，有些事不能全怪下面各个部门。说一九五八年的问题主要出在综合平衡上。不料周小舟这句话传到柯庆施等人的耳朵里，成了他们后来给周小舟定下的一条罪状。

几十年后李锐回顾这段历史时，曾在一篇文章中讲过这样一个看法：

毛泽东最初所以还能听进一些反面意见，除了对实际困难有所了解，也想纠偏以外，还因为我是一个同实际

打交道的小人物(而不是一位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或常委),也许因此毫无反感,易于听取。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前,国家计委干部李云仲怀疑“大跃进”的上书,可说也是一例。毛泽东很看重这封信中提的意见,认为计委领导从未反映过。我们几个人在会议(指庐山会议——引者注)前几次被召见,毛泽东也是很认真听取我们的意见的。只是后来彭德怀、张闻天这些大人物开了口,事情才变得复杂而不可收拾了。

几位大人物开口前后

关于“几个大人物开口”的情况,许多关于庐山会议的文章和书都有记述。这里要提及的是,在彭德怀的上书未印发当天,毛泽东曾找周小舟、周惠、胡乔木、田家英和李锐进行过长谈。这五人都是很受信任或是很被看重的。毛泽东这次召见的用意,是想让他们这几个人知道,彭德怀同他在历史上不一路,启发这几个“不知世事”(毛泽东曾当着许多人这样说过李锐)的人,不要倒到彭德怀那一边去。

毛泽东的这番用意,当时几个人倒是都理解了。可是第二天,在田家英的住处,几个人聚在一起议论,仍然觉得彭德怀的信的内容很好,与他们自己的观点一致。李锐还激动地说:只有彭老总才有胆量,敢这样写。

彭德怀给毛泽东的信在与会者中引起了广泛的争论,甚至出现了尖锐对立的意见,这本来也属正常。然而反对者中一些人习惯“上纲上线”,使会议的气氛笼罩了一层阴影。李锐想起几天前毛泽东看过彭德怀信后和他们几个人的谈话,推想毛泽东当然也还要找其他人谈,不由得联想到这些人的发言是否会有背景,心中一阵压抑。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会议结束前要通过一个“会议纪要”式的文件，毛泽东委派胡乔木、杨尚昆、陈伯达、吴冷西、田家英起草。后来又增加了陆定一、谭震林、陶鲁笳、李锐、曾希圣、周小舟参与起草。然而这个定名为《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草稿)》的东西一拿到会上，就被认为是对“大跃进”成绩讲得不够，缺点却很具体而大受非难。于是，在小组讨论中，几个起草人纷纷奋起辩解。

李锐从会议初期讲问题不能畅所欲言、到彭德怀的信受指责、《议定记录》受非难这一连串的现象，意识到一个倾向性的问题。这种倾向与毛泽东“纠偏”的初衷南辕北辙。于是他在发言中说：

> ……去年还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某种空气与压力的问题，对于提出某些怀疑和反面意见的人，轻易戴上观潮派、算账派、促退派的帽子，压力是很重的。对五九年生产三千万吨钢的指标发生怀疑，曾认为是立场问题，离开总路线的问题。《经济消息》今年第三期发表了关于完成二千万吨钢所存在的一系列困难，即受到批评，听说当事人还作了检讨。去年六月到今年年初，确实有些反面意见很难提出来，很难展开讨论。

李锐把话题从会场外拉回会场：

> 这次庐山会议仍有不愿谈缺点、不愿听缺点的情况，一说缺点，就可能是否定成绩，这种压力还多少存在。对于《议定记录》草稿“关于形势和任务”部分的批评，有些是过重了的，彭总的信把一些意见提出来作为对立面，引起大家讨论，这种精神是好的。

这简直就是“顶风上”！

小组内外立刻引起了较强的反应,一些人在发言中纷纷针对李锐的观点进行批驳,说:大家没有感到有怕说缺点的空气。对缺点不是不讲,不在讲多少,是要弄清它的性质。缺点错误不是方针路线性的,是在执行正确路线中产生的等等。

也有向李锐作揖的。几位搞计划的"京官"说李锐说出了他们的意见。

李锐在会下也曾问过周恩来对彭总的信的看法,周恩来平静地说:也没有什么吧。总理并不觉得信里有什么"恶毒攻击"的祸心。在表面上还允许独立思考的这几天里,对彭总的信,不少人是持这种态度的。

说起来彭德怀之所以会给毛泽东写信,与周小舟有关。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武昌会议以后,彭德怀来到湖南。周小舟陪同到彭德怀的家乡湘潭乌石,以及韶山和株洲等地参观。两人边走边谈,对"大跃进"的种种政策和发展趋势深感不满,忧心忡忡。

上庐山之后,他俩又有过两次交谈,彭总表示:有些意见,最好能找主席敞开谈谈。又怕因自己的个性,谈不好。周小舟就根据自己前几天和主席开"同乡会"的体验,说:我们同主席谈话很随便呀! 并谈了"同乡会"那天晚上毛泽东如何听得进不同意见还作了自我批评,以及自己说了"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的话主席也不介意等等。

周小舟这番介绍,打动了彭总的心。于是他决定给毛泽东写一封信,反映自己对"大跃进"的主要看法。

后来周小舟被定为彭德怀反党集团成员,其中有两条罪名就是为彭德怀当参谋和提供材料。

黄克诚是在七月十六日彭德怀的信印发给大家后被通知立即上山的。和他一起上山的,还有林彪以及书记处和经济部门的几个主要负责人。他们的被召,同讨论彭德怀信有关。

一九五八年三月间，黄克诚曾到过湖南，他对陪同他的地委和军分区干部说：近几年，我们的干部中，有一种反常现象：不敢说真话，说真话的受压制打击，看风说假话的反被提拔重用。有些假话是上面逼出来的。上面瞎指挥，下面怕戴"右倾"帽子，就大放"卫星"。黄克诚最后说："我是见到什么问题，喜欢一吐为快，敢讲真话，实事求是，正面的意见，反面的意见我都听……"他讲这些话，是针对那段时间他走了几个省，觉得到下面了解真实情况很困难，有感而发的。

黄克诚一上山，李锐和舟小周就去看望他，两人谈到，在前一段会议中，存在着不能多谈缺点的压力，当谈到彭总的信时，黄克诚说：按照实际情况，缺点还可以说得更重一些。

黄克诚比别人更清楚毛泽东与彭德怀之间历史上的恩恩怨怨，也知道毛泽东这时召他上山的用意，但他还是在两天后的发言中，讲了真话，支持了彭德怀的意见。

李锐以往没有在张闻天的领导下工作过，只是一九四八年在列席东北局的会议时常听他的发言。那段时期，张闻天正在专心研究经济问题，经常率领巡视组到下面调查研究，花了很大精力分析了当时东北存在的五种经济成份(国营、合作化、国家资本主义、私人资本主义、小商贩)及相互关系，并据此提出了党对经济建设应采取的方针。

在庐山会议前的两次政治局会议上，张闻天都毫不含糊地表明自己对"大跃进"的看法，并认为在宣传中要承认缺点和错误。

整个庐山会议期间，由于不在一个组，以前又不很熟，李锐和张闻天只有过两次短暂的接触。一次是在彭总的信印发之后，有一天李锐同胡乔木、田家英、周小舟、吴冷西等几个说得来的人及陈伯达，在田家英的住处一起议论信的内容，张闻天进来了，也参加了这次"意气相投"的聚谈。

第二次接触是在张闻天的发言被当做靶子印发的当天，他们

偶然相遇，张闻天问李锐看过他的发言稿没有？李锐回答：看了，提到的那些缺点都是存在的。

李锐对张闻天的发言，当时是从心底赞同的，而且认为张闻天的发言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大跃进”作了全面评价，既有理论素养，又能比较全面地掌握情况，抓住了问题的本质，比彭总的信讲得更清楚。

七月二十三日事件

毛泽东终于按捺不住了，柯庆施一伙又乘机挑拨，说他们的矛头是对着主席来的，人都被他们拉过去了等等。毛泽东更认为自己的领导路线受到了挑战，于是一改庐山会议纠“左”的初衷，于七月二十三日突然召开大会，宣布反“右”！号召大家对“大跃进”的攻击要“硬着头皮顶住”。并且强调：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现在也不放弃。

毛泽东在讲话中虽始终未点名，却多处对彭总的信的内容严辞批判，向那些对“大跃进”表示不满的同志兴师问罪。

狂飙骤起，风云突变。

接着就发生了七月二十三日夜的事件。每当回想起这一夜造成的严重后果，李锐总为自己最初的举措懊悔不已。

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批彭德怀讲话以后，晚上，李锐想不通，去找周小舟、周惠交谈。周小舟比李锐还激动，他怀疑毛泽东的这篇讲话是否经过常委讨论，想三人一起到毛泽东那里去说个明白，周惠也觉得毛泽东变化太快。李锐认为：根据自己一年多的接触，毛泽东只喜欢柯庆施那样一些说大话、善迎合的人。像黄克诚这样比较稳重、多看困难的人就很不喜欢。周小舟说毛泽东的讲话让人转不过弯来，想三人一起到毛泽东那里去，哪怕吵一顿也好。

李锐觉得毛泽东正在气头上，这时去了也说不清。周小舟又

要去找黄克诚。李锐担心这样会被人说成是搞小组织活动。但未能阻止。三个人就一起去了。

黄克诚也是思想不通,心情沉重,连晚饭都吃不下。聚谈中,周小舟说,主席这样下去,就像斯大林晚年,独断专行,会导致党的分裂。李锐在激愤之中也说了主席的讲话是翻云覆雨,主席不能一手遮天之类的话。黄克诚一直劝他们有意见还是直接找主席谈。

临走时,彭德怀到黄克诚屋里来了,因屋里已无多余的椅子,李锐等三人向彭总打过招呼后就起身告辞了。此时此刻,他们几个多想再和主席开一次"同乡会"、"交心会",倾诉一下满腔忧虑、困惑和痛苦,然而几天前的一切,却似乎已经恍如隔世了。

转向

从七月二十四日开始,会议的方向完全转向批判彭、黄、张、周。李锐是列席会议的工作人员,可也被作为重点在小组会上受批判。

小组会上有人揭发李锐在去庐山的专列上说过"五八年大跃进出了轨,翻了车"。其实李锐当时只是转述胡乔木的一个比喻。但此时李锐一口咬定是自己说的,是说不按轨道走就会出轨,比喻的是综合平衡问题,从而撇开了胡乔木。揭发者说,他是听柯庆施说的。从此,"李锐说去年翻了车"就再也讲不清了。

这天中午吃饭时,柯庆施知道了李锐在小组会上的情况,就倒了酒走过来跟李锐干杯。想起遭到的暗算,李锐心里一股怒气,就大声说:柯老,你是看见过列宁的人,何必跟我们后生小子过不去。说完就转回餐桌,硬是不和他干杯。几桌人都听到了李锐的这句话,看到了这位"柯老"被弄得十分尴尬。

论年龄柯庆施比李锐大二十几岁,论资格两个人也不是一个

层次。他们之间能有什么芥蒂呢?

南宁会议上,柯庆施是大红人,后来在成都会议时,他看到冶金部的一份报告受到毛泽东的表扬,便也急着想写一篇东西在会上印发,内容是十五年内,全国人人都要成为大学生。他找李锐起草,李锐觉得他谈的空空洞洞,便勉强凑了一两千字。此文既没在会上印发,更没讨得主席的赞扬。柯庆施大失所望。事后向田家英发牢骚:李锐没把文章写好。以后中央开会,他必带上张春桥,不再找李锐了。

李锐晚年回忆自己当时不与柯庆施碰杯一事,认为:这个细节一方面说明自己"少年气盛",同时也说明,会议气氛还没有像后来那样紧张,所以还能允许我如此放肆。事后,李锐还得意地把这件事告诉了周小舟和周惠,他们听了也很高兴。那时,他们还不知道大祸即将临头。

七月二十六日,李锐开始在小组会上检讨。当时他必须辩明自己对总路线、"大跃进"是拥护的,在工作中也是贯彻执行的,只是对钢铁指标定得过高,与其他方面难以平衡有意见,而这些意见去年曾三次写信并当面向主席反映过。

至于以前在发言中谈到的"不该对提意见的人施加压力"的问题,是因为觉得像这样的会议,主要应总结经验教训,缺点谈透,问题才搞得清楚。

李锐说他对彭总的信开始是同情的,只是觉得一些词句,提法欠妥。听了主席的讲话,对许多问题比过去看得深了一步,受到很大教育。

这个检讨因"太不深刻",没有得到小组多数人的通过。

"对事,也要对人"

形势继续急转直下。"龙颜大怒"如野马脱缰。尽管彭、黄、

张、周以及李锐等在会议前期对“大跃进”持批评态度的人普遍做了检讨，尽管没有人再敢说“大跃进”半个“不”字，毛泽东仍决定：事是人做的。对事，也要对人。

自从七月二十六日传达了毛泽东的这一指示以后，犯错误的不再是认识问题，而是有组织的反党活动。李锐当初担心的七月二十三日晚的聚会也真的成了“小组织活动”，被一再追查，成为后来将他们定为“资产阶级军事俱乐部”、“湖南集团”的事实根据。

七月二十八日，第一组小组会仍集中批评李锐。李锐作了第二次检讨。承认自己迷失了方向，承认自己二十日的发言（为《议定记录》辩解的发言）精神不对头，“实际上对彭总的信可说起了呼应的作用”。说自己会议初期读书、看材料，搞比例关系，钻综合平衡问题，以及“大跃进”到底以何种速度为宜等问题，“这完全是一种书呆子气息”。

意外的召见

正当形势日益严重的时刻，七月三十日一早，李锐意外地得到毛泽东召见的通知。同被找去的还有黄克诚、周小舟、周惠。这是继七月十一日的“同乡会”、七月十七日针对彭德怀的信的“打招呼会”以后，毛泽东在庐山会议期间对李锐等人的第三次召见。

气氛相当缓和。当李锐等人反映当前会议空气太紧张，许多问题难以分辨时，毛泽东说：要容许自由辩论，容许交锋。李锐等对有人说他们是“湖南集团”很反感。毛泽东说：这是一种误会，不必介意。接着毛泽东又谈起长征中的一些往事，暗示他们不要再受彭德怀的影响。

谈话结束后，李锐颇有轻松之感。遇到田家英，便把情况告诉了他。家英却说：决不可轻信，大难还在后面，他对毛泽东的反复无常和会议发展的内情，均比李锐清楚。家英还激愤地对李锐说：

彭德怀是政治局委员，政治局没有开会讨论，就让小组会去批斗，太不应该了。

为了消除毛泽东的猜疑，李锐经再三考虑，接受了胡乔木的建议，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明他和黄克诚、周小舟、周惠等人以往完全是工作关系，而对彭总则根本不熟悉。这次会上对“大跃进”的观点确实比较一致，但并不是相互串联的结果，而是对会上讲缺点会有压力有共同感触，所以七月二十三日听了“讲话”后感到紧张，就聚在一起交换了看法。

李锐这些解释，都是针对所谓“湖南集团”而做的。他希望毛泽东相信他们并没有搞什么“非组织活动”。并在信中用“我是以我的政治生命来说清楚这件事”做保证，当然他没有汇报他们在一起说过“主席晚年像斯大林”之类的话。

毛泽东将这封信拿给政治局常委们传看了。

列席两次中央常委会

为了让他们这几个人更清楚问题的性质，毛泽东决定让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列席七月三十一日和八月一日给彭德怀定性的常委会。

两次常委会，毛泽东同彭德怀算历史总账，说彭德怀在历史上十分之七是在同他唱对台戏，历来有野心。历来要用他的面目改造党、改造世界。

无论彭总怎样解释信只是写给毛泽东一人看的，毛泽东仍断言：彭德怀的信是准备发表的，是要组织队伍，争取群众，信的锋芒是对中央的。

常委们又开始“适应”和“理解”毛泽东的思想了，他们按着毛泽东的调子，不时插话，挨个表态，对彭德怀进行谴责。

虽然都在努力“紧跟”，但也有跟上、跟不上之别。朱德态度比

较温和，就信谈信，话还没讲完，就被毛泽东不耐烦地打断，奚落为“隔靴搔痒”。林彪插话声色俱厉：彭德怀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中国只有毛泽东是大英雄，谁也不要想当英雄。

后来通过的八届八中全会的纲领以及给彭德怀定性的基调，就是林彪讲的这几句。

除了批彭德怀，毛泽东的讲话还不时“旁敲侧击”。讲到张闻天，毛泽东说：洛甫（张闻天）的马克思主义哪里去了？你们要瓦解党，这回是有计划、有组织、有准备，从右的方面向正确路线进攻。

讲到周小舟：是否小舟被永远拉过去，看小周的态度……有些事你不知道，信的目的何尝不知道？

讲到李锐：李锐动摇，去年十一月到苏联，同留学生谈话，说“大跃进”搞糟了。

“定性”之后

两次常委会之后，按照毛泽东的意思紧接着于八月二日召开了八届八中全会。宣布两次常委会对彭德怀问题的定性。中央委员接到通知后纷纷上山，掀起了一个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高潮。为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三面红旗，几乎人人上阵，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和“资产阶级军事俱乐部”展开猛烈的批判斗争。

李锐不是中央委员，拿他自己的话说：“进反党集团还不够格。”于是忝列第五。被定为“彭德怀反党集团的追随者”。

不能说李锐对此没有思想准备。在起草“反党集团文件”期间，田家英曾悄悄告诉李锐：问过总理，没有李锐的名字。但毛泽东对秘书林克说：朱德是老右派，张闻天也是，李锐这次也是个右派。

接下去，是连日无休无止的检查和批斗。

李锐作为小组批斗的重点，不仅要从早到晚交代、检讨、接受批判，还必须对各种可怕的揭发、质问做出回答。

——庐山会议的前一段，你经常与周小舟来往，并放出会议有压力的空气，你究竟讲了些什么？

——黄克诚头天上山，第二天你就和周小舟聚到那里，又讲了些什么？

——毛泽东同志讲话后，你们当晚又聚到黄克诚那里，两次都有彭德怀参加的，讲了什么？交代清楚。

有时李锐刚交代了几句就被打断：

——不要这样解释了，要划清界线，和盘托出。

——从你的一系列言论、活动看，你是系统地反对总路线的。不仅上阵，而且是打先锋的。

——你说你这次来庐山带来很多关于比例关系的资料和本本，显然是准备进攻的。

几天以后，根据重点批斗彭、黄、张、周的格局，进行了重新分组，李锐和彭德怀分在一个组。这对李锐来说压力一下子减轻了许多。但是，目睹批斗中对彭总尖刻的语言、严厉的质问，乃至令人难堪的人身攻击，仍使李锐痛苦万分。

七月二十三日夜他们在聚谈中说过的"主席很像斯大林晚年"的话终于被捅开。八月十日李锐被通知到黄克诚组对证一件事。当时黄克诚正因二十三日夜的聚会被追逼交代。一看到李锐被带进来对证，就以为李锐已和盘托出，于是讲出此事。李锐那封以"政治生命"来保证的信，由此变成欺骗主席的罪证！

李锐在交代事情经过的过程中，仍然反复强调当时黄克诚是怎样批评了他们，让他们有错误就好好检讨这一点。与会者又去找周小舟对证，周小舟承认了。

这句话的捅开在会上引起的反响是爆炸性的！然而李锐最担心的还是他和田家英、胡乔木之间的交往。当时，会议的简报对此

已有所反映，再这样追逼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如果他们之间对毛泽东的那些议论再被揭发出来，对毛泽东的威信也没有好处。

李锐把"罪过由我一个人承担，人事关系到周、周、黄为止，决不能再扯宽"的想法告诉了薄一波，薄一波十分同意。于是李锐立即写了《我的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的扼要交代》，承认自己欺骗了主席，承认自己同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有湖南宗派关系。这样就把范围局限于反正大家都已知道的这几个人之间。李锐给自己戴上了大得不能再大的帽子，免得再因"不彻底"而被继续追问。

然而在几天以后的一次大会上，周小舟在被逼交代时还是提到了李锐和田家英的交往，甚至提到了田家英曾告诉李锐如果允许离开中南海，他将向毛泽东进言三条，一是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是不要百年之后有人来议论；三是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

李锐当即站起来大声说道：这三条意见是我自己的想法，跟田家英无关。大概是小舟听误会了，这完全是由我负责。

决不再牵扯田家英和更多的人，这是李锐此时惟一的想法。幸亏刘少奇马上说了一句：李锐不是中央委员会的人，他的问题另外解决。

一场迫在眉睫的险情，就这样被掩盖过去了。

八月十一日下午的大会上，胡乔木针对"主席像斯大林晚年"一说做了长篇批判发言，层层分析毛泽东的英明伟大和这一谬论的荒唐与反动。之后，毛泽东也做了长篇讲话，其中提到：李锐不是秀才，是俱乐部的人，想把秀才们挖去不要妄想，(秀才)是我们的人。

毛泽东这里讲的"不要妄想挖去"的秀才，显然是指田家英、胡乔木。至此，李锐既达到了不牵连别人的目的，同时，也彻底地把自己置于了死地。

八月十六日，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彭德

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

后来李锐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文字里，屡次提到他在山上时有一种很悲观的情绪。我问他这种情绪具体指什么，因为外面有人传李锐当时想到了死。李锐回答："是失望。"

这种失望之深刻，可以从另一事例看出：

庐山会议结束后，水电部党委决定开除李锐的党籍。国家机关党委负责人找李锐谈话，了解李锐对这一决定的态度。李锐很痛快地告诉他：同意开除，我没有意见。

第四节　留得信史照人寰

“实录”成书始末

一九七九年一月，李锐重新工作以后，中共中央组织部退还了多年审查中强迫李锐上交的一切资料，李锐在清点了这些东西之后，发现惟独少了一个黑皮笔记本。

这个黑皮笔记本是李锐在庐山会议期间使用的记录本，里面详细记载了那翻天覆地的四十多天中，许多人物的表现，大大小小的事件，以及记录者当时的感受。

“是非曲直由人断，日久自然明。”这是彭德怀在庐山挨批斗时，对私下关心、同情他的人说过的一句话。即便是几十年后，我们也不难体会，讲这话的人，心境是何等凄凉，胸襟又是何等坦荡！对现实的无奈，对未来的期待，问心无愧的赤诚，违心认罪的不服，真可谓集百感于一言！新中国成立四十多年，历次政治运动中被冤枉的人不会少于千万，许多人没有像彭德怀这样说，但是那话的意境所构成的精神支柱，却几乎是所有过来人都曾有过的体验。

是非曲直由人断，日久自然明！正是基于这种坚定不移的信心，李锐对这个黑皮笔记本格外珍惜。用李锐自己的话来说，这是“为了历史也为了自己”。

从庐山回到水电部挨批斗的日子里，李锐将自己的日记、家信、笔记等物统统上交，惟独留下了这个黑皮笔记本。在以后漫长的岁月中，他天南地北的几次下放劳改，都把这个笔记本小心翼翼地带在身边。直到一九六六年被关进秦城监狱前，李锐知道这一次这个小本子是留不下了，他怕丢失，就在封里写上“李锐庐山会

议记录本”几个字，然后和其他东西一起交给了来逮捕他的人。

现在，偏偏是这个最为重要的记录本不见了。

经历了那么漫长的动乱年月，人世沧桑，权柄更迭，这些材料的管理不知几易其人，几易其地。要寻回一个笔记本，不啻大海里捞针！可李锐实在不甘心。猛然间，他想到，那次被捕与陈伯达有关，或许这能成为一条查寻的线索？

他把这个情况向中央组织部做了反映，请求他们帮忙查找。

等待的日子，是在希望与担心的焦虑中度过的。

是上苍有意要将这段历史真相昭示人间，还是神灵不忍辜负了冥冥中那些冤魂的企盼？是李锐的猜测分外高明，还是命运这次对他特别青睐？不管是哪种因素起了作用，总之，又过了一些时日，这个黑皮笔记本真的在陈伯达的档案中找到了！

笔记本上没有“专案办公室”的编号，可见一开始陈伯达就将它取走了。也许，希望这段历史不要再见天日的人，还不止陈伯达一人。

然而，黑皮笔记本偏又回来了！它的失而复得使得中共党史的研究多了一部极其珍贵的史料，这就是李锐依据这本笔记及庐山会议的有关资料，写成的《庐山会议实录》一书。①

一九八〇年秋，李锐参加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稿的讨论。他是国务院第十组（能源组）的组长。重新评价“庐山会议”，自然是会议面临的“若干历史问题”之一。李锐在小组里受大家敦促，作为“庐山会议”的参加者，他用了半天时间，讲述了庐山会议的经过，在与会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当时他发言的主要依据，就是那个黑皮笔记本。

---

① 此书一九八八年由春秋出版社和湖南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内部发行；一九九四年经过李锐增订补充后，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公开发行，反响很大。目前，李锐又作了大幅增订，作为三版本，将仍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责编注。

会议简报以两万多字的篇幅刊出了他的发言。负责《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工作的胡乔木，看到这份简报以后，非常激动。二十多年的沧桑，谁又能想到，李锐凭着一个小本本，竟能把当时那么惊心动魄、错综复杂的过程叙述得历历在目。参加过庐山会议至今健在的人虽然也还会有一些，但并不是谁都能把当时的情况说清楚。因为参加者中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掌握全局情况，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曾深入漩涡的核心，而李锐所处的位置却具备这些条件。更加难能可贵的是，李锐有这种历史的眼光，有记录历史的意识。

按捺不住胸中的激动，胡乔木提笔给李锐写了一封信：

> ……看了你在小组会上关于庐山会议的发言，真是高兴。很多事情我都忘了，有些不知道，想因你的日记又完璧归赵之故。因此想起，你是否可以负责写一庐山会议始末史料(另可找一两位合作者以求比较完备和比较客观，请提名)，写出后再找有关同志补充审定。这很要紧，值得付出心血，万一我辈都不在了(人有旦夕祸福)，这一段重要史料谁来写呢？会写成什么样子呢？同意否请告。
>
> 祝好
>
> 胡乔木
>
>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十九日

这封信与李锐的想法可谓一拍即合。李锐也意识到，这些东西如果不写出来，当事人一死，说不定就会给历史留下空白，或使事情的真相永远难以弄清。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一九八八年夏天，李锐在青岛完成了这部书稿。

其时有关庐山会议的情况，社会上已有数种书刊流传，其中涉及的史实真伪并存。

《庐山会议实录》，第一次由亲历者揭示了中共党史上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详细过程。李锐用大量第一手资料证明："毛泽东晚年已经成了一个空想社会主义者。""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实际上是一场为维护空想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争。"

关于庐山会议的斗争是"路线之争"还是"权力之争"的问题，几十年来，社会上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苏晓康的《乌托邦祭——一九五九年庐山之夏》是倾向于后者的，西方一些人也比较欣赏"权力之争"的说法。我曾就这个问题请教过李锐，李锐说："庐山会议本质上还是路线之争。因为毛泽东认为是自己的领导路线受到了挑战。当时毛泽东根本不会（而且谁也不会）怀疑他的地位有什么问题。不像'文革'中的'二月逆流'，那时毛泽东的确感到自己有可能成为少数而连红卫兵都利用起来。"

李锐在《庐山会议实录》一书中也对自己的这一看法作了更加系统的阐述：

> （毛泽东）一直把"大跃进"、"人民公社"看成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不容许怀疑和反对；至于运动中有偏差和问题，则认为不必大惊小怪，是前进中的困难，是不可避免的，不断纠正就是了。如认为公社已整顿得差不多（还要保留公共食堂），工业再调整一下指标之类，而最要紧的是，劲可鼓不可泄，这样，形势就会好转起来。毛泽东的认识，是党内大多数高级干部的共识。当时，有谁不愿意尽快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呢？有谁不向往"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呢？当然，也有部分同志在严峻的事实面前比较冷静，对党内普遍滋长的"左"倾思想忧心忡忡，因此，对纠"左"的认识程

度比一般人超前一些，这就是“彭、黄、张、周及追随者”，以及后来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一大批人。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上书言事，对总路线和“大跃进”还是肯定的。他的不同意见，表现为把错误出现的原因，归结为领导者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有问题，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背离了“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应该从指导思想上纠正“左”的东西。彭德怀尤其是张闻天对“左”的错误的性质和程度的认识，比毛泽东深化了一层，就被认定为“怀疑”“三面红旗”，当然不能容忍。毛泽东当时说得明白：一个百花齐放，一个“大跃进”，一个人民公社，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这三件事要向全世界宣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

当我从《庐山会议实录》一书中读到彭、黄、张、周、李锐在庐山会议前期那些无所顾忌、实事求是的言谈，真为他们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由衷地感佩；但当我看到庐山会议后期，在泰山压顶般的政治压力下，他们为了维护党的一致，维护毛泽东的威信而被迫出卖自己，从那被扭曲的灵魂中流泻出来的一篇又一篇检查时，简直不忍卒读！

书中记述的李锐当时的一段感受读之令人心潮难平：

八月十三日至十五日，连续开全体大会，彭、黄、张、周作全面检查，大家再批评，这当然是进一步加码，最后定性，尤其是逼彭德怀承认是老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也是魏延式、纳吉式的人物。这也是为作出反对“反党集团”决议而必须进行的最后程序。

……我觉得很悲观，我想，这是中央委员会，这是我们党最高领导层的会，怎么竟没有一个人敢于出来讲半

句公道话呢。

这本书于一九八九年上半年出版后，五年中一直是“少量刊印，内部发行，仅供党史研究和有关同志参考”。所以，尽管它被海外学者广为研究、引用，但直到一九九四年六月该书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为止，大陆竟然没有一篇关于它的评介文章。难道历史上这如此沉痛的教训不该“让广大人民群众都知道”吗？

遗憾的是，有些人甚至糊涂地认为：该书“有损于毛泽东的形象”、“泄密”等等。

一次，胡乔木遇到李锐，对李锐说：“是我让你写的，有什么问题我承担。”

李锐和胡乔木是一九三九年夏在中共南方局召开的青年工作会议上相识的。同年年底，李锐来到延安，任中央青年委员会宣传部宣传科科长，胡乔木任宣传部部长。胡乔木对李锐的才华和思想的敏锐相当欣赏，李锐对胡乔木的学识和政治水平也很佩服。彼此交谈很少顾忌。新中国成立后，从三峡论争到庐山会议，胡乔木同李锐不仅观点一致，而且还经常帮他出谋划策，足见其交情之深。然而，若干年后，当中国跨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他们之间在有些问题上却发生了较大分歧，此是后话。

公道自在人心

读完《庐山会议实录》不久，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陕西韩城拜谒了东濒黄河、西枕梁山的太史公祠。

当我在献殿前默读后人书写的这幅楹联时，心情格外激动：

刚正不阿留得正气凌霄汉

幽而发愤铸成信史照人寰

横批是:穆然清风。

讲真话不容易。能为民族、为人类留下信史的人,必然会得到人民永远的崇敬。

尽管《庐山会议实录》发行的范围极为有限,春秋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主持出版这部著作的原湖南出版局局长李冰封和李锐本人还是收到了不少通过各种途径得到这本书的读者的热情的来信。

诗人毕朔望在信中说:

李锐此书宜广为流传如昔之太上感应篇者。我从北戴河休息十日后回京一口气看完——不过其间转录的一些废语(消磨了我辈大半生)实在不忍卒读。爱恨交集,这才是真正有价值的……

老出版家、翻译家、作家王子野在信中写道:

冰封同志:

承蒙关照,今天收到李锐的大作《庐山会议实录》,我一拿到手就一口气读完三分之一,实在是部佳作,应当谢谢你!

语言学家吕叔湘因没有按期收到出版社原先答应给的赠书,急急致函曰:

冰封同志:

六月三十日手稿及时收到。《实录》一书我想再等待些时,现在又一天过去了,仍没收到,大概被弄没了。尊处如尚有存书,仍恳惠赐一本,李锐同志的新作素所钦

仰，不愿失之交臂也。

不久，出版社又另寄上一册。
作家萧乾在一封寄给该书责任编辑朱正的信中说：

德豫兄寄来一册尊编的《庐山会议实录》，我花了两天时间一气读完了李锐同志这本巨著，真是感慨万千。如果要我选十年来三本好书，我首先选这本。同《乌托邦祭》一比，那本只是写了气氛，而实质性的内容尽在此书中。真难为作者那样认真地记录。他的插语不多，但句句深刻，这本书百年以后也会为人所珍视。未来史家会感谢作者——也感谢你这位责编。你做了一件大好事！

建议早日改为公开发行。希望李锐同志有新著，更多地向我们展示历史……

钱钟书先生的信是写给李锐的：

锐翁道席：久阔音问，偶闻动定，殊以为念。

惠赐新著，愚夫妇递番研读，惊心眩目。公以局中人，述幕后事，欲识东坡所谓"庐山真面目"者，斯焉取斯。记原稿本失而复得一节，可愕可喜，洵有如贵乡曾剃头自传墓铭语："不信天，信运气。"弟三年前大病以来，衰病相因精力短乏，惟兄公老当益壮，善自珍惜。草此，报谢。

即叩冬安。弟钟书敬上，杨绛同候。

李锐和钱钟书交往并不多，只是与好友黎澍一起去看望过他一回。当时，钱老送李锐一本《谈艺录》，李锐便回赠了一本《庐山会议实录》。

第二章　谷底行

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命运的一次转折。从此，毛泽东把"三大改造完成以后，国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仍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从党外引申到党内；把阶级斗争的重点也从党外转移到党内。并把矛头指向党的领导层。从此，国无宁日，党无宁日。

庐山会议，也是那些对"大跃进"不满、敢于犯颜直谏之士命运的转折：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被分别调离了国防、外交、省委第一书记的岗位，当时保留的他们的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的职务，也随着阶级斗争的年年深入，在"文革"之初结束了。

庐山会议以后，全国二十几个省大多揪出了对"大跃进"表示过不满的"反党集团"，继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揪出五十五万"右派"以后，"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再次把中国的三百八十万"精英"从波峰推进浪谷。

这是个多么深的浪谷啊！谷底的道路是那么屈辱漫长，谷底的世界是那样艰难孤寂。多少人没等走出谷底便精神崩溃，因忍受不了精神和肉体的痛楚而在下一个浪潮涌起前便葬身谷底！

李锐算是这些落难者中较为幸运的，他活了下来，但那血口般的谷底吞噬了他生命中四十二岁至六十二岁这整整二十载的壮岁年华。

第一节　“李锐反党集团”

从庐山回到北京

一九五九年八月下旬,李锐从庐山回到北京,回到水电部。在这之后的半年多时间里,李锐每天生活的主要内容就是挨批斗。

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全国迅速掀起声势浩大的“反击右倾机会主义”的高潮,水电部是全国“反右倾”的一个分战场。军委批斗彭德怀、黄克诚“反党集团”;外交部批“张闻天反党集团”;湖南批“周小舟反党集团”,水电部的李锐自然也要给他凑出个“反党集团”。于是水电部里因李锐而受牵连者达一二百人之多。

先是在部里批斗,然后又从全国水电系统调来一批人扩大声势深入批斗。

这场风暴之初,还有过这样一段小插曲:

从十八岁参加革命以后,李锐一直为无暇尽孝而不安。他曾向母亲许诺:国庆十周年之际,接母亲到首都来观光。一九五九年九月下旬,在长沙的母亲便张罗着准备来北京。和母亲住在一起的大姐李琬华已在半个多月前接到李锐来信,知道弟弟的情况发生了剧变,此时只能对母亲以实相告,劝母亲千万不要去北京。而母亲不听则罢,一听更是执意要去。琬姐只得请了一个多星期假陪同前往。到北京以后,她将母亲安置在父亲生前的老友家中,自己去看望了弟弟,对他只说是自己来京办事,未提母亲。

当时李锐正陷入昼夜车轮转式的批斗之中,琬姐不能让弟弟因母亲的到来加重精神负担,同时也不能让母亲见到自己深爱的、引为骄傲的独子,在一夜之间便被当成反党集团的头子批斗的种种惨状。于是她千方百计哄骗着母亲在北京住了几天便一起返回

长沙。这以后,当母子终于相见,已是二十多年后的事情了。

水利电力部党组在一九七九年的一份《关于对“李锐反党集团”平反的决定》中概述了当时的情况:

> 一九五九年反右倾整风运动中,水利电力部党组错误地将李锐等同志定为“以李锐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将张铁铮、季诚龙、陈牧天、常流同志定为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李名播、徐祖德同志定为一般成员。从一九五九年八月至一九六一年一月,部党组多次召开科长以上党员干部参加的党组扩大会,还召开了职工大会,除我部在京单位全体职工参加外,并邀请外地水电系统的设计院、工程局等四十个单位的代表参加,对“李锐反党集团”进行了批判斗争。同时,把原电力部一九五六年派到长江三峡规划办工作的李善民、章冲同志视为李锐同志的“亲信”,还有韩寓吾等一些同志,[①] 都受到点名或不点名的批判……
>
> 当时部党组对上述同志是以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反党集团”来进行批判斗争和组织处理的。这些同志被错误定为“反党集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把他们对水利建设、水电建设和三峡规划的方针政策和重大技术课题的不同意见,视为反党、反中央、反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把他们之间的正常的工作关系和同志关系,

① 引者按:张铁铮、季诚龙为水电总局副局长,陈牧天为总局计划处处长,常流为北京水电设计院院长,李名播为专家办公室主任,徐祖德为上海水电勘测设计院负责人,韩寓吾为上海水电勘测设计院院长,李善民、章冲为中南水电勘测设计院正副院长。

> 视为非组织活动的“集团”,以致作出了错误的决定。其结果,不仅使这些同志长期蒙受不白之冤,身心受到不同程度的摧残,遭到不公正的待遇,也使水利电力事业(主要是水电建设)受到不应有的损失……

中国的语言文字在有些场合是那样富有表现力,而在另外一些场合又显得那么干瘪贫乏。哪怕是刻骨铭心的屈辱,哪怕是骇人听闻的荒谬,哪怕是不堪回首的痛苦,只要经过这类文牍的概括、抽象,立刻会变得使任何人无动于衷。时隔二三十年,我们从上边这段叙述中,实在不太容易感受到当时“惊心眩目”的气氛。

好在我发现这份“平反决定”中还有这样一段文字:

> 一九六〇年二月,水力电力部机关党委办公室还特地编印了《批判斗争李锐反党集团发言选编》一书,发至全国水利电力系统各单位,使一些同志在所在单位又受到批判斗争和组织处理。

根据这一线索,我开始了多方查寻,终于找到了“平反决定”中要求彻底销毁的幸存的一本《批判斗争李锐反党集团发言选编》。

这不是出于好奇,而是为了进一步弄清那场“斗争”的内涵;这不是展示愚昧,而是想告诉读者,我们的民族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曾经陷入过怎样的误区。

水电部的批判斗争

果然,刚一翻开这本“批判发言选编”,我立刻感受到当年水利电力部充满硝烟烽火的斗争会场场面:

台下攒动着一片黑压压的仇恨与虔诚,“批判斗争李锐反党集团”的巨大横幅横贯主席台上方,硕大的黑字如一块块巨石悬在被斗者头顶。

然而“反党集团”的头目李锐并不“服输”,听了×××的批判后,他认为与事实不符,马上找到会议主席,指名要某人来对证。然而,在这种场合谁会为你“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作证?结果理所当然地遭到迎头痛击,“李锐不老实,罪加一等”的口号声再次轰然而起……

对李锐“反党集团”的批判深刻而全面: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业务路线;从现象到本质,从现实到历史。

庐山会议上张闻天被批斗后,曾写过一份十分全面的检讨,说自己从六个方面反了“总路线”:一强调发展生产力,把建立社会主义物质基础,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任务。二强调改善人民生活福利,强调社会主义国家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在物质生活水平上进行和平竞赛。三强调利用物质刺激,即利用工资等级、奖金制度等,来刺激劳动人民和知识分子的生产积极性。四强调价值规律及其他经济规律的作用,强调生产计划都应服从经济规律,而不是经济规律服从生产计划。五强调厂长、工程师、专家等的集中管理,反对在生产中大搞群众运动。六主张“平衡论”,“按比例论”,“生产渐进论”,反对“冒进”,反对“大跃进”。

几十年后,正是这份“检讨”,证明了张闻天当年的正确。历史发展到今天,完全按照并且丰富了张闻天当年的主张。

有趣的是,手头的这本《批判斗争李锐反党集团发言选编》与张闻天的“检讨”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今天读来,那些声讨李锐的檄文,实在比任何赞歌都更有力地证明了李锐和他那个“反党集团”的远见卓识。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当年批判会上的那些现场发言。下面引号中的所有文字,均系当时批判原文,除了根据内容作些技

术上的分类外，未作任何加工。发言者姓名一律省略。

（×月×日，批判重点，“李锐反党集团”的政治路线：右倾机会主义，反对“三大万岁”，即总路线万岁、“大跃进”万岁、人民公社万岁）

“李锐反党集团反对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把‘多快’与‘好省’对立起来，主张以质量为中心，以达到他们反对高速度的目的。李锐主张‘宁可少些，但要好些’。季诚龙说：‘以质量为中心来谈多快好省’，常流则说：‘质量是继续跃进的关键。’他们主张：搞几个运动教育干部重视质量。”

“人们把总路线比作上天梯，比作指路灯，比作幸福的源泉。而以李锐为首的‘反党分子’，却把总路线当做不可容忍的祸患。他们在一个所谓‘好’字和‘质量为中心’的幌子下，把多快好省分裂开来，对立起来，没有数量和时间的要求，只要求质量，这就是要限制群众的积极性和潜在力量的发挥，使人们无劲可鼓，无上游可争，这样就是不要总路线，不要速度，不要社会主义建设。”

“李锐去年(一九五八年)在上海召开的全国水力机械专业会议上的讲话，是他反对总路线、‘大跃进’的纲领性讲话。他说‘二五规划各省喊得很响，好像劲头很大，我看有点发高烧，有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他认为一九五八年工程上马太多，很被动，骑虎难下。他说：‘搞工业与打麻将不同，不能轻易加番。’他出差新安江工地时，蓄意收集施工中的质量缺点，指责新安江工程进度快是‘瞎起哄’，谩骂说：他妈的，问题都是放卫星放坏的。”

“他们对‘大跃进’也进行了疯狂的攻击：李锐指责群

众提出的‘不怕办不到，就怕想不到’，‘已唯心主义到了极点’，说‘主观能动性不能超越客观条件，否则就是唐吉诃德，就是乱干，陷于神化般的幻想’。他还说，‘五八年‘大跃进’是做了一场社会主义的大梦’，‘是乱糟糟的一场混战’，是‘发高烧’，是‘出轨翻车’。他甚至还说，‘实在是中国的工人农民好，若在东欧，只要有一条，就会出匈牙利事件’。”

“李锐反对以钢为纲的方针。说‘以钢为纲我就不赞成，结果什么都搞掉了，比例失调了，将比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还严重’。”

“事实胜于雄辩，一九五九年我国国民经济建设的全面继续跃进，提前进入一九六〇年的事实，不正说明我们正在历史发展的大道上大步前进吗？倒是‘李锐反党集团’出轨翻车，复辟资本主义的大梦毁灭了。”

“‘李锐反党集团’反对人民公社。李锐说‘人民公社发展太快了’，公社是自上而下的，不是群众创造的。诬蔑人民公社‘都是浮夸现象’。”

“事实上，经过合作化和社教运动，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空前高涨，为大规模开展水利运动，发展各种经济，合理安排劳动力，调剂和使用生产资料，综合利用自然资源……所有这些都不是规模狭小的高级农业合作社能办到的。于是人民公社这种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社会组织形式应运而生了。所以‘反党集团’攻击人民公社是‘自上而下’，‘办早了’显然是毫无根据的非难。”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来，在党的领导下，大搞群众运动的结果，工厂矿山布满了全国，人民公社风起云涌，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我们到处看到的是欣欣向荣的

美好景象，听到的是响彻云霄的歌声，这难道是像‘反党集团’说的乌烟瘴气、一场混战吗？”

“‘李锐反党集团’连最成功的像国民经济大跃进，两年完成五年计划这样的群众运动也看不上眼。他们所叫嚣的缺点，和我们所说的缺点完全是两回事，他们是说我们不应该有总路线，不应该大跃进，不应该成立人民公社。这些都‘搞错了’，万恶滔天，罪不可赦，因此应该向全世界承认错误和失败。而总路线是谁制定的呢？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大跃进是谁号召和领导的呢？是党中央和毛主席；人民公社是谁最先发现和提倡的呢？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既然这些都‘错’了，‘糟’了，那么党中央和毛主席还不应该承认‘错误’？而‘错误’又是这样严重，把国家搞得这样乱糟糟，那么党中央还不应该改组？毛主席还不应该下台么？‘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同志们，这就是李锐攻击‘三大万岁’的本质，他们的卑鄙目的，就是以反对‘三大万岁’为名，逼迫党中央、毛主席下台，取消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这样他们就成了党（资产阶级的党）国（资本主义的国）有功之臣；不难一步登天了。这就是他们的狼子野心，这就是他们的阴谋本质。”

（×月×日。**批判重点，“李锐反党集团”的组织路线：打击老干部，工农干部、重用知识分子**）。

“‘李锐反党集团’，特别是李锐，在‘多搞水电’的幌子下，反水利，反火电，反对在这个问题上与他们意见有分歧的所有干部。把忠心耿耿为党工作的老干部，说成一文不值，把那些专门与党与人民为敌的地、富、反、坏、

右视若掌上明珠。他们拉拉扯扯,互相吹捧,不遗余力地搜罗那些与他们具有同样观点、赞成他们的人,以名利地位为诱饵,鼓励其忠实地为自己效劳。而这些人也确实没有辜负李锐的重望。他们效忠于李锐的目的,就是幻想有朝一日,跟着李锐飞黄腾达。"

"从'李锐反党集团'的活动来看,他们与我们之间的斗争,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政治领导技术还是技术领导政治。在他们看来,只有他们这些'专家'才能领导一切,根本不把党领导和政治领导看在眼里,他们实际上是向党争夺领导权。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这是右派分子武器库中的破烂货,它早已被驳得体无完肤了。"

"李锐在水电总局时期,经常以所谓党组扩大会代替党组会,还标榜说:'这种会议党内是党组会,党外叫局务会。'规定一些非党总工程师为'党组扩大会'基本成员;有时竟叫非党总工程师主持党组扩大会议。总局技术处长期没有党员处长,李锐说:'就要试验一下,看看没有党员领导行不行。'他把伪资源委员会的旧技术人员叫做'元老',称某总工程师是水电的'老祖宗',狮子滩发电后,李锐要为他们设庆功宴、发奖状。"

"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我们的革命和建设是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觉悟和劳动积极性,我们丝毫不隐瞒我们用人的阶级的标准,因此我们把无产阶级的'德'提到一切问题的首位,照这个标准来选择干部、培养干部。李锐却说什么'有才就能为革命工作','作了业务工作就是革命'。"

"我们是政治挂帅,他们是技术挂帅,我们说政治是灵魂,是统帅,他们把技术和政治对立起来。李锐曾公开宣传'政治是政治,技术是技术',常流也常常要大家'好

好钻研业务，将来一定可以成为专家。'"

"李锐还说：'去年（一九五八年）政治挂帅搞得太多了，什么事都要党委决定，哪有那么大本领？一个水电站的好坏，全部由设计总工程师负责。'"

"李锐反党集团从他们的'德才'标准出发，千方百计地打击排挤老干部，迷信和重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李锐说：'在建设时期，老干部不能光靠党票，把党票看成铁饭碗。老干部要老马识途，不能老狗挡道。不能光凭资格，混辈数，没有业务本领难以领导，就要让路。将来干部要选举，选不上就不能当领导。'前水电安装公司科队长一级工农干部多，李锐训斥他们：'你们这是工农政府，凭你们几个能办水电？'"

"早在一九五六年，李锐、季诚龙即攻击我院（上海勘测设计院）党委书记Q同志，说他是大老粗，水平太低，干不了党委书记，不称职。并指使韩寓吾（院长）'动员'Q同志脱产学文化。韩寓吾捏造说：'Q虚荣，爱面子，脱产学文化，不积极。'李锐说：'这个人就是放不下架子。'去年，李锐和季诚龙又和韩寓吾谈要调Q去工地工作，诬蔑说：'Q很粗，也很空，不适宜作知识分子工作，该到施工工地去锻炼。'在李锐、季诚龙的支持下，两三年来，我院以韩寓吾为首的一小撮'反党分子'，经常谩骂党委书记Q同志'狭隘虚荣'，'不懂装懂'，'放牛出身'，严重损害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

"李锐坚持资产阶级干部路线。一九五六年我院（上海勘测设计院）分配到一批转业军人干部，李锐批评说：'你们尽找些麻烦，乱七八糟收进来'，相反，他很器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李锐曾亲自指示韩寓吾要重用既是资本家又是工程师的吴锦安，说：'吴搞过国华公司，有组织

能力,白手起家不容易。国华公司有一帮人,要好好安排。'"

"一九五七年十月,某设计院领导向李锐汇报了肃反整风情况,李锐说:技术干部要用之不疑,就连有专案的人,也要信任,不要把人家搞得那么紧张。五七年,当W在上海违反政策,滥招人员,院领导向李锐汇报时,李锐说:让他搞去吧!不放手怎么能搞到人。纵容W违反党的人事政策,造成了组织的严重不纯。"

"同年四月,在全国水力机械专业会议开会前一天,李锐听说'右派分子'×××、×××未参加会,他要季诚龙打电话叫'右派分子'参加。第二天开会作报告时,又说:'他们政治上是右派,业务上还有用,应该让他们参加。"

(×月×日,批判重点,'李锐反党集团'的专业路线:反火电、反水利、反三峡)

要能听懂这部分批判发言,有必要对所谓"反火电"、"反水利"的背景作些介绍。李锐的所谓"反三峡"已在本书第一章中详尽交代,这里就不再啰嗦了。

南宁会议上,李锐在毛泽东面前除了逐条批驳林一山"早上三峡"的观点外,还阐述了自己对水电与火电关系的看法,特别强调了水电事业的重要,引起毛泽东与其他中央领导人的极大兴趣。

李锐说:现在全国一百九十亿度电量中,水电只占四十七亿度(百分之二十三),其他均为煤电。火电发展受煤的制约。东北煤虽多,但不久以后也将从关内运煤去。而中国的水力资源是世界第一,开发条件极其优越,造价比火电贵不了多少。因此,电力工业长远方针应该是"水主火辅",缺少水力资源的地方才以火电为

主。应尽力开发物美价廉的水电。水电站形成的水库,又多有防洪、灌溉、航运等综合效益,一举数得。西方和苏联都是优先发展水电。

三天以后,在宣布林、李论战结果的那次会议上,毛泽东不仅同意李锐缓上三峡的意见,而且对李锐关于发展水电的观点也表示赞同,说:水力用之不竭应当多搞水电,加快发展水电,"水主火辅"嘛,没有水力的地方,当然要搞火电。当时李富春、薄一波也都插话表示赞同。认为只要有条件,应当尽量多发展水电,现在赶不上,第三个五年计划总可以做到"水主火辅"。

然而,当"反击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铺天盖地呼啸涌来之时,人们似乎被大批判的烈火烧昏了头脑,否则就无法解释他们怎么会连"无限崇拜"的毛泽东肯定过的东西,也胆敢当成李锐的"罪行"。

说到"反水利",李锐的确同水利部门的一些负责人存在很大分歧。在修建官厅水库、淮河一系列支流水库时,李锐认为水利部门只重防洪,而不注意综合开发,为此他在许多文章中阐述过自己的观点。

读李锐关于水电专业的论文,即使是绝对的门外汉,也不必打怵。流畅的语言,严谨的逻辑,生动的事例,有趣的比喻,通俗而不失深度的论证,不仅不会令人望而生畏,而且能读之兴趣盎然。请看下列论述:

"什么是河流规划中的综合利用原则呢?那就是要以国家最小的投资修建水工建筑物,最合理地利用天然资源,综合地满足各有关国民经济部门所提出的要求。河流的综合利用是以国家总的经济发展计划为基础的……不考虑各有关经济部门的实际情况,而只从'解决防洪首要任务'、个别方案技术问题的研究和遥远的假想等

出发,则必走入歧途而不自觉。

"……如果只从技术出发,现代科学的发展对于技术的可能性几乎是越来越没有限制的,但有个最大的限制,这就是经济上的合理性。有人打过一个比方,现代的水工技术可以叫太平洋的水流到大西洋去,但是需要答复两个问题:这样做有没有必要?这样做要花多少钱?如何求得技术和经济两者的统一,这就是每一个规划人员的职责。

"由于对防洪要求的绝对化和缺乏经济观点,就有可能产生这样的后果:即防洪规划人员不会精打细算,不会用国家最少的资金来获得最大的防洪经济效益;同时由于缺乏经济观点,往往只强调用水库防洪的一面,而不同样重视其他的防洪措施;并且由于对水库防洪作了绝对的要求,就必定较少考虑到其他综合利用开发的许多复杂问题,例如电力是否有用户、是否可靠、是否浪费了?航运是否需要建船闸,是增加了麻烦还是减少了麻烦?灌溉工程跟不跟得上?等等。这就要求修建以'防洪为首要'的工程时,必须同各有关经济部门的工作步调一致,不要互相脱节,造成不可补救的损失。只有进行了全面的综合的考虑,并且作了详细的经济分析比较,才能得到最合理的防洪规划方案。"①

李锐的这些精彩论述是在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九年之间发表的,今天读来,人们会脱口而出:人才难得!然而,在当时那个"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的时代,又有多少人能理解这些经济思想的宝贵?更不用说珍惜和爱护能具有这些难能可贵的思想的人了!

---

① 李锐:《关于长江流域规划的几个问题》,原载《水力发电》一九五六年九月号。

可惜啊，李锐们不属于那个时代，而那个时代本应该特别需要李锐们！否则，中国的经济建设水平何止经过四十多年才发展到这一步呢？好了，还是让我们回到会场，听听怎么批判李锐这些主张的吧。

“李锐反党集团破坏党的水电建设事业，首先是反对火电，反对水利，反对三峡。”

“早在燃料工业部时，李锐、张铁铮就勾结在一起，攻击中央和原燃料工业部党组：水电建设的方针不明，计划不定，力量得不到生长，致使水电建设发展得太慢，诬蔑中央和原燃料工业部党组‘歧视水电’，诬蔑解放以来兴建的所有水利工程——官厅、淮河、佛子岭、梅山、大伙房等等，‘在综合利用上无不存在缺陷’。”

“反对火电，实际上就是要反对电力建设。火电的突出优点就是投资省、见效快，正是由于这样发展了火电，才打下了电力工业的基础，如果按照‘李锐反党集团’的说法，停下火电，（李锐等从未讲过要停下火电——引者注）就要打乱我们整个国家经济建设的布置，拖整个国家建设事业的后腿。”

“防洪事业对于我们国家来说非常重要，一九五四年长江的洪水，一九五五、一九五七年松花江洪水以及去年（一九五八年）珠江的洪水等等，直接威胁到千百万人民的生命安全、重要工业城市、国家交通命脉的重大问题。洪水灾害不除，整个国家的工农业生产就不能正常进行。‘李锐反党集团’要根本反掉水利建设，其结果就必然是农业落后，六点五亿人民失去生活保证，国家政权基础动摇，全国人民仍要回到解放前的苦日子里去。”

“李锐他们还有个说法，说他们只不过是对某些火电

或是水利工程有意见,或是对某些人某些部门有意见。其实这些全是诡辩……我国的水利建设事业是党中央、毛主席和各级党委亲自领导的,并不是哪一个部门愿怎样做就怎样做,他们所以拼命反三峡、反对林一山,反对治淮,反对水利部,只不过是以此为招牌,来反对整个的水利建设事业,反对党中央和毛主席,反对社会主义,他们不愿看见广大人民摆脱水旱灾害的威胁,不愿看见人民过幸福的社会主义生活,他们没有劳动人民的感情,只有个人的野心。"

"李锐为什么排挤火电、攻击水利,攻击党委、党组,甚至攻击党中央和毛主席呢? 其目的还不是想从水电上发家,先搞个'水电独立王国',积累政治资本,抬高身价,对党邀功,向上爬,逐步实现个人政治野心吗?"

"更岂有此理的是,李锐公然提出要请日本人,请法国人来代替我们修建水电站,说他们有本事有力量,要把我们国家的重大建设事业让帝国主义国家来插手。季诚龙居然也就要去与日本代表团谈判。他们不相信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力量,不相信苏联专家的技术力量,而迷信资本主义国家的那一套技术,完全丧失了政治警惕性和民族自尊心。"

"李锐反三峡,其坚决和狂妄更是尽人皆知的。但是,'反党集团'拿出什么理由来呢? 根本没有。有的,就是三峡对人民有什么好处,他就反对什么。他们说防洪不需要三峡,航运不需要三峡,甚至说连发电也不需要三峡,这简直是已经疯狂到了极点了。"

"三峡工程是我国的无价之宝。三峡早日建成,将引起整个国家的巨大变化,每年将要增加无数亿的财富,使广大地区的数千万人民免除洪涝威胁。但是李锐却要坚

决把三峡反掉，坚决与人民作对。”

“一九五九年五月李锐在贵州攻击三峡说：长办这几年是生活在云雾里，头脑里只想搞大的、搞三峡……不知道三峡施工有多少困难，它的施工问题和交通运输与我国经济条件是不相适应的，搞三峡是不现实的……去年（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大家头脑发热，已经搞得全国很紧张，如果现在搞三峡那更不可想像，幸亏林主任未当国务院总理，如果他当了总理，很快搞三峡，那全国老百姓连饭也吃不上了……”

“毛主席提出研究开发三峡水利工程，这是党中央、毛主席建设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全国人民无不欢欣鼓舞，希望早日实现。李锐及其‘反党集团’却百般阻挠，说三峡工程将使一个省（指四川）由桑田变成‘沧海’，使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指重庆）搬家，以挑拨党和人民的关系。季诚龙也说：修建三峡不知道是哪辈子的事，淹没太大、投资一百多个亿不合算。常流则向李锐献计：从地质上否定三峡修建的可能性。李名播更是在外国专家中散布：三峡这样大的工程，有些困难还预见不到。中国的经济条件修建三峡是不成熟的。”

“一九五六年二月，李锐在长办举行的座谈会上竭力反对在三峡进行大量的勘测研究，认为各部门所有勘测力量和本身任务之间，确存有很大的矛盾，不能把其他工作都停下来专做三峡勘测工作。”

“至于建设三峡的技术问题，我们认为的确是很复杂的，但我们相信在党的领导下，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任何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三峡科研工作的顺利开展，说明了建设三峡是全国科学技术界人心所向，也说明了三峡建设中的若干科学技术问题是完全可以解决的。”

“至于三峡投资问题，据目前国家基建投资增长的速度来看，三峡投资的高峰在开工以后的第六年，投资额亦不超过十亿元，而最初两年年投资额都在一亿元左右，完全是我国经济条件力所能及。初步设计要点报告的胜利完成，证明了‘反党分子’李锐所说的都是一派胡言，他们这些政治骗子，他们反对三峡是有眼不识泰山。‘李锐反党集团’反对三峡不过是蚍蜉撼大树罢了。”

“任何一个反党分子都是有思想根源和历史根源的”，这话当然不无道理。在当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是用来说明这类论点的一句非常流行的比喻。对李锐的揭发批判自然也要追根溯源。然而，历史就是这么捉弄人，谁又能想到，正是这部分批判发言，成了李锐“平生‘不左倾’”的又一个注脚。

（×月×日，批判重点，李锐反对历次政治运动）

“李锐经常向人发牢骚说：‘延安整风弄得干部人人自危’，整得‘延河两岸无行人’，‘一提起延安整风我就头痛’，当别人提到延安整风成绩很大时，他说：‘什么成绩很大？如果不是最后纠偏，不知要冤枉死多少人！’党的八大会议开始时，他还说：‘对于延安审干不做个正式结论，很难舒服。’直到今日还称呼当时受审查的常流为‘难友’，并向人表示：‘延安抢救运动，××（指康生）不出来检讨，不能使人心服。’李锐对延安整风，有多么大的仇恨啊！”

“李锐反对土改，包庇了地主曹笑舒。曹是李锐武汉大学时的同学，在土改中被批斗，曹写信给李，李锐接信后便以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身份，写信给衡阳市委宣传部长张时杰同志，强调曹是知识分子，要张关照，企图包

庇地主过关。”

“在整风反右运动中，配合右派向党进攻。李锐对右派言论大加欣赏，他说：‘我对这些人（指右派）有由衷的感情’，‘我们的缺点，就得要这些人来批判才深刻’。当右派分子向我们党和毛主席猖狂进攻时，他在水电总局的干部会上推荐大家学习当时向党进攻最猖狂的《文汇报》。右派分子骂毛主席‘好大喜功’，他就化名‘孙元范’写了小品文《大鱼网主义》，诬蔑我们好‘大’成‘癖’，配合右派向党进攻。他还写过一篇短文《保密问题》，对党的保密和人事审查制度冷嘲热讽，诬蔑说：‘出国实习生的审查，往往严格到有一粒‘麻子’（家庭问题之类）也不能参加实习，比右派分子攻击我们党的保密制度和出国人员的人事审查制度尤为恶毒。’”

“反右斗争开始后，李锐觉得坐在机关里日子不好过，他到湖南去，有的同志正在专职反右，他就说：‘不反右死不了人’，当新华社右派分子黄操良自杀后，他低声惋惜地说：‘这是政治悲剧。’大家看，李锐的反动立场是多么鲜明。”

“李锐对其他各次政治运动又是怎样呢？他认为，一九五二年的‘三反’‘五反’运动扩大化了，‘搞得太过火了’。一九五五年‘肃反运动’当胡风反革命集团被揭发后，在大量铁证面前，李锐却怀疑胡风不是反革命分子。他说：‘狮子滩肃反镇压得过火了。’在上犹工程局抱怨说：‘肃反妨碍了生产。’一九五六年他到上海，上海水电设计院向他汇报肃反情况时，他批评说：‘不要把人家搞得太紧张了，你还要人家工作吧！’”

“李锐不仅在历次重大政治运动中，暴露了他的反动本质，而且在对国际问题的看法上，他的反动思想也很突

出:一九五六年匈牙利事件发生后,他出差上海,在火车上听到广播他很激动,说:'苏联不该出兵,本来是人家内部的事,这样搞反而搞糟了。'这和帝国主义攻击苏联出兵是干涉匈牙利内政的谬论又有什么区别呢?"

请读者原谅我在这里不厌其烦、不加修饰地引用这些当年"原版"的批判文字。或许有些读者会感到枯燥乏味,其实,这些原始文字就像绘画中的素描,就像电影艺术中的黑白纪录片,最质朴、最真实地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头脑清醒、个性鲜明的李锐!又因为它们是从"批判"这个极其特殊的角度来反映人的思想品格,因此其可信程度反而更高!

在读这本约十五六万字的《批判斗争李锐反党集团发言选编》时,我曾突发奇想:一个世纪以后出生的人们,面对这件"文物"中的批判文字会作何感想呢?他们能够理解公元一千九百五十九年间,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这种奇特的思维逻辑吗?或许有人会认为我这是胡思乱想:我们能读懂两三千年前的文字,又何需担心百年以后会有人读不懂这类"文物"呢?

是的,我们能读懂《诗经》、《左传》……因为那是人类正常的思维逻辑和思想感情形成的文字。而面对这一类把对批成错、把人说成鬼的册子,我们说什么好呢?扭曲的时代造就了一代扭曲的"批判家",扭曲的"批判家"则用扭曲的批判进一步扭曲时代。

整整五个月的揭发批斗,近百次各种规模的批判斗争,成千上万的水电职工干部放下工作、放下业务,没日没夜、反反复复地参加批斗;全国其他反击"右倾机会主义"的战场亦如此。然而自然规律是残酷无情的:不管人们对"三大万岁"多么虔诚地捍卫,这场斗争却是因了"三大万岁"缔造的"饿魔"悄悄伸出双手,扼住了千百万正忙于批判、怒吼的喉咙而告结束的。

第二节　险些葬身北大荒

难堪的"双重饥饿"

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六日上午,中直机关党委找李锐进行了一次重要谈话,有中央组织部 的人在场。党委负责人引用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指责李锐"想把秀才们挖去"一语,对事件过程进行了进一步追查,并向李锐提出:为何不揭发别人?

最后他们向李锐宣布:清除出党,下放北大荒劳动。

这两条处理意见事先都征求过李锐的意见,所以李锐并不感到意外。中组部的人警告:今后不得谈庐山等事,否则将受更严重处分。

这天下午,部里(水电部)来人取走李锐在东北、湖南时期的全部文件。

从这天开始,李锐着手作下乡前的具体准备。

一九六〇年四月二十一日,李锐在日记中写道:

> 夜八点半自家起身,三轮两辆至北京站。妻立大门,幺幺(小女儿)哭。手提书二袋及衣物包,上车甚累。正点开车,约两点入睡。

当时的北大荒在某种意义上很像俄国的西伯利亚。这不仅是因为那里气候严寒,冬季气温常在摄氏零下三十几度,夜间可达零下四十度,全年只有四个月的无霜期,而且也都是犯人的"流放地"。

李锐所在的虎林县西岗八五〇农场就集中了一大批北京下放

到这里强制劳改的右派，他们之中李锐认识的就有：司法部部长助理王怀安，著名女记者戈扬的丈夫、画家胡考，著名歌唱家张权的丈夫男高音莫桂馨等。

王怀安和李锐是延安时期的老相识。李锐来到八五〇农场所属的兴华村一个多月后，王怀安和胡考一起来看他。虽然同为"天涯沦落人"，但此时此地却不敢多谈，怕有"串联"嫌疑，只能相互问候一下身体，问问劳动情况。

原来，在司法部领导中分工"抓业务"的王怀安一九五七年到下面检查工作时，发现肃反中一些案子有明显的轻罪重判、无罪错判现象，便向当事者追究，答曰："不这么判，指标完不成，领导不满意。"四十三岁的王怀安听罢怒不可遏，大骂："你们是为了自己的乌纱帽，不怕旁人坐牢！"王怀安还向司法部领导和中央反映肃反扩大化的问题，指出："站在法庭上的，并不都是敌对分子，有些是人民内部矛盾。"

一九五八年十月，王怀安以"攻击肃反运动"、"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罪名被押到全国政法会议上批斗。十一月正式定性为右派，十二月遣送北大荒劳改。

按照当时的政策，"右派"是"敌我"矛盾，而"右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属"人民内部"矛盾。所以李锐没有被编进王怀安等右派集中的"排水连"（实为劳改连），而是分在兴华村生产队的"老头排"；也没让他住在管束较严的右派集体宿舍，而是和"老头排"里的一个东北单身汉住在一起。王怀安说："当时，我们都很羡慕李锐哩！"

李锐从王怀安和胡考那里得知，一九五八年冬天，右派们初来时，在冰天雪地里干活，曾经冻死过人。李锐一来就有炕睡，而他们来的第一年住的是草和树枝搭的窝棚！严冬腊月，夜里全身"铠甲"一件不能脱，嘴里呼出的哈气很快就在被头上结出一层冰，把被尾掉过来，一会儿又是一层冰，这样掉来掉去，一夜下来，只有被

子中间是软的。后来他们虽然搬进了房子，但仍是在地上打通铺！

王怀安他们下来的时候，全国正处在“大跃进”的高潮中，干活要求“连轴转”，每晚只能睡三四个小时，加上窝棚里温度太低，热量消耗大，体力根本恢复不过来。有人就倒在水利工地上睡着了，如此便发生了“冰天雪地里干活，冻死过人”的事情。而那时李锐正在为阻止三峡工程舌战群儒、正在为阻止这场“大跃进”一次次向毛泽东直言强谏。如今虽然不再搞“连轴转”了，但劳动强度仍然很大。大轰大嗡的形式主义余毒在各级干部中并未肃清。碰到接踵而来的“大突击”、“大会战”，就要连续十几天、几十天每日劳动时间都在十四五个小时以上！

本来高强度的体力消耗需要高热量的补充，然而李锐一九六〇年五月来到这里时，全国已陷入一场空前的大饥荒。北大荒地广人稀，这场饥荒比别处来得稍晚一点，但也已开始常以豆饼为主食了。这种用榨过油的豆渣压成的饼，在正常年景是用来喂牲口、做肥料用的，人的肠胃自然很不习惯。李锐才下来，当然更难适应，开始是腹泻，接着是肚子一阵阵剧痛，有时一夜要起来腹泻几次。白天干了十几个小时的活，夜晚却无法好好休息。后来他也学着周围的人，饿急了就在地里啃萝卜，吃生土豆，实在找不到可吃的，就拔根大葱，就着凉水权且充饥。

李锐的姐姐从长沙给他寄来的粮票四次被偷。信件是放在生产队长办公室待取的，生产队领导答应追查，却从无结果。后来总算能收到了，信中得知，长沙街上只有咸菜卖！李锐明白，这些粮票实际上是姐姐一家人的口粮，心中十分不安！

人们一天到晚都在谈吃。一两个月工夫，李锐的体重便减了十几斤！“老头排”的人都说他比刚来时黄瘦多了。

然而李锐感受到的是肉体和精神双重饥饿的折磨！来此两个月了，一天到晚就是面朝黄土背朝天，今日锄白菜(地)，明天锄土豆(地)，后天锄包米(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终日精疲力竭，几

乎什么都无暇顾及。这天又种了一整日大葱，疲惫不堪的李锐在日记中写道：

多久以来，报上无水电站消息。新安江、刘家峡、三门峡如何？醉心的事业！而今却每日重复简单劳动！

十几天以后，他又写道："最近除了劳动、睡觉、吃饭三件事，其他无一愿顾及，报纸在内，体力应付不过来。擦身、洗衣也是不得已。"

对于一个惯于读书、思考的人来说，这种精神上空虚、寂寞的折磨，绝不亚于忍受饥肠辘辘的痛苦！

雪上加霜

七月，一年中最紧张的麦收开始了。每天五点钟下地，晚上七点以后才能收工。连续多日的腹泻使李锐全身无力，尤其是腿软得站不住，有一次他只好跪着割麦子！

更糟的是，病情后来发展到腹泻以后吃不下东西。虚脱几次使他几乎昏倒。但麦收期间医生是不开假条的。像他这种身份的人就更不会被允许休息，李锐只有带病坚持。

进度自然是不理想的，除了身体极度虚弱，还有割麦的技术问题。"老头排"里某些旧意识很深的人总想在李锐身上表现自己，不惜落井下石，动不动就对李锐粗鲁地挑剔、训斥、耍态度，甚至派专人监督他是否"卖力"。弄得李锐忍无可忍，起而反抗，发生争吵，以致终日不快！

李锐可不想让这种强加于他的"管制"把自己搞垮。一天上午，腹泻严重，李锐便没有下地。中午，生产副连长便大肆训斥"无故不上工"之人："不要午休，别人干多少，你去补上。"李锐没理他

那一套。别人不把他当人,他自己要把自己当人。农业技术员出身的生产队指导员对李锐还算同情,但他只知李锐腹泻,不知李锐不能吃,因而也只会让李锐“坚持”。他不明白,对于一个病重之人,这种“鼓励”听来会多么令人难受!

如果不是上苍有意要把李锐推向绝路,简直就没法解释,在那些日子里,磨难为什么会接踵而来。

正当李锐被折磨得心力交瘁之际,中直机关党委来信,告曰中组部已经批准开除他的党籍。

当初李锐对“开除党籍”一事曾经断然表示“同意”,这一方面是出于失望和负气,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实际上没有申辩的权利!五月初,中组部派人来复查李锐的历史问题时,李锐曾向来人反映:开除党籍决定的所有条目中,所言根据,夸大其辞,绝大部分不符合事实。当时以为他们回京后会逐条核实,想不到结果仍然如此!天理何在?!公道何在?!

大半生探索、追求的信念,几十年出生入死形成的情结,结果却是被抛弃,被开除,李锐怎能不痛苦万分!

“上午哭了一场。王指导员说有意见还可以提。不禁又下泪。中午上工时,一人早去,一路哭着,想着二十五年如一场梦。想着关于决定内容事,要给安子文和中组部写一封信。”(李锐日记语)

此时此刻,他竟忽然想起张闻天在庐山会议发言中的一段话:“主席常说,要敢于提不同意见,要舍得一身剐,不怕杀头等等。这是对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杀头还不行,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所以问题的另一面是要领导上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

李锐曾多么钦佩那些精辟的见解,而今,虽如闻其声,却再难见其人!忠而见疑,竟成了他们这些优秀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的悲剧。

人，对付肉体的痛楚无非是两种方法：或硬抗，或麻醉。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整的人，将这套办法推广到精神痛楚方面：开始是本能地为被歪曲的事实申辩，与不合情理的批判论争。当觉悟到这一切不仅无济于事反而雪上加霜时，便转向第二种办法：麻醉良知，扭曲自己，按照批判者的思路努力使自己想通、认罪，而且要心服口服。

一个人如果总觉得自己冤深似海，终日郁郁，这种精神状态在异常艰苦的劳改生活中是活不下去的。有人说，在险恶的环境中，最先倒下的是那些精神崩溃的人，而不是身体虚弱的人。但在复杂的现实生活中，身为“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罪犯”，要想始终不移地坚守自己的信念，事实上是极难的。因为诛者、讨者不是别人，正是他们无限信赖、无限热爱的党和群众！所以那个时代的过来人，绝大部分采取了第二种办法。李锐在和右派们的接触中，不少人就向他谈过这种“思想收获”：“思想通，才能对所受到的一切感到理所当然，心平气和，才不会使身体垮掉。”

李锐也曾努力使自己想通，他在检查交待、思想汇报以及家信中，曾多次试图从“家庭出身”、“阶级根源”、“阶级立场”等找寻自己“犯错误”的根源，但一接触到“错误”的事实，他还是无法使自己心服口服，自圆其说。所以他的检查总被认为是“浮皮潦草”、“挖得不深”、“没有根本改变立场”。好在他的性格救了他：想不通的事情不死钻牛角尖，也不用歪理硬说服自己、扭曲自己。面临巨大的打击，他宁可用拼命劳动，用捉鱼、做草垫褥子、编草鞋之类的事情转移注意力，排遣痛苦，把时间占满、精力耗尽，休息时也就顾不得多想了。

虽然这也是一种“麻醉”，但它麻醉的是痛苦而不是良知。这种办法使李锐虽历经磨难却避免了人格异化。

只剩下生存问题

麦收总算结束了，随之而来的却是食堂伙食的质与量大幅度下降。

一次，李锐去生产队侯医生处看病，侯医生告诉他，“排水连”里的右派们情况十分严重：百分之八十多的人有病，劳动重，患浮肿的多。

情况继续恶化。从这年九月起，当地规定整劳力每人每月二十一斤粮，家属十八斤。将进入冬季时，整劳力每日也减到十五斤了。

生产队的整劳力都在公共食堂吃饭。公共食堂是“大跃进”的产物，是人民公社化的重要标志，因为吃饭“不要钱”。其实，即使不办食堂，自古以来农民吃饭也是基本上“不要钱”的。不过这样一来，原来分给每家每户的口粮就都留到食堂去了。本书第一章提到，庐山会议上，朱德是不大赞成在农村办公共食堂的：“食堂自负盈亏，公家总吃亏，办不起来不要硬办，全垮掉也不是坏事。”而毛泽东在庐山七月二十三日的讲话中还特别提到了公共食堂：“食堂是个好东西，无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全国能保持三分之一，我就满意了……曾希圣说，食堂节省劳动力，我看还节省物资，如果没有后面这一条，就不能持久。可否办到？可以办到。”

实践证明，毛泽东想当然了。让几千年来世世代代以家庭为单位过惯了小日子的农民去吃公共食堂，哪能比一家一户过日子精打细算？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许多地方吃空家底，就和公共食堂不能计划用粮有很大关系。

李锐在兴华村的食堂还发现，大灾之年，食堂成了干部贪污的重要渠道。按说当时一个整劳力每月十几斤口粮，在全国已属高标准了(有的省只有九斤，还有的省只有三斤！)，可是，由于干部的多吃多占，在食堂就餐的群众根本吃不到这个标准。

饥饿像魔鬼似的折磨着人们，每天不到半斤、带壳的粗粮不能满足生存需要，各种代食品便成了救命稻草。让我们来看几篇李锐一九六〇年九月的日记摘抄，也许，这比任何文学描述都更能真实地反映当时的情况。

九月十六日

仍捡土豆，去七人。下午在野地里捡到小绿瓜一个吃了，亦如野人也！粮食减二斤，甚有影响，全局问题。晚开会，安排了过冬：目前，多吃野菜，大小豆叶均可吃。五八年过于乐观，庐山过于乐观也！

九月十七日

一天跟犁杖捡土豆，甚累。觉得抬不动腿，全身发软。上午吃生土豆一枚，下午又捡食小绿瓜一个。晚喝完稀饭后，胃痛发作。

九月二十二日

整日捡土豆。中午野菜窝头，菜益多，喝开水，颇顶不住。无可奈何，晚大会动员背荞麦。

九月二十四日

场院打荞麦，实感无力。晨甚冷。中午野菜豆面窝头。晚喝稀饭六碗。人生最根本问题，劳动与吃饭，对我真是太实在的经历，每天只此二事！（多么想看一下报纸！）开始下霜。

九月二十五日

我在坟茔地捡一天土豆。老姜头似受命监督我之

"卖力",顶人习惯无法改变。吃了几个生玉米,刚摘下者可食。除食草之外,亦如六畜矣！今天的窝瓜叶,许多人不吃,我仍吃来可口。

九月二十七日

坟茔地南剥玉米,不如割麦之累,坐地而剥。食生玉米。背回地瓜秧。最近吃地瓜秧多。晚肚胀,似是胃痛,今晨拉肚。昨夜大会,严整小偷,又训开会迟到之人,视职工如被看管者。秋收要求快而细,麦收损失是大的,与吃包米芯有关?

九月二十八日

中午随郭大爷至南村水沟捉鱼(当地人称一种很小的"老头鱼"),(草甸中)烂泥没膝,花一个多小时,捉了大半桶。晚上一人收拾,用盐腌好。

九月二十九日

……中午与郭大爷去南村沟捉鱼,不如上次顺利,捉的人太多,成"捉鱼运动"。水袜子(胶鞋——引者注)已被草梗扎破,腿亦伤,走路艰难……

九月三十日

村东捉鱼人太多,村里有了反映:不能误工,捉了交食堂……

在挨饿的日子里,李锐用姐姐寄来的一点粮票买了谷子面饼干,从不独食,分给同屋的老汉和"老头排"里的其他人。这些饼干在当时都是延续生命的珍品,这使过去为难过李锐的人也甚为感

动。

不久，李锐也得了浮肿病。用王怀安的话来说：他呀，脸肿得像罗汉，两只眼睛成了两条缝。

“排水连”已出现饿死人的情况。他们上下工要整队，行动受限制，不能去捉鱼，更不能随便偷吃地里的生土豆、生玉米。

开始，右派们家里情况好一点的还能接到北京寄来的包裹。但只要包裹一到，村干部就会像嗅到鱼腥的猫，跟上来了。必须先上供，否则就会遇到各种麻烦。过了一段时间，寄来的包裹越来越少了，后来几乎绝迹。因为北京市民的供应也越来越紧张：一个成年男子的粮食配给每月也只有二十几斤，副食极其贫乏，肉和油的配给每月每人均只得二三两。

此时，从中央到地方所有的报刊、电台宣传口径很统一：这些困难的出现，是自然灾害、修正主义的经济封锁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捣乱的结果。

据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回忆：从“一九六〇年起，农村中的严重情况逐渐反映到中央来，反映到毛泽东那里。他的心情沉重起来。在那些日子里，他常常闷闷不乐，沉默寡言，有时长时间呆坐在那里，凝视不动。这种情况在过去是少有的。”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三十日，毛泽东在听取中央局工作汇报时沉重地说：庐山会议的估计不灵了。当时认为一年之内形势可以好转，以为右倾压下去了，“共产风”压下去了，加上几个“大办”就解决了。当时有人说：逢单年不利，逢双年有利。今年又是双年，要说逢双年有利，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共产风”比一九五八年刮得还厉害。原来估计一九六〇年会好一些，但没估计对。一九六〇年有天灾又有人祸，敌人的破坏尚且不说，我们工作上是有错误的，突出的是大办水利，大办工业，调劳动力过多。

三个月以后，毛泽东又一次怀着矛盾的心情对几位中央领导说：郑州会议的召开是为了反“左”的，由三月到六月只反了三个

月。如果继续反下去就好了。谁知道彭德怀插了一手，我们就反右。反右是正确的，但带来一个高估产、高征购、高分配。这个教训值得我们记取。庐山会议反右这股风把反“左”打断了。

从这些谈话中人们不难发现，毛泽东当时的思想既有开始冷静、开始承认失败的一面，同时又有相当混乱的一面：在他看来，“左”是要反的，问题是由谁来反，由他来反可以，由彭德怀们来反就不行了。

李锐在长沙的琬姐一家忍饥挨饿又托人给李锐捎来一桶饼干和罐头。这些食品是困难时期国家照顾运动员的。琬姐在省体委工作，又得了严重的肝炎，所以能分到一些食品。她几乎全部寄给了弟弟！这天，王怀安来李锐小屋里坐，李锐拿出饼干、罐头往炕上一放：“吃吧，家里捎来的。”

王怀安说他当时的感觉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无比幸福！当然他当时是不敢说出口的。因为那时这种感觉只有在见到毛泽东时才允许有，否则就很“反动”。

然而这些食品也着实使王怀安幸福到了极点，以致三十几年后的今天他还回味无穷，一再说，那味道真比今天去了一趟王府饭店还高级！

一桶食品不过几斤，没几天就吃完了。李锐立刻又陷入难堪的饥饿。

就在李锐垂死挣扎的时候，北大荒的右派接二连三又死了一批。其中就有那位名叫莫桂馨的男高音。和他在一个生产队的人说，莫是因为在地里乱吃东西，又喝了沟水，结果得了痢疾，每天腹泻十几次，本来就被饥饿弄得虚弱不堪的身体，这一病，没几天就死了。同为右派的北影演员巴鸿，亲手为他挖了墓穴。其时，距莫桂馨和妻子张权满腔热情地从海外回到祖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才不过几年！

终于被中央察觉

在北大荒劳改的右派不断饿死的情况终于被中央察知，于是下了一道命令，让北大荒的右派一九六一年春节前都撤回北京。有人说作出这一决定的原因是“怕影响太坏”。

八五〇农场场部的干部中有几位是老红军，恰巧是湖南人，李锐的老乡。他们悄悄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李锐，还对李锐说，饿死了这么多右派，很担心中央会处分他们(后来中央并没有处分他们)。

这回轮到“右机”的李锐羡慕“右派”了。王怀安等一批右派于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先后撤回北京，而几乎病入膏肓的李锐却仍未得赦免。只是在一九六一年春节把他从兴华村调到八五〇农场总场场部。后来得知，就连这个调动，也是田家英等几个关心他的人帮忙向李富春求援的结果。否则，李锐或许等不到回京，就去同男高音莫桂馨做伴了——严重的浮肿得不到控制，结果就是死亡。李锐离开兴华村时，那里已经饿死二三十人。

农场售货员

西岗八五〇农场总场场部坐落在密(山)虎(林)公路旁，是一幢坐西朝东的四层楼房，韩战结束后，十万转业官兵奉命开发北大荒，这座楼房就是当年转业官兵拆除部分日本军营后，用这些砖盖起来的。它是西岗地区第一座楼房。楼西的工人俱乐部旁原是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灰砖砌成的日本军营还有几十间平房。于善浦、尹瘦石、杨角、张晓非等几名文化部系统的“右派”摘帽留用后，就住在这里。李锐也搬到这儿，住在当年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下人住的一间六平米左右的小屋。

总场大楼的南边有个篮球场，再往南，挨着球场有一座场部所属的商店，商店门口一块不大的地方是个半露天的小市场，卖瓜果蔬菜旱烟菜子之类。农场职工、附近农民大都在这里购物，是场部一处非常热闹的地方。清史研究专家于善浦当年第一次见到李锐，就是在这个小市场上。

于善浦回忆了他第一次见到李锐的情景：

> 几天来，我老听人们在说，有个中央八级干部在小市场上卖菜子，心中顿生好奇，想看看八级干部是什么样子。又听说他也是从北京下来的，不禁萌生“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情感。这天我来到小市场，在一个个摊位旁寻视，一眼就看到一个身材魁伟的汉子站在那里，头戴一顶南方人戴的罗松帽，上身着中式对襟灰棉袄，棉裤腿上扎着绑腿，两手揣在袖筒里。显然是棉鞋抵不住寒冷，他不时地在地上跺着脚。职业的习惯使我仔细观察了对方的神情：浓黑的眉毛下，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探索着过往的行人，寒冷的天气逼得他咬紧牙关。他漫不经心地守着地摊上一个个敞开口的菜子口袋。
>
> 到这里买菜子的人并不多，来看“西洋景”的倒不少。人们窃窃私语：“这就是中央的一个部长”、“这就是那个八级干部”……

时代让李锐创造了一个全国之最：中国最高行政级别的售货员。

时间长了，李锐也能和小贩一样，用一个小瓷酒盅就可以打点买主。人们都乐意和他说话，他很快就在这里交上了不少朋友……

李锐有时也从农民手里买点泥鳅、小鱼和鸡蛋，这在前一年都

是不可能的。人民公社化以后，私人买卖被当做“资本主义倾向”严格禁止。全国范围内空前严重的大饥荒，使中央对这方面的政策已有所松动。

和于善浦成为好朋友

李锐和于善浦做了邻居以后，共同的遭遇、对美术的爱好，使两人很快成了忘年交。这一年李锐四十五岁，比于善浦大十八岁。年轻的小于自然乐得有这样一个可以倾吐心声的朋友。于是把自己的经历一古脑地向李锐诉说。

一九五五年，小于从东北鲁迅文学院美术系毕业，分配到北京故宫博物院陈列部搞研究。他曾经在金文专家唐兰先生的指导下研究商周青铜器，后又跟从沈从文先生研究中国古代织绣。强烈的求知欲加上聪慧、刻苦，使二十三岁的小于在故宫这个古代艺术殿堂里很快出类拔萃，成为青年研究人员中的佼佼者。一九五七年整风运动中，小于怀着满腔热忱，建议研究人员多学点业务，少参加点政治运动。结果闯了大祸。一九五八年三月，他和文化部的右派们被遣送八五〇农场畜牧队劳改，一九六〇年摘去了右派帽子，由于能书会画，便被留在农场工作。

李锐却不大谈自己的身世，只是说自己刚来北大荒时在兴华村，那里很苦。

小于在总场的工作单位是文工队，兼管总场机关大楼的图书室。他发现李锐很爱读书，常到他那里去找书看。一次，小于在整理图书时发现了李锐写的《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一书，不禁对李锐又增添了几分敬意。同时又想到这位追求真理、热爱领袖的人却落得如此下场，更是不胜感慨。

凭直觉，小于感到，这位早已成家立业的人要比自己这个单身汉心事重得多。他时常翻开相册，向小于介绍他的家庭成员。北

京家里来了信，有时会给他带来几丝喜悦，但更多的却是使他增添无限烦恼。对于还没有婚恋经历的小于来说，当然很难理解李锐复杂的心境。

后来，李锐又被调到附近一座火电厂扫厕所，小于仍然经常去火电厂看望他。

“思想汇报”中不能再讲真话

按说李锐在北大荒的十九个月（一九六〇年四月至一九六一年十一月），是庐山会议以后“大跃进”的严重后果在全国充分暴露、全国经济陷入最严重危机的时期。李锐在水深火热的底层，对这一切当有最深刻的体会。但是，这期间在他写给部党组的思想汇报中，却再也看不到类似庐山会议上那些深刻、中肯的真知灼见了。通篇讲的只能是如何在劳动中发现了劳动人民的优秀品质，改造了“资产阶级”世界观，认识到自己“犯错误”的阶级根源，以及努力出勤，提高劳动技能之类。

是饥饿使人的思想也发生了“萎缩”？是终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改造”使人的精神陷入了呆滞？如果真是这样，他就不会在日记中写下“五八年过于乐观、庐山过于乐观”之类的话了（李锐日记中诸如此类的语言，后来都被秦城专案组贴上了“不满”、“翻案”、“攻击”之类的标签）。可见那些“汇报”文字只能说明，“反右”、“反右倾”运动完全窒息了民主空气，封住了有识之士的嘴！

第三节　炎凉何必叹，把酒贱浮名

又回到了北京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日，从哈尔滨开往北京的列车二十三点十四分正点抵达终点站。回家的路上，李锐从车窗内贪婪地望着北京的夜景。初冬的街道是那么萧瑟冷清，从去年四月二十一日夜晚离开，到今天因身体原因从北大荒调回北京，整整五百七十天！北大荒的一切就像一场梦。

保姆蔡嫂开的门。家人都已睡熟，轻轻地亲了孩子，嘱蔡嫂别叫醒他们。

她还是起来了。

"回来了?"

"回来了。"

双方都没有更多的话。

第二天，李锐独自来到北屋。好心的蔡嫂过来安慰他，同他谈他走后孩子们的情况，帮他整理从车站取回的行李。李锐心中十分感激。

孩子们给团聚带来了生机：十五岁的大儿子苗苗拿出成绩册，除物理有些困难，其他功课均属优良。李锐一直认为：儿子智力虽不如女儿，但诚实质朴，这就很好了。

大女儿小妹又高又瘦，才十一岁已十分懂事、能干。被爸爸亲过以后，赶紧跑回房抑制伤心。

刚刚从幼儿园接回来的小女儿幺幺，是爸爸最喜欢的小宝贝。最初抱她，有点认生，后来轻轻叫爸爸，一会儿就熟了。三岁了，自然不复一年多以前"举高高"、"嘬小嘴"，新的名堂却更多了。同她

讲："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却回答："我不会的呢?"小脑瓜真灵。

一周以后，李锐同妻子范元甄去北京中级人民法院办理离婚手续。

其实，一九五九年李锐从庐山一回到北京，妻子就从思想上同他划清了界限。李锐白天在部里挨斗，晚上回家挨批。终日不得休息，头都是昏昏沉沉的。

提起那段生活，李锐只有一句话："那简直不是人过的日子!"

李锐的老朋友中了解他这段经历的人，都说李锐的神经特别坚强。在国内历次政治运动中，一些走上绝路的人，往往在外面挨斗还挺得住，亲情一绝，精神便崩溃了。

妻子在航空工业部工作。五十年代，作为党培养的红色专家，她从北京航空学院调干班毕业后，便当了航天工业部所属的一个大型仪表厂的总工程师。在实际工作中，她对"大跃进"的许多做法也不满意，夫妻之间常有这方面的议论。她也曾写信给在外地出差的丈夫，对报纸上"放卫星"的报道表示怀疑。李锐在《庐山会议实录》中记述的那些刚上庐山时写的家信，也都是寄给她的。庐山会议后，她一方面因李锐受到株连，一方面也因为思想"右倾"，一落到底，发配到热处理车间当炉前工，接受改造。从那时起，她的思想就迅速跟上了形势。于是，她开始检讨自己，揭发丈夫，不遗余力。

当然，以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当时范作出的这种选择也是可以理解的。"大义灭亲"一直被中国的传统文化奉为美德。遗憾的是，对许多人来说，弄清"义"的内涵，要比作出"灭亲"的举措困难得多。

离婚后的独居生活

北京安定门外有一片名叫"六铺炕"的地方，当初不知因了怎

样的典故而得名，反正六十年代初那里已是一片楼群，连“一铺炕”也见不到了。水电建设总局的宿舍就在这片暗灰色的楼群里。

离婚以后，李锐搬进八号楼（这是水电总局的单身宿舍），离原来的家不远。在这儿，李锐开始了为时两年的“闲居”生活。

失去了家庭，他更加渴求事业，只有事业，才能使他振作。然而他已经离开事业快三年了！他的另一位至交历史学家黎澍（时任中科院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实在不忍心告诉他，他已被毛泽东“抹掉”了。一九五九年听完庐山会议的党内传达以后，黎澍心情沉重，几天不愿说话。后来黎澍对妻子徐滨说：“不抹掉以后还能有个安排，一抹掉就再难起用了！”想到这位坦率正直、思想奔放、才华横溢的朋友正值盛年便遭此厄运，黎澍夫妇都非常难过。

李锐却并不完全清楚自己的处境，他认为自己即使不能再回到高层政治生活中去，总还可以搞自己热爱的水电事业吧。如果能去搞文字工作，他也十分乐意，那本来就是他的老本行。所以李锐想利用这段时间多读点书，锻炼身体，恢复健康，为以后的工作准备更充分的条件。

读书是李锐一生最大嗜好之一，在这段日子里，更成了他生命的需要。李锐对书的涉猎相当广泛，哲学、政治经济学、通史、文学史、中外文学名著、人物传记、诗词、诗论、美术理论，甚至棋谱都在他研究的视野之内。

李锐有写读书札记的习惯。无论是深思熟虑终有所得，抑或漫不经心随手所记，这些读书札记无不体现着他独立思考、善于分析、勇于探索的特质，同时也留下了他在这段特殊的人生历程中，同苦闷、孤独顽强搏斗的心灵轨迹。

读完《贝多芬传》。罗曼·罗兰精通音乐，才能写得如此深刻。也就是二万字。真如矿石中炼出的纯金，总研

究了百倍的材料。“在艰苦的深渊里，从事于讴歌欢乐。”“他的一生宛如一天雷雨的日子。”

耳聋对于音乐家是整个世界的死灭，而他要重造那已死灭的世界，重造音响的王国。这是何等毅力！贝多芬私生活极端不幸，几次失恋，终身不娶，常常一文不名。

又翻《朱自清诗文集》。我还是喜欢这种清爽自然隽永的短文。思想观点为时代所限，但篇篇有至情，语言很流畅。时下之文，多是观点虽好，而无情意，长八股太多。这一个月的闲居读书，可能使自己今后去向断明：养养笔墨，做点有益小事，要学会真正的观察、深思和绝对控制。但还要保留独见，哪怕一时竟错、竟“不通”，总以自通为上。精明与糊涂都难得，但值得。

被《太平天国亲历记》所吸引。外国人总是评记事实，最为可贵。中国人士自来顾忌太多，束缚太多，不敢记事实。没有这些事实资料，又何来历史？根据什么来作研究分析？我们这一代的历史，后代研究起来就困难。弄历史的人搜集不到全面资料，只得看将来如何看待“内部档案”。

读《哲学原理》、《通史》，并翻列宁的《哲学笔记》。做为一个思想家，不懂自然科学是不行的。公（指毛泽东——引者注）于此似差一点，年青时对自然科学无丝毫兴趣，甚为可惜。谭嗣同还搞“以太”通数学。马、恩、列都是精通的。

政治经济学读完，可记大事也。全部有札记，甚便于

以后翻阅。这样的书我们可能还是写不出来的,一则对资本主义及马克思主义经济著作不如人家之熟悉。二则最主要的是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还不成熟也。读读通史,西汉经学一段写得很好,对宋明理学评述很精:伦理道德虽无不打上封建统治阶级的烙印,但精到处也与人民的伦理道德精神有其一致性。

读《通史》。所谓材料与观点,不掌握材料,对此无深功夫,观点无从发挥其作用,如两者不可得兼,宁肯材料充分,有独到之处,而观点有所错误,读者还是能得益。可以各自淘金。对自己则要求要有观点,对别人则不必苛求。主要问题应在有无材料,有无独见。并非人云亦云,而是从自己艰苦的搜索中得出结论。

读读通史,搁下多日,在思索通史的写法。范老(范文澜)之作当然是好的,但总觉不足,显得割裂零碎,拼凑之感,写好一部通史,是毕生之力。

读完范著通史第二遍。不甚满意。学术思想部分一般写得较好。史实穿插总觉突兀。前后头绪也不流畅。经济、生产也过少。可惜自己没有本钱,真是想写历史。

开始看周谷城通史,直接引用史料,这点反觉比范著好(范是经过翻译变为自己语言的)。

下午四点起看《叶尔绍夫兄弟》,一口气到第二天早晨四点。除吃饭外,整整十一小时看毕。写一九五六年风浪中,捍卫党性原则,充满与生活相联的政治和哲理。

对于当代苏联社会生活刻画极准，揭发了许多"一两个指头"的问题。褒贬恰到好处。

邱吉尔第二卷读完。回忆录应属于最有价值的一种史料，虽然观点立场不同，但材料是第一手，读来亲切。

读了一天《鲁迅书简》，甚了解老人当时寂寞心情，有一个能谈谈的青年，他是多么兴奋，而情不自禁。这是一个办法，不想读书时，就找最爱读的书来翻翻，并作摘抄。

整日读《鲁迅书简》，大概也是年龄与阅历多了些的缘故，比过去读时更了解其心情。

有时，李锐也从纯文学的角度写些随感：

读《德伯家的苔丝》，哈代写得如此细腻，如此富有乡土气味，原文一定美极，翻译也好，风景描写与心理描写合而为一，气魄不如旧俄大作家，但细腻则过之。与谢德琳有相同处……

故事的结局如此高潮如此出人意料。写农村的生活和田园风俗有如《冰岛渔夫》的感人，作者几乎是在精雕细刻，却又不露刀痕，使读者时时为苔丝的命运提心吊胆，明知会向悲剧发展，总愿作者安排稍好一点。"苔丝"命运比"安娜"命运更令人耿耿于怀。关于宗教问题写得甚多，是反神权的，可惜不了解欧洲之宗教历史。

在更多的情况下，"札记"只是寥寥数语：

读刘厚生《张謇传》，史料多，选择甚好，文章也生动，有感而作之作也，但观点是旧的。

翻隋唐五代史，只述史料也。

翻郭沫若《文史论集》，其实第一部分有些文章可不必选入，并无学术性质。

翻《闲闲录》等，吴兆骞之充军宁古塔，清初文网之残酷，科场案之株连，充军及于家族，何时读来都令人愤懑！

读《马克思传》，读得很慢。与时代背景不熟有关。梅林完全以马克思文体、警句写此传，用了二十多年工夫。

看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占据材料，有分析和见解，令人喜读。

偶阅《二千年间》。过去从未翻过，作者一九四六年写，有很大概括力；惜乎要用"通俗"之笔，遂难成学术之作。关于朝代纪年划分办法，便于记忆，说得很好。

随便翻《随园诗话》，作者实博学多才之人。也是大胆思想之人。

以上这些，只是这段时间李锐读书札记的一部分，或许它们能使读者"一叶知秋"。应该说，李锐晚年之所以能够在学术研究中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与他一生的读书态度、读书方法是分不开

的。

李锐不仅有读书的嗜好，还有买书的习惯。离婚以后，他的经济状况一直十分紧张，有时简直到了卖物救急的地步，但他还是常常经不起书店的诱惑，几乎每个月都要在买书上花掉二三十元。每去一次书店，他就得计划一下应该减少哪些生活开支，来弥补这个“亏空”。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要对付一日三餐，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刚离婚时，蔡嫂每天把李锐的八两饭单独做好，李锐每天来取一次。自从蔡嫂被通知“不许为李锐做任何事情”以后，李锐每天上午的时间总要为吃饭不得不在十点半以后就要去当采买、厨子。不知多少次，为了买几块豆腐、几两肉，就得上街排一个多小时的队。这些东西都是每月仅有的一点营养配给，不去买，身体难以支持；去买，就要在这些生活琐事上花掉大量时间！就是想买点蔬菜，也常要跑好几个菜店才能买到。

好心的蔡嫂有时偷偷地给他送来一些饭菜，甚至让小女儿幺幺来告诉他：“北门打开，阿姨还放菜。”李锐怕连累她，总是对蔡嫂说：“以后还是自己来。”幸亏长沙的母亲、琬姐和沈阳的灼姐在她们自己也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节衣缩食，寄来干肉、咸蛋等食品，接济身体还在恢复中的独子和弟弟。

一九六二年春节前夕，为了招待来过年的孩子们，李锐到东单去买牛肉和冬笋，途中买豆腐排队花了四十分钟，到东单菜市场一看，买肉的长队从商店里一直排到大街上，足有好几百人，李锐望而却步。买冬笋的队似乎短一点，结果也排了一小时又十分钟。

这天晚上，商店里，大街上，那一条条购物的长龙，那无数张菜色的面孔，总在李锐的脑海里盘旋。他觉得，通过这一年多的市民生活，与千千万万的普通人同呼吸、共命运，他对人民的疾苦有了更深切的感受，从而也更认清了前几年经济决策失误导致的恶果。

面对这些现实，每一次奉命而作的检查交代、思想汇报，怎能

不是违心之言，又怎能做到深刻、做到“口服心服”呢？

后来，每当他翻出庐山时的文件资料，已经能非常平静，再也没有那种头脑炸裂的感觉了——自信使然。

但检查还是要做的。这期间，他甚至提出过希望恢复党籍的要求，这主要是为了能重新工作。整天看着满楼的人进进出出地忙，而自己却成了一个被遗忘的闲人，充沛的精力无以释放，他觉得这无异于一种苦刑。

有时他简直不敢看日历，日子一星期一星期地过去，年华流水般地逝去，分配工作却仍然无望！痛苦折磨得他失眠加重，经常一夜要服两次安眠药。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三日，李锐从广播中听到新安江水电站正在装吊第四台机组的报道，真有恍如隔世之感！一九五九年四月上海会议时，周恩来知道李锐连着给毛泽东写了两封信，说到一九五九年原定钢铁指标绝对不能完成，还提出“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意见后，很是高兴，曾在工交系统的小组会上表扬了李锐。会后在李锐的陪同下，周恩来来到正在施工的新安江水电站视察了半日，非常满意，挥毫题词：“为我国第一座自己设计和自制设备的大型水力发电站的胜利建设而欢呼。”一路上，两人同坐一辆车，闲谈了许多事情，总理对李锐等几位主席身边的人能随意向主席直抒己见，深感赞许和欣慰。所以在庐山会议上，周恩来为李锐也陷进了那个“圈子里”深感惋惜，曾在会议将结束时专门找李锐谈过一次话，嘱其好好学习。

如今，那倾注了多少心血、寄托了多少憧憬的新安江水电站，仿佛就耸立在眼前，工地上热火朝天的喧沸之声好像还在耳边。然而当年叱咤风云的策划者，今天却独困斗室！李锐在日记中不禁哀叹：“第二个五年计划到第三个五年计划我竟是如此度过的。我好像一个在后方医院养了几年的受伤的士兵，突然听到前方传来的炮声！”

要是偶然翻到当年为三峡而争论的材料，更会使他久久不能平静。

情所不堪时，李锐便自我开导："在北大荒不是常憧憬这样的生活吗？能吃到粮食、能吃得饱、能有较多的时间读书。而现在生活条件安定、房子朝阳，有暖气，每天两次热水，李锐呀，你怎么这样不知足呢？"（李锐日记语）

这两年，倒是李锐一生中同他的三个孩子接触最多的两年。以前他一年到头出差，跑遍祖国的山川大河，视察水电站工地，很少有时间和孩子们在一起。现在虽然离了婚，孩子们倒是三天两头跑过来看爸爸。到了寒暑假，更是天天都来。

和一些事业型的人不同，李锐极为"亲子"。他为两个大孩子辅导功课，引导他们读书，假期教他们习字、下棋、游泳。对老实而反应较慢的大儿子，李锐格外耐心，为了帮助他最感困难的几何，李锐仔细研究了教科书，为他反复讲解，有时候，儿子成绩不好，做父亲的也从不讲那些伤害自尊心的话。李锐觉得，要让孩子自己有信心，首先周围的人要对他有信心，不能泼冷水。儿子有了进步，李锐总是备加鼓励。

小妹的聪慧能干做父亲的早有察觉，心中自然十分欣喜。她不仅功课门门五分，图画手工也甚爱好，手特巧。同爸爸对弈，精明得很。李锐心中断言："此女将来能学点东西。"但小妹习字却不如哥哥进步快，原因是别人说不得。

但不知怎的，李锐总觉得自己对于孩子们好像是客人。

最让父亲疼爱的是小女儿幺幺。虽然幺幺每星期六才从幼儿园回家，但只要她一来到李锐的房间，就会立刻使屋里充满欢乐。幺幺每次来都缠着爸爸讲故事，"要讲小动物的"，李锐则要求以唱歌交换。有时候爸爸还没开口，她自己却头头是道地讲了起来。幺幺喜欢为爸爸表演幼儿园新学的舞蹈、儿歌，有时故意撒娇，在

床上打滚:“我在幼儿园乖累了,回家就要乱七八糟淘气。”幺幺质问爸爸:“为什么叫我‘幺仔’? 那你就叫李仔、锐仔。”不知什么时候,她已记住了爸爸的名字。

每次抱她,李锐心里总是又疼爱,又伤心:她出生后不久,家庭就遭剧变,多么不幸,然而那充满欢乐的小心灵对此还全然不知。糟糕的是,小家伙总让爸爸为难:

“你为什么住在这里?”

——真让爸爸没法回答。

“我们家什么都有,你这儿什么都没有。你原来住我们家,妈妈跟你吵架了。”

问她:“你是怎么知道的?”

答:“你还穿长袖衣的时候我看见的。”

——小小的心灵里,竟留下了这样的记忆!

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幺幺又来玩:“你为什么老不到我们家来了?”

爸爸再一次被问住。这天晚上,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的小女儿,但愿你长大了不会有任何痛苦的回忆,特别是不要有说不出的痛苦回忆,一切不幸,一切创伤,都在我们这一代结束吧!

让李锐感动的是,即使在那样一种阶级斗争的高压气氛下,水电工程总局的一些干部、群众并没有歧视他。无论是在楼里,还是在路上,在医院,他们见了李锐,只要周围没熟人,便主动和他打招呼,同楼的邻居常常把《参考消息》拿过来给他看。总务科的同志给他借了一辆自行车,这使他的生活方便了许多。传达室老张、老刘、老徐等几位更是常常借给他购货本,帮他订牛奶。逢年过节,机关里发些食品,他们也总想着给李锐送去一份。这些普普通通的人,虽然不一定都能弄清李锐到底受了多大冤屈,但是,善良的天性使他们对落难者满怀同情。

田家英的友谊

在这段艰难的日子里，田家英的友谊给李锐低沉的生活留下了一抹珍贵的亮色。

还在一九五九年从庐山回到北京后，田家英特意给李锐打了一次电话，称“我们是道义之交”，不幸被站在电话机旁边的妻子听了去，没过几天，李锐家的电话就被拆除了。

李锐从北大荒回来以后，两人又通了一次电话，约定到鼓楼大街的书店碰面。然后两人都戴上大口罩，在街上边走边找有单间的饭馆。

两年不见，李锐似乎衰老了许多，田家英也显得心事重重。李锐谈了北大荒艰难的环境，谈到北大荒的农民、农场职工以及北京去的右派们如何以豆叶、玉米芯充饥，浮肿、死人的种种惨状，很动了感情。田家英也谈到庐山会议后他受到的种种冷遇。

原来，一九五九年从庐山回到北京，迫于形势，田家英向毛泽东做了检讨，得到了毛泽东的谅解：“照样做你的秘书工作。”但是，他们之间在政治上已经开始出现了裂痕。

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继续恶化，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田家英奉命带调查组到浙江农村调查了一百天，并参加起草农业“六十条”以及贯彻“六十条”的试点工作。这个文件虽然仍坚持了人民公社的体制，但是它取消了食堂、供给制，将基本的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小队，这对改变平均主义，刹住共产风，扭转农业局势起到了很大作用。田家英以出色的工作为此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这一年，他和毛泽东的关系还是比较和谐的。

一九六二年，田家英在农村调查中，发现社员们普遍要求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经过进一步调查，他认为包产到户对于解救经济危机、恢复农业生产是有利的和必要的，便向刘少奇、邓小平等

几位中央领导人做了汇报，得到一致赞同。但能否推行包产到户，还要看毛泽东是否同意。田家英明知提这个建议要冒风险，但还是向毛泽东进言。果然，遭到了毛泽东的批评。

在这年八月召开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批评包产到户，成了毛泽东重新强调阶级斗争的导火线。因为毛泽东认为这样做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田家英的合理建议不但没有被采纳，反而造成了他与毛泽东之间的又一次更大的裂痕。从此，田家英逐渐失去了毛泽东的信任。

交谈中，李锐和田家英都认为，国家和人民再也经不起折腾，无论如何，不能再搞大的运动了。

分手前，两人一起咏成一首五言诗：

闹市遮颜过，
胡同尚可行。
人间多雨露，
老友系诗情。
冷眼观尘世，
丹心向众生。
炎凉何必叹，
把酒贱浮名。

“七千人大会”没有给李锐带来转机

一九六二年召开的七千人中央工作扩大会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当时党内外都有一种为彭德怀抱不平的情绪。这次大会以后，党中央为一批在反右倾运动中被错误批判者作了甄别平反。但是，李锐的命运并没有因这种大背景而获得转机。毛泽东重新强调“阶级斗争”以后，这股“庐山翻案风”很快就被压

了下去。

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三日下午，水电部刘澜波、钱正英约李锐谈话，向李锐宣布：党籍问题不考虑、不甄别，工作问题初步考虑去某一水电工地。李锐当然要提出异议。对于第一点，李锐重申一九六〇年七月和一九六二年五月给部党组和中直机关党委写的两封信的内容，再次强调：那个开除党籍的决定（后面简称"决定"）中的十来条根据，绝大部分与事实有很大出入。对方回答说："决定"有庐山问题这一两条就够了（够开除的了）。他们要李锐把对"决定"的意见再写一下。李锐拒绝再写，只要求安排时间专门谈一次。

对于工作安排，李锐当然醉心于水电事业，但是，他的愿望是要在水电事业中实践他的战略思想，发挥他的专业才能，而不是去工地做些简单劳动。因此他提出，如果党籍不能解决则不如去编编字典、或搞搞图书馆之类的资料工作，还更能发挥自己埋头搞资料的长处。

对方认为：从年龄讲，现在下去锻炼也不算晚。李锐答：从生理方面说，三十至五十岁是人生最好的年华，而自己已经四十六岁了！

这次谈话之后，李锐连续多日看不进书，报纸也只是随便翻翻。尽管安眠药成倍增加，仍然常常夜不成寐。每早的气功锻炼，无论怎样努力都无法使自己"入静"。

庐山会议以后，周小舟被下放到湖南浏阳做了一阵公社副书记，又调到广东任省科学院副院长；张闻天调到中科院社会科学部经济所做研究员，黄克诚和彭德怀赋闲几年之后，也分别担任过山西省副省长和国家三线建设的负责人。真正被打入社会最底层、处境最惨且一直不予安排的，只有李锐！

为了摆脱那理不清的思绪，从那时起，他几乎天天都去北海后门的"棋艺社"。他的下棋兴趣和技能，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培养起

来的。无论是局外观战，还是参与厮杀，都能使他暂时忘掉痛苦、忘掉自己的存在。

为了平息心中的风暴，他更频繁地骑着自行车到处去观摩画展。美术馆、北海公园、北京展览馆、故宫，无论何处，只要有这方面的活动，他都必到无疑。美术本来就是他自幼最热爱的，过去他和黎澍、田家英三人只要聚到一块儿，鉴赏各自收藏的字画总是一个重要的话题。而现在，他更是一头扎进去，使备受摧残的心灵有一个停泊的码头。他想在这世界里寻找真、善、美。和写读书札记的习惯一样，李锐每次观摩画展，也要随手记下观感：

> 下午骑车到展览馆观英国三百年水彩画展，均原作，集来不易。风景小品为主，早期多钢笔淡彩，也有类似我国水墨者。近代的几幅印象派："东方港口"、"夜空飞鸟"等，给人印象深刻。有一幅"打网球"，全绿调子，油画底稿，给人以迷茫之感。看来绘画方面英国远不如法德等之茂盛。观卢浮宫之平生志愿，无以得偿了。

> 下午观看徐悲鸿画展。大概是眼高了，素描还是国外部分为上乘，国画间有佳作，如"漓江春雨"、"逆风"等，柏树一般是好的，狮、鹰也有佳作。奔马实不敢恭维（过去多次机会，都没有买一幅也）。晨鸡只有立意是好的。猫则远不如任伯年。几幅有名大作，国画、油画人物都太平板（田横本人例外），缺乏思想，有的给人以呆滞之感。油画技巧似不如现在青年，桂林山水几幅是失败之作。喜马拉雅几幅都好。其素描基础在国画、油画中似乎并无特别表现。

> 上午特上故宫观历代画展。印象深的只有几幅，李

公麟“放牧图”得见全貌，马一千多匹，姿态千万，与“清明上河图”共垂千古之作也。徐天池大幅葡萄，藤叶生动之至，题字也比郑板桥佳。石涛、八大几幅都好，难怪齐白石要做门下走狗。有一位康熙时的画状元的工笔写景，过去没见过，简直像浮雕。见到张宏一幅，不如我所藏“仙家犬吠白云中”之有微瑕。龚半千列入清朝画家，明末已成名。仍明朝为是。赵之谦影响后来海派形成，惜过去未曾留得一幅。

辩诬

一九六三年四月三十日上午十点，距上次谈话一个月零七天，水电部副部长冯仲云约李锐谈话。从上午十点半到下午一点，李锐逐条批驳了“决定”中的不实之辞。

例如，一九三七年六月六日在北平，李锐因被警察在住处搜出进步书刊而被逮捕，他根据自己了解的被捕知识（不暴露身份，不出卖别人），哄骗敌人说自己是长沙来北平考大学的学生，进步书刊是一个已回老家的同学放在这里的，如果不赶快放他出去而误了考学，家里就会断绝经济供给。敌人对这个一身学生气的青年所述情况倒也不大怀疑。作为释放手续，便要他写一个保证。为了不暴露身份，李锐写了一份“不交不良之友，不读不良之书，也不参加共产党”的保证。李锐刚一出狱，立刻就找到党组织，投入了紧张的革命工作。后来，警察局在《华北日报》登出了所谓张训之（李锐化名）的紧要启事：“训之因交友不慎，误结识共产党人，因收读共产党分子交来之共党文件《星火》等，被官方查获训诫，现已觉悟，此后专心向学，决不参加任何反动组织。特此声明。”

显然，李锐用以欺骗敌人的那份“保证”被大大加工过了。这些问题在延安“审干”时已经查清并做过结论。然而，李锐在庐山

会议上出事以后,“对敌屈服”、“登报悔过”、“欺骗组织”、“叛徒”等等,成了李锐一条洗不清的罪名。

新中国成立初期,李锐确实帮助过一些来向他求助的亲友和母校武汉大学的同学安排了工作。他们之中,有的本人和祖上几代在家乡兴学,为桑梓教育事业作出过很大贡献;有的曾在共产党和平解放当地时起过重要作用。李锐觉得,这些人虽然都为国民党做过事,但也都是今天搞建设十分需要的人才。李锐很重乡情、友情,但也不是不讲原则。他根据当时掌握的情况和政策,只要没有大的罪恶,便尽量用其一技之长。后来,这些人大都成为肃反运动扩大化的牺牲品。虽说几十年后均获平反,有的还当了所在地区的政协委员,然而在当时,“包庇、安插、重用坏人”却成了李锐被开除党籍的又一条罪证。

更有甚者,一九六〇年二月,李锐从医院看病回家途中去书店买书,当时他正处于白天在部里挨斗,晚上妻子整夜吵闹,被折磨得心力交瘁的时候。他在书店里挑了二三十本书,分几次到柜台付款。由于过度疲劳,精神恍惚,有两三本与付过款的书放混在一起,忘记付款。店员便同他一起到附近派出所。李锐出示了身边惟一的证件医疗证,说明疏忽的原因,店员当即道歉,李锐亦补了书款。二十多天后,李锐在庐山的“反党罪行”传开,店领导立刻把那天的事情作为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反映到部里,尽管李锐按组织的要求写材料说明了当时情况,并以自己一生经济清白作证,但这件事还是成了李锐“个人品质不好”的例证而写进了“决定”。

至于“决定”中将“反三峡”、“反水利”之类也作为“开除”的原因,李锐当然更加忿忿不平。他在南宁会议上的那些观点是得到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充分肯定的嘛!

两个半小时的申辩,得到的答复是:

(1)主要问题是庐山,其他都是次要的,不必关心。庐山问题思想中至今没挖彻底,所以“山上”的人只有你一人被开除党籍。

(2)党籍问题不甄别,不讨论,并非个别领导的意见。

(3)短时间内不能确定去何处工作。

(4)今后多向党汇报自己的思想认识。

(5)甄别暂不谈,也可争取重新入党。

(6)你的问题并非一般“右机”,要从政治上深挖。

……

这最后一条指的是什么?为什么说自己“并非一般‘右机’”?“要从政治上深挖”什么?如果不是七个月后,刘澜波在谈话中点明,李锐恐怕很难想到,那些最致命的“攻击毛的话”是谁人揭发。

同上次一样,从部里回来以后,李锐记下了谈话的过程。

这天下午,从幼儿园回家过“五一”节的幺幺来找爸爸玩。小脑袋里永远装着数不清的问题:“爸爸怎么老不上班?”“你的电炉坏了,为什么不同我们住一起?”“我不吵你,你一人住北屋还不安静?”“你长大了做什么?你不做坏事吧?你学雷锋一样吧?”……她大概是看爸爸久久闲居,总不去上班,于是忽然想起大概是因为爸爸还没长大,所以不能做事。这让爸爸怎么回答呢?

命运的又一次逆转

这一年年底,李锐的命运发生了更大的逆转。

十一月五日,水电部几位领导再次约李锐谈话。冯仲云负责向李锐通知:党籍不谈,到安徽乡洪甸劳动(后因房子问题改为去磨子潭)。然后说上次李锐对“决定”内容提出的意见是对的,承认是部里的错误。什么“偷书”、“被捕”等都不是什么问题。“事情很难讲”。李锐问为何上次谈“工作”这次却变成了“劳动”?对方无以为答。

到底又发生了什么事情?李锐如掉云雾中。想到庐山会议以来,妻离子散,如今落得苟延性命还是出了问题,情绪实在无法控

制。仿佛屋里的人又都说了一些安慰的话,李锐却一句也没听清。

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八号楼的。环顾这间已独居两年的陋室:桌上是每日习字的笔砚,架上堆满各种书籍,墙上挂着刚刚从朋友处取回的心爱的字画,还有幺幺天真烂漫、欢乐之至的彩色放大照片……他忍不住想一声长啸!又觉得影响邻居不好,便冲出房外,竟然转到离家很近的人定湖!

湖水满了,夕阳血红地浸在初冬的暮霭中,一切凝结,落叶满地……他不明白,这样蹉跎下去,自己的生命还有什么意义?他在湖边狂走。

幸亏那是一个月夜。温柔的月光给黑夜涂上了一抹亮色。或许绝望中的人正是在这日月沉浮交替的自然规律中受到了启迪?

第二天,李锐的情绪已平静了许多。他做的第一件事是给在长沙、沈阳的两个姐姐写信。多少年来,李锐与这两个姐姐的非同一般的手足之情、骨肉之亲,弥补了婚姻不幸所失去的一些家庭温暖。前几个月,琬姐、灼姐来北京看他,李锐吃惊地发现,她们已衰老了许多!为了接济困苦中的弟弟,几年来,她们自己忍饥挨饿,包裹不断,为他吃了多少苦啊!

接着他翻看画册。楼里正在修暖气管道,机器声、油漆味充满走廊。李锐感到好像置身于工厂的机械车间,忽然忆起自己正是一九五二年此时调到北京,当时那股为第一个五年计划没日没夜工作的勇猛劲头,那些热火朝天的场面,竟然又使李锐激动了一阵。

夜晚,刘澜波来接他到部里又谈了两个小时,冯仲云也在座,态度非常缓和。刘澜波告诉他,对他的处理,包括当初发配北大荒,全部都是中央决定的,问题还是在庐山,但不知范元甄又向上面写了什么揭发材料,具体内容他们也没看到,好像性质很严重。李锐心里不禁一阵悸动:真是还不完的"孽债"啊!

两位部长对安排下去工作重新作了说明:去工作,不是去劳

动。可以多带些书去读,还可以搞些调查研究。时间是二到三年。他们甚至讲了“留得青山在……”之类的话。

李锐还能说什么呢?

三十四年后,小妹(李南央)在《我有这样一个母亲》一文中为这段历史写了如下一段文字:

> 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后,我爸妈离婚。本来我爸爸有可能恢复党籍,降为局级用,我妈一份长篇揭发材料报了上去。据刘澜波说,传到他手里时,已满是烟迹,不知过了多少人的手。最后传到邓小平那儿,邓说:“太恶劣了,烧掉!”我始终不甚明了,邓到底指的是我爸的言论太恶劣,还是我妈的揭发行为太恶劣。

从这次谈话的第二天起,李锐开始着手做去安徽的具体准备。表面上看,他似乎又渡过了一次精神危机,实际上,夜深人静之际,只要一想起自己七八年就要这样过去了,一生最好的年华就这样白白浪费,他心里就又会翻腾起来,以至夜不成眠。辗转反侧之际,他忽然产生了写谭嗣同传的念头。在北大荒西岗时,李锐在小于那里看到一些有关书籍,就曾想过,像这样为民族进步奋斗一生的人物事迹,应当更多地传播人间。今年(一九六三年)四月的一天,路过菜市口,那是当年谭嗣同捐躯的刑场所在,不禁想起谭临终语:“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这是何等气概!能写点东西,精神有了寄托,日子就会好过得多。于是,李锐在清理要带走的书时,便有意将有关材料挑出。接着两天,为了买到这方面的书籍,李锐骑车几乎跑遍了全城。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李锐动身前十四天,与田家英又见了一面。

两人先在后海边散步,夜深后,又来到后海附近的一家小酒

馆。对于李锐的遭遇,田家英感慨万千。当然,这与他自己当时的心境也有关。

这年二月召开的研究在农村搞“四清”运动、五月召开的研究“以阶级斗争为纲”抓农村社教的会议,都没有通知田家英参加。毛泽东在五月的会议上,还以批评的口气说:“一九六一年搞的‘六十条’对阶级队伍问题写得不突出,没有好好注意依靠谁的问题。”毛泽东提出的这个问题,与“六十条”的起草人田家英的确有关。在如何看待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问题上,田家英和毛泽东之间早就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毛泽东在五月会议上亲自主持起草的一个文件(前十条)中有这样一段话:“依靠贫农、下中农,是党要长期实行的阶级路线。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一直进入到共产主义以前,我们要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要发展农业生产,不依靠他们,依靠谁呢?”田家英对此不以为然:“难道阶级成分也能遗传吗?”谁知这话传出去后,被当做一个错误观点批评了。

田家英对毛泽东“左”的一套越来越反感,毛泽东也对田家英愈来愈疏远,田家英说:“照这样搞下去,总有一天要分手。”

共同的情感,共同的遭遇,田、李两人越谈越投机。田家英劝李锐:谭嗣同传千万不能写,否则会被认为以谭自居,更要被置于死地。

分手时,他们走过景山已很远。李锐独自大步走过北海大桥,至后门桥时,坐上一辆三轮车,到宿舍已经十二点半了。精神上“痛快”了一下,可谭嗣同传却要吹了!

李锐想为这次会面留下点纪念,于是起身吟得七律一首:

客身不意复南迁,
随遇而安别亦难。
后海林阴同月步,

鼓楼酒座候灯阑。
关怀莫过朝中事,
袖手难为壁上观。
夜半宫西墙在望,
不知相见又何年。

李锐怎么也没想到,这次分手,他和田家英便再也没有相见的日子了。

过了几天,写谭嗣同传之念又起:家英的话自然有理,可自己本无此心,又何必去管那些非议!或者写孙中山传?这总不会发生误解吧,但也难说,看来只有去编医书才安全!

这些想法在李锐脑海中来回翻腾。

十二月四日,李锐接到沈阳的灼姐来信,劝他不要写谭嗣同传,专读马、列、毛,写点与此有关之题为好。

当天晚上,李锐来到黎澍家,他想听听这位专门研究过辛亥革命史的朋友对此有何见解。

黎澍认为:谭嗣同传倒无不可写之理,只是此人味道不大。不如写孙中山、蒋介石。但李锐觉得两者材料均太多,那么短的时间连最基本的资料也搜集不起来。黎澍又建议李锐研究哲学,谈到中国无真正的思想家,孔夫子是什么都说一点,接触一点,却远不如希腊诸家,近代到黑格尔之精细深透,中国简直无人可比。这些议论,在当时,不是至交,是绝不敢讲的。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一日,是李锐再度离京的日子。"上午九点半,匆匆吃完饭,轻轻亲过幺幺,不敢多亲她,怕一下冲动,收不住眼泪。硬起心,同孩子们挥手告别。"(李锐日记语)

第四节 磨子潭

最初的日子

坐落在安徽霍山县大别山中的磨子潭水电站，青山环抱，碧水悠悠。美丽的大自然以她的宽厚、恬静，接纳了李锐那创痕累累的心。

李锐将部党组介绍信交给磨子潭水电站的领导。介绍信上写着：“帮助工会做点文化教育工作，根据身体情况也可参加些轻微的劳动。”对方告诉他，站上原来并无专职教员，帮助职工搞文化教育，是部里分派下来的任务。

这天晚上，李锐在临时住处给琬姐、灼姐、苗苗、小妹等亲人写信。六七年前为视察工作李锐曾来过这一带。在给灼姐的信中李锐写道：“旧地重游，不免感慨系之。今天又爬上坝顶，钻入坝垛，下厂房，看水轮涡壳，昔日种种情景，如镜头闪过。这种滋味，只我一人独知。鹰的翅膀折掉，变成小鸡在地上活着。我自认无个人英雄主义，但有浓厚的事业心。过去七年总算有了点经验，但山崩地陷，摔下来了，亦复何言！因此这两天的感情上，觉得还是不该来水电站。我非诗人，无以遣情，只有一边含泪，向你倾诉这么几句。我的残酷遭遇，人世实属罕见。也好，就在这教工人识字，学加减乘除，‘将军当兵’，聊以自慰。”

但是，这种低沉的情绪不久就有了转变。山里人特有的纯朴、善良、热情好客温暖了他那颗冰冷的心。虽然大家对他身份懵懵懂懂，只是听书记说是个犯了错误的下放之人。而他们不屑于计较这些。

这天李锐把饭盒放在食堂备用，两位大师傅见他老是自己洗

碗，嗔怪他不该这样客气，要他“像在家里一样随便”。这一句质朴情真的“像在家里”之言，让李锐又感动，又心酸：他们岂知自己已是无家之人！

站上的罗书记亲自跑来告诉李锐，他的宿舍很快就收拾停当，怕他着急，又说住房就和办公的地方在一起。这正合李锐心意。

两天以后，李锐搬出招待所，乔迁新居。这是水电站一排单身宿舍中一间九平米左右的房间，四壁已被刷得雪白。工人们见他一来就跑到竹业社订做了一个大书架和一支竹笔筒。知道是个读书人，特为他安了一个一百支光的大灯泡，还特意把霍山新华书店的人请来，和李锐谈买书的事。招待所师傅送来了暖壶、脸盆、痰盂、褥子和被单，四五个人帮着搬家。那两位要李锐“像在家一样”的厨房大师傅老王、老孙，每早都为他送来一锹燃炭作为室内取暖之用，还带上一壶开水……

很快，李锐迎来了在磨子潭的第一个新年。元旦那天早晨，罗书记等几位电站负责人和一些老职工、小青年都来给李锐拜年，厨房还专门为他这个新来落户的人单做了几个好菜。李锐推辞不过，就去买了酒，把左邻右舍请来，一起享用。李锐觉得，这个年比在北大荒的西岗和八号楼过得有趣、热闹得多。这天，他在日记中写道：“就为此等感情，也应当有利于磨子潭也。”

春天来了，水电站也分给李锐一块“自留地”。一九五八年农村实行公社化以后，为了限制农民的私有经济和私有观念，给步入“大同社会”作准备，“自留地”曾被严格取缔。安徽省对此坚决执行。然而一九五九年以后，经济危机使安徽农村饥荒严重、饿殍遍野，人口大量外流。面对现实，省领导痛感“失职”、“内疚”，采取了“定户到田、责任到人”等补救措施，“自留地”也是其中措施之一。不过仅一年，曾被毛泽东同意试验的“责任田”就被毛泽东斥为“单干风”、“翻案风”、“方向路线性错误”。安徽省领导人没有因全省大量饿死人而受处分，却因亡羊补牢、想出解民众于倒悬的措施而

"挨批",并从此"赋闲","责任田"随之被取缔,但"自留地"却保留下来了。

李锐在自留地里种上了花生。女青年小葛见他翻地十分熟练,惊奇地问:"什么时候学过种地?"李锐笑答:"在你还没生出来的时候!"可不,他最早学种地是在延安。

山里的春天,漫山遍野百花吐艳,美得醉人。看到李锐喜欢把采来的野花插在权当花瓶的笔筒里,几个小伙子今天送来一束桃花,明天送来几枝串红……有一次,为了帮李锐进山采花,他们甚至牺牲了晚上的电影!鲜花竞放,满屋生辉,暮气一扫而光!

夜校里的文化教员

水电站的职工很大一部分是青年人。由于交通不便,他们和外界的联系受到很大限制。李锐的到来,给他们单调而平静的生活带来了不少新奇。

可不是,也不知这个身村高大,目光炯炯的人过去到底是个多大的干部,反正一接触,就让人觉着言谈举止非同一般;也不知这人到底有多大学问:他的大书架上,摆了满满一架子书,全是他从北京托运来的!每天早餐后,他要跟着广播听英语;几天来一次的一大叠、一大叠的报纸,他定要从头翻到尾,一张不漏地看个遍。更新鲜的是,他还特别爱写毛笔字,水电站仅有的一两个有点旧学底子的人,都说他那书法好漂亮!他写的大多是毛主席诗词和其他旧体诗,写完看着满意的就贴在他屋里的墙壁上,每隔几天换一张。

生活方面也有些地方挺特别:每天早晨,他六点以前必定起床,练气功半小时。夏天一到,他就天天爬上坝顶,到水库中游泳。别看大伙儿守着水库生活了那么多年,还真没几个会水的。有一次,他游过一个山嘴,还为拦竹排的农民截回一根楠竹。那些竹业

社的山里人没有一个会水的，个个对他翘大拇指。

单身青年们很快就同他熟悉了。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同住一栋宿舍楼，整天进进出出抬头不见低头见，更重要的是，大家很快发现，这个人其实很好接近。

于是他们开始天天晚上跑到他屋里聊天儿、打扑克、下棋。星期日或白天有空的时候，就到坝上去看他游泳。有几个青年还跟他学。“观众”的热情，往往会使李锐游得更加出色。

刚来磨子潭时，李锐曾向水电站的领导谈过，将自己的情况与身分如实向群众说明，这样好相处。但是他们没同意。

职工夜校开学了。李锐负责教初中语文。别看这些小伙子玩起来劲头十足，让他们学文化，可就蔫儿了。

听课的热情倒还比较高，反正李老师讲课生动、活泼，又开眼界又有趣，当然爱听。可就怕写作文。布置的作文常常交不上来，以致李锐常有到青年家中一个个催交作业之举。

改作文又是一件十分头疼的事，李锐在那段时间的日记里，常常会有这样的记载：

“几乎整日改作文卷，进度甚慢，比在延安清凉山处理稿件困难多了。”

“夜改作文卷，味同嚼蜡，勉强为之。”

“上午改作文卷，佳卷甚少。”

“夜上课，到二十人，作文仍交不出，真是没办法。”

学生作文的主要问题是：内容空泛、生造词语、错字和语法错误多。除个别能达到初中程度外，其他均只有小学水平。

为了提高学生们的写作能力，李锐自编教材，他根据有关书籍编撰《语法讲义》、《应用文讲义》，还根据学生作文中的错字和病句编了“作文病院”。他在课堂上讲解应用文写作知识时，就以学生

们在作文中的毛病作例，启发大家一起参加评卷、修改，课堂气氛非常活跃。他又从报上找出一些短小生动的文章做范例，使作文要领具体化，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个别辅导”是李锐教学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常把学生找到自己的宿舍兼办公室，拿出他的作文耐心地逐字逐句地帮他分析，或者把别人写得好一点的拿出来对比。为了对症下药，他还看了一些学生在学校时的作文，发现青年们作文之所以普遍不够朴素、实在，原来是当地学校的教师就喜欢那种“党给了我一双金翅膀，飞向革命”之类的句子。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学生情况有了好转。李锐日记中出现这样的记载：

“将作文卷全部改毕，好几人甚有进步。”

“上午改了不到十本作文卷，大体都有进步。”

“今收到二十七本作文，空前盛举！”

学生有长进，教师当然欣慰，他感到：能教会二十几人作文，总是一件工作。（李锐日记语）

两年以后，水电站领导决定将语文、代数分班独进，有如今天学校里分“文科班”、“理科班”。学生绝大部分都跑到李锐这边的教室来了，领导根据工作需要劝说一些青年去代数班，劝都劝不走。

青年们喜欢李锐的课，更喜欢李锐其人。这个“老李”在他们心目中再也不是什么神秘莫测的“大干部”。课堂上，他是教师，课堂外，他是兄长。除了天天晚上可以到他那儿去串门儿，每逢周末或节假日，李锐的宿舍就成了“俱乐部”。

李锐喜欢这些青年，可有时也是无可奈何陪他们玩。尤其是当他刚刚打开书或摊开资料、书稿准备做事时，青年们敲门闯入，

他便只有“入乡随俗”。

李锐以他那研究三峡工程和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分析的智商下象棋、下围棋、“打百分”,在这个小地方自然是远近无敌手。他常常“让三子”,“让五子”甚至“让七子”,仍然大获全胜。火气大的青年屡战屡败气得摔过棋子,李锐则因常常战绩辉煌而兴高采烈,曰“痛快之至”、“大过棋瘾”。玩到走火入魔时,他也童心大发变成了孩子。

来到磨子潭,生活开支比在北京省了许多,李锐便恢复了经常给长沙母亲寄钱的习惯。这一来,他每月手里的生活费也就是三十来元。但在青年当中无疑还算“财主”。所以小伙子们经常借故要李锐买糖请客,要是他屋里有一点糖食被发现,也立刻会被一抢而光。

李锐的对门邻居是两个已成家的女青年,两人经常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吵架,闹得四邻不安。也吵得李锐无法看书做事。这天,两家战事又起,李锐劝阻无效,便回屋挥毫写了一首小诗:“小戚小葛好邻居,打打闹闹笑嘻嘻。一天突然不说话,只因丫头抓小鸡。”“丫头”是小戚的小女儿,李锐把诗贴在门外,立刻广为传唱,两个女青年也破涕为笑。

磨子潭的青年们愿意把心中最隐秘的事情向他倾吐:失恋的,会拿着女友的绝交信找李锐出主意,诉烦恼;出身不好的,会把家里的种种隐私以及心中的苦闷向他和盘托出……

这天西安电校分到这儿的青年汤洪熙送来了一个新日记本,请李锐题字。李锐发现,这个年轻人特别喜欢接近他,有点像北大荒的小于。思索了一阵,李锐在上面写道:

写日记有许多好处,最重要的是可以督促、检查自己;可以养成做事有恒的习惯;可以备忘,同时也可藉此练习写作,使语法通顺。但日记很不容易坚持。如果采

> 取有话即长，无话即短的办法，各种各样的事情和偶有所感都不妨记下(日子长了，就会辨出哪些可记，哪些不必记)，便容易坚持下去，慢慢养成习惯。当然，日记主要是写给自己看的。小汤同志以为如何?

后来这个小汤果然成了李锐在磨子潭水电站职工中的“高足”，李锐曾几次向电站领导推荐小汤等青年去考职工大学，为电站培养技术力量，可惜此议因“文革”开始而作罢。

李锐在青年们心中的分量，竟引起了一位“阶级斗争”观念极强的电站负责人的不安。他甚至私下告诉一些青年不要与李锐接近，说他是修正主义分子。这话很快就从青年口中传到李锐的耳朵里。身为戴罪之人的李锐仍然气盛，竟把那位领导请到自己宿舍当面对质，两人为此大吵一场。

常来宿舍与李锐对弈的，不仅有青年，还有水电站的几位年纪较大的工程师、管理干部、司机等等。他们当中文化高一些的，喜欢和李锐谈国内外形势，谈旧体诗，谈水电站人际关系中的种种矛盾和工作中的问题。全站每周的政治学习，李锐常常不由自主地变成了会场的中心，大伙儿都想听他讲，都爱听他讲。

文化水平低的，也喜欢接近李锐，他们喜欢李锐为人的诚恳、豪爽、热心肠。头一天，他刚帮助一位不识字的杨大嫂写了家信，第二天，一位姓汪的职工又跑来请李锐给他新生的儿子取个名儿。李锐翻了辞海，因其姓“汪”，便选择了“浩”字。“汪浩”，寓其宽广博大之意也。小孩子学习不理想的，父亲来请李锐给辅导，升学遇到麻烦的，找李锐当参谋、出主意；经济上有困难的，来向他借钱。全站向李锐借过钱的，总有十好几人。对于这些事，李锐永远是有求必应。

骇人听闻的心里话

李锐做过九年的报纸宣传工作，养成了到处了解情况的习惯。来到磨子潭后，自然也想了解本地农村的情况。

晚上外出散步，是李锐的习惯。他经常信步走到附近生产队或山冲里的农民家中小坐、闲谈，有时也向他们买点鸡蛋茶叶之类。

李锐最感兴趣的是生产方面的问题。他发现这里的生产方式很保守很落后，产量也低。农民用钱十分困难。他在桃花冲碰到过一个生产队长，是信用社的债户，十元钱都还不起，磨了半天，只还了五元。一个小伙子告诉李锐：当地青年娶媳妇，要出八十元，十丈老布，不少家里没活钱的农民，只好打光棍。

李锐便向公社和生产队的干部建议，根据山区的特点，应下大力气发展茶叶、茶子油、林木生产，这些副业的收入不仅可以改善群众生活，还可以促进农业生产，使粮食自给。

当地从没有积肥沤肥的习惯，李锐极力说服他们改变现状。

一年以后，公社秘书在路上碰到李锐，高兴地告诉他：一些生产队副业已抓出了成效；不少地方因为积肥沤肥提高了地力，粮食有所增产。公社还把这样做、并做得好的生产队树为样板。

农民们对李锐十分敬重，可是每当问起他的过去，他总不肯多谈，只说自己是犯了"错误"。不过，时间一长，人们好像也从各种渠道听到了一点。有时他们会悄悄向李锐打听："彭德怀现在在哪里？"李锐当然只能支吾过去。

对于为民请命而遭贬黜的人，朴实仗义的农民是极为信任与同情的。

这天晚饭后，李锐散步走到一座桥头，被白水坂大队的群众邀进去闲谈了两个小时。他们以为他是上面来的什么"大首长"，便

大大地发开了牢骚:这里一九五八年下半年就开始断粮,一九五九、一九六〇年最严重,开始每人每天还有二两粮,后来竟几个月都难见一粒粮食。树皮、树根、各种野菜都吃遍了。一个生产队长告诉李锐,他队九十六人,死了二十四人。旁边的人却都说这个数字很平常,有的队死的还要多。有人接着说,他们队就死了四十五人。死者中老年人居多,也有青壮年、小孩,很壮实的也死了。干部则要大家不准说是饿死的,去食堂吃饭要走几里路,去晚了就吃不上。干部、司务长、做饭的以及他们的家属,则没有饿死的。外面参观的来了,食堂就把剩下的一点粮食全搜出来做干饭,参观的一走,就几天没吃的。当时的实际情况,县里都是明白的,可谁也不敢说。"跃进"时,日夜逼着干,不干就打人,抓人,不给口粮,调到别的生产队"劳改"。谁不怕倒霉,谁还敢讲一句老实话!县里一位干部就因为说了一项水利任务三个月完不成,就被调到一个生产队管制劳动,群众还能喝稀的,却故意整他,给他吃糠巴巴。

人们说,饿到后来已无法生产,喝了点稀汤,干部就领着大伙儿到地里,围着坐,根本没力气干活。鸡猪都已杀尽,牛倒是杀得很少。干部们后来也被整得厉害,因为他们半夜偷机动粮做饭吃。有的还被关了起来,当然他们都向群众道了歉。有个很"冲"的小伙子插话说:"道歉算什么,人还不是已经饿死了!"

后来,李锐在给部党组的一份思想汇报里写道:"我看到低标准(指每人每月十几斤粮食定量)时,农村饿死了一些人,但极少听到农村基层干部有饿死的。而战争时代,基层干部同群众在一起,身先士卒,出生入死,伤亡是很多的……是什么原因?我自己这样试答过:战争时期是对敌斗争,你死我活,上下思想一致,干部群众一条心,鱼水关系。而低标准时,情况大不相同,总觉得是有思想紊乱的一面。"为了使这种能够反映一点真实情况的"思想汇报"通得过,李锐接着就给自己戴上了一顶"总喜欢看阴暗面"的帽子。

大家都把李锐当成一个"高高在上"的人物,他告诉人们,自己

也吃过各种代食品,从玉米芯、瓜叶、瓜藤到榆树皮,说的都是"行话"。大家问他吃了多久?答:半年。人们这才相信,说:"现在都讲老实话了,干部群众是一家人。"他们还告诉李锐,那几年,霍山范围之内,大致情况都差不多。李锐觉得,相比之下,北大荒兴华村当年的生活水平恐怕还得算是中上等。而且挨饿的时间也没这么长。

李锐又问起他们的生产情况,农民们说,白水坂山高、气温低,每亩只能打二百斤。李锐便与他们对比青海、黑龙江的气候、地理情况,认为产量低还是干劲不足,措施不当,应该想办法改良土壤。

使李锐吃惊的是,农民们都相信县以上的领导是绝不会胡来的,只是大队、公社、县这些基层干部把事情弄坏了。

另一次,李锐同公社彭主任沿白水沟同行,过了龙门坎,连续碰到几处小瀑布。李锐觉得比杭州九溪十八涧不知美多少倍!然而彭主任却指着路边的引水道——一个石砌的深洞和下面毁掉的一块田,告诉李锐,这就是"大跃进"时搞的一个小水电站的"遗址",当时厂房都盖了,那时的口号是水电站要"遍地开花",全县搞了一百多个,无一成功,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六安专区修水利,从各处抽调的劳动力都是倾村而出,粮食全吃光了,可是由于规划不周,"水网化"还是一场空!

彭主任也谈起那时农村的"大食堂":"二三百人吃饭,要走五里路,就那么一点稀的。后来才改小食堂。一九六一年下种时,饥饿的农民把稻谷和玉米子都从地里抠出来吃了!死人根本不算什么事,倒在路上的,衣服都被剥去了,但当时省委向中央汇报时却说只死了一千人!"

类似这样的交谈,李锐简直记不得有多少次了,他发现这里的人们总好谈及那两年的事情。"大跃进"中安徽省领导冲锋陷阵,这一带的情况也就特别惨。面对这一切,李锐只能在心里仰天长叹。去年刚刚开过的中央全会已经重申:庐山结论铁案如山!

好心的群众还非常关心李锐什么时候才能回去,见了面常会问起,李锐总是说:这要由组织决定。

最使人对李锐感兴趣的两件事

大彭、小彭是磨子潭水电站小学的教师,有一段时间,李锐每晚散步总是过桥走到小学为止,加上夜校语文班后来改在小学教室里上课,李锐就同他俩熟悉起来。

他们两个对李锐的兴趣之一,是想听李锐讲他过去的革命历史。这当然不只是他俩的兴趣,当地的老老少少,只要知道李锐的人,对这个问题都感兴趣,李锐越是不讲,别人就越是好奇,尤其是水电站那些新来的青年,更是总缠着李锐要他讲自己过去的事。李锐当然是不肯讲的,只有一次,实在拗不过,就给他们讲了一点"一二·九"运动时,自己在学校里带头闹事的经过。这是惟一的一次破例。

大彭、小彭对李锐的兴趣之二,在于李锐的字。李锐为小学校写过一些关于教育方针的标语,也为他们个人写过毛泽东诗词。这当然也不只是他俩的兴趣。李锐的字在当地可谓远近闻名。直至"文革"前夕,来讨字的人几乎是络绎不绝。

为此,李锐曾写过这样一首打油诗:

拙字居然上墙沿,
标语语录诗连篇。
山中无虎猴子霸,
一纸涂鸦七分钱。

那里惟一可买得到的大张纸是七分钱一张的白色有光纸。来讨字的除了磨子潭的人,还有佛子岭的、石槽的。遇上春节写门

联,李锐要一连写上好几个小时甚至一整天。

后来大彭因工区伙食太贵,调到离他家很近的丹龙寺谢家坦小学任教,一次他来信约李锐和小彭去玩,两人选了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前往。因为要翻一座很高的山,当天不能回来,就在谢家坦住了一夜。大彭夫妇杀鸡相待,一片盛情,晚上生产队的青年农民来了一屋子,与李锐漫谈当地的生产和生活情况。第二天早晨,人们拿来纸、墨、笔、砚,李锐才恍然大悟大彭约他来的目的。那天,他为大彭和谢家坦的另一位教师一共写了十张毛泽东诗词。

写诗成为寄托感情的重要方式

来到磨子潭,李锐对旧体诗的兴趣大大发展。他把吟诗做诗当作一种休息,更看做一种情感寄托。特别是当气候变化,几十年的痼疾哮喘折磨得他无法入眠的夜晚,他便坐在床上吟诵旧体诗。

寄居六载为何情?
偶语牢骚非素心。
圣代当今多雨露,
解铃还请系铃人。

这首诗写于一九六五年,从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算起,李锐被贬黜已整整六年!可惜系铃之人并不因为实践检验的结果而有"解铃"之意。这怎能让李锐没有"牢骚"呢!李锐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不是某些文艺作品中"高大全"的、只会讲豪言壮语的"英雄",面对如此不公平的待遇,他当然要有"牢骚",这种牢骚在日记里也出现过:

……翻看去年前年的日记,看到许多关于幺幺的记

载，令我伤心，连忙到屋外让冷风侵面，不然就会止不住落泪的。这是怎样的惩罚啊！夺去我的一切！自问我是一个讲“人性”过分到温情的人，二十二年逆来顺受的夫妇生活如此，即使是处理一般同志、干部、同级、上下级间的关系，也无不如此。对待×××的自闹一个月的家庭纠纷而不上班，我是人情到家了的；反右时的保护×××而换来以怨报德，我也淡然处之。可我今天却落得这样的下场……大概只有遭到横死或真是哮喘大发作一口气上不来了，也许领导人才觉得有点“心愧”，但也难说，一切是政治第一也。

最令他情所不堪的，是至今不能回到他热爱的水电事业中去。每当回忆往事，他便心潮难平：

八年踏破九州山，
遍访水能天赐源。
以礼古田刘家峡，
新安资水狮子滩。
大河上下学规划，
三峡争论在超前。
雅鲁藏江远未识，
如今闲住磨子潭。

一天晚上，李锐拿出专业书籍，翻看《水工建筑的破坏及其原因分析》一文，心中不禁黯然。晚上，他在日记中写道：“完全是一种旧梦难断的心情”。还有一次，他在备课时无意中翻出当年写的“长江规划”一文，那些天他正为水电站职工讲解《矛盾论》、《实践论》，对照二文的基本观点，李锐更感到，自己那些切合实际的主张

应当坚持。当晚,他又在日记中写道:“我不会忘记当年的勇气,这段历史总有人记得的。”“想起那些紧张勘测的日子,想起钻入新安江河床底下的隧道,想起自己承担过的风险,想起那些沸腾的生活,想起自己全身心倾注的事业,而今突然中断,今天还住在这样一个‘打补钉’的水电站,怎没有一点个人的哀怨!……”

六载飘零何用嗟,
长安北望已无家。
飘飘谁得沙鸥似,
伏案孜孜笔走蛇。

李锐在这首诗里,表达了他失去家庭远离亲友之后的心境。来到磨子潭,他对孩子的思念极其深切,以致多次在梦中梦见孩子。在日记中,多处提到孩子:“珠珠(侄女)考大学,估计能考上,苗苗怎样呢? 还是挂心得很。孩子们多么不幸! 整个中学时期与我隔绝。真是无可奈何也!”“昨夜连续两次梦见三个孩子,一短梦一长梦。真是‘人间悲剧’。”“大概天亮前迷糊了一阵,做了一个梦,同小妹、苗苗在一起,幺幺却未入梦!”……

一九六五年七月,李锐得知幺幺将上小学,便对着幺幺的照片,为她画了一张头像。为便于邮寄,画像搞成明信片式样,右上角还画了一条红领巾,信封题曰:“幺幺上小学,早戴红领巾。”于开学之际寄到北京。几个月后,他又给幺幺写了一封信,许多字都注上了拼音,为了字迹工整,竟抄了五次! 信封上直书“范盈兰(幺幺学名)收”。

“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为杜甫的诗句。李锐借“飘飘谁得沙鸥似”之句表达了自己无家可归、四处为家的处境。第四句“伏案孜孜笔走蛇”是说,尽管如此,他仍在著书立说,对于文化教员的工作,自己也是尽心尽力的。事实上,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勤勤恳

恳，不计个人恩怨的敬业精神，真乃盖世无双也！

李锐的母亲和姐姐们对再度落难远行的亲人继续关怀备至。母亲的信充满体贴和鼓励："希尔心情开朗。自己不可太省。我已年过古稀了，没有什么了不起。希尔好好保重身体，往后再为国尽力，不使为娘的担心着急，即是尔的好意。惟我心里时刻不能忘的，母子团聚，其他一切都不在乎。"

这天李锐又收到琬姐从长沙寄来的一箱腊肉，品种甚多，有鱼、肉、肝、香肠、条心等等。姐姐真是煞费苦心！想到自己年近半百之人，还被家人如此疼怜，心中真是不知如何是好。来磨子潭以后，姐姐们寄来的包裹不光有食物，还有书籍、药品、衣物、棉被等鱼雁往来更是十天半月从不间断。这天李锐在日记中写下这样一段感受："人间骨肉之情，大概只有同经患难才会看得如此之重。虽然儿时没有饿过肚子，同工人、农民的苦难不可同日而语，但我们三姐弟的童年，那种相依为命和生活中的种种辛酸，自然会保留这种老而弥亲的情分也。"

秋天，李锐把山里刚刚收获的新茶寄给她们，并在包裹中附上小诗六句：

山中无特产，
惟有此荒茶。
妇孺辛勤摘，
色嫩味亦佳。
千里寸心寄，
沈阳与长沙。

一位朋友曾问过李锐，为何不给北京寄些茶叶？李锐沉吟良久，第一次对人说出："哀莫大于心死也。"

一九六二年，李锐在白水坂大队听到，那里“大跃进”时为炼铁树木被砍光的情况后写道：

昔日满山合抱树，
今朝举目秃童头。
只因寿县大军到，
一扫而光燃小炉。

几经磨难，李锐对自己的看法仍不动摇。虽然他在磨子潭写的“思想问题的交代与检查”中不得不写上：“我的实质问题是对群众的冲天干劲、对群众的无比威力，对普通人的智慧，对社会主义事业，对广大群众急于改变一穷二白的决心与可能太无知，心太冷……”但在“写给自己看的”、可以吐露真实心迹的日记里，却是另一番风景。下面是他在一九六四年日记中的一段：

……指挥军事，真是得心应手也，但以同样方法决心大炼钢铁就有问题。一切事物有其本身客观规律，主观能动性只能在其一定限度……

对于毛泽东发出的“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李锐是十分赞成的。一九五九年水电部批斗李锐时说他一贯反对“治淮”，那是强加的罪名。但是，在“治淮”的具体方案上，李锐对水利部片面防洪以及后来“大跃进”时一些不切实际，以致挖了又填、填了又挖、劳民伤财的做法，是很有意见的。一九六四年，淮河沿岸又出现严重涝情，逃荒到磨子潭一带的难民很多。李锐提笔写道：

旱涝无妨山里人，
油茶竹米日燃薪。

流民今岁又无断，
尽是豫东淮北音。

为了对付从青年时期就留下的严重的哮喘痼疾，李锐坚持游泳锻炼，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晚年。下面这首诗是李锐一九六五年夏为游泳而作：

仰天多谢地球回，
水暖山青花又开。
如此风光吾独览，
鱼儿欢喜故人来。

风恬波静绝行舟，
俯仰之间似忘忧，
惟有青山殷勤甚，
朝朝不厌伴观泅。

然而，“风恬波静”的大自然，并不能使李锐完全平静：“一人独在湖中，惟有青山作伴，大声喊话，以泄胸中之气。”（李锐日记语）

一九六四年春夏之交，雨水骤增，李锐喘病频频发作，痛苦之至，不眠之夜，他写道：

山中春早也归迟，
骤暑随寒乱着衣。
老病相欺无可奈，
坐床夜夜有谁知。

喘息之余小挺尸，
通身绵软似无思。
仰看斗室天棚角，
蟢子悠然在挂丝。

对于吟诗、写诗的动机，李锐写道：

作字写真难赋诗，
平生好画喜观碑。
盛年赢得身轻日，
也学打油专自怡。

自己正当壮年，正是做事的时候，却弄得“无官一身轻”，无法施展抱负，李锐总无法释怀。

但是，豁达开朗的性格又使他即使身处逆境，也不会终日郁郁。李锐爱好广泛，多才多艺，又很好动。他曾为寻访当地名为“小兰”的野花，在一个星期日和一位青年冒险攀上坡度足有七十度的险峰峭壁，在荆棘丛中钻入钻出。虽终未寻着，却亦感尽兴。后来邻居家一株小兰开花了，谓不可无诗，李锐欣然应命，赋诗相赠：

满山秀色无人夸，
暂请移尊就我家。
一夜冷香潜入梦，
原来山草胜琼花。

此诗脱胎于郑板桥的咏兰：“兰花本是山中草，还向山中种此花。尘世纷纷植盆盎，不如留与伴烟霞。”李锐戏言：“诚哉我乃一俗人也。”

封建社会几千年,中国一直是文字狱盛行的国度,此种陋习朝野均有深中其毒者。李锐的诗,也没少给他添麻烦。

湖南人夏天爱吃苦瓜,李锐有诗曰:

> 长沙寄我苦瓜子,
> 淮上无人识苦瓜。
> 半口犹嫌瓜太苦,
> 岂知味在苦殊佳。

结果,"文革"中有大字报说他天天吃苦瓜,作"苦瓜诗"是在"卧薪尝胆",为了"东山再起"。

李锐不甘沉沦,诗作中便有反映:叹老嗟病非吾事,壮心未已千里志。昨日不可留,赶上须迎头。山高惧两足,水深喜常浴,为何两不厌?素来不辞严。

这种自我激励在李锐这一时期的日记中也可见到,例如读完《马克思传》,他写道:

> 马克思的任何一天对我都是鞭策,他有时工作到凌晨四时。思考对于他是最高的娱乐。科学研究是安慰他的不竭的源泉。他从早晨九点钟到晚上七点钟都坐在不列颠博物院里,他惊人的劳动是足够和他的才力同行并进。不要浪费时间啊,李锐同志!

修改旧作找回自我

这几年,真正能使李锐找回自我的,是他对自己"旧作"的整理工作。

所谓"旧作",即一九五二年李锐写的《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

活动》一书，也就是北大荒的于善浦在图书馆见到的那本。那时，李锐忙于报社工作，全书二十万字全是利用业余时间写的。此书开始是在党内刊物上发表，一九五三年由《中国青年》杂志连载，一九五七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上百万册。一九五九年初，出版社通知再版，李锐即着手准备补充修改。庐山会议以后，此事便中断了。在京闲居的两年里，李锐已为此书的整理搜集了大量资料。写"谭嗣同传"的念头被亲友们劝阻以后，他便准备在磨子潭完成这项增订工作。为此，他带来了全部有关历史资料和一些必须阅读的书籍。这些书籍除毛选外，主要是哲学、哲学史、近代思想史和马克思传等。经过一年多的阅读和消化材料，至一九六五年正式开始修改。到"文革"前夕，全书的修改和补充工作已完成了百分之八十，完全重写的部分达八万字左右。

不难想像，在那个把毛泽东捧为"救星"、把毛泽东思想封作"顶峰"的时代，从事这项研究要受到很大局限。李锐为摆脱这种局限作出了极大努力，研究了大量史料，还历史以本来面目，避免使其成为一本纯宣传性的东西，而且此书确实在这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成为那段历史时期这一类书籍中独具研究特色的佼佼者。出版后，即有日文、朝鲜文译本。七十年代初，美国有英文译本。虽然时代造成的主客观方面的局限仍然存在，但此书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是李锐一生对毛泽东学术研究的起步。通过对毛泽东早年思想的研究，使李锐更看清了毛泽东后来的思想发展脉络。许多当时不能写进书中的研究成果，都为他在新时期对这一课题的深入探讨打下了基础。

他曾在当年上交部党组的一份思想汇报里写道：

> 我在这里两年多，主要时间、精力即尽于此事。我明知我的处境，此书不会再版了。但此书性质不同（与其他书），我觉得这件事我有责任把它做好、做完，因为我搜集

的材料最全，也的确作了些研究。今后我准备将改写好
的全书交有关方面，让别人来利用我的成果。

“文革”之初的“防空洞”

一九六六年夏，“文革”开始，学校停课，李锐的研究工作也随即终止。毛泽东通过《人民日报》，号召全国人民“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历次政治运动中有问题的人均属“牛鬼蛇神”之列。李锐自然在劫难逃。他成了这个小水电站大字报揭批的重点人物之一，所揭问题包括“拉拢腐蚀青年”、“到处打听饿死人的事”、“利用旧诗发泄对党的不满”等等。

李锐除了写检查交代材料之外，还被要求就地“劳改”。过去和李锐来往较多的干部、群众也受到追查和批判。“到处讲李锐的好话”，在当时是一条可供批判的罪状。

然而，比起其他地方受冲击的干部，李锐仍是十分幸运的。一九六六年八九月间的“红色风暴”，席卷全国，大城市尤甚。水电部门的那些在北京、上海、武汉的领导干部，有的被“造反派”的棍棒打断了肋骨，有的被皮带抽得血肉横飞。最重的在乱棍下当场毙命，最轻的也逃不过斗争大会上的挂牌、“喷气式”、戴高帽、拳打脚踢等各种人身侮辱与体罚。因受不了折磨与侮辱而投河、服毒、悬梁、跳楼自杀者不计其数。相比之下，一九五九年批判“李锐反党集团”的那几十次斗争大会，简直是“文明”到家了！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李锐在磨子潭没有遭到过一次“文革式”的批斗。只是有一次，水电站小学校的孩子们，给他戴了一顶高帽，牵着他在离水电站五里地的石槽镇游了一次街。整个过程中没有一个大人。

人们在地头开玩笑，说李锐躲进个“好防空洞”。

在这段时间里，除了报纸和广播，李锐经常是通过外面传到山

里来的一些零零星星的传单、小报来了解运动的。像水电部部长刘澜波等被揪出游斗的情况,李锐便是从翻印的传单上得知的。

实际上,李锐同外间仍然相当隔绝。他自己也常常感叹:“住在山里,真不知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以至于一九六七年二月,他竟然还给李富春写信,要求调回部里分配工作。孰不知国家乱到这步田地,哪还有人能工作!

李锐此举,除了对运动情况的隔绝,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一个无限热爱自己事业的人长期失去工作权利、工作机会而造成的无以排遣的痛苦、失落和寂寞。想到这年四月自己就年届五十了,从一九五九年到现在,整整浪费了八年!每当从新闻媒介中听到一点关于水电方面的消息,他都不禁要想,如果这几年自己不脱离岗位,事业上不知又会有怎样的长进啊!在磨子潭,李锐虽没有受到更严重的冲击,但也是被当做“敌我矛盾”揪出来的“牛鬼蛇神”,他不能再随便接近群众,整天不是扫厕所,就是喂猪,而最固定的工作还是扫厕所,后来有的青年就喊他“所长”。有一段时间,他常常用长沙方言自己对自己说话,否则他觉得自己会失去说话能力的。

一日李锐从一张翻印的传单中看到“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字句,不禁想起自己的孩子。这种最最陈腐反动的血统论会使他们受到怎样的委屈呢?这天晚上,他在整理抽屉时又发现了一封几年前给小妹信的底稿,于是再次引起伤感,不禁下泪。深夜,他在日记中写道:“感情麻木已久,受不起偶尔触动了,孩子们现在是怎样的情形呢?每伤心一回,几等于小病一场!”自从“文革”初起,自己写旧体诗被批判为“放毒”以后,李锐已经很久不写诗了,有时为了防止“诗思”又起,他会赶紧做点什么,以把这种念头叉开。可是这一夜,他终于忍不住吟出了自己的伤心:

春夜风寒伴一灯,

扣窗碎雪不吱声。
何为翻出女儿信，
怕动心埋骨肉情。

这年二月二十四日，水电部造反派派来三人找李锐调查刘澜波问题，他们要李锐立功赎罪，说李锐过去总有幻想，但现在那些人都垮了，政治局委员垮得差不多了，胡乔木成了“修正主义分子”……来人拿出一份列明薄一波一百三十条罪行的印刷品，要求李锐写材料时参阅，并出题三道：庐山会议前后刘澜波的思想动态；部里哪些问题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刘澜波与彭德怀、薄一波等人的关系。

第二天，李锐将所写材料交出，来人很不满意，谓有重要的事情还没写到。这倒也没冤枉李锐，因为他的确有心“包庇”，他的原则是别人知道的就讲，估计外人不会知道的就不讲。可来人却甚知“底细”，这令李锐心里好生纳闷：如此深切知道自己同刘澜波关系的是谁？想来想去，终于他弄明白了谁是揭发者。果然，李锐的猜想从来人口中得到了证实。

对于妈妈的做法，成年后的小妹曾做过这样的一番分析：

> 她和我爸离婚、揭发我爸根本不是因为他们思想不一致，而是她胆小，为保自己出卖了丈夫。我的小舅、大姨，还有妈妈的朋友都反对过我的看法。他们说，我妈妈那时没有办法，为了孩子，只有那么做。我至今不能同意。也许离婚是可以理解和原谅的，但是把我爸爸置于死地的揭发，却是用保护孩子无法说通的。

临走，来访者命李锐好好在此劳动改造，说他比北京的部长们舒服多了，还讲了北京一些给“走资派”戴高帽、挂牌、游街之类的

事情。

一九六七年回到北京后的两个月

这年四月，李锐接到北京设计院来信，限他在一个月内将他放在“旧居”一间屋子里的存物搬走，否则将由“革命群众”处理。

为了防止李锐返京途中“自己活动”，造反派特派两人与李锐同行。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三日晚六点半到达北京站，早有两名造反派等在出站口，用车直接将他拉到部里，一路看押，有如对待犯人。第二天，“革委会”命李锐仍住八号楼，又派一人同住，他们直告李锐如此安排的原因：“怕你与刘澜波等串联，我们要对你负责！”

第三天，李锐即被通知去部里参加陪斗。

第四天，李锐才得空到“旧居”去完成他此行的本来目的：清理存物。其实这些存物去年已被水电站的红卫兵抄过了。

苗苗开的门。幺幺已九岁，高得几乎认不出。小妹长胖了。果然，血统论使孩子们受了委屈，因为爸爸是“反革命”。

在以后的日子里，李锐不是被叫去部里参加陪斗，就是应付四面八方要他写材料的人。每次陪斗都要站好几个小时，有一次还游了街。好在此时武斗高潮已过，比起部里其他领导，李锐受的这点罪确实算不得什么。而写材料却令李锐苦不堪言。除了要他写彭德怀、张闻天、胡乔木、薄一波、田家英等人的材料外，还要写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和他一起工作过的老干部的材料，以及水电部其他领导的材料。当时造反派、红卫兵的思路是，找到的罪证越大，抓出的“坏人”越多，“文革”的胜利就越辉煌。因此李锐那些实事求是的回忆总令他们大失所望，李锐也因此常遭申斥，“思归”之念不禁日日萦绕在李锐心头。磨子潭多么安静！

这次回京，李锐深感他日夜思念的孩子们同他很疏远了！心里非常难过。一天他在楼下碰到幺幺，情不自禁地一把抱住她，热泪纵横："幺幺，知道不知道这几年爸爸多么想你？"幺幺很懂事地陪爸爸一起上楼，亲了爸爸，给他背"老三篇"。李锐则嘱她"要听毛主席的话，听妈妈的话"。并要幺幺转告哥哥姐姐，要他们三人最近的照片。这天李锐在日记中写道："和幺幺在一起的这半小时，是这次回来最可宝贵的半小时！"

可第二天，李锐就收到了孩子们与他划清界限的信！苗苗和小妹不再接受爸爸负担的生活费。实际上从一九六五年起，他们俩就不再与爸爸通信，李锐曾为此痛心之至！这回，孩子们在信中表示："你对我们还有感情，而我们要同你划清界限。照片现在不能给。"

在北京近两个月，李锐对"运动"已完全"理解"了，"父子关系变成政治关系"在运动中不是什么新鲜事，李锐也是有一定思想准备的。于是，他给孩子们写了一封回信，赞赏他们对自己的这种态度，说明自己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表示今后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的决心。

孩子们还小，他们理解不了太复杂的问题，李锐只能对孩子们这样说。

六月五日上午，李锐在前门排了四个小时的队，买好返安徽的火车票。归来方知，那天刚好斗刘澜波，造反派来找过他去陪斗，却扑了空，十分气恼！革委会负责人命李锐把票退掉，并责问："谁让你买票的！"其实就是此人同意李锐去买票的。但李锐只能听命，到火车站又排了三个小时的队，将票退掉。

接下去的日子仍是陪斗和被迫写材料。最让李锐头疼的是，部里的造反派总要向李锐追逼刘澜波的材料，而且一口咬定李锐交代不彻底。由于当时知情者对李锐和刘澜波的关系揭发得已不

少，李锐不得不写出详细的“交代”。不过，恰恰是这些交代说明了刘澜波的思想和为人。这里，不妨把李锐的部分“交代”照录如下：

> 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为止，（李锐一九五二年到燃料部水电建设总局任局长，刘澜波为副部长——引者注）七年之中，我与澜波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其原因，除开工作关系之外，我认为主要由于在思想感情上有某些相通之处，即“右倾情绪”的东西。我认为，他为人比较厚道，作风较民主，尤不喜欢整人。因之，逐渐与他建立起一种可讲一定的“知心话”、“私房话”的关系。例如：
>
> 访苏回国时，在飞机上，我深有感慨地同他谈到，希望以后不再搞大运动了，并谈到儒家的恕道问题。这实际上是怀疑群众运动，害怕阶级斗争的思想，刘虽没有多答言，也未反驳我的观点。
>
> 一九五六年或一九五七年，一次同他从国务院开会后一起出来，因为会上谈到三峡问题，我狂妄地说：“主席又不是圣人。”他当时虽责备我自由主义、无组织观念，实质上只是怕我乱讲话的毛病捅出乱子，而并不是从思想认识上来作批评。他是一个很谨慎的人，从不乱讲话的，尤其在重要场合，更是如此。
>
> 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时，他对一些划为右派的人是同情的。如对编译室的一个老俄文翻译，就特别表示过惋惜之意。前辽宁“反党集团”中成员，刘同他们都是老熟人，谈起来就叹息，很不以这种“斗争”为然：“怎么观点不同，有点议论，就成了‘反党’？”（他在东北老一辈同志中是一个中心人物，有人说他像一块磁石吸铁一样吸引人。）

一九五八、一九五九两年“大跃进”时期，我认为刘对“三面红旗”的看法同我差不多。如一九五八年夏，上海华东区计划会议，对一九五九年指标大加码时，我在上海与刘通电话，很不赞成，说只有电力顶住了，他完全同意我的看法。我当时给毛主席写的一封信，寄给他看过。由于电力部未能跟上“大跃进”指标，毛主席一见到刘时，曾半打趣地指着他说：就你没出息。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武昌会议后，大家去麻城参观（湖北“大跃进”的典型），看了一块棉花地和新盖的一片生产队的集体宿舍。他却跟我谈他的农家生活回忆，仍是一个富裕农民的持家之道，思想感情上同当时公社化运动是格格不入的。一次司局长会，有人对公社化怀疑，刘一言不发。关于当年计划能不能落实，他向我说过这样的话：“好像吊着脖子走路，脚后跟不着地。”

庐山会议时，我们住在同一栋宿舍，但不是一个小组。会议前期，刘少奇提出“成绩讲够，缺点也讲透”。大家对缺点还是津津乐道，工交系统埋怨情绪最大，刘也发泄过这种情绪（原话已记不起）。对我当时来往的人和活动，刘是很清楚的。延安时期，刘在柯老（柯庆施）领导的统战部工作，跟柯很熟。七月二十三日前，柯等率领“左派”很是活跃，刘很担心我被卷入攻击的靶子中。当时对于彭德怀的信有各种议论，“左派”认为彭的矛头是对着主席的。他和我一起估计形势的发展，问我的看法。我说，主席讲话，可能是“左、右”两边各打五十板子。我当时心情很沉重，刘也表现得跟我一样沉重。会议初期，一次同工业各部长游山，大概是在植物园，大家谈到农村一些情况时，我冒了一句“中国的农民好”。意指要是在东欧，早闹事了。小组会上斗争我比较紧张时，刘特地告诉

> 我，张霖之将这话告诉他，张并没有揭发。这当然是明显的包庇。我写的交代材料也交刘看过，他为我出过主意，找薄一波帮忙，过关过得好一些，因为薄在主席面前曾讲过我的好话。

从李锐这份"交代"中可以看出，李锐和刘澜波两人在道德品质、是非观念、原则立场等方面确实有许多地方很相近。李锐在北大荒兴华村劳改时，曾将一块瓜叶、玉米芯掺合着一点面粉做的代食品寄到北京，刘将其拿到党组会上给大家传看；在磨子潭时，为了能给李锐重新安排工作，刘澜波也到中央组织部去活动过。因此造反派认定李锐和刘澜波私自串通，一定还有更多的活动。这些情况，李锐直到快离京时，才从一个朋友口中听说。

六月二十一日，李锐离开北京，二十四日回到磨子潭。现在，只有这儿才是"家"了。

被捕

山里的夏季雨水多，气压低，每年一到这个季节，李锐的哮喘病就要频频发作。这年夏天，他的主要工作是守夜看桃园。山冲里的夏夜，万籁俱寂，最容易让人思绪万千，然而，或许是经历了太多的磨难，李锐觉得自己的感情都有些麻木了。他惟一的感觉是出奇的冷，有时候他被冻得在守望台上缩成一团。夏夜竟然也会如此之冷！

八月二十六日，北京又来了三个人，找李锐调查胡乔木、田家英、吴冷西的情况。来人向李锐出示了中央办公厅和公安部的介绍信，称他们是"批斗最大一小撮"专案小组的。从他们口中，李锐证实了一个在北京听到的传闻：田家英确实已经自杀身亡。

来人要李锐交代庐山"胡吴田集团"的活动，李锐申辩了一句：

“不能说他们是有政治阴谋”,立即受到指责,斥为“反扑”。并再次向他表明:这三人是“漏网集团”。

李锐听说专案组的组长是周总理,便请来人向总理转告:他认为毛主席身边最危险的不是什么胡、田、吴,而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接着又揭发了陈伯达的一些情况,并要把这些情况写成材料呈总理,当即被三位专案组成员制止,说这种材料不能写!李锐只好口头叮嘱他们一定要把这些情况转告周总理。三人不置可否离去。

李锐是在做了毛泽东的兼职秘书以后才同陈伯达有所接触的。平时,李锐和田家英对陈伯达的察颜观色、投机钻营就十分不满。“大跃进”特别是庐山会议上,陈伯达的两面派手法搞得就更露骨。所以李锐说毛泽东身边最危险的人是陈伯达。陈伯达当时正红得发紫,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

十一月一日,中央专案组又来了两个人,其中一个是上次来过的。他们奉命通知:上次给周总理的信不能转,并对有关胡、田、吴的材料又盘问了十几个问题。

十一月十日晨,李锐像往常一样,早餐后去打扫厕所。几天来,左肩、右臂和左手腕总是疼痛不已,有时疼得坐卧不安,只能用右手来扫。

余下的时间,他拿起《列宁的青年时代》看。这本书是从前天开始读的。过去只翻过一下,近日重读,他发现此书非常生动,引人入胜。列宁在二十三岁就将马克思的主要著作都读了,并同民粹派巨头作过斗争,而且取得了胜利。李锐不禁感叹:多么早熟!理论准备多么充分!

下午,生产队老罗卖给李锐两斤蜂蜜,这是李锐为了治疗哮喘常要服用之物。李锐用烧锅蒸了一遍,一直忙到晚七点半。他当时自然不会料到,这两罐蜂蜜居然八年以后才得以服用。

晚九点半,两辆中吉普车突然开进磨子潭。车上下来五六个

军人。山里人哪见过这阵势,纷纷从屋里跑出来围观。

两个干部模样的人走进李锐宿舍,客客气气地对李锐说:“安徽军管会主任李德生要你去合肥谈话。”李锐在延安是坐过牢的,一看这架势心里立刻明白:这是要被捕了。显然,自己八月份对中央专案组的人讲的对陈伯达的看法,陈伯达和中央文革小组知道了。

第五节 狱中生涯

这里是全国最高级别的监狱

一个小时后，李锐已把宿舍里的行李、书籍、日记本等物件收拾停当，并把在庐山会议上使用的黑皮笔记本做好标记后一并交出。一行人将李锐带上中吉普车，于当晚十点半左右连夜上路。

整整走了一夜。十一月十一日上午到达合肥。吃过午饭后，李锐被送上一架专机。机上已有一位部队干部等待，看来此人负有押送之责。天黑前，专机飞抵北京，两辆中吉普车早等在那里，把李锐从机场直接送往秦城。到达的时间是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一日夜。

京郊昌平县的秦城村坐落在燕山脚下。据说秦朝曾在这里屯兵戍边。当地老百姓至今还保留着某些秦时风俗：夏季妇女可以随意光膀露奶子。秦城监狱离村子约一里地，自然是因地而名。新中国成立初兴建此监狱时，征的就是秦城村的地。

受时代影响，中国监狱基本是苏联模式。监区内，四幢灰色的大楼，有一些绿化带，并设有图书馆。馆内除马、恩、列、斯、毛著作以外，还备有中外名著。

这里是全国最高级别的监狱。五十年代到"文革"前，狱中对犯人还是比较讲政策的。我曾采访过一个因"胡风反革命集团"事件于一九六〇年八月至一九六五年九月在秦城坐牢的老人，他告诉我，那时囚室内写字台、纸、笔俱全，他在里面不仅读了不少名著，还写了《唐诗今译》、《宋诗今译》两本书。即使在"三年困难时期"，犯人也能吃得饱。

“文革”开始后,“四人帮”用极左路线加封建法西斯的一套统治监狱,这里便成了“地狱”。

吉普车驶过竖有铁丝网和岗楼的高墙,进入有荷枪实弹士兵把守的几重铁门。李锐明白这是到监狱了。但是他并不知道这就是秦城!只感觉从西郊机场到此,走了很长时间,是京北一个很偏僻的地方。

关进单监以后,李锐发现这是一座很“厉害”的监狱。监牢的质量相当好。墙很厚,他住的囚室有二十多平方米,带卫生间。外面是一扇厚门,门的上下各有一扇小方门,里面是一扇重型铁栅栏门,上下对应有方洞。显然,这不是关押一般犯人的地方。

监区内原来的老楼有四栋,其中三栋李锐都住过。第二年,他发现院子里有起重机在施工,知道监狱还在扩建,于是开始做长期坐牢的打算。后来新盖的牢房李锐也住过,而他最初住的那类二十多平方米的牢房后来都被隔成双间,可见犯人的数量在不断增加。这并不奇怪,“文革”本来就是制造“思想犯”、“政治犯”的运动。

犯人的伙食名义上是士兵标准,但实际上达不到。作为当时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机器上的零件——看守,往往把犯人当做最坏的人,所以非常虐待。有时菜里故意不放盐,或是故意不把菜洗干净,泥沙掺在菜里难以咀嚼,油极少。有一年春天,一连吃了一个多月盐水煮菠菜,餐餐如此。逢吃米饭,李锐请看守多打一点,看守反而故意少打。有一年春节,为了对付一吃大米饭就遭此“不公”,头几天,李锐就留下了几个窝窝头,结果查房时都被收走。

牢房中,除一张矮木板床外,没有任何物件,被褥很薄。令人不解的是床上不设枕头,李锐好不容易攒下一些手纸当枕头,查房时也全被没收。他只好把鞋脱下来当枕头。

狱中规定夜间睡觉必须面朝门上面的哨兵观察孔,因此整夜

不准翻身，不得仰睡，碰到看守故意刁难还会有新的花招，例如冬天胳膊要放在被子外面之类。本来李锐的睡眠就非常不好，常年要靠服各种安眠药才能入睡，狱中的种种折磨，更使他难以入眠。

黑色囚衣只有单、棉两种，暖气来前停后，一件空心棉衣极易受寒，只得白天也围着被子坐在床上。晚间被子和垫褥又显得太薄。狱中前五年，李锐的哮喘病经常发作。

最可恶的是，狱方纵容看守对犯人进行各种形式的人身侮辱和折磨。李锐经历过的就有：经常毫无缘故罚站半天；动辄训斥辱骂，乃至被叫到小窗口吐唾沫；或者命令把手臂伸出窗口锤打。有一天早晨，李锐把手伸出窗口取稀饭，看守故意把滚烫的稀饭翻在他的手上，以致烫伤。幸亏铁门是上了锁的，看守不能随便进来，否则施虐的机会将更多。

李锐觉得，这所监狱的文明程度，还不如二十几年前延安时期的牢房。那时几个人同关在一间窑洞，哨兵还不这样虐待。

无休无止的折磨，日子极不易熬过。楼内常常听到的是两种呼号声：一种显然是神经病患者的叫喊，有整日叫"毛主席万岁"的，也有整日大声骂娘的；另一种是犯人受不了侮辱痛骂看守，但接下来就会听见有人开锁进房，痛打叫骂者。于是楼里又响起被痛打的犯人的呼号！

对病人的照顾也很差。有一次，李锐听到隔壁的犯人大声哀呼头痛，求看守告诉管理人员，反而受到看守的申斥，哀号了半天也无人理会。一段时间后声音平息了。李锐心里不禁担心，如果是脑血管之类的病，可能就出大问题了！

刑讯和逼供李锐没有亲身体验过，大概是因为他的问题比较简单，但和李锐同时期在秦城坐牢的北京市委书记刘仁和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则都经历过。陆定一因不肯承认"翻案"，被手铐铐了两个月，吃饭、上厕所都不打开铐子，手腕磨得皮开肉绽；刘仁则被铐了两年，一直铐到死在狱里。

最初两年常常好多天不放一次风，还不如延安监狱能按规定天天放风。李锐在屋里慢跑锻炼身体，也遭到看守蛮横制止。他只得在每次被提审时，都提出按时放风的强烈要求。

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会感受得到单身监禁是一种极重的刑罚。一九七九年，国家有关部门曾组织过一次在秦城坐过牢的高级干部座谈会。李锐因出差未能参加，特写了一份材料。除对上述问题作了揭露以外，李锐还谈到：

> 除报纸、《红旗》杂志外，只有四本《毛泽东选集》。没能多读些书，实在太可惜了。狱中绝对禁止纸、笔，否则也可写点儿笔记之类。如果一直给书看，又给纸笔，相信不会有许多人害神经病的，此事应作为一个重大教训。
>
> ……单监是一种很重的刑罚，尤其长期单监，极易导致精神病。
>
> ……从延安时代起，我们所施行的狱政，可能还是从苏联学来的一套，或者加上封建法西斯逼、供、信的一套。几十年的经验教训，亟需加以总结。

“大脑体操”

为了防止在极其单调而漫长的单监生活中神经出问题，入狱不久，李锐就开始以做诗的方式做“大脑体操”，题材或来自报上新闻，或来自往事回忆，但更多的还是狱中生活。当然大多随哼随忘，只有少数能留在记忆里。狱中不能记日记，然而那些留在李锐脑海中、以后又被偷记在书中的诗词，却弥补了这个缺憾，使我们得以了解李锐在狱中的许多生活细节和心理活动。

例如《入此周年》一诗，就记录了李锐入狱之初的情况：

昨岁飞来入此时，
恍如梦里久呆痴，
薄衾不耐寒和病，
挨到天明尚乱思。

李锐是不甘心老在“梦”里的，提审的时候，他多次向狱方追问被逮捕的原因，也问过是否因揭发了陈伯达之故，但从没得到过明确回答。

尽管如此，李锐仍不甘心在狱里做“屈死鬼”。从“气功长跑天天练”、“方丈穿梭日十里”等这些诗句中可以看出，在不能保证放风的情况下，李锐在方丈牢房内仍然坚持体育锻炼。他要活下去，他期望着看到公道战胜邪恶的一天！

狱中的年节，又是怎样度过的呢？

孤身已惯过佳节，
自语无端吟旧章。
未睹花容春已去，
时闻蝉唱夏方长。
冻窗晶亮知飞雪，
霜月团栾难赐光。
何事呆呆墙角望，
蜘蛛又在挂丝忙。

闻蝉鸣虫唱，应是中秋节；观冻窗飞雪，当是元旦或春节。在民间，这本是合家团圆、亲人相聚的日子。而在牢房内，无端自语、吟哦旧章，甚至久久呆看蜘蛛挂丝，便是节日里排遣寂寞、自娱自慰的内容。

佳节如此，平日又该如何呢？

切切何所待，
朝朝报一张。
空知万物事，
徒结九回肠。

当今莫道无烦恼，
万事逢忙了。
一天呆坐又黄昏，
昔日寸金难买寸光阴。

或云独坐可忘老，
其实无言渐变呆。
表壳呼为锅盖事，
偶然念及自生哀。

著名职业革命家王若飞出狱后，竟将表壳唤为锅盖。李锐以此自况，不寒而栗。

闲，修得山居日面山，
看不厌，风雨艳阳天。

闲，日影移窗旦夕看，
随缘伴，灯照蠹鱼眠。

闲，欲语无人十六年，
真无奈，口自对心谈。

能不呼余叟？五千朝，无言独坐，孤房空守。长夜不眠吟榻上，百计消磨永昼。窥者怪，书空挥手。挖出心肝喷热血，问谁知最是闲难受。分阴惜，莫回首。

在为李锐作传的过程中，我常常会想起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的著名短篇小说《热爱生命》。一个真正热爱生命的人，无论生存环境多么恶劣，他都会不屈不挠地去追求生存质量。除了前面提到的在牢房中长跑、做气功、吟诗以外，在这首词中，我们还发现李锐竟用手指在空中练习书法！

一位提审员的回忆

在回忆这段牢狱生活时，李锐几次向我提到一个人，他叫王宪举，是当时中央专案组中彭德怀专案组的主要办案人。李锐说："在那些人里，他的态度是最好的，被他提审从来不逼，也不要态度。最可恶的是那些来外调的人，态度坏透了。有时候太寂寞了，我甚至希望王宪举能来提审，这样可以有一个人说说话。"

经过多方查寻，一九九四年六月，我终于在北京的一个部队干休所找到了王宪举。这时他已是六十七岁的老人了。王告诉我，他当时在彭德怀专案组里负责黄克诚、李六如、李锐的提审。据王宪举说：逮捕李锐中央是有正式批件的。这个文件由当时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戚本禹起草。吴法宪派专机到合肥，十三军保卫处一个处长带人到磨子潭执行逮捕。因为中央专案组驻在北京城里，要提审了，才到秦城监狱去一趟，所以王对李锐在狱中的生活情况不很了解。

王宪举告诉我：审问的内容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一九三七年李锐被捕的事，另一个是李锐在磨子潭日记中的一些内容，那些内容

在当时被认为是坚持庐山会议上的反动立场。

“我那时也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他。但我对他同对黄克诚、李六如一样,从没有过打骂、侮辱人格。而在我们这个专案组里,对专案对象实施体罚的情况相当普遍。”

谈到对李锐的印象,他说当时就觉得此人很有才华。这个印象是从李锐在狱中写的材料和审问时的谈吐中得到的。

临离开王宪举家时,这位坦诚的老人感慨地说:“当时真是委屈了这些老同志。”

周恩来想起狱中的李锐

李锐入狱以后,便与外界完全继绝了音信,水电系统传出许多谣言,甚至说李锐这个人已经死掉了。长沙、沈阳的母亲和姐姐也都蒙在鼓里,生死不明。动乱年月,像这些政治上“有问题”的人,批斗时被整死,私设公堂被打死,不堪凌辱自杀而死,关进大牢或在“劳改”中被折磨死的事情,实在太平常了。可惜国家至今好像没有公布过这样一个统计数字:像统计死于某场战争中的人数那样,统计一下“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人数。所以人们对“李锐之死”的传说,并不感到惊奇,更不会有人去寻个究竟。

直到一九七二年十一月,长江干流上的葛洲坝施工出了问题,李锐才又被人想了起来。

葛洲坝是毛泽东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他七十七岁生日那天亲自批准兴建的一项巨型水利工程。然而这项人类首次在世界三大河流之一的长江干流上拦河筑坝的“豪举”,却是一项典型的违反基建程序的“三边工程”(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李锐的“老对头”林一山曾正确地反对过这项工程的上马,然而毛泽东已决定的事情,别人说了有什么用呢?动工两年后,由于重大设计问题和施工组织混乱被迫停工。为此,周恩来在国务院召开了几

天会，着手解决工程引发的问题。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晚，周恩来总理又一次听取了工程有关负责人的汇报，突然总理问道："李锐在哪里？"一位知情人赶忙应道："李锐还关着。"总理接着就说："还关着？可以给他做些事嘛，提些意见，也是劳动嘛！李锐就不赞成在干流修坝，主张先开发支流。"总理嘱咐把这项工程的设计材料给李锐看一下，提点意见，并说："总得有对立面，没有对立面危险得很。要有对立面！"

然而，周恩来的指示并没有传到狱中，倒是当时也参加了那个会的李锐的一位老同事，把李锐还活着的消息，送到了李锐在湖南的母亲家中。

奇墨怪毫写诗篇

直到李锐入狱五年以后，犯人受虐待的情况才有所改变。一九七二年底，狱方向犯人们传达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指示，说他们接到反映，监狱里有人搞法西斯，法西斯式的审讯制度应废除。今后如有打骂、刑讯逼供等情况，犯人可以向中央控告。

这个向中央反映情况的人，是关在秦城的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指示"传达以后，伙食有了改善。对病人的照顾也有所改进。李锐得了肝炎，每天可以吃到一个鸡蛋，还发了一包葡萄糖粉。

不久，李锐等级别高一些的犯人又搬回到条件相对好一些的"老楼"，被褥比过去厚一些了，配了枕头，房间里还添了暖水瓶、床头柜之类的什物。放风逐渐比较正规，每天一次，每次半小时左右。为了弥补室外活动量的不足，李锐在囚室内慢跑，也不再遭到禁止。纸、笔还是不给，允许阅读的书籍除毛选外，增加了马恩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以及鲁迅的一些单行本。提审员王宪举还到六铺炕的宿舍给李锐找来二十几本书！李锐把当时的感受比作"鲋鱼涸辙忽天雨"，有了书，日子就好过多了！

一九七三年的一天，李锐在放风时作跑步锻炼。一道高墙将两边隔开，两侧再由几段短墙隔成格子，每个"格子"大约二三十平米——重犯、要犯都在"格子"里放风。如此灰暗、单调的环境，如果没有极其坚强的神经、没有一个能够自我调节的丰富的内心世界，长年的狱中生活，是很难不导致精神崩溃的。而李锐此时在牢中已关了六年！

跑着跑着，李锐一个趔趄摔倒在地，手腕也碰破了——毕竟已经五十六岁了，从四十二岁起，十四年的坎坷，已把李锐过早地摧残成一个风烛残年般的老人——衰弱、苍老，稍一活动便喘息不止。只有那颗心，还在顽强地抗争，只有那个优质的大脑，还在不肯停歇地思考。

护士给了他一瓶龙胆紫药水和几根棉花签。回到宿舍后，李锐竟突发奇想：此可作奇墨怪毫也！从此，李锐的狱中生涯掀开了新的篇章！每天，他靠墙坐在矮床上，面对哨兵的监视孔，越发规矩地捧着书——书本遮住了哨兵的视线，李锐便把他的一首首"铁窗诗作"用棉花签蘸着紫药水，写在《列宁文选》(两卷集)上的空白处。为防万一，李锐采取两条措施：一是把那些牢骚太盛的"毒草"用了代替的辞句；二是写了二百多句五言"语录歌"夹在其中。

在未获得"奇墨怪毫"的前几年，只能即兴口占，随作随忘，只有少数记得下来。如今有了"装备"，李锐更加诗兴大发，简直把它当成了每日生活中最主要的内容！

这种冒犯狱规的活动，一九七四年底和一九七五年初曾两次被发现，于是两本《列宁文选》和另一本《剩余价值学说史》先后被没收了。李锐倒也不在乎：大不了再把我关下去吧！

李锐吟咏的范围相当广泛：读书心得，读报随感，对伟人的景仰，对朋友的怀念，狱中感怀，亲情寄语，人生品味……而最多的还是他对自己生平的回忆。若干年后，李锐在这本诗集的序言中写

道："为什么如此不厌其烦啰啰嗦嗦地回忆这平凡的一生呢？因为想到儿女，总企望他们将来有缘见到这些东西，知道这个父亲并非'牛鬼蛇神'。"

在几百首诗稿中，有古风，有五言、七言绝句和律诗，还有几十首词。有些是过去生活中随手写下的"旧作"，大多则为囚室新作，代表了七十年代历经劫难后，李锐的思想情操、政治观念和精神面貌。

一九八〇年，这几百首诗由湖南人民出版社结集出版。李锐年轻时的朋友、我国新闻工作的老前辈李普先生为这本诗集起名为《龙胆紫集》。"龙胆紫集"，一本竟然是用龙胆紫药水写成的诗集！她蕴含了作者对生命的热爱，对黑暗的抗争，以及任何荒谬都无法扭曲的、对人的基本权利的追求与捍卫等丰富的内涵！

赵朴初先生为这本诗集的题词令人回味无穷：

不识庐山真面目，几多幽谷晴峰，只缘身在此山中，峰头刚一唱，谷底坠千重！　　度尽劫波才不减，诗心铁壁能通。莫将此道比雕虫。血凝龙胆紫，花发象牙红。

李锐就这样在狱中写了两年多。在他继续谷底跋涉、狱中苦行的时候，我们不妨循着他的诗迹，追溯一下他的身世吧。

第三章　血凝龙胆紫　回首忆平生

第一节　儿时戚戚事

人世凄凉事，
失怙未五龄。
月月随阿母，
南郊哭父灵。

《龙胆紫集》"忆童年"一诗中开头这几句，记述了李锐童年生活的一个重要片断。

红白拉锯中的名门大户

李锐祖籍湖南省平江县长寿街镇。自祖父时代起，家里就是长寿街有名的地主兼商人。

平江是湖南省的穷县，境内山多地少，又缺乏矿产资源。可那处在湘鄂赣交界处、与长沙、武汉、南昌均相距不远的地理位置，却颇受兵家青睐。民国初年，南北军阀混战，段祺瑞、吴佩孚、张敬尧、傅良佐等军阀都是先占领平江，然后经过平江打长沙；北伐时，叶挺也是先打下平江，再经过平江打武汉。抗战八年，平江有七年

处在前线。连年兵燹瘟疫，使本来就穷的平江更加贫困。人们纷纷背井离乡，向外谋发展。

长寿街是平江数一数二的大镇，也是这个穷县相对较为富庶的地方。镇上的李宅有几十间房，宅后面的两个池塘、一片橘园都是李家的财产。遇有红白喜事或其他重大活动，前来捧场的四乡亲朋冠盖如云，那围墙内的大院能停下一百多顶轿子。李家的田产，据说在千亩上下，街上几家生意最好的铺子以及茶行、粉行，都是李家祖父开的。"文革"前，镇上有人说：现在整条街上的铺子加起来，都不如当时李家一间铺子的生意规模大。

平江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及地理位置，至少在两个方面影响了李家：

其一，十年内战时期，平江是红白相争非常激烈的地区。这个县出过一百多个将军，其中共产党方面的五十四个，国民党方面的五十七个。"一将成功万骨枯"，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四九年，平江人口从七十三万减少到四十五万，其中除少量外出谋发展外，绝大部分死于"拉锯"中红白相杀或每次战争后带来的瘟疫。

像李家这样的地方上的名门大户，当然是拉锯双方注意的重点。李家成员中既有人参加地主的反动武装"挨户团"，如李锐的堂侄李箴铭，也有人投奔了共产党，如李锐和李锐的表哥方国华；既有地方上的恶霸堂侄李憩之，也有深受乡邻敬重的李锐的父亲李积芳、母亲李张淑；既有人死于国民党的屠刀下，如表哥方国华，也有人死于红军的极左政策，如两个祖母及婶婶、侄儿等。

表哥方国华是大家族中李锐最亲近、最敬佩的一位兄长，大革命时期，任长寿街店员工会党支部书记，一次白军突然杀进镇子，表哥来不及撤退，被敌人抓去，牺牲时才二十几岁。

其二，由于平江与武汉、长沙、南昌三大城市相距很近，可谓得风气之先。本世纪初，就有几十人出国留学。李锐的父亲一辈七兄弟中，三个留学日本，一个留学法国。然而只有排行第三的父亲

李积芳和四叔李积芬学有所成。

四叔李积芬在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与阎锡山同班。回国后任北京政府测量学校校长。到任不久，去上海招聘教师，在那里染上猩红热死去。时年只有二十九岁。

对于四叔的死，李积芳极为伤心，他认为这个弟弟本来是可以为国家做些事的。

父亲追随孙中山

李积芳为前清时期湖北仕学馆学员，一九〇五年被洋务派首领、掌管学部的张之洞选送日本做官费留学生。他在早稻田大学读政治经济科，与宋教仁为同庚同窗好友，还结识了黄兴、秋瑾等革命党人，并且是最早一批同盟会会员。

武昌起义爆发，李积芳回到湖南任法制局参事。法制局是清末康有为等发起"维新运动"、酝酿"君主立宪"时，各省成立的有关法律建设的机构。他还创办了湖南政法学校，兼充公立法政各校教员。利用这些阵地，李积芳积极筹办地方自治，第二年即被选为国会众议院议员。

袁世凯解散国会以后，李积芳一度不闻政事，后来又到广州参加了孙中山的非常国会，支持孙中山护法讨袁。

一九一六年，北京写真通讯社出版了一部日本佐藤三郎编的《民国之精华》，其中"中华民国议员列传"部分关于李积芳的小传有一段评述其人的文字：

> 秉性诚厚笃实，痛恶浮华。居常以俭约自持，能耐劳苦。与人交，直而不欺，喜闻尽言。人告以过，不论当否，必婉词谢之。若加以过度之誉，则反漠然待之。甚至示以怒容，视同欺侮。平生以文过为耻辱，常语人曰：有过

而能陈不违，反足以增其令誉；有善而能不求人知，反足以减少谤言。其见解洵可云超出寻常数倍矣。

如果说，人的品格也可以像遗传因子一样在后代身上发生作用，人类学家当然不会同意。然而李积芳的三个儿女，特别是李锐，成年后确实大有“乃父之风”——尽管他还未懂事父亲就已去世。

启明女校的“李家媳妇”

李锐的母亲李张淑是湖南醴陵人，娘家贫农，姐夫在长沙城里做个小官。她是同姐姐、姐夫在城里长大的，到过湖北、南京一些地方。个子虽小，人却漂亮，又很会讲话。通过媒人介绍，李积芳第一次在庙里同她见面就非常满意。

嫁到李家以后，李张淑与外表严肃、心地和善的丈夫感情极好。丈夫为她起了个新名字“存真”，每有书信，开头便称“存真吾爱”。“五四”以前，只有极具民主意识的人才会如此称呼自己的妻子。

然而，周围的环境却与此极不相称。婆婆十分严厉。李家是大户人家，雇有不少男工女工，但婆婆奴役媳妇的传统在旧中国是不分贫富人家的。李张淑每天从打扫厅堂到侍候婆婆的一应“生活”都要做，不然就会挨婆婆的申斥。

一九〇五年，父亲去日本留学，母亲极不愿意一个人在这个大家庭里呆下去。父亲便从日本写信来，让她去县城的启明女校读书。婆婆当然反对，但又不好违拗儿子的决定，便在经济上刁难。每学期开学，她只给媳妇一

吊零用钱,连买纸笔都不够。还是父亲节省读书的官费,寄给母亲,才使母亲的学业得以维持。

启明女校是父亲的朋友平江县凌容众、李樵松夫妇于一九〇七年创办的。他们在日本留学期间都是同盟会会员,归国后,看到国内农村能读书的人很少,妇女读书尤难,便毅然卖掉一千余亩水田的家产,创办了这所女子学校。校内设小学部、缝纫部、刺绣部,还有学制为两年的简易师范部等等。母亲是简易师范部第一期九个学员之一。

在学校,母亲能诗、能画、能文,成绩总在前两名。毕业后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长沙高级师范学校"稻田女师"第一班。

但是母亲并没有去这所学校就读,父亲当选为民国议员后,她便随父亲去了北京。

民国三年,他们有了长女李琬华,隔年,又有了次女李英华;民国六年,生下儿子李厚生(乳名明伢子)。三个孩子均出生在北京西城城隍庙街(今成方街)。

儿子的出生,使父亲特别高兴。大大庆祝了一番,凡来贺喜的,每人获送二十只代表吉祥的红蛋。

张勋复辟,国会解散,父亲去广州参加孙中山的非常国会,母亲带着三个子女从北京回到长沙,生下了他们的小女儿。

这期间,父亲经常给母亲来信,谈国家、谈人生。当然谈得最多的还是教育子女。父亲反对对子女太宠爱,要求子女能独立成人。父亲的书法极好,母亲将这些信件贴成厚厚的一本集子,一直珍藏在身边。可惜这些信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抄家时毁掉了。

父亲去世后，母亲闹分家

父亲的病是在广州作下的，当时中医称为“气满”，他饭后总是感到呼吸困难。其实，照现在看来，那病大概是心肌梗塞。

一九二〇年，父亲因病从广州回到长沙，这以后直到他去世，一直赋闲。父亲为官清廉，家中并无多少积蓄，赋闲后，经济状况自然困窘。省长赵恒惕曾拟委任他做榷运局局长，这是个肥缺。然而，“道不同不相为谋”，一直追随孙中山的父亲拒绝与同北洋军阀一个鼻孔出气的赵恒惕合作。每年春节，赵恒惕都要派副官送来三百块光洋表示慰问，父亲总是坚辞不受，让那位副官把钱退回去。明伢子懂事以后，父亲不肯趋炎附势的这些事，通过母亲的叙述，深深印在他的心中，以至影响了他一生的品格。

从日本留学回国的田秋明在长沙开有“秋明医院”，他是父亲最信赖的医生，但一直把父亲的病当胃病医。那年章太炎来湖南，邀长沙几位社会名流游岳麓山，父亲走到爱晚亭便气喘得不能再走——此时他的病已相当严重。

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一日夜里十二点左右，父亲从黄兴的儿子黄以欧家里打牌回来，临睡前感到很不舒服，但仍然兴奋地告诉母亲“北伐军已经出来了”！一点左右，父亲大喘，母亲立即吩咐轿班去请田秋明大夫。田一进门，父亲就喊：“田博士，要救急，你把针带来了没有？”田答：“就派人去拿。”父亲把床沿一拍：“来不及了！”两点钟，父亲就落了气。其时他还不满四十岁。当夜，悲痛欲

绝的母亲剪掉了满头青丝。

父亲赋闲的两年里，为了度日，母亲背着他变卖了不少首饰，后来连父亲烟嘴上的一点点金质装饰物也卖掉了。父亲去世后，才三十岁出头的母亲带着四个儿女，困难之际，平江老家的大伯父让他的儿子带来二百元钱和一封信，信中劝母亲：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今子尚幼，望弟媳携子女扶柩返乡。

母亲当时已有了分家的念头。她要继承夫志，将儿女们抚育成人，就必须留在长沙让女儿们读书，不能再回那个乌烟瘴气的老家。她不肯再用老家的钱，让侄儿把一封言词恳切的信和钱带了回去。

由于一时筹不到钱，父亲的灵柩无法运回老家安葬，只好寄放在长沙城南郊外那种专门寄放灵柩的处所——厝屋。

每个月，母亲都要去那里看望一次。家离南郊近二十里。每次去，母亲抱着五六岁的明伢子，雇一辆人力车，而两个不满十岁的姐姐只能跟在车子的后面走。

母亲对父亲的怀念是极其深切的。她比父亲小十岁，在父亲面前比较任性。平日，父亲总是很顺着母亲。如今，失去了父亲的体贴，小女儿又因照顾不好，在父亲去世不久便夭折了。母亲把生活中所有的委屈和苦难，都来这里向父亲的灵柩哭诉，常常还没有走到那间停灵的小屋，就放声号啕大哭起来。

厝屋那阴森森的长廊以及长廊两侧一间挨一间停放灵柩的小屋，使幼小的明伢子十分害怕，但坐在父亲睡着的那口大黑棺材边，他又感到好像亲近了父亲。他好感谢父亲灵桌前那对小纸人“金童玉女”，因为他们愿在这么冷清的地方日日夜夜陪伴父亲。

这种“哭灵”持续了近两年。一九二二年年末，母亲带着儿子，去北京向国会要回了父亲的二千多元抚恤金。返回途中，经过上海时，五叔带明伢子去拜见了父亲的生前好友谭延闿。谭也送了二百元奠仪。

回到湖南，母亲用抚恤金和谭延闿等父执相送的一大笔钱，将父亲的灵柩从水路运回长寿街，并在老家为父亲大摆道场。除了以此寄托对父亲的感情，好强的母亲还想争一口气：不用你李家的钱，也能把事情办好。结果把钱全部花光。其实，当时丧事如能节俭一些，以后的日子也不会那样艰难。

道场一做完，母亲就找来族中的长辈提出分家。父亲名下的田地，有三百担租谷，还有长寿街镇上的两个店铺。父亲在世时，全归祖母掌管，大伯父、叔公、祖母和姨祖母都是母亲头上威风凛凛的家长，一个年轻守寡的媳妇在这样的大家庭中，地位之卑微可想而知，母亲敢于向长辈提出分家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家长们当然不同意，祖母提出：你们母子回来，饭有你们吃的。然而母亲态度坚决，理由充分：我要培养孩子读书，老家没有好的学校！

母亲对这个乌烟瘴气的老家、对老家中那些吃喝嫖赌的子弟深恶痛绝，生怕自己的子女在这样的环境中受到坏的影响。父亲生前常常对母亲讲：将来的社会是要“共产”的，所有的人都应该自食其力。因此母亲打定主意：决不在老家住下去，不管将来生活多艰难，也要留在长沙，培养子女读书成器。

长辈们终于屈服。母亲分到可收一百担租谷的田产和长寿街出租的两间铺面。带着三个子女回到长沙。

三姐弟

琬姐(琬华)、灼姐(英华)从小就受到母亲这样的教育:读书要发狠啊,你们只能考不收学费的公立学校,钱是要留给弟弟读书的。

二十年代像母亲这样比较开通的妇女,头脑中也难免有一些根深蒂固的封建观念,重男轻女便是其一。她还要两个女儿将来都去读不收宿膳费的师范,"大学要留给弟弟去读"。

两个姐姐后来果然都考进了公立学校。琬姐小学毕业后进了有名的省立周南女中,后来又考进了上海两江女子体育师范学校。一九三四年回长沙教书。灼姐读完中学后进了长沙女子师范,毕业后教小学。

三个孩子中读书花钱最多的就数明伢子。五岁,母亲就把他送进了二十年代省内外闻名的私立楚怡学校。这所学校不仅聘有第一流的教员,有第一流的校舍和教学设备,而且教学思想也很新潮,采用美国"道尔敦"制教学法。旨在发挥学生积极、主动的创造精神,而不是像国内一般学校搞"填鸭"式、"注入"式教育。例如,在管理方面,学校要求学生从小学会自己管理自己:从卫生检查,到校纪监督、召开班会等各种活动,都由学生自己组织;在学习方面,除教授课本知识外,还常常给学生做一些智力测验题。为了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每个年级都开设手工课。教员备课非常认真,各种校规极严,学费也相当高,所以学生多是富家子弟。

因为小时候脑袋特别大,明伢子在小学的绰号叫"大脑壳"。"大脑壳"一年级只读了半年就跳到二年级,二年

级读了半年又跳到三年级。本来上学就早，这一来，他比同年级的孩子要小两三岁。

黄兴幼子黄乃与明伢子是小学的同班同学。如今，这位七十七岁的老人回忆起儿时的同伴仍然充满感情：

李厚生活泼好动，争强好胜。他的作文、毛笔字和手工常常被当做楷模在全班展览。要是偶尔一次老师表扬了别人的作业没有提到他，他便不服气，一定要写一篇更好的，胜过对方。我也是班里的学习尖子，我们俩常常竞争。厚生打架也很厉害，他曾用大脑壳把比他个子大的对手一下顶到墙根儿，半天喘不过气来。

母亲的家教

母亲的家教之严在亲友中是出了名的。从小学到中学，三个孩子都常挨母亲的打。母亲读过女子师范学校，一方面，她把教育子女看得十分重要；另一方面，封建社会“不打不成器”的礼法家规对她的影响又很深。孩子在学校犯了错误，跟同学打了架，弄坏了人家的东西，或在家不守规矩，挨骂回了嘴都要挨打。

除此之外，年轻守寡的母亲那种特有的不安全感，也是她常常要体罚孩子的原因。只要天晚了不见孩子回来，她就恐慌得要命，总怕发生意外。男孩子放了学都贪玩，爬墙上树乃至打群架，在那个年龄也是题中应有之议。然而母亲都决不允许。明伢子因放学不按时回家挨打挨得最多。

比挨打更难堪的家法是罚跪。如果母亲认为孩子的错误严重，打过之后需要“反省”，就命在父亲遗像前罚跪。小孩子也是要面子的，要是被邻居撞见，真恨不得钻到地缝里去。

明伢子不仅不能因为是家里的“宝贝崽”而有丝毫幸免，而且

母亲对他的管教较两个姐姐还要更严一些。她甚至在儿子每天放学之后，要亲自检查他的口袋和书包，生怕他拿了不该带回的东西。

严格的家教使明伢子养成了不少好的品行和习惯，也使他产生了一种逆反心理。后来他的出走就同要摆脱母亲的严厉管束不无关系。

由于战乱，乡下的租子常收不上来，一家人连吃饭都紧张，只好常常靠变卖东西和借债度日。因此，让儿子去读楚怡这样的“贵族学校”，实在是很勉强的。每逢开学交学费，母亲都要四处奔走，东挪西凑，到后来，她甚至多次以三分利向原先自家的女佣借债。

和周围坐人力车上学、有佣人送午餐到学校的富家子弟比起来，厚生在同学中吃、穿方面就显得太寒酸了。夏季，满街的瓜果，母亲不让买一个，怕吃坏了肚子没钱看医生；学生中十分流行的陈嘉庚运动鞋家里也买不起，只能穿母亲做的鞋。学校里每年一度的菊花会，是为学校筹款的活动，富家子弟都能很体面地买上一大盆菊花，得个“爱校”的美名。可母亲天天为柴米油盐发愁，哪有闲钱去满足儿子的好胜心呢？能使李厚生骄傲的，只有年年在班里名列前茅的学习成绩。

十岁目睹了“大革命”的兴衰

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李厚生目睹了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兴衰，这场大革命在一个儿童心中留下了怎样的印象呢？《龙胆紫集》的“童子团歌”中写到：

围墙挤破教育坪，
欢迎北伐绿衣兵，
马列中山像高挂，

红旗蔽日梭镖林；
牛披彩带来开会，
头戴高帽扮劣绅。
北伐胜利总庆祝，
白昼游行夜提灯。
打倒列强除军阀，
歌声响彻九霄云。

当时李厚生只有十岁，但对“打倒列强除军阀”也能理解。因为母亲常常向孩子们念叨父亲的为人，父亲的志向，还有那些和父亲一样正直、一样在黑暗中追求光明的朋友。黄兴、宋教仁、秋瑾、谭延闿这些辛亥革命的风云人物同父亲的友谊，以及给父亲的书信、诗文、墨迹，厚生是从小就见到的。父亲的同乡至交李六如、方维夏两位共产党的早期革命活动家，更是母亲时常挂在嘴边的人物。可以说，母亲的念叨是李锐革命意识的最早的启蒙。

学校里教自然课的老师是位共产党员，每天的朝会讲话，他都要给学生们讲北伐形势，讲三民主义。教育会坪广场为北伐举行庆功会，楚怡小学每次都要列队参加。

那些日子，李厚生是小学生中的“活跃分子”。他被推举为学校宣传队的小领队，常常带领同学们走上街头或者到乡下以文艺节目宣传革命，宣传北伐。因为喉咙特别大，领呼口号、上台表演节目都是骨干，即使比他年龄大的同学也愿意听他的。

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在上海公开宣布了消灭共产党的政策；五月二十一日，湖南许克祥在长沙制造了镇压工农武装的“马日事变”。

事变发生的那天早晨，厚生被母亲关在屋里。街上枪声不断，那是总工会的纠察队和农民武装赤卫队在同反动军队进行巷战。枪声停息以后，厚生跑到街上，看到由于寡不敌众，路边许多纠察

队员和戴着红袖标的赤卫队员陈尸街头。紧接着,是反动派对革命志士的血腥屠杀。

李锐在一篇回忆文章《纪念何斌》中就写道:

> 长沙街头,常有"滴答答滴答答滴滴滴"的号音吹过,几个或十几个男女青年,被粗绳捆着,有的是赤膊,颈后都插了一支朱(笔)标,被一大群如临大敌的士兵推着跑。不管跑得怎样急,这些青年总是激昂地一呼一应地高叫着口号,这种情景,给予我——一个十几岁孩子的心的撞击,是对英雄的崇敬多于死的恐怖的。

几个月前还是红旗招展,多次举行群众集会的长沙市广场"教育会坪",一夜之间变成了刑场,司门口便是杀人的地方。二十八岁的湖南省总工会委员长郭亮等九名革命者在这里被杀害之后,头颅被悬在司门口示众。鲁迅发表在申报上的《铲共大观》一文,详细记述了这一情况。

郭亮的名字在大革命时期的湖南,可谓妇孺皆知,厚生率领童子团参加游行时,多次目睹这位深受群众爱戴的革命家的风采,还在教育会坪的集会上听到过他那令全场振奋的演讲。后来又亲眼看到去司门口向英雄的头颅告别的群众人山人海,弄得反动派十分恐慌。一种对英雄和正义的崇拜之情在他童稚的心中进一步萌发。

不久,乡下的方国华表哥以及住在平江的李六如的两个弟弟也都在大革命失败后牺牲了。李六如在长寿街的房产、店铺被"还乡团"放火烧光。这位一九二一年便由毛泽东、何叔衡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继而毁家闹革命的乡前辈,后来到延安做了毛泽东的秘书长。

鲁迅先生写道:"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有的!"若干年后,

李锐等许多在童年时期便看到过“悬头”的青年，仍然义无反顾地投奔了延安，就是鲁迅这一论断的有力佐证！

中学生活

秋季，十一岁的李厚生升入楚怡学校中学部。入学不久，他便和一位语文教员发生了冲突。那位教员在课堂上把“诗圣”杜甫的作品讲错了，厚生当场指出，那位教员感到脸上无光，便总找机会刁难他。

母亲也是懂诗的人，当然知道儿子给老师提的意见是对的。教员如此无理，母亲便向校方提出了控告，并在第二年将儿子转到另一所私立学校“岳云中学”。后来那位教员被楚怡学校解聘。

大革命失败后，岳云中学和其他学校一样，死气沉沉。虽然也是全省一流的学校，然而文科方面的教学思想和课程设置却很陈旧。初中国文以《孟子》为教材，高中国文教员是前清举人，只讲《古文辞类纂》，不准作白话文；地理教员只会让学生抄黑板。这所中学以数学闻名，学校以“工业救国”的思想教育学生。高中的数理化全用英文原版的教科书，每天有做不完的习题。

除了完成功课，李厚生对新文学特别有兴趣，但要弄到这些书刊却很难。一次他突然发现同班军官家庭出身的文立徵同学有邹韬奋编的《生活》和林语堂编的《论语》，便每期向他借阅。班上出墙报，只有他俩坚持用白话文写文章。关心时事、爱好文学，不愿死读书，使两人成了莫逆之交。

李厚生的中学时期，可记述的并不多，但与文立徵的结识，却是对他日后的道路有影响的一件事。

第二节　书生奋起呼陆沉

沉闷的武大

一九三四年，十七岁的李厚生高中毕业，和文立徵等三个要好的同学一起到北平考大学。这几个向往民主、追求个性解放的青年，对湖南沉闷的校园空气非常不满，都希望能考中北平的大学，据说北平的学校思想相对活跃，学生生活也比较"自由"。考试结果，其他三位同学都如愿以偿，只有李厚生被武汉大学工学院录取。他只得怅怅南归。

武汉大学位于武昌风光秀丽的东湖珞珈山，离市区十多公里。校舍是由美国著名建筑师开尔斯参照承德外八庙建筑特点设计的。中西合璧的宫殿式建筑座落在青山绿水之间。设有文、法、理、工四个学院。李厚生在这儿度过了他的三年大学生活，并从这里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由于学生中没有进步组织，个别倾向革命的学生只能偷偷读点进步书刊，赋诗言志，私下里交流交流心得。

右派学生倒很活跃。一九三二年成立的国民党特务外围组织复兴社，当年就在武大学生中发展成员。另一个特务组织CC，也在学生中建立了他们的机构。凡是参加了这些国民党外围组织的学生，毕业后都能得到收入较高的工作。有几个思想进步的同学因为受到他们的威胁被迫离校，其他进步学生的活动只得更加隐蔽。严格的考试制度、沉重的课业负担，使更多的同学为了过关，只好埋头读书，不闻国事。

一次失败的尝试

入校以后，李厚生和湖南来的几个同学很快结为好友。晚饭以后，他们常常漫步湖畔，谈人生、谈时局。大家深深感到：学校阴暗沉闷的政治空气与堂皇开阔的校园真是太不相称了。同时也意识到：必须有自己的组织。于是，他们开始了一次以失败而告终的尝试。

当时学校里已有一些大大小小的同乡会，湖南同乡会人数最多，他们便想在同乡会的基础上成立学生会。李厚生等自知办这类事情靠几个新生是不行的，必须仰仗几个高年级的、在学校里有号召力的学生。自然他们首先想到的便是去找湖南同乡会负责人许升阶。许读政治系三年级，功课好，在师生中有名望。平时同学们一起骂国民党、蒋介石，他从不阻止，更不反驳，因此大家对他十分信任。他的复兴社分子的身份直到一九三六年他毕业后去国民党报纸《扫荡报》任职，大家才晓得。

在许升阶的授意下，李厚生等几个新生又联络了几十名同学，贴出启事倡议成立学生会，并在斋（学生宿舍）代表召开的学生大会上选出了许升阶等七人为执行委员。这一结果当然要遭到对许的底细略有所闻的几个进步学生的强烈反对。他们也贴出告示，批评选举不合法，应该先从各班选出班代表，再从班代表中产生学生会负责人。不过，因临近寒假，成立学生会之事不了了之。更糟的是，因为这件事，李厚生等几个新生被学校中的进步学生怀疑为许的同伙。

工学院有机械、土木两系，每系一个班。李厚生所在的机械系在学校是个非常活跃的集体：群体正义感强，爱“闹事儿”，运动员也多。李厚生游泳不错，还喜欢打球。排球、足球、篮球、网球都打，还是足球和排球的校队队员。

工科学生课业很重，李厚生却不愿死读书。他兴趣广泛：热爱体育，会写小说，擅长美术，常为同学画速写头像。入学不久，他的一篇描写人力车夫的短篇《走》，便在师生合办的校刊文艺专号上以压卷的位置刊出。多才多艺和开朗活泼的性格使他十分有人缘。当年大学的同班同学、班主席刘清（原名石秀夫，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六机部副部长）回忆说：

> 每天下午三点，我们必须在球场见。后来搞学运，时间少了，但只要有空，我们仍要去打球。李厚生聪明、热情、爱交朋友，又比我们读书读得多，接受进步思想比一般同学早，所以搞活动很能出点子，《西行漫记》这本书就是他介绍给我看的，这一书对我有启蒙作用。同学们都愿意和他接近。

在所有的课外活动中，李厚生最喜欢的还是读进步书刊。三十年代中期，进步文化事业比较活跃，《新生》、《读书生活》、《世界知识》等杂志和生活书店发行的各种进步小册子在市面上较为常见，学校图书馆里也能借到几本英文和日文的马列著作。进步学生中爱好文艺的多，他们最爱读鲁迅的作品，李厚生更是“散篇文集读无遗”，将鲁迅看做漫漫长夜中的启蒙师。

李厚生特别喜欢做的另一件事，是与在北京读书的中学同学文立徵通信。文立徵考上北平辅仁大学化学系以后，同李厚生几乎每周一信，信中无所不谈。但两位热血青年最关心的还是华北局势。

致全校教授先生的公开信

大学二年级，“一二·九”运动的消息传到武大。往日沉寂的校

园出现了骚动，可惜报纸上的报道过于简单。隔了几天，文立徵从北平寄来长信，信中详细描述了"一二·九"当天，他参加的那支游行队伍在王府井南口同警察的高压水龙搏斗的情景。李厚生立刻把信拿到同学中去传看，并于当夜将信抄写成大字报，贴在文学院门口。为防止有人撕去，他找来一把旧菜刀，立于墙边，刀下压了一纸警告："谁若撕毁，当以汉奸论！"

当时文学院兼作学校办公楼，是师生来往最多的地方。第二天，整个校园沸腾起来，群情激昂，讨论着如何响应北平学生的行动。

李厚生和几个进步同学召集工学院二年级全体同学开会，商量的头一件事是如何发动全校师生，召开全校大会。为了争取校方和教授们的同情，大家推请李厚生以工学院二年级全体同学的名义，起草了一份"致全校教授先生的公开信"。他在信中写到：

> 北平同学的来信，使我们全身躁动。火热从脚心直冲脑顶，我们无法再压住我们的血与泪奔出来……

信中列举了北平、上海各大学校校长、教授们联合支持北平学生的通电，特别引用了北大教授陈衡哲的一段话：

> 横在我们面前的路有四条：第一，是那浑浑噩噩的行尸走肉的路，第二，是那在"刀头上舐血吃"的廉耻的路。这两条是辱身亡国的死路。第三，是那"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拼命的路，第四，是那忍辱食垢以求三年之艾的路。这两条是自救的活路。

李厚生在信中分析道：

> 可是事实已明显摆在面前，吴越的故事已成史迹，别人早已做好了铁枷，使你再也不能做那“生聚教训”的美梦。敌人侵占东北之后，而热河，而察哈尔，而平津，而整个华北。谁能担保不再而武汉……而全中国？这是最惨痛的凌迟。

信中最后呼吁：

> 我们已经听到很多教授先生激昂慷慨的痛语。我们现在惟一的希望是各位教授先生出来领导我们，给我们安慰、自信、勇敢与团结的力量。

这份出自一位十八岁爱国学生之手的激情澎湃的“公开信”，在学校引起了强烈反响。武汉大学学校当局和许多教授，原来都是北京大学的班底，较尊重蔡元培办学精神的校长王星拱、哲学系主任范寿康以及广大爱国教师，都对学生的行动表示同情。特别是范寿康教授，李厚生在被选进学生救国会以后，曾去他家求教，范寿康诚恳地对他说：对于学生的爱国行动，我完全支持。

此时，武昌市区的其他学校已开始串联，酝酿游行示威。十二月十二日在华中大学召开了武汉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代表会议，三分之二以上的学校派代表参加。会上通过了“告全国同胞书”，决定成立武汉学联，并要求各校尽快成立学生会。

论地位、实力，国立武汉大学都是全市大中学校中的“当然领袖”。回校后，全校师生召开大会选举出一个“临时九人代表团”，领导学运。许升阶等人当选。其他当选者，也大部分是高年级的同学。“九人团”又推选了许升阶等两人代表武大参加武汉学联，在学联各校代表的选举中，许升阶当选为主席。十二月十七日，五十三所学校的一百二十多名代表正式成立“武汉中等以上学校学

生救国联合会”。学联决定响应北平学生的行动，于十二月二十日举行武汉三镇学生联合大游行，到汉口的日租界示威。

十九日晚，进步学生紧张地准备着。许多学校的学生会，派人占据门房，控制电话，以便随时和学联联系。在武大，名义上的领导是“九人团”，实际上的组织者是李厚生、魏泽同、王前等进步学生。他们撕掉床单、衬衫做成袖章、横幅，并派了二十名同学去汉口支援。武汉三镇中的汉口位于长江北岸，那里没有大学，且多是女中，市一女中的学生万国瑞任总指挥。当局怕学生去冲设在汉口的日租界，决定封锁轮渡，阻止学生过江。这二十名学生便赶在封江的前一夜渡江过去。

组织汉口大游行

二十日凌晨，李厚生和另外二十名学生通宵忙完本校游行的准备工作以后，又作为支援汉口各校的第二梯队，赶到江边。此时，轮渡已经停止。他们沿江搜寻，终于找到一条木划子，雇人划了过去。先后偷渡过江的还有华中大学、武昌乡师等四五个学校的部分学生。

一上岸，同学们展开“国立武汉大学”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两面大横幅为队伍先导，昂首阔步，开始游行。李厚生带领大家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多年郁积之气，喷发出来，激动得热泪盈眶。群众纷纷拥上街头。同学们更加热血沸腾。

上午十时许，十七校四千余人在江汉关汇合，等候武昌大队人马过江，但直到十一时，仍不见武昌来人。李厚生、万国瑞等人决定，十七校先游行。

在这支因民族危亡集合起来的队伍中，思想水平并不一致。游行中，华中大学因口号问题和武大发生了争执。华大这所由国民党CC特务控制的私立学校，不敢提激进口号，只同意喊“支持

政府对日交涉”、“反对华北自治”等。李厚生和他的同学们却坚持要呼“反对卖国外交”！“讨伐叛逆殷汝耕”！汉口各校的学生都跟着他们高呼这些口号，沿途围观市民极为振奋。

这天的游行刚刚开始，日租界内便架起了机关枪。游行大队由江汉路、沿江路、三民路、中山路游行一周，又在孙中山铜像前的广场开了群众大会，才分头散去。

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下午四点，李厚生和武大同学回到武昌，才知道武昌游行的学生和政府发生了大冲突。

武汉共有六十多所大中学校，其中四十多所集中在武昌，是三镇学生的主力。这天，五十余所学校的上万名学生参加了游行。学生们强烈要求把三镇队伍都集中到汉口日租界对敌人示威，对政府封江禁渡的做法极为愤怒。主管轮渡的建设厅长刘寿朋以“保护学生安全、避免意外”为理由拒绝学生要船的要求，还派秘书指责学生“无理取闹”。这下气炸了游行学生。他们砸了建设厅，厅长吓得跳墙逃跑。担任学生游行队伍总指挥的学联主席许升阶见控制不了局面，又怕日后受政府惩处，临阵脱逃。武大的队伍在另外几名进步学生的领导下，和其他学校的学生一起，又去砸了轮渡码头。

李厚生等从汉口回来的同学，在省政府门前找到武大队伍，立即投入了战斗。

天黑了，大部分同学返回学校，但还有一些同学在学联代表、武昌高中学生何功伟等人率领下，准备坚持斗争：政府不恢复轮渡，我们就不恢复长街的交通！于是各校队伍纷纷来到长街静坐。惟独不见武大的队伍。

几位学联代表聚集在黄鹤楼下的茶馆中商议行动计划，李厚

生和另外两位武大学运骨干也参加了。大家一致决定露宿。何功伟打电话指责许升阶临阵脱逃。李厚生赶回学校,动员了几十名同学回到汉阳门,参加这一行动。

这一夜,整个长街和汉阳门一带的人行道上坐满了露宿的学生和前来支援的市民。隆冬的江风寒冷刺骨,气温在摄氏零度以下。饥饿、寒冷、一天的劳累都没有影响这些爱国青年的士气。同学们有的三三两两围在一起议论着白天的斗争,有的学校拉开场子向群众进行抗日宣传。更多的同学在学生代表的带领下,激昂地唱着一支又一支救亡歌曲。

教育局长程其葆和警察厅长蔡孟坚及华大校长陈时等人来到露宿地,摆出悲天悯人的姿态:"同学们,天气太冷,还是回去吧!"广大同学纷纷责问:"为什么不许我们过江去日租界示威?""抗日何罪?""你们一天不恢复轮渡,我们一天不回去!"

武昌市民被学生们的爱国热情深深感动。附近的住户、商店夜不闭户。小学生在老师的组织下给大哥哥大姐姐们送开水;有名的曹祥泰、冠生园、伍亿丰等商号,抬来大批饼干、糕点;各个学校都送来了防寒的衣物。有些家长本来想把参加露宿的孩子拉回去,可看到这动人的场面,便改变了原来的想法,和孩子们一起参加了斗争。这一夜,江城的抗日救亡运动大大深入人心。

二十一日早晨,武大的队伍参加了全市各校学生向政府的请愿,要求过江到汉口游行。教育厅长在省政府里召集各校校长开会,企图动员学生回校。后来又将请愿代表何功伟等请进省府谈判。代表们坚持:不恢复轮渡,不让过江游行,同学们就决不回去。

谈判一直僵持到下午,外面几千名学生等急了,以为代表被扣留,便开始冲省府大门。守门的卫兵赶紧将大门紧闭。学生们抬来大木桩朝大门撞。湖北省政府主席怕前日砸建设厅的一幕重演,只好同意第二天开江。为分散学生力量,要学生分两天到汉口游行。消息传出,上万学生和一直支持他们斗争的武汉广大市民

为这一重大胜利欢呼跳跃，欣喜若狂！

二十二日，武昌两千多名学生过江到汉口游行，汉口各校学生在江对岸列队欢迎武昌战友，汉阳学生一千余人也渡江参加了游行。三镇学生终于会师，他们沿途高呼口号，散发传单，两旁群众报以热烈掌声。武大全体学生都参加了游行。滑稽的是警察厅长蔡孟坚带头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他是怕学生冲日租界，这使学生们大为恼火。有人建议把队伍调过头，把他们甩在队尾，但因人多，意见不一，又缺乏经验，想法未能实现。

二十三日，过江的学生更多，游行队伍长达两公里，围观群众多达十余万人。武汉市长吴国桢、教育局长程其葆带领随从也来参加游行，并走在队伍前面。这两个平日高谈"中日亲善"的人，此举之用意与昨天那位警察厅长差不多。果然队伍一接近日租界，他们便高喊着阻止队伍再往前走。

此时日租界四周堆起了沙包，拉上了铁丝网，沙包和房顶都架起了机枪。长江中日本军舰上的大炮也脱下了炮衣，炮口对准示威群众。租界周围早已站满了中国当局派去"保护"的宪兵、警察。但游行队伍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声援下，同仇敌忾，在日租界前高呼"日本鬼子滚回去"等口号，民气之盛，到达极点。

罢课以后

三天的大游行结束后，武大许升阶为首的"九人团"自知领导不力，集体辞职。由各系各班代表参加的正式组织"武汉大学学生救国会"成立。李厚生当选为常务干事，负责宣传股。接受"九人团"的教训，这回他们再不迷信高年级学生，当仁不让地自己出来当领导了。

为了敦促政府改革大学教育，以适应挽救民族危亡的形势，救国会成立的第一件事，就是领导了全校的总罢课。支持"总罢课"

的部分教师以“武汉大学教职员救国会”的名义，致电南京，要求“中央严令各地军警当局，不得摧残学生爱国运动”。

罢课之后，武大学生救国会担负起组织全校学生学习、生活、开展抗日活动等各项工作。为了推行战时教育，他们在同学中组织了战时经济、战时国际法规、国防化学、国防文学、救亡教育、中日问题、军事工程、军事无线电学等各种研究会，聘请教授分别担任指导。救国会还组织学生早晨上军操，成立宣传队下乡宣传等等。

这期间，北平学联为联络全国学生一致行动，派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的两位学生代表来到武汉，李厚生和何功伟负责接待了他们，并安排他们在三镇几所重点大中学校作了《北平学生运动的经过》和《北平学生运动的意义》的报告。所到之处，受到热烈欢迎。

代表们在报告中指出：华北名存实亡，学校被军警全部封锁……此后的运动中心应该由北方转到南方来，武汉三镇便是最理想的中心地带。他们希望武汉三镇的全体青年负起责任，来领导、来发展这场民族战争中的学生运动。

为了平息风起云涌的学生爱国运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八日，全国各大报刊登出消息：蒋介石将在南京会见全国各大学学生代表。代表资格是“平素学行优良”的学生。“聆悉政府方针，贯通各方意见”，使学生“对于国事情况能更深明了”。

十二月三十日，武大学生救国会召开紧急会议，决议不准学校派代表去南京“聆训”。“一二·九”以来，爱国学生为敦促政府抗日，游行、请愿、发宣言、向政府打电报、致公开信……如果这些还不足以代表青年们的意见，难道两三位“平素学行优良”的学生就可以传达青年们的意见了？

在学生救国会的领导下，大部分同学不参加学校组织的选举“晋京聆训”生的投票，选举自然没有结果。但校方还是派去了三个学生。于是由李厚生起草武大学生救国会在天津《大公报》上登

了一个启事:

> 查本校同学×××、×××、×××三人,违反本会去年十二月三十日全体会员大会决议,冒充本校学生代表入京聆训。兹经二月九日全体会员大会决议,将该三人驱逐出会,特此公告。

与此同时,全国南北普遍掀起了一场反"晋京聆训"的斗争。"一二·九"运动中任清华大学中共党支部负责人的蒋南翔,抗日战争初期在武汉见到李锐时曾告诉他:当时武大学生救国会的启事,使平津学生很受鼓舞。

校长的警告

一九三六年初,政府开始对学生运动采取强硬态度,湖北教育厅根据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的指示除宣布提前放寒假外,又规定:今后不上课、不考试的学生不得给予学习成绩;对妨害课业的学生,立即开除,对煽动罢课或干涉校政的团体要制裁。反动派的御用文人也纷纷出来劝学生"理智救国"等等。与此同时,国民党当局还公布了《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在反动派制造的恐怖气氛下,一些家长把孩子领回家,连一些学运积极分子也退出了运动。学运一时处于低潮。

在武大,学运的中坚分子们仍然在坚持斗争。

李厚生负责宣传股,便着手办了一个刊物,名为《救中国》。这是他一生中首次办刊物,这时他还不满十九岁。

这本十六开、约三万字的刊物共出版了两期,刊载的基本上是进步学生的作品。第一期长、短文章共十五篇。

在发刊词中,李厚生特别批判了具有代表性的"中国没有能力

同日本抗战，非先十年生聚不可”的悲观情绪。指出：“日本得寸进尺的亡我政策，告诉我们没有慢慢生聚的机会，我们的民族再不能麻痹下去了，再深沉的麻痹就是死亡。”

李厚生还编选了一位工学院学生的文章《良心话》。该文朴实、深刻，很能代表一部分学生的思想转变过程：

> 我曾经反对罢课，也曾怀疑发起罢课的人动机不纯洁……可是我们现在受的是什么教育？工学院水力学学的是密西西比河、莱茵河的修浚法，自家年年闹水患的黄河应当如何治理是不管的。生物学系学的尽是些自然现象记载之学，稍切实际的遗传学、细菌学等是没有的。纯谈理论的纯粹自然科学，我们知道它的重要性，全部应用技术都是纯粹自然科学的产物。这是千百年的大计，危在旦夕的中国如何能够等得到呢？……试问我们现在转瞬就有做亡国奴危险的时候，谁能够安心坐在教室里读纯粹的科学理论呢？以后的教育，一定要改革，不然我们应当长此罢课。

在这一期中，李厚生写的另一篇文章《胡谈学生运动》特别引人注目。“一二·九”以后胡适曾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认为北平学生游行之前应先将路线和目的地通告警察机关，“军警那天上午的手忙脚乱是可以原谅的”。还说根据美国的经验，凡大规模游行，都应事先将路线和目的地通告警察机关，然后责成警察机关维持秩序。

李厚生在文章中讽刺道：“我很怀疑胡先生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他是在纽约还是在北平。将这次游行的纷扰之罪加之于学生，那么‘中年人’的心未免太毒了。”

他还写道：“敌人的侵略不是坐在课堂里读几句死书可以抵御

的,我们不愿坐在课堂里让我们的国家灭亡……希望胡先生不要再唱埋头读书的高调了,这些话无论怎样好听终于成了废话。我们现在想要知道的是同民族解放斗争实际相联系的知识,救亡实践的方法。"

四十多年后,在武汉一所大学的研究室找到了这份刊物。面对着它,李锐并无悔其少作之感。

《救中国》的出版,进一步消除了李厚生和其他进步学生当初为评选许升阶为学生会代表造成的隔阂。

在反动派的高压下,学生中的"左"倾情绪有所抬头,一些学校的学生在抗日宣传中不讲策略,提出了反对政府、拥护苏维埃的口号。

刚上台的湖北省主席、亲日派杨永泰,便以"有共产党操纵、反对本党主义"为借口,勒令解散武汉学联。学联遂转入地下,成为秘密组织。

此时,武大的学生救国会依然合法存在,但为了行动方便,避免特务破坏,李厚生等四十多名骨干成立了秘密团体武大青年救国团。他们牢牢掌握着"学生救国会"的一切活动。

形势日益紧张。一次,校长王星拱将李厚生等七名学运骨干找去谈话,说:学校已得到省公安厅通知,如果你们的行动过于"越轨",我无法负责你们的安全。作为一校之长,王对学生还是爱护的,但七名初生牛犊对于这一善意的警告只是一笑了之。

这年暑假,武大参加秘密学联领导的代表毕业离去,李厚生接替了他的工作,与武大化学系学生万国瑞代表武大领导秘密学联。

万国瑞还在市一女中的时候便是该校学联代表,"一二·九"大游行时,担任过汉口各校游行的总指挥,一九三六年考入武大后,仍然是秘密学联领导的成员之一。

在共同从事学运的日子里,他们建立了恋爱关系。后来李锐帮她改名为"杨纯",这个名字她一直使用到现在。

一九三六年暑假以后,李厚生的主要活动已不在校内,而在秘密学联。

秘密学联的成员有二百多名,是来自武汉二十多所学校的代表,每校少则几人,多则十几二十人,其中骨干大多是“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秘密学联的领导机构由各校推选出的一至两名代表组成。懿训女中的范元甄也是秘密学联的领导成员之一。

秘密学联完全采取地下活动方式,他们在学生中传阅进步书刊,组织读书会,领导各校的抗日活动,并与“一二·九”学生运动后北平成立的中共秘密外围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相互联系。李厚生、杨纯以及英语系学生谢文耀三人还办了一个地下刊物《武汉学联》,通过汉口的生活书店秘密发行。

由于学联工作繁忙,李厚生这时已很少上课,只是在期末突击一下,以求考试通过。虽然他对理工科不如对文学艺术、社会科学理论更有兴趣,但是从中学到大学,他所受到的学校教育却一直是偏重理工的。这不仅使他学到了自然科学方面的比较系统的理论知识,而且培养了他严谨的思维逻辑、求实的思想风格、科学的工作作风。后来他之所以能在三峡工程、“大跃进”、毛泽东研究等领域中形成自己独到的见解,与他的学历及这种学历对其素质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为此从五十年代起,他一直鼓励青年干部:一定要懂一些自然科学。

成立自发党支部

李厚生被校长警告过之后,电机系一位曾与田秋明大夫关系很深的教授,便通过田把厚生在学校的情况告知了长沙他的母亲,说厚生在学校从事的活动很危险。父亲去世以后,母亲一直把这个独生儿子看做是自己的全部精神寄托,听到这个消息,她干脆从长沙搬到武汉珞珈山,在学校附近住下,常常到宿舍来管束儿子的

行动。

其实,母亲在父亲和父亲那些朋友的影响下,政治上一直比较开明,但她实在为儿子的安全担心。她劝儿子:"你父亲在世也会赞成共产党的,可是胳膊拧不过大腿,共产党虽好,杀头太可怕了。"

为了对付妈妈,李厚生伤透了脑筋,有时候他和秘密组织的同学在自己房内开会,远远看见妈妈走来,他就将房门锁上,室内静悄无声。

李厚生和几个最要好的进步青年越来越感到,必须和党组织取得联系,否则他们这些风浪中的小船,该往哪儿飘呢?

一天,李厚生在圣罗以中学进步教师何伟处,发现一本别人寄给何的共产党北方局主办的刊物《长城》,便断定此人一定有党的关系。于是向何提出加入共产党的要求,可何却没有明确表态。很久以后,大家才知道,当时何也刚刚入党,大约党还没有交给他发展组织的任务。

之后他们又找到一个刚从苏州反省院放出来的人,名叫甘禹民。甘在大革命时期曾到苏联学习过。当时他们只知道他入反省院是因为参加了共产党,却不知道从反省院出来是需要经过党严格审查的。

甘的意见很快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在没有找到党以前,可以先自发成立一个支部,一边建党,一边找党。一九三七年二月的一天,李厚生、杨纯、谢文耀等六七个年青人在谢文耀家开会,每人都填写了一张自制的入党表格,并庄严宣誓。他们将这个自发的党组织称为"中国共产党武汉临时支部"。

由于局势紧张,一九三七年的暑假提前了两个月。放假前夕,李厚生给长沙的琬姐去了一封信,说自己要去抗日,请把母亲接回长沙。

这时李厚生离毕业还差一年。五月初杨纯到北平去接党的关系,写信来叫他去,而母亲的"看管"又使他的活动很不方便,所以他决定提前离校。

当琬姐心急火燎地赶到珞珈山时,李厚生已经去了北平。母亲几乎无法承受儿子的这种"叛逆"行为。大约有半个多月,她整天哭着在珞珈山周围转,并执意不肯回长沙。琬姐在长沙兼着四个学校的体育课,是家里经济上的顶梁柱,眼看假期已满,怕丢掉饭碗,只得动员在长沙一所小学任教的灼姐辞掉工作,来珞珈山照顾母亲。

在北平找到了党

一九三七年五月,李厚生带着自发支部八名同学的入党表来到北平,很快就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除甘禹民等两位从反省院出来的人外,其他六位同学的党籍均得到认可。

正当中共北方局领导与李厚生、谢文耀等几位武汉来的同志研究如何在武汉建立组织时,"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了。

这段时间,李厚生、杨纯、谢文耀以及文立徵同住在北平西城翊教寺的庙院里。因房东老头没报户口,警察来查,在李厚生处搜出进步刊物,于是便发生了本书第二章提到的"一九三七年被捕"及登报事件。

事情发生的第二天,党组织要谢文耀马上回武汉,待李锐出狱,又通知李锐和杨纯、文立徵立刻离开北平。此后,便是一段极为动荡的生活。

七七事变之后的动荡生活

李锐和场纯、文立徵于是随平津流亡同学到山东济南,随后参

加了三路军韩复榘队办的抗日干部训练班接受训练，训练完赴各县作民运训导员。训练将结束时，济南已很危险，文立徵被分配到城武县当民训员，李厚生留山东平津同学会工作，这个机构后来同中共山东省委一起撤至泰安。杨纯所在的女生队未分配，集中至济宁继续训练。

这次分手，对于三个人的命运，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文立徵从这以后一直在山东鲁南一带区、县地方武装开展抗日活动，担任过著名的铁道游击队政委。一九四五年在敌人的一次突袭中牺牲。

杨纯和女生队的几个伙伴，被山东省委调去参加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队。曾任部队团政委。转到地方后，又做了多年地委书记。

残酷的战争环境，隔绝了杨纯同李厚生的联系。五十年代再见面时，两人均已儿女成行。晚年，他们保持着同志式的友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杨纯曾任周恩来的秘书、卫生部副部长。)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李厚生以山东平津同学会的名义回武汉募捐。离校才半年，形势已发生了很大变化。陶铸亲自到武大建立了党组织。此时，武汉成为平津沦陷后流亡学生和进步文化人的聚集地。

李厚生在武汉拜见了冯玉祥、沈钧儒、王昆仑、沙千里、许宝驹、罗隆基等各界名人，募捐到一笔钱和一些书籍。

当工作告一段落时，李厚生去看望过母亲一次。这时，灼姐也已离家参加了抗日。母亲本是深明大义之人，否则就不会在儿子出走之后又送女儿去抗日，但半年前儿子的不辞而别使她的“家长”尊严受到严重损害，以致见到儿子仍然怒火冲天，盛怒之下，竟把儿子关了起来。李厚生以绝食表示抗议。还是琬姐百般劝说，弟弟才得以“获释”。

由于泰安已经失守，中共长江局派李厚生赴徐州五战区开辟青年工作。

五战区是李宗仁的防区，包括苏、鲁、豫、皖各省的一部分地方。

李厚生到徐州不久，即同平津同学会的同志商量，仿照武汉青年救国团组织的办法，成立了第五战区青年救国团。一九三八年二月在徐州开了成立大会，李厚生任五战区青年救国团总负责人，随即他带领总部的同志在苏、鲁、豫、皖的二十多个有党组织的县成立了分团。

司令长官李宗仁政治上比较开明，抗日态度积极，青年救国团在五战区是合法的抗日组织。这期间，李厚生参加过李宗仁主持的抗日团体的工作会议。

一九三八年三月，一篇署名“李锐”的讲战区青年问题的文章，在武汉《战时青年报》上刊登，这是李锐第一次使用这个名字。

台儿庄战役胜利之后，徐州很快变成了前线。国民党军队大撤退之际，李锐奉命率领青救团的三四十人到东北军于学忠部队组建战地工作团。这是李锐参加革命以后惟一的一次投笔从戎。为时三天。

突围中，部队被打散，李锐只身来到淮阴，找到淮阴抗日组织的负责人吴觉。

李锐是在前一段时间负责五战区青年救国团工作时认识吴觉的。此时吴觉正在利用他的家庭与国民党上层人士的各种关系以及合法的抗日团体的地位，团结苏北一带的进步人士，酝酿成立地方抗日武装。

李锐的到来使吴觉十分高兴。国民党淮阴县长请吴觉等各方面的地方要人吃饭，吴觉要李锐同去，以壮他们这一方的声势。后来吴觉在回忆这次宴会时写道：

> 同年夏,国民党江苏省当局要淮阴县长胡海泉出面请我们吃饭,同时向他们省方要人,如李岐鸣等,想利用吃饭举行一次交换意见。主要想在对统一战线认识方面求得一致意见。我们参加做客吃饭者,是我及宋、谢三人,另外还有李锐同志,因他曾听了党内关于统一战线的重要报告。我们准备座谈时以李锐同志为主发言……在宴后开始座谈的时候,国民党人开了话题后,即由李锐同志发表了长篇意见。李的一席话说得很是生动,说得国民党人哑口无声,而不敢继续发言了。

这次宴会以后,吴觉十分想留李锐在淮阴工作,但李锐还是想先和党取得联系,一方面当初他是受了党的委托带队突围的,对此需要有个交代;另一方面他想请示一下组织,是否同意他留在淮阴。

于是李锐来到附近的涟水东北军五十七师常恩多师长处,他知道这个部队中有党的组织。但是由于国民党政训处对这支西安事变中捉蒋介石的部队监视甚严,连师长看进步书刊都躲在帐子里偷看,李锐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为了继续寻找党的关系,在吴觉的帮助下,李锐化装从苏北乘船到上海,从上海到香港,再从香港到广州,最后回到武汉。

此时中共长江局正在武汉。王明任长江局书记,周恩来、博古任副书记。长江局将李锐派往湖南省委组织部负责青年工作。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报《观察日报》编辑部就在湖南省委隔壁,黎澍任该报总编辑,李锐便在这段时间里结识了这位党内的饱学之士。

恋爱、结婚、共赴延安

抗战爆发后,范元甄也离开学校参加了武汉青年救国团。范

出身于官僚资本家庭，在学校，她受到何伟等进步老师的影响，成为抗日团体中的活跃分子。她最出色的一次表现，是在一九三八年为了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世界青联派代表团来中国，在武汉各界召开的欢迎世界青联大会上，十七岁的范元甄代表中国青年致词。那番精彩的即席讲话，显示了她出众的才华，给出席会议的中共中央领导和各界人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李锐回忆：那天王明对范元甄的发言和朝气蓬勃的风采特别赞赏，说："这种人应该是共产党员。"事后才知道，范元甄已经是共产党员了。

武汉沦陷前夕，大批进步人士和团体纷纷撤到长沙。李锐整日负责接待和安排他们的生活，工作十分繁忙。范元甄担任了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所属抗战演剧九队党支部书记，这时也来到长沙。她和李锐本来在武汉秘密学联时就很熟。在长沙这段时间的接触中，两人感情进一步发展。

一九三九年七八月间，李锐到重庆参加南方局(原长江局)青年工作会议。会后和范元甄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结了婚。此时范元甄已是重庆《新华日报》记者。对于他们的婚事，小妹在《我有这样一个母亲》一文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 那天，我父亲说叶剑英莫名地兴奋，跑上跑下地给他们照相。妈妈后来告诉我，史良曾为她惋惜："结婚太早了！"在我懂事后，母亲曾反复多次地向我提到此话，永远地后悔自己年轻时的选择，好像毁了她的一生。

这年年底国民党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大肆迫害、逮捕共产党员和爱国民主人士。为了保存力量，中共把一大批青年干部送到延安，于光远、胡绩伟以及李锐夫妇，都是在这个时期先后到达他们日夜向往的"革命圣地"的。

第三节　五味俱全的延安六年

宣传科长

李锐和范元甄到达延安的具体时间是一九三九年的最后一天。这一年,李锐二十二岁,范元甄十八岁。

中共中央一九三五年从江西长征到这里,这时不仅早已恢复了元气,而且由于全国向往真理、追求光明的人士源源到来,力量在迅速壮大。此时,聚集在延安的革命者约五万人,使这里成为全国培养、储存革命干部的后方基地。

从《龙胆紫集》“延安杂忆”“青春歌”等几首诗里,可以看出李锐初到延安时的愉快心情:

延安色彩最单纯,
黄土蓝天间白云;
莫道都穿粗布服,
称呼同志一家人。

马札随身即会场,
油灯一盏半窑光,
惜怜破布草鞋料,
小米金黄土豆香。

回忆延安昨日情,
偷闲寻乐正妙龄。
下河洗衣风已软,

围炉煮枣雪初晴。
草鞋斗艳堪圆舞，
木屐如飞好滑冰。
远足开荒野餐会，
每逢周末涉水迎。

其实，延安的物质条件极为艰苦，一年到头吃的就是小米、土豆；衣服是三年一身棉，一年一身单。然而，在延安青年们炽热的情感中，延安是革命的灯塔，抗日的中坚。李锐来到这里，自然会有一种找到了归宿的幸福感。这是当年许多投奔延安的人都曾有过的最纯洁的情感。这情感使他们热情奔放，苦中作乐！李锐的幸福则比别的青年更多一层：他和范元甄是人人羡慕的恩爱夫妻。王怀安曾回忆说："那真是郎才女貌！"又说："不！是郎、女全都才貌双全！在延安时，说到他俩，没有不称赞的！"

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是中共中央的直属机构，与它平行的单位还有职工运动委员会、妇女工作委员会等等，作用相当于后来的"共青团中央"。

当时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兼任中央青委书记，在他离任以后，又由中央宣传部部长凯丰兼任这个职务。副书记是冯文彬。李昌、胡乔木、黄华、刘光、宋一平、蒋南翔都是中央青委委员。

中央青委下设组织部，部长李昌；干部部，部长黄华；宣传部，部长胡乔木。宣传部下面有宣传科和编辑科。编辑科实际上就是《中国青年》杂志编辑部，许立群、韦君宜、萧平都是这个杂志的编辑。

李锐一到延安就被胡乔木留在宣传科任科长。范元甄则进了马列学院。著名的经济学家童大林、"文革"前上海宣传部部长杨永直、前新华社副社长陈适五都曾是宣传科的科员。

当时，从大后方来延安的青年大部分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

像于光远、李锐、武衡、韦君宜等这样直接留在中央青委等机关工作的是少数。

李锐在中央青委宣传科工作了一年零九个月。

轰动延安的《轻骑队》

到中央青委一年多以后，李锐和宣传科、编辑科的青年创办了在延安轰动一时的墙报《轻骑队》。凡是四十年代初在延安生活过的人，不论是高级领导还是普通干部，都不会忘记《轻骑队》。一个墙报之所以有这样的影响，是因为它的内容不但反映了延安的“光明面”，更涉及到延安的“阴暗面”。

说起创办《轻骑队》的起因，童大林讲得最有意思：

> 说实在的，要光是像我这样一些初中学生，就闹腾不起这个事儿来。因为我们都比较老实、听话，领导让怎么就怎么。这些大后方的大学生一来，中央青委机关立刻成了当时延安青年中文化层次最高、最活跃的一个单位。这些人原先都是各省抗日青年团体的头头，能说、能写、又会组织活动。
>
> 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对延安好些事情看不惯，每天晚饭后，就聚在窑洞前聊天儿，谈的尽是这类话题。于是有人提议：办个墙报，将这些意见写上去。大家赞成，事情就是这么定的。

如果说，这些从国民党统治区来的青年对于生活的艰苦以及来自敌人和战争的危险是做了比较充分的估计，那么对于革命队伍内部的种种问题，他们却是太缺乏思想准备了。在他们的心目中，延安既然是革命圣地，就应是处处平等、自由、民主的典范。一

旦发现现实生活并没有理想中那般纯洁,便感到不能容忍,便要拿起笔来,向他们看不惯的一切宣战。

几乎没有经过任何争论,这个墙报就定名为《轻骑队》。

《轻骑队》是前苏联共青团在工厂里开展类似"青年监督岗"活动时的一个组织名称。另外,三十年代中央苏区曾有一个名为《青年实话》的杂志,其中有一专门登批评文章的栏目也叫"轻骑队"。

没有负担,无所顾忌,敢打敢冲,勇往直前,是轻骑队的战斗风格。难怪具有批评特色的青年组织或刊物栏目等都愿以它命名。

中央青委的几位领导相当慎重,担心出这样的墙报,万一批评不当,会惹出事来。但青年们的热情一定要保护,于是决定先出一期看看。不敢让他们贴出去,就贴在窑洞里,把中宣部部长凯丰等几位领导都请来"审查"。大概是因为第一期内容比较温和,"审查"顺利通过。皆大欢喜之际,众人决定:贴出去!

这些思想敏锐、眼里揉不得沙子的青年人真是敢想敢干,什么人都敢碰、什么看不惯的都敢批。李锐当然是积极分子之一。当年他发表在《轻骑队》上的文章,今天还想得起来的有两篇:一篇题目叫做《想当年》,讽刺某些老干部没有新建树,只一味摆老资格。文中虽然没有点名,但所举的例子:"想当年我在苏联如何如何","想当年我与高尔基如何如何"……人们一看便知是指萧三。萧三是毛泽东一辈的革命家、著名诗人,曾任"左联"驻苏联代表。李锐等一些青年却瞧不起他发表在《解放日报》上的几首白话诗,觉得太缺少"诗味儿",萧三似乎一时还拿不出更尽如人意的诗作,言谈中只好常常"想当年"。

一天傍晚,在延河边散步时,李富春遇见李锐,笑指他说:"李锐,你好尖锐,挖苦萧三嘛!"

五年以后李锐出任中央冀热辽分局机关报社社长,曾在一篇日记中写道:"想起当年在轻骑队写讽刺萧三的杂文,多么幼稚、偏激!"

另一篇是李锐在调到《解放日报》以后给《轻骑队》的投稿。文中批评一种对上谄媚、对下骄横的领导作风，矛头所指，是他的上司，《解放日报》三版主编。耿直一直是李锐性格中一个很突出的特点，无论利害关系如何，他看不惯的就要讲。从青年到老年，尽管受了那么多挫折，这一性格始终不变。

《轻骑队》批评萧军的稿子不少，带头的是许立群。青年们不喜欢他"老子天下第一"的作派，更不喜欢他动不动就以"鲁迅弟子"自居。

韦君宜到"泽东青年干部学校"以后给《轻骑队》投稿的题目是《论师道》。文中说，老师就要比学生高明，而"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某些教师的水平却不能令人满意。

陈企霞的长诗《丘比特之剑》，讽刺了当时延安女青年的择偶标准："王明的口才，博古的理论"，非此不嫁。四十年代初去延安的青年男女比例为十六比一，女青年们找对象眼睛都盯着大官儿、"大知识分子"；工农干部和"小知识分子"就被冷落了。

《轻骑队》上登载的，也不都是批评文章，比如胡乔木的《纪念白求恩》，就发表在《轻骑队》的第一期上。许立群的《反对党八股》，后来备受毛泽东赞赏。童大林在他的大作中要大家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节约每一张纸，每一个信封……这使李富春大为高兴，因为他是延安的"总管"，这类事归他负责。

《轻骑队》每两周一期，每期七八篇，稿源极为丰富。稿件都由童大林用毛笔抄成大字报，然后精心安排，配上各种字体的标题，再加上华君武、蔡若虹、张谔的漫画，可谓图文并茂。

《轻骑队》轰动了延安，每到周末，那块矗立在延安交通要道"大砭沟"处的三四公尺见方的大木牌前便热闹非凡。其时，胡乔木已调任毛泽东秘书，但每期《轻骑队》一贴出，他必定专程过延河来看。鲁艺的学员和其他单位大大小小的干部们，更是纷纷从七八里以外甚至更远的地方赶来，一睹为快。

《轻骑队》的影响使胡乔木想到应该让毛泽东也看看。当然主席工作繁忙很难有时间过延河来看墙报。胡乔木便让童大林将每期《轻骑队》油印。毛泽东不仅自己期期都看,还叫他的警卫员也看。毛泽东对《轻骑队》的文风尤其满意。后来他在作为整风文件之一的《反对党八股》一文中写道:

> 要使革命精神获得发展,必须抛弃党八股,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主义的文风。这种文风,早已存在,但尚未充实,尚未得到普遍发展。

据当年读过毛泽东的《反对党八股》原文的于光远说:"早已存在"所指的就是《轻骑队》,原文中对此有明确的说明。毛泽东把《轻骑队》的文风誉为"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主义的文风",评价之高,实属罕见。

毛泽东的称赞使《轻骑队》的队员备受鼓舞,过了一阵子,胡乔木又想把它搞成铅印。"总管"李富春一口答应供应纸张。印刷这一关却被《解放日报》社社长博古卡住。

博古并不反对出《轻骑队》。他对童大林说,不仅在大砭沟口,还可以在"新市场"和延安其他几个热闹的地方多出几块。但形式只能限于墙报,搞成铅印,就容易传出去。不久前《轻骑队》上的一篇《龙生龙,风生风》就被国民党的一个叫做《良心话》的杂志转载,他们利用这些材料把延安说得一团糟。博古还批评《轻骑队》有"平均主义"的倾向。

既然博古不同意,铅印只能作罢。但对于博古的批评在这里是需要作些注释的:

《龙生龙,风生风》一文的作者是《中国青年》杂志的编辑、《轻骑队》第一任主编萧平。萧平是和田家英一起从四川来的,也是一位才华出众的青年,可惜一九四一年赴前线途中,因同伴枪走火,不幸

牺牲。这是一篇相当厉害的批评稿。当时延安的牛奶极少,除供应高级干部以外,只有幼儿园才见得到。而幼儿园里牛奶数量有限,便只给高级干部的孩子喝。《龙生龙,凤生凤》批评的就是这件事。

"闯了祸"的另一篇稿是《论离婚》。作者是一位少数民族干部,稿子经几人修改刊出。内容是批评延安某些领导在婚姻问题上喜新厌旧换偶频繁。据说当时从前线回来的某将军看了此文后拍着桌子大骂:这些小资产阶级搞什么名堂!

还有一篇较有名的受到批评的批评稿,讲的是高岗窑洞的窗户纸。那时延安的窑洞当然没有玻璃,窗户是用纸糊起来的。像高岗等高级干部所住窑洞的窗户纸,就比较白而亮,普通干部窑洞的糊窗纸则较黑而粗。作者认为不必在这样的生活细节中都体现出等级差别。所以,对"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指责绝非王实味的《野百合花》首创,它在《轻骑队》上早已频频曝光。

问题还不止这些。李锐发表在《轻骑队》上的文章虽没惹麻烦,可有一件事他却脱不掉干系。

适逢《轻骑队》创办一周年,于是向延安各单位和首长们致函"征求意见"。实际上大家心里都明白,此举收获的"赞扬"肯定比"意见"多得多,这样可以扩大影响。果然不出所料:赞扬、勉励、支持的回信雪片般飞来。已经调到《解放日报》国内部的李锐便让老部下、《轻骑队》第三任主编童大林就此写一篇稿,登在《解放日报》上。童大林在文章中将回信人的名单一一列出,不知怎么就把总司令朱德和王实味的名字排在了一起①。

这时,王实味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已遭批判,并被说成是"托派"分子。可王实味还是热情地给他曾在《野百合花》中百般"袒护"的、和他的观点多有近似的青年们回了信。王实味在《野百合花》中写道:

---

① 见一九四二年四月十日《解放日报》第二版。

青年的可贵，在于他们纯洁、敏感、热情、勇敢，他们充满着生命的新锐的力。别人没有感觉的黑暗，他们先感觉到；别人没有看到的肮脏，他们先看到；别人不愿说不敢说的话，他们大胆地说。因此，他们的意见多些，但不见得是"牢骚"，他们的话或许说得不够四平八稳，但也不见得就是"叫嚷"。我们应该从这些所谓"牢骚"、"叫嚷"和"不安"的现象中，去探求那产生这些现象的问题的本质，合理地消除这些现象的根源。说延安比"外面"好得多，教导青年不发"牢骚"；说延安的黑暗方面只是"些微拂意的事"，"算不得什么"，这丝毫不能解决问题。是的，延安比"外面"好得多，但延安可能而且必须更好一点。

当然，青年常表现不冷静、不沉着。这似乎是《碰壁》作者的主题。但青年如果真个个都是"少年老成"起来，那世界该有多寂寞呀！其实延安青年已经够老成了，前文所引那两位女同志的"牢骚"便是在昏暗中用低沉的声音发出的。我们不应该讨厌这种"牢骚"，而且应该把它当做镜子照一照自己。

由此可见，王实味给《轻骑队》的回信，实属情所难禁。

可他的热心却害苦了李锐和童大林，领导把"排名"事件看成是一个政治错误。说来也冤枉，因为尽管王实味所在的马列学院里在批王实味，外面的人却并不知情。胡乔木责成童大林写了个"检讨"式的声明：此文"系童大林同志发出，未经编委会全体知悉"。并表示："轻骑队曾检讨一年来工作，认为编辑方针错误，并

决定加以改变。”[1] 其实《轻骑队》根本就没有什么“编委会”。

一个星期天，青年俱乐部里挤满了人。大家从《轻骑队》贴出的海报中得知，童大林他们要做检查。整风运动已经开展了好几个月，“检查”在各单位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轻骑队》影响大，所以人们对此表现出更多的关切。

会上，已经调到政治研究室的许立群以《轻骑队》第二任主编的身份，作了长篇检查。胡乔木让童大林将原文压缩，准备登报，并将检查拿给毛泽东过目，毛泽东亲自给这篇检查加了标题：《我们的自我批评》，然后发表在《解放日报》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三日第四版上。

毛泽东的态度，使正在拼命追查《轻骑队》政治背景的康生有点泄气。

然后，中宣部部长凯丰代表上级组织，找中央青委的蒋南翔和延安市青联正、副主席章泽、童大林以及李锐、许立群等人作了两次谈话，批评他们不该在革命如此紧张、困难的时候尽讲些饮食男女，小资产阶级的清谈。

半个世纪以后，当年的“骑士”仍然健在的都已年逾古稀。人们重新审视这段历史，不少人觉得，应该给《轻骑队》平反。如果人们了解到这样一个细节，或许会多一层感慨：

据童大林回忆，那是在《轻骑队》停刊一段时间以后，一天傍晚，人们在延河边散步，冯文彬把童大林叫到一边，悄悄告诉他：前些日子，毛泽东忽然问：《轻骑队》怎么不出了？冯汇报了《轻骑队》在整风中的情况。毛泽东似乎不大以为然：让他们把屁股转过来就行了嘛！

大概是这种“分寸”较难把握，或是青年们经过整风，已学会了用另一种思想方法来解释现实中的缺点。反正已经停刊，而毛泽

① 见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三日《解放日报》第二版。

东还想再看的《轻骑队》再也没办起来。

还有一事值得一提:当年博古阻止了《轻骑队》的铅印,那些理由至今看来也不能说没有道理。可惜正是这一决定,使《轻骑队》的文稿几乎一篇也没留下来——一九四六年撤离延安时,那些印给毛泽东看的油印件都烧掉了。而杂文界的老前辈曾彦修至今认为:从延安时期算起,最好的杂文当属《轻骑队》。

清凉山文字生涯

延安的清凉山坐落在延河以北,与中共中央所在地宝塔山隔水相望,是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摇篮。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时期,《解放日报》社、新华通讯社都设在这里。《解放日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当时的地位排在新华通讯社之前。博古任社长,陆定一为总编辑。编辑部里连校对在内共四五十人。设国际部、国内部、评论部、文艺部、记者部、资料室六个部门,一个部门一所窑洞。

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四岁的李锐由中央青委调到《解放日报》社,开始了他的"清凉山文字生涯"。最初在国内部当编辑,做日班也做夜班。一九四二年调到评论部,负责编写敌后根据地方面的文章和社论。

当年和他同在一个窑洞里当编辑的余宗彦回忆说:

> 李锐来到不久,大家就感到他很有才华,政治、经济、军事哪方面的文章都能写,而且都能写得很出色。他总是能从大量的报刊资料中迅速发现写社论的题目,文章出手极快。那时重要文章和社论主席都要亲自过目,亲自修改,李锐的文章就多次被领导拿去给主席看,并受到主席的赞扬。

当时工作中遇到的一个大问题是：如何使对解放区群众运动的报道具有指导性。新华社每天都有许多反映这方面情况的稿子，一直是来什么发什么，读者看不清眉目，在《解放日报》的版面上，最不受欢迎的就是这类报道。

为了改变这一情况，李锐再次发挥了他善于驾驭材料、综合分析的特长：将某一方面的资料积累起来，编成综合性报道，使读者能清晰地了解问题的全貌。加上分析、评论，阅读效果就好得多。评论部负责人高扬文在他的文章中回忆道：

> 当时李锐同志是这方面的主力，写了许多带有指导性的综合报道和评论。赵守一、余宗彦、赵棣生、田工等同志也编写过一些出色的报道。这就把过去的一种枯燥无味的编辑工作，变成一种有意义、有吸引力的工作，大家不再为编写这种稿件而苦恼了，读者也愿意看这方面的新闻报道和评论了。

一九四三年以前，《解放日报》没有自己的军事评论，除了大的军事报道，平常的战斗消息很少引人注意。但是，随着抗日战争的节节胜利，急需有这方面的报道和评论，让群众了解战场形势，了解战争进程，以坚定全民抗战的信心，鼓舞士气。

根据党报宣传的这一需要，李锐认真研究军事形势的发展，注意向来到延安的彭德怀、聂荣臻、彭真、朱瑞等高级军事指挥家采访，很快成为编辑部里能写军事评论的人。他的论述山东战场形势的社论《山东的捷报》被毛泽东在批语中称赞道："此文写得生动而有内容。"抗战胜利前夕，李锐还写出《山东去年的军事胜利》、《解放区战场三个月来的胜利形势》、《解放区收复城市概况》等一批较有预见性的军事文章。

读者开始注意到《解放日报》上发表的军事报道和军事评论很

有味道，以为《解放日报》增加了军事评论员。一次，陆定一告诉高扬文：有人问我《解放日报》的军事评论写得不错，从哪里请来的评论家？

在延安的文字生涯中，李锐最佩服两个人：一个是胡乔木，一个是陆定一，他们都很会改文章，自己的文章也写得好。

整风之初

一九四二年是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最艰苦的一年，日军把侵华的重点从国民党战场转向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国民党也想乘机消灭共产党的力量，从而不顾抗日大局，搞军事摩擦，停发八路军的军饷，并对各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这使得这些地方的物质生活遇到极大困难，革命队伍中间也出现了一些思想问题。

为了坚持抗日，走出困境，毛泽东在延安开展了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

一九四二年一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始整顿《解放日报》。毛泽东认为：《解放日报》是一张“不完全的党报”，有时不能很好地贯彻党中央的意图，因此解决党报不能闹独立性、不能有自由主义这一重大问题，是中央开展整风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陆定一传达中央的意见，说报纸要百分之百地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意见，不能打折扣。博古在检查时也强调：“一句话也不能闹独立性，一个字也不能闹独立性。”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强调党报要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与党完全保持一致不仅十分重要，而且有很大的积极作用。因为党正处在正确路线占统治地位的时期。但是这种“强调”似乎也为日后的“舆论一律”打下了基础，以致党的路线出现错误时，党报的作用总是推波助澜。

应该说，李锐一生中这八年的新闻工作生涯是幸运的，在这段

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所制定的路线一直是引导人民走向胜利的路线。在这个前提下，新闻工作者的党性、纪律性都为保证这条路线的贯彻实施，推动革命事业的发展起着积极作用；在这个前提下，新闻工作者才不会为遵守这"两性"欠下"良心债"。在中国，不少很有思想、很有才华的新闻界老前辈，就没有李锐这种幸运了。

这期间，李锐的一篇社论《开展吴满有运动》①，对推动边区的大生产运动产生了很大影响。

吴满有是逃荒到边区的难民，初到延安，穷得卖过女儿，饿得啃过树皮。分得土地以后，他勤劳发家，丰衣足食，成了劳动致富的典型。记者莫艾写了一系列有关他的报道，李锐的社论就是配合这些报道而写的。

李锐把社论的重点放在"研究一下吴满有成功的历史"。他先引用吴满有自己的话"我没有什么秘诀，就是肯劳动"，然后将吴满有的经验加以系统总结：

> 吴满有起身比谁都早，睡觉比谁都晚，天还没有亮，他就喂牛上山，天黑了，才从地里回来；冬天比较闲，就勤于捡粪，庄稼出了苗，有的人懒上山，不除草，或者最多锄一次，他却至少锄两次，乃至三次。他这种勤快的精神，已经发生了很大影响。吴满有说："全村的人和全乡的人的眼睛，现在都向着我，我们一家人鸡叫起身的习惯，已变作吴村人的习惯了，庄上的二流子已经没有了。"
>
> 吴满有不仅勤快，肯劳动，而且他的庄稼经营得法。熟地深耕，多施肥……他的谷子除草三次，糜子锄两次；大块土疙瘩，都要打得粉碎，毫不马虎。耕地下种都很适时，不早也不晚……他又会经营副业，牛羊养得最好，经

① 载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一日《解放日报》。

常对拦羊娃讲一些畜牧知识。比如羊圈潮湿一块就垫好一块;要让牲口吃饱草,喝饱水;草要铡得短,筛得净,不让有沙土和鸡毛;牲口外放不让在潮湿地躺卧,免得生病。牛羊养得好,积肥就比人家多。除发展畜牧之外,他还广种果树,种柳条编筐子。今年还准备试种一亩棉花……

这篇社论文风朴实,言之有物,通俗平易,就是大字不识的农民,也百分之百地能听懂,而且感到亲切。而“报纸要密切联系群众”,正是报社开展整风运动要达到的目的之一。

社论还写道,吴满有雇有两个长工和拦羊娃,农忙时还雇短工,但正如社论所指出的:他是党员、抗属、乡上的优抗主任。公粮交得最多,又乐于助人,被评为公民模范。所以社论号召:“各地政府应大量发展吴满有式的劳动英雄,边区农民要向吴满有看齐!”“他的方向,就是边区全体农民的方向。”

这篇社论也引起一些人的异议,有人来信责问:可不可以不管其经营性质,把富农的方向(吴满有的方向)当做全边区人民的方向?

《解放日报》以“本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了长篇复信,明确指出:“当前需要发展富农经济,同时要保护雇农,这同政治上在党内反对资产阶级思想是两回事。吴满有是新式富农,又是党员,同旧式富农有本质区别,是‘革命的富农’。对他们的经济活动不应禁止,而且要反对党内的民粹主义思想以及各种各样安于贫穷,以贫穷为光荣的糊涂思想残余。”

这封复信是中央党务研究室(王若飞任主任)撰写的,它为在边区开展吴满有运动,推动大生产运动进一步扫除了思想障碍。

然而,李锐的社论和这封复信的意义还不仅如此,它们都涉及到怎样看待农村阶级关系变化的问题。正是在这个我们党后来屡

走弯路、屡犯错误的问题上，李锐和他的支持者们四十年代初就已达到了我们今天的认识水平。

关于农村经济和阶级关系的变化，一直是李锐新闻工作生涯中比较关注的问题。抗战胜利前夕，他在《农民在解放中——解放区农村阶级关系的变化》(原载《解放日报》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二日)一文中指出：

> 在解放区，不是两极(贫雇农、地主)分化大，而是两极缩小，中间(中农)扩大。这是解放区正确执行了中共的土地政策和其他各种财经政策与社会政策的结果……

他认为：

> 在中国共产党现行系列政策领导之下，中农贫农以及富农的经济，自会得到更顺利的发展，无疑将为我们带来一个新式的繁荣而富足的农村。

这篇署名李候森的文章是根据北岳、太行等五个抗日根据地党委的调查报告提供的情况写成的。作者不仅看到了农村中阶级状况的变化，而且对这种变化作出了肯定的评价。认为这种变化的结果对于促进经济的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但他的预见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实现，因为党并没有按“正确的政策”一直走下去。新中国成立十四年以后，毛泽东仍然认为，“依靠贫农、下中农是党要长期实行的阶级路线。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一直到进入共产主义以前，我们要在农村中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要发展农业生产，不依靠他们，依靠谁呢?”①

---

① 《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一九六三年五月。

不论外部条件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一味认为：越穷越革命，越穷越可靠。诸如此类的理论，导致中国农村经历了几十年"穷过渡"，导致了一大批"王秋赦"式的人物走运，腾达。

或许是命运的巧合，当年李锐就非常关注水利建设事业，几次撰写这方面的社论。一次，他从众多报刊中整理出一份"解放区水利建设的资料"，然后配写社论《敌后解放区的水利事业》。由于这篇社论以及随后他写的《冀鲁豫边区的剿蝗斗争》等文章的影响，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人民战争"这一节中，写下这样一段话：

> 在中国解放区，敌人的摧残是异常严重的；水、旱、虫灾也时常发生。但是解放区民主政府领导全体人民，有组织地克服了和正在克服着各种困难，灭蝗、治水、救灾的伟大群众运动，收到了史无前例的效果，使抗日战争能够长期地坚持下去。

写完上述那篇关于水利的文章，李锐大病了一场，高烧不退，住院四十天。后来他回忆说："这场病同出狱后过度劳累，生活又遭不幸有关。"

李锐因何入狱，又是什么样的"不幸"把他击倒在病床上了呢？

在抢救运动中入狱

一九四二年整风运动转入对干部的审查。

几年前同王明一起从共产国际回来的康生，此时不仅是中央社会部兼情报部部长，而且担任了干部审查委员会的主任。这个王明路线的拥护者和支持者在这场以"肃清王明'左'倾教条主义"为宗旨的整风运动中，不仅没有受到丝毫怀疑，而且竟能爬上领导

运动的副手的地位，不能说不是一个奇迹。据说这是因为他能在王明垮台的过程中迅速转向，将王明踩在脚下，从而取得了毛泽东的信任。他除了领导整个运动以外，还具体负责中央机关的整风。在这方面他的头衔是中直机关学委副主任(主任毛泽东)。延安几万干部的命运就掌握在这样一个人手中。当康生搬出从斯大林那里学来的、在共产党内部进行清洗的一套做法时，一场大悲剧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间，康生曾向中共中央报告，称中央社会部破获了一起重要的敌特案件，即“张克勤案件”。张克勤，当时十九岁，一九三七年底在甘肃加入中共地下组织，后来经地下党甘肃省工作委员会和林伯渠同意，调到延安西北公学学习。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康生在西北公学搞审干试点，以张父在兰州被敌人逮捕自首和张对领导提意见偏激等原因，将张看管起来，进行审讯。在严重逼供的情况下，张被迫编了一套假口供，说国民党对共产党在白区的地下组织实行“红旗政策”(即敌人派遣特务、叛徒，打入共产党内部，充当内奸，进行破坏活动的政策)，甘肃地下党就是“红旗党”，而且说他本人就是被发展的一个特务。

康生获得这份笔供材料后，不问真伪，认为这是审干工作的一大突破。一面抄送中央领导，一面以此为资本，到处宣扬说，“红旗政策”是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对共产党实行内奸政策的一个新策略，并进而得出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靠不住，必须“重新估计”的错误结论。随即又开展大规模的追查。

“审干”开始不久，李锐的一个大学同学因四川地下党一案受审查之后屈打成招，承认自己是特务，并诬告李锐是他的“上级”。

一九四三年四月，李锐被关进延安的监狱——保安处。

七月，康生在中央大礼堂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夸大敌情，认为“特务如麻”。康生号召：现在是紧急军事动员时期。无论是自觉为敌人服务，还是不自觉为敌人服务，我们共产

党中央号召你们赶快觉悟吧！不要再为敌人的第五纵队服务了！失掉这个最宝贵的时机，将永远陷于万劫不复的境地。

康生的这个被称为"恐怖信号"的报告，把延安及各抗日根据地的"反奸"斗争推向了高潮。就是从这个时候起，人们开始把整风运动中的"审干"阶段，又叫做"抢救运动"。从城镇到乡村，各个单位，直至监狱大搞"坦白检举"。几个月的时间里，清凉山解放日报社系统百分之九十五的人都成了"特务"，以致后来抓出"特务"、斗争"特务"的人也都是"特务"。

无论多么荒唐的检举，都要求被检举者坦白承认，否则就是"拒绝党的挽救"。与李锐同在评论部工作的余宗彦，在给朋友的信中把与他相好的三个女同学戏称为"三角形"。后来因为又加入了一个女同学，便称她们为"四边形"。审干中，不知怎么信就落到了保安处手里，于是余宗彦被反复追查："三角形"是什么组织？"四边形"又是什么组织？余宗彦当然不承认，最后被送至"劳改队"。而更多的人却在昼夜追逼斗争的高压下，痛哭流涕地承认了自己是"特务"。清凉山解放日报系统的百分之九十五的"特务"绝大多数就是这样搞出来的。

若干年后，李锐写了一份在秦城监狱八年的材料，其中有"在延安保安处受审情况"：

> (一)由于有人诬告等原因，一九四三年四月至一九四四年六月，我被关在延安保安处受审查。可记之事如下：
>
> 1.严重的刑讯，搞逼供信。我受的刑罚还是比较轻的：五天五夜不准睡觉，不准合一下眼皮(有哨兵日夜持短枪监守，威胁)，还要逼着写材料，不断受审。据说有这样一种理论，可能是苏联传来的：如此日夜紧张，可使受审者精神疲劳，终于说出真话。这种残酷的"疲劳战术"，

听说有长达十五天十五夜的，姓名已经忘记了，千真万确。受审时，通常是长时间立正站着（以致腿肿）和坐矮板凳；有时加戴手铐，时间长短不定。我手上的伤痕，几年才消去。也挨过耳光之类。

听到的有各种各样刑罚：老虎凳；鞭打；长时间戴手铐；绑在十字架上挨鞭抽（周兴即亲自这样打人）；假枪毙；等等。当时是几个人住在一个窑洞，这种情况容易交流。第一次见到林里夫时（东北人，因上海党受破坏，一九三八年即关入狱中的“老号”），他伸出伤痕累累的双手给我看，说道：“这能解决问题吗？”

魏伯跳崖受伤之后，长期戴上脚镣，因而双脚残伤。赵一峰长期戴脚镣，当时即神经失常；听说现在还不能提往事，一提就神经不正常。

还有饿饭的办法，专设“特字号”，将“顽固分子”集中，每餐只给半碗饭，曾饿过一个多月。

2. 发动群众搞逼供信假坦白（一九四三年夏季才开始，这是当时延安的“坦白运动”发展到监狱来的），开群众大会围斗也打人；树假坦白标兵，搞乱思想；严重的诱供。结果增加甄别的困难。

3. 在狱中见过钱维人（已去世）和蔡子伟。这两人在延安出版的《共产党人》上早已宣布枪毙了。蒋齐生（原在新华社），只是由于一个同姓名的“特嫌”，而误关了八年。还见到多年关成白毛女的人：满头白发的青年。

4. 窑洞卫生条件很差。铺草睡在地下，因而关节炎普遍。

5. 我是一九四四年六月有幸最先出狱的。其他绝大部分人都是日本投降后才放出来。“新号”、“老号”一起总有三四百人，或者还多。

(二)延安的“抢救运动”没有认真作过总结,没有写过一个文件,吸取这次经验教训。

“七大”开会时,毛主席曾为此对受害者赔礼道歉。对这个运动负主要责任的康生,反滑过去了。延安“抢救运动”教训极多:对革命形势估计错误;夸大敌人能量;尤其是对整个中国知识分子左翼的不信任;导致对整个地下党的否定;逼供信的恶果,多少人自杀、得神经病;等等。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肃反工作(打击 AB 团——引者注),使苏区党和红军受到极大损失。延安审干运动开始,毛主席制定了九条方针,但康生领导的保卫部门并没有真正执行。每一个当时被逮捕的所谓“顽固不化”分子,都是经过康生签字的。

(三)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党的保卫工作特别是延安审干运动,我认为仍有总结的必要。

一九五〇年我在长沙时,公安厅的负责同志曾将唐纵的全部日记(从成立蓝衣社直到离开大陆)给我看了。唐是抗战时期蒋介石侍从室负责特务工作的组长,后任内政部副部长,去台湾后仍居高位,在国民党军统特务中,是仅次于戴笠的重要人物。日记中的重要东西我曾摘录了一厚本。一九四二年的日记中,记到延安“抢救运动”情况时,我记得他写了这么一句:“可惜我们没有一个内线!”这就清楚说明,康生当年关押了几百个“特务”(除开从边区边境上越境进入被我逮捕的真特务分子外),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知识分子打成“特务”,却没有一个真正潜伏在党内的特务。这是多么大的讽刺和教训。

李锐在押期间,虽然受到种种折磨,却没有牵连过任何人。这在当时是十分难得的。在严重的刑讯和诱供下,乱咬别人已普遍

到不被当做一回事儿(二三十年后的另一场“浩劫”抓“五一六”分子,也出现过这种局面),不少人不仅承认了自己是“特务”,甚至还在追逼审问中交代了自己的“特务上级”、“特务联络人”、“特务发展对象”等等,结果雪球越滚越大,“特务”越抓越多。

一天,《解放日报》社社长博古碰到李锐的小学同学黄乃。黄乃一九三八年从日本留学回国来到延安,此时在总政敌工部(对敌工作部)工作。《解放日报》有一个叫做《敌情》的副刊,即由敌工部日本问题研究所编,所以他常到报社。博古知道李锐和黄乃两家是世交,便向黄乃问起李锐的情况。黄乃虽然说不出多少根据,但他坚信,这个自小一起长大的朋友不会去当“特务”。博古告诉黄乃:“有人咬他”。

相对而言,“抢救运动”中《解放日报》的几位领导还算比较慎重:报社被抓进保安处的人没有一个是他们决定报送的,全是康生的社会部下令抓的。对李锐的问题,他们也一直持保留态度。

为了证明李锐的罪不可赦,康生又造谣说李锐的父亲是被红军所杀,李锐同共产党有“杀父之仇”。幸亏李六如向保安处来调查的人证明:李锐的父亲是一九二二年在长沙病逝的,当时还没有红军!

李锐的亲属中的确有人被红军所杀。那是一九三一年红军打入长寿街时,实行“从肉体上消灭地主”的过左政策,家里男丁早已外逃,留在家中的祖母、婶婶、堂姐、堂兄嫂和侄儿等被强迫迁往江西,路上两个祖母走不动被推下山崖,其余几人一路病饿从江西讨饭辗转到长沙,先后病死在李锐家中。当时李锐正在上中学,家里一下来了许多人住不下,母亲便让他去父亲的朋友家暂住。

对于老家人的死,李锐虽然觉得这是一件很残酷的事,参加革命后,每次向组织谈及此事,他总是坚持“这些亲人死于红军的极左政策”这一看法,但并没有在感情上引起太大的震动。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从小没有和他们一起生活过,感情比较疏远;另一方面,

大革命以来,他在长沙常常听说老家平江红白相杀之事。当时国民党杀害共产党人及其家属,也是非常残忍的。先入为主的同情共产党、同情革命的家教和大革命时期英雄先烈的影响,已在李锐的思想倾向中起了主导作用。

然而,像李锐这样,家里发生如此残酷的事情仍然以民族大义为重,为人民的解放事业投奔光明、投奔革命、投奔共产党的青年,在"审干"中不但得不到信任、嘉许,他们的家庭反而成了他们被怀疑的根据。"审干"中一种非常流行的逻辑是:这样的人不仇恨革命谁仇恨革命?他们不当特务谁当特务?李锐的大学同班同学汤钦训就曾被责问:"你家里又不缺吃又不少穿,你来延安干什么?"言外之意就是说汤到延安来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

这种极左思潮之所以横行一时,除了康生之流别有用心,狭隘的农民意识也使一些工农干部不能理解:知识分子何以会不为私利而仅仅为了信仰、为了真理就能参加革命?

狱中的李锐终于明白"延安色彩"并非"最单纯",他在另一首诗中写道:

悠悠日夜旧山窑,
恨不心肝挖出瞧,
虽说江河曾遇险,
怎知沧海浪涛高。

然而,李锐晚年认为:正是这番坎坷,奠定了他一生反"左"的基础。

一九四四年六月,重庆一个中外记者团要来延安访问,其中有一个国民党报纸的记者是李锐小学的同班同学。周恩来看到李锐反映的这一情况的报告以后,立即吩咐有关部门将李锐提前释放,以便做些统战工作。

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五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作报告时，主动地对“审干”中的错误承担了责任。毛泽东说：这个党校犯了这许多错误，谁人负责？我负责。我是校长嘛！整个延安犯了这许多错误，谁人负责？我负责，我是负责人嘛！毛泽东又说：错误可以给人教训。给人错戴了帽子的同志，以后再给别人戴帽子时，你就要谨慎；被错戴了帽子的同志也得到了一条经验，以后你不要乱给别人戴帽子，因为你自己吃过这个亏，以后要谨慎。有了这两个方面的经验，将来我们到北平、上海、南京去审查干部，做反奸工作，情况就会好得多。最后，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人是革命者，但不是神仙。我们也吃五谷杂粮，也会犯错误。我们的高明之处就在于犯了错误就检讨，就立即改正。今天，我就是特意来向大家检讨错误的，向大家赔个不是，向大家赔个礼。说到这里，毛泽东把手举在帽沿上向大家敬礼，并诙谐地说：你们如果不谅解，我这手就不放下来。会场上报以长时间热烈的鼓掌，毛泽东才把手放下来。

祸不单行

李锐总算结束了一年零三个月的狱中生活。谁知祸不单行，迎接他出狱的，却是生活中又一个重大的不幸！

为了减轻这一不幸造成的打击，李锐一回到报社，就拼命工作。虚弱的身体，过度的劳累，痛苦的心情，使他再也撑不住了。

病床上整日昏昏沉沉的李锐，常常被一个噩梦所折磨：

茫茫的海面上，波涛翻滚，烟雨迷漫。突然，李锐被一阵狂风从一只小船上掀落海中。他向小船拼命呼喊，他在海中苦苦挣扎。正当他最需要从小船上最亲密的伴侣那里获得力量和慰藉的时候，她却在别人的诱惑之下弃船而去。小船倾覆了！而那乘人之危的诱惑者在这场风暴中扮演的，却是负有“抢救”之责的角色。

一个极重感情的人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感情上的打击。后来，李锐和那伴侣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又回到了同一条小船上，然而这梦魇却一直笼罩了他们几十年！

因为事情发生在审干的过程中，所以引起了党的特别重视。群众的反应也十分强烈。中直机关为此专门开了五天大会，谴责这一事件中损人利己的行为。中央机关党委负责人杨尚昆，在会议总结中对当事者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 党为什么要干涉？因为这不是一个私人生活恋爱的问题，一个被党审查而捕走了，一个负责审查他的老婆，自己却在负责审查的时候，利用了这个机会进行个人活动。以党的秘密去讨好自己所追求的目的。是严重的政治错误，玷污审干，目无组织，破坏纪律，有恃无恐。最尖锐的是狂妄的个人主义，明知故犯。

我不知道小妹到底是什么时候知道长辈们这段历史的。她在自己的文章中谈及此事，尖锐直率，无遮无拦：

> 我妈妈受批判后，名声很坏，没人理她。是她主动表示愿意和我爸复婚的。复婚时，她亲手用极工整的蝇头小楷抄写了杨尚昆代表组织对批判大会的总结。这份结论认为：双方都有责任，主要责任在×××。

受害者得到广泛而深切的同情，肇事者则遭到人们的一致谴责。

报社同事为高烧中的李锐输了血，医院里的医生、护士日夜精心看护，李锐终于又站了起来，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并且迎来了他文字生涯的又一个高潮。

第四节　当家才知柴米难

有口皆碑的《群众日报》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朱德总司令连续发布了七道命令，命华北、华中和华南各解放区的人民军队迅速前进，接受日军投降。与此同时，美国也用飞机、军舰、火车帮助国民党把远在西北、西南的军队运到各处抢占战略要地。中共中央预见到占领东北对解放全国的重要意义，于是派遣了两万干部和十万解放军挺进东北。解放日报和新华总社也派出了先遣队。作为中央的先遣，获命主持冀热辽工作的李富春向解放日报要办报的人，博古便派了李锐和范元甄给他。经过一些朋友的劝说，此时，他们已经复婚。李富春交给李锐的任务是：主办《冀热辽日报》。

以热河为中心的冀热辽地区，当时是东北与华北的连结地带，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一九四五年重庆谈判时，蒋介石就提出要热河的承德和察哈尔的张家口。

十月五日，李锐随杨家岭大队从延安出发。经过一个月几乎完全徒步的长途行军，这支队伍于十一月上旬到达热河省府承德。李锐走马上任。最初任中共热河省委机关报《大众日报》社社长，一九四六年一月，该报成为中共冀热辽中央分局机关报，报名改为《冀热辽日报》。一年以后，分局的范围又扩大为冀察热辽四省，报名改为《群众日报》，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至一九四八年二月，李锐一直在这家几经变名的报社任社长，历时两年零四个月。

粗粗接触反映李锐这段经历的材料，原以为这是一段比较"平"的时期，深入挖掘以后，当年该报记者沙星航的一段回忆引起了我的注意：

我到《群众日报》后没有见过李锐同志。一天我偶尔听说我们《群众日报》的前任社长是一名叫李锐的同志担任的,还说他可是办报纸的老行家。《群众日报》报人的资格数他最老了……我为没有机会同他相处而感到惋惜。

一九四八年南下后,我的第一站是进《人民日报》(北平版)编辑部,我国著名记者范长江是这家报纸的总编辑。进北平后的第二天,范长江同志在王府井大街《人民日报》(北平版)社主持了《人民日报》(北平版)首刊会,在谈到我的工作时,范问:"你是沙星航吗?"我说:"是的。"他说:"你就是来自冀察热辽解放区《群众日报》李锐那里吧?"我说:"是的。"他说:"《群众日报》很有些气派和特色。"在谈到我在通联组工作时,他要我按照《群众日报》的办法开展工作。

不久,组织上又调我去北京市委机关报《北平解放报》编辑部工作,我国又一位新闻界老前辈袁勃同志是这家报纸的总编辑。他问我是从冀察热辽的那家《群众日报》来的吧? 我点点头。他说:"就像李锐办报那样干就行了。"编辑部由李千峰同志分管通联组的工作。李千峰同志又一次交代我按照《群众日报》的办法开展通联业务。①

热河报史工作者王殿愧在一份资料中写道:

……该报为当年解放区仅有的几家大报之一。社长

① 《报史通讯》承德群众报报史工作组。

李锐和主要领导人黄钢、廖经天等来自延安《解放日报》编辑部，经理樊允行、应坚，厂长吴克真和后期社长朱九思（前期为副社长），副总编辑郭小川等也都来自延安和敌后根据地，所以该报继承和发扬延安办报传统，成为冀热辽边区报纸学习的榜样。许多知名人士曾为该报撰稿，如李六如、成仿吾、徐懋庸、安波、马洪、骆文、海默等。

原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马洪认为：

《群众日报》的得力阵容在当时解放区报社中并不多见。这是因为一批从延安出发挺进东北去办报、办新华社的老报人，由于战争的影响，一时无法到东北去而被截留在冀热辽解放区，最后又汇集到《群众日报》去了。

从一个编辑、记者，一下负责起一张中央分局机关报，而且在不长的时间里就把它办得在新闻界有口皆碑，李锐是怎样走过这段路程的？如果说，作为一个新闻战线的战斗员——一个出色的编辑、记者、报刊评论员，李锐最突出的特点是具有全局的眼光，宏观的头脑，所以能写出一系列对全局工作有指导意义的文章，那么，作为一个新闻战线的指挥员，他又具备了怎样的品格和特点呢？

初当社长

上任之初，李锐统率的绝不是一支实力雄厚的队伍，马洪所讲的“得力阵容”是以后才逐步发展起来的。创造一个人才济济的局面，除客观条件外，同领导者主观方面的因素也是分不开的。

当时，报社人员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从老解放区来的一批只有

黄钢、华山、范元甄等三个人搞过报纸。黄华、沈毓珂等也是老区来的,但没办过报。廖经天在延安虽是《解放日报》的人,但一直在国际问题研究组研究日本问题,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一不会编报,二没写过新闻。"

另一部分是在伪满洲国办过报的留用人员。这部分人在编辑部里较多。他们对于解放区的报纸不光内容陌生,连语言都陌生。以前他们在报纸版面上常使用"协和语",这是日伪政权强迫推行的一种语言,其中含有大量日语中的"汉字",语法结构也模仿日语,多为倒装。如"农作物除草着着进行"(夏锄顺利展开)、"军人家族慰安"(慰劳军属)、"畏得罗"(水桶)等等。这是一个需要马上解决的问题。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搞培训,就在日常的工作实践中帮助大家熟悉。

这是李锐担任社长以后最紧张的一个时期。不仅自己要写稿,编辑、标题、版面样样都得过问。甚至当报道"四·八"烈士的消息时,制版房找不到博古的照片,李锐还亲自挥笔,为博古画了一张素描。白天忙,晚上还要上夜班。好在他那时才二十八岁,精力极其充沛。

行政事务也十分繁杂:最麻烦的问题是电台,收报质量不行,脱漏字太多,编辑们不得不把大量时间花在校对新华社电稿上。另一件十分头痛的事情是老停电,李锐一趟又一趟地去拜访电厂厂长,直到电厂保证报社和军区的用电。发行则一直是个"老大难"。虽然各县都有发行站,但敌占区就在附近,报纸常常送不出去,热东一些县的县委内经常报纸成堆。

李锐从来没有为如此繁杂琐碎的事务性工作操过心,苦恼是很自然的,他在日记中提醒自己:"从我的职务来说,我每天至少应有相当时间来想问题,研究材料,决不能事务式地过去。"

黄钢回忆了自己初来报社对李锐的印象:

他额间有一道深的塌下的宽纹。他这男子有激情，事业心浓且强。“我现在很单纯”，他说，“就是要把这个报纸搞好。”在他这种态度底下，很多人对工作发生兴趣。

在同一篇文章里，黄钢还回忆了李锐帮他改稿一事：

在报社代理主持编务的这一短短时期，我学着写了一点时事政论性的杂文。这是从到达《冀热辽日报》以后开始的。最早的一篇文艺体政论《蒋介石汪精卫“救国同心”》，是揭露蒋汪他们在“曲线救国”方面“同心”的计划。记得这一篇尝试性的杂文草成后，曾由李锐同志作了大幅度的修改，才得以完成，当即发稿登载出来。五十年代中期，我在（北京）作家出版社集结我多年来所写的文艺性国际政论而出版时，曾在出版说明中提到过此事：感谢李锐同志对我当时习作杂文时的帮助。解放区同志之间这种无私的帮助，是很值得铭记的。那时候都是为了完成报纸工作共同的战斗任务，绝不会发生在今天条件下文坛上所熟知的那些计较。

报社编辑部分采通科、编辑科两个部分，采通科的外勤组相当于今天的报社记者部，专门负责外出采访写报道，内勤组则负责编辑记者们写回的报道。采通科对外又是新华社冀热辽分社。编辑科的工作除了处理新华社发来的电讯，主要负责版面安排和写社论短评。李锐把精力更多地放在编辑科。

老朱（副社长朱九思）对有些稿子压，不耐烦改。我倒还有耐心。办报就得做这些琐事，而且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李锐日记语）

从李锐当社长一年后的这段日记中可以看出，他已经逐渐适应了这个角色。

一支干事业的队伍需要一个宽松、和谐的人际环境。与党内一些习惯于在政治运动中给大多数人制造负罪感，然后驾而驭之——这套"经典"领导艺术的官儿们不同，李锐的经历使他一上任，就显出了自己的领导特色。

黄钢调到报社时，在延安"审干"运动中还没有得出结论，或者说是个还要继续接受"审查"的人。正值总编辑鲁森外出，李锐立刻就让他代理总编辑的工作。这位延安《解放日报》的采访科科长，后来一直是李锐在业务方面的左膀右臂。

女编辑安若的父亲是国民党北平新闻检查所所长，李锐曾对她开玩笑说："哟，那可是我们的冤家对头哇！"他让"冤家对头"的女儿做采访科内勤组组长。因为她业务娴熟，文笔流畅。

别人都说，李锐自己是个才子，在用人时，他也十分爱才，可田绿萍却有另外一番经历。她来报社时是个初中未毕业的十六岁小姑娘，在资料室做资料员。平时虽兢兢业业，但毕竟年龄小、文化底子差，剪贴报纸有时还难免把张三的文章接到李四文章的后面。但有一次，她在群众评报活动中，对马洪写的《满足贫户"老牛赶山"》[①] 一文提出了批评意见。那篇文章介绍了在土改中把坏田分给地主的经验。田绿萍认为这样的做法不应该肯定，更不应该宣传。马洪当时是冀热辽中央分局秘书处处长，他为报社写了不少好文章，有相当的知名度。那时，他正负责土改工作团的试点工作。

一些人对小资料员的"不知天高地厚"不以为然："马洪的文章还轮得到你提意见？""难道会是人家马洪错，你对不成？"然而社长

① 载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三十日《群众日报》第一版头条。

李锐却一眼看出这个小姑娘还颇有见地。他在全社的业务会上特别表扬了田绿萍，肯定了她的意见，并且检讨了自己对此文没有仔细看的过失。不久，中央果然纠正了土地改革中诸如此类的"左"的偏差。

报社里还有一批日伪报社留用人员，这些人精神面貌的变化似乎体现了更丰富的含义。田绿萍在回忆这段生活时有这样一段记述：

> 最初这些人精神萎缩，处事为人小心谨慎。几个月和老解放区来的同志相处，改变了他们的精神状态，一扫在日伪时那种小职员在上司面前唯唯诺诺卑躬屈膝的劲头，遇到业务上的不同意见他们也敢于畅抒己见，有时还和老解放区来的编辑人员争论得面红耳赤。工作之余也开开玩笑。谁也不把为混饭吃不得不在日伪供职看成是"政治问题"。当时若没有这条，光靠解放区来的十来个人是办不成报纸的。

永记终生的教训

当然，李锐也不是一个一贯正确的领导者，比起党内许多人来，他只不过更善于吸取教训。

在那些经年累月纸张已经发黄的日记本中，李锐在一个晴朗的冬夜写下的日记，令我与他同样"意外"与"痛心"：

> 昨夜发生极意外痛心之事：报务员韩克新自杀。电务科这次三查，查出一个五人集团，包庇地主、接受贿物，极为严重。群众斗了一番，稍有过火。昨夜对全体人员报告形势和联系三查，对电务科讲得重一些(不像一个党

员之类）。原先准备讲犯错误者不要悲观一节，又未讲进去（还是自己思想认识不够），散会后，电务科小鬼匆匆送来韩一信，我以为是坦白材料遂放着，而不知是绝命书。待会儿小鬼来说韩已自杀，是用步枪自杀的。信中毫无埋怨，痛恨被地主拖入泥坑。我随即与樊、朱、鲁去看他的尸体，弹从腹入，悲恸之至，摸了摸他的额头。（我如更关心同志，及时拆开信，尚可挽救其生命，此事当永记终生）召开全电务科会，谈了些教训，大家情绪还算稳定。今日一天都不安。

我查了一下与这篇日记有关的历史背景：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七年间，中国共产党党员由几万发展到二百七十万。毛泽东认为：这是一个极大的跃进，但缺点也就跟着来了，有许多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和流氓分子混进了我们的党。因此有必要整编党的队伍，以解决党内不纯的问题①。

于是在部队和地方开展了"三整三查"又称为"新式整风运动"。"三查"，在地方是指查阶级、查工作、查作风；在军队，则把最后一查的内容换成"查斗志"。"三整"，是指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

就像延安的"抢救运动"没有认真做过总结，没有写过一个文件一样，尽管我多方打听，仍找不到全面评价、研究这场运动的哪怕是一篇论文。

毛泽东对"党内混进许多地主富农分子"的判断是否准确？这场运动的得失如何？经验教训如何等，缺乏文字资料的依凭。笔者只能根据采访当年运动参加者的一些零散却一致的印象作出判断：这场运动对消灭封建土地制度的土地改革起了巨大的支持作

① 参见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用，但运动中也出现了不少"左"的倾向，特别是在"查阶级"中，唯成份论大泛滥。

韩克新的家庭出身，目前已很难弄清，但从他在伪满时念过"国高"这一点推测，他的家庭成份不会低，否则也念不起。韩在土改时还同地主的女儿谈恋爱，"三查"中自然要被重点审查。但"包庇地主"、"接受贿物"之类却未见有何根据。

李锐在延安"审干"中有过被整的经历，如今在他的领导下竟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内疚、自责怎能不使他"悲恸之至"呢？

这以后，李锐在报社明确宣布：不再搞疾风暴雨式的"三整三查"运动。

半个世纪前的新闻观

一九四六年二月，也就是李锐当社长的第三个月，他给在延安的胡乔木写了一封信。胡乔木当时仍是毛泽东的秘书，同时负责新华总社的领导工作。胡乔木回信说，李锐信中反映的情况很好，有助于中央了解情况。

今天，重读这封信，我们会感到：它的意义不仅在于向中央反映情况和对冀热辽分局领导提出了中肯的批评，而且体现了李锐当时的新闻观：

> 现略谈此间报纸宣传，并提供一些不成熟的意见：
>
> ▲宣传上保守与被动。去年十二月二十六、二十七日，延安即播出北镇失守，蒋军大举向热辽进犯。但这一类失利消息，当时均未能及时见报[元旦我写了一篇《保卫热河》，也被搁下(指分局领导——引者注)，理由是"特务在承德造谣很厉害，登出后人心浮动"]。事实上，老百姓的消息比我们还灵通。后经几次争辩，始发表出来(还

是用“延安电”),然敌军已逼近矣。最近蒋军继续侵犯的消息,亦以同样顾虑,未能及时发表,几次都是反复争辩后,才放马后炮,以致宣传攻势不能主动展开。而热河活生生的事实很多,一切有待延安表态,或延安表态后,仍然踌躇不定。已刊消息说有冲突,而冲突内容则怕“人心不安定”而略去(迟了几天才又发表)。今天的事实说明,及时发表并解释这些消息,于人心安定是有帮助的。

▲报纸是宣传工作最重要的武器。看看我们各地出版的报纸,恐怕只能是以“政治上强”而聊以自慰,与许多外报相比特别是在技术版面上,未免“相形见绌”。(《解放日报》与《新华日报》除外,《晋察冀日报》亦如此)我觉得应设法在张家口办一高级的新闻专校(或附属联大),从各地抽调干部去受训。各地当然也要办中小型的学校及训练班。关于新闻工作的经验,各地也应很好交流,或办专业刊物。今后是否有一专管新闻事业的机构。(包括电台在内,过去是军区管,今后可能不行了)

▲陆定一同志在离报社时的欢送会上说:今后各地报纸不应该是一个模子,然而今天,事实上还是许多小《解放日报》。

▲在大城市除办大报外,还应办小报,争取一般市民。中国至今只有以低级趣味或风花雪月讨好读者的小报,而无一种有趣味,有风花雪月,而又有政治观点,内容健康,为广大城市读者所喜爱的小报。这种人才恐怕更难找。因飞机之便,北平报纸能常看到,这种感想就更炽烈了。

李锐在近半个世纪前的这些看法,似乎对于今日国内新闻界,仍不失指导意义。

在新区开展工作

在冀热辽等新区,最大的问题是人们对共产党、八路军不了解。新区人民在日伪政权的统治下生活了十几年,亡国奴的痛苦使他们对自己的国家、政府有很深的感情。他们把蒋介石的政府看成是正统的、自己国家的代表,把国民党的军队看做国家正统的军队。至于共产党,则由于种种原因,在新区人民中的影响及信任程度实在是十分有限的。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当时新区流行着三种货币,即伪钞、红军票和边区票。伪满倒台了,苏联红军撤走了,但他们的货币却都比共产党发行的边区票值钱。最不受信任的就是边区票。一次报社的两个同事在街上吃馄饨,五块钱边区票买一碗,老板都不肯,而那五块钱是他们几个月的津贴攒下来的。

报社里的日伪留用人员,最初对解放区来的干部也疏远,甚至不大瞧得起。接触了一段时间以后,才发现这些人虽然穿得破破烂烂,原来还真有学问。

除了用行动影响他们,李锐还规定,报社每天早晨上一小时课,由他自己和其他几个解放区来的干部讲共产党的奋斗史、八路军的抗战史。

在报纸的宣传上,则经常介绍八路军和解放区的情况。例如编写《国共两党抗日成绩的比较》、《日寇口中的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大事年表》等史料性的文章,开辟了《延安回忆》专栏。

李锐写了《从卢沟桥到贵州》,介绍国民党在抗日战场上节节败退的情况;写了《湖南灾荒纪实》,介绍了当时蒋管区如何民不聊生。还发表了冀热辽分局负责人程子华写的《热河应该是谁的?》以及李六如的《蒋介石怎样出卖东北与热河》等文章,并辟有《回忆伪满国》专栏,帮助群众认清日伪本质。

这一时期，报纸上还发表了不少揭露国民党对共产党假谈真打的杂文短论，李锐和黄钢写得最多。

日伪统治时期，共产党经常派出自己的干部到这一带的群众中组织抗日活动。一九四一年以后，日伪实行了所谓“民匪分离”、“集家并村”的政策。在长城内外东西长九百八十里、南北宽二百五十里的地带制造“无人区”。“无人区”内，村庄全部拆毁，村民们被赶进若干写有“土城部落”的围墙内，天黑后，“部落”大门上锁，不准出入。然后挨家查户口，若被查出有人没回来，便以“八路探子”论罪，全家受株连，被打得死去活来。老百姓把“部落”叫做“人圈”。敌伪经常到“无人区”巡逻，发现人就追捕射杀。

热河光复之初，李锐曾路过这一地区，只见“人圈”中人畜同室，儿童赤身裸体，惨不忍睹。他在《龙胆紫集·热河东北杂记》中的第一首诗，便是记述“人圈”的。

一次报社的廖经天执行任务到“土城部落”借宿，请村长给号房子。村长边走边嘟囔着说：号房子，困难啊！很多人家都是男女老少挤在一条炕上，合盖一床又脏又破的棉被，谁出门谁穿，叫他们怎么腾出炕来啊？那一夜他们和“部落”里的老乡挤在一条炕上睡的觉。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冀热辽分局和热河省委号召全区人民对汉奸、恶霸、特务进行清算复仇运动。报纸紧紧配合这一中心工作，刊登了大量文章。派出去的记者和各级党委派下去的工作人员一起，发动群众，控诉“人圈”的悲惨生活，清算日伪对群众惨无人道的迫害。清算复仇运动后来转入减租减息，分散土地运动。报纸上发表的《新拨村的群众是怎样发动起来的》、《九区怎样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等一些指导性的文章，对推动运动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除了报社同事自己写稿，他们还组织一些做地方工作的人员写。郭小川回故乡做丰宁县县长，就给报社写了不少文章。

两年以后，郭小川担任了报社的副总编辑。

除了正版注意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副刊办得也比较活泼，有文艺作品，也有今天晚报上常见到的那种服务性文章，诸如《一种简单的凉菜》、《油污怎么洗》、《我怎样记日记》等，很受读者欢迎。

当时军调部每周有飞机来承德，便带去一部分《冀热辽日报》，在北平一定范围内散发。热河是国共停战谈判中的一个焦点，大家对热河的报纸很关心。与北平各家报纸比起来，虽然印刷质量不行，《冀热辽日报》的内容还是吸引人的。

撤退

一九四六年，国民党大举进入解放区。冀热辽分局决定撤离城市，转入农村。

报社从七月份开始疏散，机器设备分批向隆化转移。八月初，杜聿明调遣十三军、九十三军、七十一军等部队向热河扑来，形势非常严峻。报社需要作进一步撤退。李锐派采通科主任廖经天带领报社身体较弱的女同事和家属先走一步，撤到围场。

八月二十五日下午，李锐接到分局电话，平泉敌人已经出动，报社须立即撤退。这天夜晚，社长李锐和总编辑鲁森、副总编辑朱九思、沈毓珂等一直到最后大样签字发排，才和报社最后坚持出报的二十多名同事一起撤出承德市。就在这天的报纸上，华山写了一篇在全国很有影响的文章：《我们还是要回来的》。

撤退是在上有敌机扫射，下有土匪袭击，边走边打边躲空袭的紧张日子里度过的。电台的工作人员仍然坚持每天接收新华社电讯，出油印的《每日新闻》，并向延安新华总社发稿。

由于分局对形势估计不足，从承德撤退以后，分局机关和报社等单位又经历了隆化、围场等撤退，最后撤至林西，每到一地，都认为这是撤退的最后一站，想拉开架式办报。但随着敌人的步步紧

逼,只好收摊再撤。两个多月的行军中,报社机器几乎是随走随埋,随走随丢,到林西时差不多“全军覆没”。

人员的损失倒不是很大,除总务科长的女儿在土匪袭击中被枪打死,没有其他人员伤亡。撤到赤峰时,和当地的《民声报》汇合,这不仅弥补了人手的不足,而且也使报社的印刷设备得到了重要补充。

当了父亲

行军途中,李锐做父亲了!

原来,廖经天带领的那支“妇孺支队”撤到一个名叫大庙村的地方时,范元甄临产了。陪她走在后面的采通主任廖经天和经理部负责人金刚找到附近一所农舍与主人交涉。房主是个矿工,他认为外人在自己家里生孩子不吉利,拒绝他们把产妇带来。

情况危急,人们用毯子把范土甄从车上抬下来时,孩子的头已经露出来。他们只得持枪强行闯入这所农舍。身边没有女同事,金刚便担任了接生员。战争年代,真是一切都无法以常情论!孩子出生在大庙村,便以“庙”的谐音给孩子取名“苗苗”。听说后来金刚扬言要李社长赔他一条毯子、一身军装,大家都笑。

在林西

林西靠近与外蒙相连接的北方国界,是热河最北部的一个县城。敌人占领赤峰以后,兵力已很分散,没有再继续追击。

县城不大,宛如农村中的集镇。撤到林西的机关单位很多,物资供应十分紧张,粮食都是从外地运来。没有煤,做饭烤火主要靠牛粪。

经过两个多月的撤退,各单位人员的思想都比较混乱,不知再

这样撤下去的前景会怎样？两报合并以后，一切工作都需要很快上路。李锐召集了全社大会。报社的张玉麟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

> 参加会议的人炕上坐得满满的，也有靠墙站着听的。屋里坐不下，外间屋挤得密密麻麻。李锐同志肩披大衣，他的身材高大，方型脸，两只大眼炯炯有神，双眉似锁似展，说话斩钉截铁。
>
> 他说：现在蒋介石依仗着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向解放区大举进攻，叫嚣三个月消灭共产党。党中央根据敌我双方的情况，做出决定，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要保存有生力量，迫使敌人分散兵力，而我们要集中兵力形成拳头逐步消灭敌人，然后转入全面反攻。他还说：打仗最忌讳分散兵力，日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所以失败，在战术上的兵力分散，是一个重要原因。今后我们在军事上将在各个局部战场以多胜少，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政治上我们将在广大农村放手发动群众，在农村建立巩固政权，搞好土地改革，一个轰轰烈烈的革命高潮必会到来。
>
> 大家静静地听着，心情似乎开朗了许多。
>
> 李锐同志接着说：越是革命遇到暂时困难，越是每个革命者出力的时候，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言论和行动为自己写历史，希望在座的各位同志在若干年之后，在撰写自己的这段经历时能是光荣的一页……

李锐的演讲是极富感染力的。他的话不仅稳定了大家的情绪，而且激起了人们的工作热情，报纸很快就上路出版了。

一个优秀的指挥员，在部下面前就是天塌地陷也不能表现出丝毫惆怅。李锐并不是没有苦闷和困惑，只不过他所处的地位使

他不能随意流露。从李锐到林西不久给延安新华总社的一封信里，可以看出这段时间他思想情绪的另一个方面：

> 这一年来碰了不少钉子，得了一些教训，略略知道一点"当家"的困难，过去在延安的生活真是"饭来张嘴"，不知天高地厚。去年八月底至十月底撤退五六次，奔波一二千里，将和平城市思想一扫而光了。
>
> 我们现在最大的困难还是电台与交通（整个情况如此）。一个坏马达，每日一修，电池像吊气一样。现在派人去东北，不知能否买到些东西。其他物资条件远不能与延安比，连煤油灯都找不到，零下三十几度时，墨水瓶经常冻住，只有牛粪与草根可烧，我们将住房等最好条件让给印刷厂，因他们困难更多。但大家情绪还好。有些牢骚也只是对热河太冷清而发。
>
> 热河很特殊的问题，是蒙古问题（林西是辽都，金兀术坟离林西二百里），可惜这次我们不能整理些材料带上，我曾想有系统整理些热蒙材料，但日常事务太繁，几次动笔又作罢。
>
> 居在林西，四顾茫茫，一片草原，闭塞之至（想收中央社电讯无电池）。东北报纸间或来一点，亦时隔一月二月……某种程度的苦闷，在林西后方的干部中是很普遍的，我也不能例外……

李锐的苦闷，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来自人际关系上的麻烦。两报合并，虽然在人力物力方面都增强了实力，但人际关系的处理却增加了一些复杂因素。

合并以后，社长由分局宣传部长赵毅敏暂时兼任，李锐和原《民声报》的负责人任副社长。李锐兼总编辑。最初，那位副社长

写来的东西李锐从没改动过，怕他不满。有一次，李锐实在忍不住，改了一篇他写的长文，还特别送给他再看一遍，声明改得不一定妥当。对方回了一条："能用则用，不能则退还，不必乱改！"李锐当然十分恼火，但三天以后还是主动去找他谈心。对方认为李锐"排挤"他，李锐检讨了自己工作中有时不自觉的主观、独断，并对一些误会做了解释。对方的不满仍未消除。

一个多月以后，那位副社长调走了。李锐心情十分沉重，他在日记中写道：

> ××今早走了。当然他之定要离社与我有关系，他对报社事业感情浓，而觉我"排挤"了他。我应该深自检讨，不要多责备别人……

接下去李锐在这篇日记中总结了自己在与这位同事相处中的种种教训："业务上对他不够信任；某些工作应交给他，自己却独揽，不管主观情形如何总是不好……"

而立之年的李锐，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并不像他写文章那般"早慧"。日记的内容也反映出他在这方面的正直善良，不工于心计。

虽然冀热辽中央分局所属机关全在林西，但战斗部队都到前方去了，守城力量十分有限，当地土匪武装很是活跃，出城十里就有遭袭击的可能。加上冀热辽边区被敌人分割，报社的来稿和发行都遇到空前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报纸还能不能办得下去？谁心里都没底。

这时分局正在组织力量，派一批干部和武装部队到热中去建立游击区，李锐由此想出了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决策：将报纸化整为零，成立三个支社，到下面去办地区小报，同时给报社供稿。

每个支社都配备了最有力的领导：热中支社的廖经天、热东支

社的黄钢、热辽支社的鲁蛮,他们不仅政治素质好,写作能力也强,都能独当一面。

各个支社人员有编辑、记者、报务员、译电员,带着收报机、手摇马达、油印机,还配备了马匹。每支队十人左右。

到敌人的眼皮底下办报,随时都有危险。在战斗最频繁的时期,支社在一个地方工作的时间常常不超过三天。有时候刚刚支起天线戴上耳机准备接收新华社电讯,突然出现敌情就得拔锅起灶立刻转移。支社的人们都说:我们的报社是在马背上!

支社的工作受到当地党委和群众的热烈欢迎。支社收录新华社电稿,出版《每日新闻》和内部参考,同时也把游击区的斗争情况向林西报社发回大量稿件。报社除自己采用外,还向新华社发稿。所以那时新华社向全国播发的电讯中,不时会出现"新华社热中支社电"、"热东支社电"和"热辽支社电"。这样一来,报社虽然僻处一隅,和整个冀热辽以及全国形势的联系反而比在承德时更紧密了。

绝大部分记者都分派到三个支社去了。只剩下李锐等几个社的领导,还有几名军事记者。他们也轮流到附近地区采访,并加紧培养从承德、锦州和赤峰来报社参加工作的青年学生。这些青年进步很快,不久便充实了报社的采编队伍。

樊允行是原来延安清凉山印刷厂工会负责人,是到林西以后才来报社工作的。他发现这里印刷厂的人数约有延安中央印刷厂的十分之一,但生产效率却只及延安的三十到四十分之一,毛病就出在哪有活大家都一哄而上。他让工人按照延安的流水程序生产,工效提高了三四倍。李锐看出这是个管理人才,便让樊允行担任经理兼厂长,原来担任厂长的两人做副厂长。最初其中一位不大服气,李锐看出苗头,就去找他谈心。李锐理解他,却不肯迁就他,看他暂时还转不过弯来,便派他去哈尔滨采购设备。几个月后他回来一看工厂大变样,他心悦诚服地向老樊表示愿意在他领导

下工作。

李锐又请电台的三个日本人办起电务训练班，他们的技术都很好，为报社培养了一批人才。

就这样，在林西这个闭塞的小县城里，在几乎不具备办报条件的情况下，报社的工作却开展得蒸蒸日上。

这个时期虽因战争而紧张动荡，却丝毫没能使李锐少年时期就养成的读书嗜好有任何减弱。在这些年代他的日记里，时常会看到这类记载：

> “到郑××处弄回十几本书，内有《日日夜夜》等。”
>
> “昨夜开始读斯坦倍克的《相持》，今夜读完……”
>
> “零碎读完韬奋的《患难余生记》……”
>
> “整日头炸痛，但仍勉强读完《恐惧与无畏》第二部……”
>
> “翻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党的每个做经济工作的同志乃至每个党员都应该精读这本书……”
>
> “上午到分局开会，又弄回一些书……”

一九四七年八月，李锐在一户蒙奸家的“浮财”中，发现了两大箱古旧书籍，如获至宝。他想，这些书除了自己看，此地反正也不会有别人要看，我不拿走，无人管，终将四散，于是统统“接收”。严格说，这有点违反纪律。“浮财”理应上交，但如果落入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村干部手中，这些古旧书籍将无疑成为“引火之物”，李锐也就不管那么多了。

春华秋实

一九四七年六月，解放战争开始进入战略大反攻阶段。六月

六日，解放军收复赤峰，报社随之从林西迁回赤峰市。报纸已改名为《群众日报》。几个月前，冀热辽中央分局扩大为冀察热辽分局，作为分局的机关报本应将原来的报名《冀热辽日报》改为《冀察热辽日报》，李锐为此征求了全社同仁的意见，大家都觉得这个报名太长，经分局同意改为《群众日报》。

安顿下来才三个月，赤峰就开始流行鼠疫。日本人在东北建细菌工厂，投降时炸毁了这座工厂，致使鼠疫灾难发生。一九四七年，敖汉、乌丹、赤峰一带，死于鼠疫者数千人。后经过封锁、隔离、治疫，直到一九四八年才控制住。

全城疏散。分局机关已搬到乡下。但是报社暂时不能离开，乡下没电。报社周围挖下深沟，让老鼠不能自由来往，同时继续派人下乡去找适合报社的搬迁地点。

鼠疫蔓延日趋严重，有些老百姓为保住因鼠疫死亡的亲人尸体而不愿烧尸，便向医生行贿，致使染病而死的人越来越多。报社处在城中两个被封锁的疫区之中，十分危险。《龙胆紫集·热河、东北杂忆》中的一首诗，记述了当时报社困守危城的情景：

我军全线反攻中，
鼠疫猖狂犯赤峰。
依旧夜班看大样，
时闻警报半城空[1]。

总算在乡下找到一处落脚之地，报社迁往牤牛营子村。

这一年，临近灭亡的蒋家王朝统治愈加专制，许多进步青年无法忍受蒋管区的黑暗，投奔了解放区。从平津来的大学生一批批分配到报社。其中陈牧天、李冰封、柏原等青年学生，后来不仅在

① 有疫毙者即发警报——引者注。

事业上卓有成就，而且和李锐结为一生好友。

这期间，报纸的主要内容围绕着解放战争的两大任务——土改和打仗展开。在那个时代，这是人们最关心的两件事。

一九四七年秋后，土改中出现的干部侵吞土改果实、农会中混进阶级异己分子变成“假农会”，以及侵犯中农利益等问题日益突出。《群众日报》对此发表了大量报道和社论。为了使情况及时得到反映，报社进一步加强了通联工作。根据报社的提议，分局和热河省委对领导干部给报社写稿规定了量的要求，并指示各旗县党委设置专职通讯干事。

这些工作使报社来稿从一年前的每月几十篇增加到每月逾千。

群众对报社的批评建议，李锐和几位报社领导是十分看重的。他们不止一次地在报上刊登启事，征求读者对报社的意见，并以《来函照登》的形式发表群众对报纸的批评，还配发编辑部回函。这些登在报上的批评，绝不像现在某些报上所登的是无关痛痒的点缀。可以说，凡是能发表的，都是相当尖锐的意见。

当时报纸也犯过在政策方面的错误，如宣传“老牛赶山”（指土改中把山顶上的坏田分给地主，半山腰较差的田分给富农，山下平原分给贫下中农的做法）、“打乱平分”等，但由于有了群众的监督等因素，所以都能及时纠正。

尽管稿源丰富，李锐仍然常常自己写稿，这已成了他工作中的一个习惯。一九四七年夏，前线战局发展很快，报社的编采力量都派到前线去了。李锐自己也到下面采访，他一路走一路写，一个月工夫，采写了新闻通讯二十三篇。

于俊沂回忆当时的情景时写道：

当时报纸经常发表社论，李锐同志是写社论的专家。报社的社论除少数为报社其他领导同志撰写外，几乎全

由李锐同志"包干"而且文章质量也高。

他写文章速度非常快。例如一九四七年秋的辽西杨杖子战役,我军歼灭敌人一个师。但国民党中央社发出的电讯还在那里吹牛。李锐同志看了电讯稿以后,立即动笔,只一个多小时就写了一篇文章出来。

他自己工作如此,对别人要求也非常严格。在他看来,工作上任何一点小的疏忽都是不允许的。所以,跟李锐同志打交道都得格外留神,丝毫不能含糊。

对于李锐的缺点,于俊沂讲得婉转。当时,在报社的党组织生活中,大家对李锐批评最多、意见最大的方面就是:待人太严厉,老是批评人,严格得让人喘不过气来。

春华秋实。两年多的耕耘,对于一张报纸,最令人欣慰的莫过于它在干部群众中树立的威信。当时,那些从蒋管区来的知识分子到解放区后,大多要派到农村去搞土地改革。陈牧天就是其中之一。他回忆道:

我们从来没有在农村工作过,更不知土改为何事。都分散在各村独自工作。我们靠什么来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呢?除了学习中央文件(如《土地法大纲》等)和听领导报告外,主要就是靠经常学习《群众日报》,学到切合本地情况的经验,马上就如法炮制。报纸对土改运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还有一篇题为《报纸就是教科书》的文章,是当年土改工作团的干部张凡写的:

有同志问我,领导不常在这儿,联系挺不方便,工作怎

样办？我跟他说：看报纸。我就是这么的，要是上级指示下不来，再就是有些具体事指示里没说，我就把报纸当成百科辞典似的，从里头查一查别人解决这具体事的经验。

一九四八年二月，正当报社工作开展得红红火火，一片兴旺，报社领导廖经天接到李锐从哈尔滨寄来的一封情深谊长的信：最艰苦的日子我们在一起，而现在情况好起来，我却要离开你们了……

第五节　给高岗、陈云当秘书

初识高岗

事情还得从几个月前赤峰鼠疫猖獗时说起。城里几乎所有的机关都搬走了。一九四七年十月九日夜晚，高岗和他的秘书刘家栋突然来到赤峰。他们先到分局，那里已是一座空楼。听说报社还在城里，刘家栋就来找李锐，并带李锐来见高岗。

高岗当时是东北局副书记。在东北局林彪、罗荣桓、高岗、陈云四位主要负责人中，林、罗主要负责前方打仗，高、陈负责后方工作。

高岗的一身打扮把从外面进来的李锐吓了一跳：他穿了一身防毒服。见到李锐穿得如此“随便”，高岗不禁有些吃惊。

后来李锐才知道高岗这次来分局的目的：解放战争几年来，冀热辽分局的工作一直存在不少问题，如领导班子弱、作风不深入、仗打得被动、土改也不彻底等。那时从延安经热河去东北的干部很多，其中有不少知名人士，他们在热河逗留期间，都感到热河工作做得不够好，并把这些意见带到了东北局。告状的人多了，高岗就来到分局，准备彻底了解一下这里的情况。

高岗问了老百姓的情绪、土改、扩军的情况，以及对分局几位负责人的看法。

报社工作与分局机关一直有着密切联系，到林西后，李锐一直参加分局大小会议。对分局工作中的问题，李锐在承德时就有看法，以前不仅同个别分局领导交换过意见，而且在给胡乔木的信中，也作过反映。如今东北局领导来了解情况，李锐便十分直率地说了自己的看法。

第二天，高岗又约李锐去谈了一个上午。从李锐所谈的情况中，高岗证实了过去东北局听到的反映是有根据的。

在此之后的日子里，高岗不是去参加群众大会，就是去找在各乡搞土改的工作团了解情况。又和六位地委书记分头谈话，发现分局工作确实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地主的地大多没分下去，不少农会并非贫农在掌权，大部分地区的土改是夹生饭。而前一段时间，分局某领导人到中央汇报工作，却将冀热辽土改运动大肆吹嘘，竟然受到中央表扬，说这里的土改搞得彻底！

不久，分局召开了有地、县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对前一段工作进行检查。

高岗为会议作了一个报告，主要内容是讲土改政策、改变干部作风等问题。报告是高岗让李锐帮他整理的。报告谈道：

> 据最近两三个月来各地和报纸反映的实际情况，是假农会多，地主狗腿当道，一些干部蜕化变质，贫雇农翻个空身，土地改革基本没有完成。可是过去许多地方轻易搜集数字，轻易估计"基本完成"，作这种假报告的人，党性不纯之至。对人民不负责任，只闹个人表功，于革命事业危害极大……

分局会议结束以后，这个报告在《群众日报》上发表。就在社论发表的当天夜里，中共中央的一份文件(即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作者注)发到报社。对照这个文件，李锐发现高岗的报告中关于中农的政策问题讲得比较含糊，甚至还有侵犯中农利益的意思，就根据中央文件的精神作了修改。第二天一早，高岗也看到了中央文件，急急找到李锐，说自己关于中农问题的说法与中央文件有出入，李锐告诉他："已经改好了。"高岗非常满意。

高岗在热河期间，对《群众日报》很赞赏。刘家栋曾告诉李锐：

"高岗说,报纸办得很有劲。"

工作之余,高岗也爱和李锐等人闲扯。高岗特别推崇陈云,说陈云很厉害,东北就是这两人(指林彪、陈云)厉害。

分局会议一段时间之后,高岗派李锐、刘家栋、柴沫再次到下面检查工作,并指定由李锐负责。他详细交代了下去的任务,最后还引用陈云的话说:"陈云讲百分之九十九是掌握材料,方针政策随之就有了。"

李锐一行在下面工作了半个多月,他们和土改后划为各种成分的农民交谈,向农会委员调查,又发现了许多问题,如定成分的标准模糊不清,许多地方定成分主要看吃穿光景,而不是看有无剥削关系。有些地方又把在外边做生意的小商贩定为"赤贫",根据是他们没有土地。对于革命的对象,农民中的糊涂认识也不少,在一个农会委员的座谈会上,李锐问他们:"该斗什么人?"答曰:"小买卖、奸商、富裕的。"逼得李锐只好讲了一通土改政策。农会委员们反映:"过去谁也没给我们这样细讲过。"他们还发现,中农因公粮派得太重,不满情绪很大……

为了了解更多的情况,他们三人经常分头行动,一人跑一片儿。

月底回到分局,向高岗和分局领导汇报,由李锐主讲。高岗对他们此行大加赞赏,并且批评分局工作太不深入,对分局以前向中央表示"年底前真正彻底完成(土改)"极表怀疑。随后,高岗又到冀东了解情况。

李锐觉得,高岗到热河以来,不是先听分局领导汇报,而是直接到下面去摸情况,找下面干部做调查,工作抓得紧,作风也深入,特别是和过去常见的那种浮泛的、大而化之的领导作风比较,更给李锐留下了好的印象。

不久,东北局对冀察热辽分局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黄克诚担任了分局书记。

一九四八年二月，高岗返回东北局，李锐同车去哈尔滨探亲。一年多以前，报社从承德撤退到林西，一度形势依然紧张，国民党的进攻随时有可能使林西变成战场，于是分局决定让带孩子的女同志全部撤离林西，范元甄便带着才出生几个月的苗苗去了东北。此时范正在离哈尔滨不远的阿城糖厂任经理。

一路上，高岗向李锐谈了许多自己的经历，以及对有关中央人事的看法。他好像有意要让李锐了解这些东西。李锐是一个有历史癖好的人，他认为这些都是极有意义的党史资料。

高岗在哈尔滨的住宅，是原来的法国领事馆，庭院深邃幽美，两层楼房是典型的欧洲建筑风格。高岗要一行人先到他家休息。

李锐从阿城探亲回到哈尔滨，高岗向他表明，要他做自己的政治秘书，并向冀察热辽分局发电："拟调李锐来东北工作，望能同意。"

调换工作李锐倒是早有此念。在热河，他就感到做报纸工作太空。在下面搞调查时，他甚至想过："如有机会去搞一个县，还是有信心搞好的。"解放战争的迅速进展，又使他产生过将来去搞经济建设的念头。

可是，如今转业的机会来了，却仍旧不是搞实际工作，这使李锐心里十分矛盾。

最后促使李锐留下的有两个因素：一是高岗在热河数月的工作作风给李锐留下了较好的印象；二是他无法说服范元甄离开东北，一起回热河。

对爱情极为专注的李锐不愿因长期两地分居使家庭再发生隔膜。在报社里，只有朱九思等几个最知心的朋友知道，这位工作起来文思敏捷、生龙活虎的社长，其实常常为他的不和谐的夫妻关系苦恼不堪。

帮高岗写过两篇大文章

作为政治秘书，李锐主要负责帮高岗起草报告、文件。高岗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但懂得用知识分子做帮手。

在东北期间，李锐帮助高岗写过两篇大文章。

三月中旬，东北局召开九省二市(全国解放以前，东北包括：黑龙江、嫩江、松江、合江、兴安、吉林、辽东、辽西、热河和哈尔滨市、沈阳市)干部会议，也称“三月会议”。

这是总结东北解放区土地改革的一次重要会议。

当年东北的土地改革运动(也称“平分土地运动”)除冀察热辽分局以外已经告一段落，基本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目标。大多数农户还分得了牲口、房子和衣物。贫下中农在农会中掌了权，在“保卫胜利果实”这一口号的动员下，扩军、战勤、征粮等工作空前顺利，有力地支援了前方。

但是，在“左”倾思想的干扰下，这次运动也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和错误，尤其是在高岗去热河、冀东调查，土改由凯丰负责的那半年，“左”的倾向发展尤为严重。侵犯中农利益和打人的现象非常普遍。而侵犯中农利益又多半是在“满足贫雇农要求”的口号下发生的。许多地区不顾中央规定“剥削收入不超过其总收入百分之二十五者仍算为中农或富裕中农”的政策，将部分中农和富裕中农实际上划进了富农成份，严重扩大了打击面。

打人的情况大多发生在农民追问地主浮财的时候，想不出好的办法，便动手打人。一些干部不仅不对农民进行引导和教育，反而认为这是发动群众解决问题的好办法。一些干部即使认识到这种做法的野蛮落后，但害怕给群众泼冷水，仍然不敢制止，致使打死人、逼死人的事情屡有发生。

除此之外，把地主富农中的恶霸与非恶霸、旧富农与土地改革

后产生的新富农同等对待;侵犯工商业;没收地主在城里经营的工商业财产,甚至将人逮捕等情况,在不少地方都存在。用黄克诚的话说:“这些严重的错误,是被战争的胜利掩盖了。”但如果任其发展,东北解放区的经济,农民的生产情绪都将大受影响。

一个多月中,李锐自始自终参加了会议。会上,黄克诚等人同“左”倾错误毫不妥协的斗争精神,给李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李锐为这次会议起草了《东北局关于平分土地运动的基本总结》。东北局机关报《东北日报》用了整整两个版的篇幅全文刊载,成为一九四八年《东北日报》上最长的一篇文章。

四十五年后,我在中共中央宣传部资料室找到了当年这张《东北日报》,竟然一口气读完全文,并不似读近些年一些报刊长文那般乏味费力,甚至很有些感动:一个政党,大概只有在真正充满自信的时候,才会以那样坦诚而彻底的态度检讨自己的失误。

另外,李锐的文风也真是好。那么长的工作总结没有好的文风是很难让人读得下去的。全文材料充实、丰富,即使在几十年后仍能真切具体地感知当时的历史情况。文字极其朴实,分析切中肯綮,找不到一处同类文章中常见的那种空洞而公式化的议论。当我们在多年的政治学习中,被充斥套话的文章熏陶得麻木不仁时,读读我党解放战争时期这样的工作“总结”,会有一种返璞归真的感觉。

文风的健康,有赖于党风的健康。

中国北部的蒙古族是一个近百年来受尽了异族侵略者残酷统治压迫的民族。清朝、北洋军阀、国民党反动派、日本帝国主义者对内蒙人民的欺压、掠夺,使这个向以慓悍著称的民族,变得极为衰弱、落后。

解放战争时期,内蒙古的工作归东北局领导。

“八一五”日本投降以后,经过两年多的努力,东北局在内蒙古

的工作取得了很多成绩:成立了东西蒙统一的人民自治政府,创建了内蒙古人民自己的军队,他们为配合东北华北解放军作战、肃清当地土匪发挥了重要作用。党组织在内蒙古发展了四千多名党员,培养了三千多名干部,并在农业区进行了土地改革。

但是,在一个有着独特历史文化、风俗习惯,有着独特经济环境、阶级结构以及民族心理的地区开展工作,问题毕竟要复杂得多。除了和汉族地区土地改革中出现的带有共性的"左"倾偏向以外,还有许多特殊的问题。一些派去工作的汉族干部机械地照搬汉人区的一套工作经验,对宗教文化简单斥为"迷信",出现了拆庙焚经打喇嘛的事情。在大汉族主义情绪的影响下,有的旗政府被无形中取消了,只挂县政府的牌子,出完全汉文的县政府布告。土改纠偏工作中,出现在补偿中农时不补偿蒙古中农的情况。甚至有人认为:蒙古人不会种地,主张好地分给汉人,坏地分给蒙人。

在蒙族干部中,普遍存在着容易把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对立起来的问题。他们说,共产党是"汉人党"、"内蒙共产党是汉人建立的"。

为了促使内蒙古工作朝健康方向发展,东北局于一九四八年六月底召开了内蒙古高干会议。会议进行了将近一个月。高岗是主持人,但他除一头一尾外并不到会,而由李锐天天将会议的情况向他反映。会议后期,李锐把会上干部们反映的情况总结出来,和他商量总结报告的内容,高岗便把自己的意见扼要说明,再由李锐拟出提纲,起草全文。

这篇署名"高岗"的《在内蒙干部会的讲话》在《东北日报》以一个版的篇幅全文发表以后,由于中央重视,解放区各大报刊均作了转载。内蒙古错综复杂的问题经过讲话的条分缕析,变得一目了然。文中对一系列政策详尽细致的阐述、对"左"倾现象深入浅出的分析,都令人印象深刻。

在批评派去内蒙古工作的干部大汉族主义的错误倾向时,李

锐引用了斯大林《在联共十次大会民族主义报告提纲》中的一段话：

> 在边疆工作的大俄罗斯共产主义者，他们是在“强国”民族生存条件之下长大的，不知有民族的压迫。因此他们往往缩小了民族特点在党的工作中的意义，或是完全没有顾及到这些特点，在自己工作中未考虑到某一些民族的阶级构成、文化生活、过去历史的特点，使党对民族问题的政策庸俗化，因而加以曲解。这种情形，其结果便弄成曲解共产主义，倾向于大国精神、殖民主义、大俄罗斯排外爱国主义方面。

不曾读过这些著作原文的高岗连连称赞：“哎呀，这个引得好，引得好！”

越来越不喜欢高岗其人

高岗对李锐的工作是满意的，然而李锐却越来越不安心。当秘书以后，他和刘家栋就住在高岗的楼下，半年来的深入接触，使他对高岗其人越来越不喜欢。

李锐“不安心”的另一个原因是觉得自己的工作“太清闲”。除了去开几个会以外，其他时间几乎没什么事做。高岗十分爱玩，没事就拉着李锐下围棋，有时下到半夜一点还不罢休，有时甚至把电话筒都摘下，不让别人打进来电话。

这种“不安心”的情绪李锐向高岗表明过几次，要求到下面去做实际工作。沈阳解放前夕，李锐更是坚决要走，高岗便把他推荐给陈云。

一九五〇年，李锐曾和黄克诚谈过对高岗的看法：其一，此人

根本不读书,文化也低;其二,生活作风太乱;其三,用人搞“小圈子”,对不喜欢的干部排斥甚至记仇。黄克诚不大同意李锐的看法,说用人自己有一个固定的班子很难讲就是“宗派”,也是需要的。同年高岗被任命为国家计委主席。李锐又找黄克诚谈了对高岗的看法,认为中央选错了人。黄克诚说,中央的决定是对的。李锐见黄克诚听不进去便不再同他谈了。

随陈云接管沈阳

一九四八年十月,辽沈战役捷报频传。沈阳的解放指日可待。

十月二十六日晚,高岗在他的住处召开紧急会议,同时通知李锐参加接管沈阳并列席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陈云、林枫、王首道、叶季壮、李立三、吕正操、汪金祥、张平化等。鉴于解放军进驻长春时有些乱,会议集中讨论了接收沈阳的具体方针和方法。大家认为:沈阳接收得好不好,对全国影响很大,沈阳的接管经验有全国意义,任务复杂艰巨,必须由最有威望最熟悉城市工作的领导人来负责,于是当晚宣布由陈云任接管沈阳的最高领导机构“沈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

虽然还是做政治秘书,但是在陈云领导下工作李锐是愿意的。李锐在延安中央青委宣传部工作时,参加过中央组织部主办的“读书班”,学习唯物史观。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是读书班的总负责人,教员由艾思奇担任。中央青委冯文彬、李昌等,以及边区党委书记高岗都是“读书班”的学员。就是在这次读书班中,陈云丰富的工作经验和实事求是的作风,以及他对哲学理论的重视,给李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十月二十七日,东北局决定了沈阳军管会的全部人选:主任陈云,副主任伍修权、陶铸,卫戍司令伍修权,沈阳市市长朱其文,市委书记陶铸。二十八日,从各处抽调参加接管沈阳的四千名干部

开动员大会，二十九日便从哈尔滨乘火车出发，沿途一路绿灯，飞奔沈阳。

当时前方军事形势发展太快，已来不及从容准备，军管会的许多具体工作都是在专列上开会决定的。例如进城后的卫戍和社会治安问题，可能发生的各单位争房子的问题，几十万市民、几万俘虏以及接收沈阳的大队人马每日粮食的筹集，群众最关心的金融物价问题等等。真是头绪繁多、万机待理。

十一月二日黄昏，军管会主要人员乘十七辆大小汽车开进沈阳，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宣布：人民解放军于十一月二日下午五点解放沈阳。

军管会主要人员都住在位于沈阳市中心区域的大和旅馆。李锐同陈云的另一位秘书余建亭就住在陈云隔壁。每天，各系统接管人员按时来汇报接管情况，陈云、陶铸、伍修权将这些情况和大家研究后，再向东北局和中央汇报。李锐每天将各系统汇报来的零散情况和研究结果整理成简报，用电报发往哈尔滨和延安。除此之外，他还负责协助陈云处理沈阳接管时期的报纸宣传和外事工作。如今，李锐撰写的那些电报，均成为研究那段历史的宝贵资料。

李锐感到，和陈云在一起工作，可以学到的东西很多，特别是在处理复杂问题时陈云所表现出来的高度概括力和政策水平，更使李锐获益匪浅。例如，沈阳解放时，工厂都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状态，秩序很乱，复工是个大问题。但一般职员尤其高级职员对接管干部很疏远。除了特务造谣，也同南满土改时搞得过"左"、镇压地主恶霸杀人过多有关。他们十分害怕像农村一样搞批斗，并对共产党有没有能力管好大工厂表示怀疑。职员对工人不敢管，工人则不服管，生产纪律不好。

陈云提出：处理工人同职员之间的关系，要采取很慎重的态度，诉苦方式也要注意。职员中有问题的，可向工人道歉，或作调

动处理。接管干部要努力让工人了解：工厂中非有管理人员不可，今后还要长期用这些人，他们同工人的利益是一致的，一切问题是历史造成的，工会要有技术人员和职员知识分子参加。

后来根据形势的需要，清退了公教职工中的百分之七至八，其中最多的是东北九省二市的国民党政府官员。陈云要求：被清退者都要给以出路，或改行，或劳动，或自谋职业。有一般过错的，也不再过问，要他们在新政权下凭本领吃饭。在具体安排时，陈云几次谈到要防"左"，要根据具体情况，区别对待。在他向东北局起草的《正确处理新收企业中的职员问题》这一文件中，再次批评了"左"的错误："表现在只重视工人、轻视职员，对职员缺乏分析，不加区别地乱打击，形成工人与职员的对立。这样就破坏了员工团结，其最后结果也必然是妨碍生产、危害企业。""对于职员的改造，是一种思想和作风的改造，是细致而长期的教育工作，不能急性粗暴地处理，需要自上而下地处理，也需要工人与职员的相互批评与自我批评。"关于技术员，陈云多次强调："他们是管理复杂的现代化企业中必不可少的骨干力量，只要忠于职守，都要安排好工作和职务，并在生活待遇上给以必要的优待，使他们能充分发挥其专长。"①

几年以后，李锐走上水电工程局领导岗位，他对国民党留下的一大批水电工程方面的老知识分子、老专家以诚相待和器重，极为重视发挥他们的业务专长，这与陈云当年对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① 李锐：《接管沈阳纪事》，《中共党史资料》第40期。

第六节　在"新湖南"

一九四九年五月间,李锐离开沈阳,南下湖南。

平津、淮海战役的胜利,使全国解放的步伐从北方大步迈向南方广大地区。在天津停留时,新组建的湖南省委确定由李锐负责省委机关报《新湖南报》的工作。这对于李锐,算是"归队",虽然并不十分情愿,但他一时也还没有其他更熟练的"专业"可以挑选,加上队伍还是原来《群众日报》的老班底,战争年代建立的感情,大家相互熟悉,业务上更是轻车熟路,也就服从了组织安排,随新任命的省委书记黄克诚一起去湖南。

初返湖南

在返乡的路途中,多少景物使李锐抚今追昔,心潮难平。过武汉,他写道:

过江又见汉阳门,
车近东湖思故人。
八十里波不平静,
莫非为我洗征尘。

过老家平江,他写道:

并非特具故园心,
一过通城景物新。
土铳三千迎北伐,

梭镖十万欲西拼。
口丁减半“暴徒”在，
村屋夷平草木欣。
不倒红旗二十载，
擦干眼泪接亲人。

就要进长沙了，李锐想起了母亲。多少年来，母亲对儿子以特殊方式表现出的那种刻骨铭心的爱，常常使李锐内心有一种说不出的愧疚。他请一个进城执行任务的同志悄悄去家里探望，看母亲还在不在。很快便得到了母亲健在的消息，李锐松了一口气。

第一次进家门，李锐按家规给母亲行了跪拜礼。表示自己多年来未尽孝心的歉意。母亲看到自己心爱的儿子平安归来，且在外面大有出息，自然不会再计较以往的事。但妻子却气坏了。就为这件事，范元甄没少骂李锐，说他丧失立场，不该向地主母亲下跪。

在《新湖南报》

为了《新湖南报》的顺利创刊，除了着手准备创刊社论和头几天的版面，还在路上，李锐便招兵买马，广罗人才。在武汉停留时，他通过地下党从母校武汉大学挑选了刘海金等四名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加入了这支队伍。

有趣的是，地下党帮助《新湖南报》买下的社址，就是李锐的母校岳云中学旧址。旧地重游，李锐感慨万千。不禁赋诗：

一片瓦场经武门，
模糊旧梦少年心。
莫非前世缘来结？

十五春秋换主人。

考虑到新闻事业发展的需要，报社举办了新闻干部训练班。考生由地下党和其他革命组织推荐报名。经过考核，录取了一百多名学员。

班主任由副总编辑廖经天担任。我曾问过廖经天：与李锐一起工作最深的感受是什么？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心情很愉快。他交给你工作就充分信任你，放手让你去干。例如，他从不干预新闻干训班的具体安排。"

廖经天也的确干得十分出色。湖南省委很重视这个训练班，省委宣传部长周小舟、省政府副主席袁任远都来讲过形势和政策方面的课。业务方面的学习，要求学员从评报开始，报社各部门负责人轮流来传授新闻业务知识。

只经过三个月左右的学习和训练，绝大部分学员就能胜任记者、编辑的工作。

新闻干训班虽然只办了一期，却培养了不少人才。经过四十年的岁月，当年的学员有的已成为省报或出版界负责人，有的获得了高级编辑、记者的职称。在鲁迅研究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原湖南人民出版社总编辑、民进中央常委朱正，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参加《新湖南报》的新闻干部训练班时，只有十八岁，在三十二岁的社长李锐面前简直还是个"小鬼"。而今，晚年的他们已成为至友。

一九五〇年，李锐录用了他在武汉大学时的老同学许任飞。这件事在当时就颇有争议。

许任飞就是"一二·九"学生运动初期武汉大学的学生领袖许升阶。武汉三镇学生大游行以后，许因临阵畏缩而自动辞职，李锐当选为学生救国会的负责人之一。但是，他和许仍保持着个人来往，为此少数同学对李锐颇有些微词，说他太重乡情。其实李锐对

许升阶的友情除了乡情之外,恐怕更多的还是欣赏许的才华。许不仅在校学习成绩出类拔萃,当年南京的《外交评论》杂志向社会征文,在强手如林的竞争中,还在读书的许升阶竟荣获第一名,得到四百光洋的重奖。这使他在学校和社会上都有些名气。李锐在学运中创办的进步刊物《救中国》,许升阶也帮助出过一些好的主意。

许升阶毕业后,在武汉国民党《扫荡报》当编辑,后来又在国民党重庆《和平日报》担任过总编辑。解放后,他进了华北军政大学,这种学校是共产党专为国民党留用人员进行政治教育的场所。毕业后,许找到李锐要求帮忙介绍工作。

几十年政治斗争的风云变幻,使两人的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是李锐对老同学仍然旧情难忘。这说明,在党内历次的阶级立场、阶级感情、阶级斗争教育的政治运动、政治学习中,李锐始终保留着一点独立的"自我"。李锐在庐山"出事"后,范元甄批判他"一贯没有组织观念"以及"对人对事的资产阶级观点",李锐认为即对此类事情而发。

李锐觉得,许任飞有办报经验有写作才能,国际知识非常丰富,并已在军政大学受过培训,便留他在报社资料室工作。有人提出,这样的人安排在报社不合适。李锐认为,建设一个新的国家,人才是到处都需要的。报社的领导权、发稿权都在我们手里,让这些国民党留用人员发挥一技之长有什么不好呢?一九五九年水电部批斗李锐时,这个例子毫不含糊地列在"包庇坏人"的标题之下,并成为李锐被开除党籍的罪状之一。

富于主动性,是李锐主持新闻工作的一个突出特点。从主观方面来说,这与他的政治文化素养及强烈的事业心有关。从外部环境而言,也需要有开明的领导和相对宽松的环境。湖南省委几个主要领导人的素质和民主作风,为李锐提供了发挥主动性的外

部条件。

省委宣传部长周小舟是李锐南下时在开封才认识的。周小舟是个很讲实际的人，为人直来直去，两人可谓一见如故。至于省委书记黄克诚，李锐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记述过对他的印象：

> 我入党之后，经过抗战前后地下党时期、延安六年、热河东北四年，以及在湖南这三年，上下级和工作关系中，熟识的老同志包括中央领导同志，不在少数。但敢于没遮拦，随便交心，明明知道对方不会同意，也敢于表达、敢于坚持己见的，黄老是头一个。

省委对报社编辑部的工作非常放手，非常信任。李锐在延安《解放日报》时大部分时间在评论部，因此当他主持报纸工作后，一直有重视评论的习惯。那时《新湖南报》天天有社论，一般都由报社独立负责，只有特别重要的文章才请周小舟来审阅。周小舟有时就亲自到报社来，和李锐坐在一个办公室里审稿。

朝鲜战争爆发时，湖南是解放不到一年的"新区"。群众对战事发展非常关注，对复杂的国际问题疑问甚多，担心战争的前途，尤其担心第三次世界大战会打起来。

但是，按照多年惯例，地方报纸无权发表国际评论，只能转载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评论。

李锐感到，在这种时候，应该打破惯例，针对新解放区的特点，对舆论进行引导，于是接连写了十来篇短评、社论。为此，李锐和黄克诚发生了很大争论，黄老不赞成这种"越轨"行为。相持不下，只好向中央请示，中宣部当即回电："同意报社的做法。"黄克诚将中宣部的回电拿给李锐看时，笑着说："李锐，你胜利了。"

相互的信任使报社工作与省委的配合十分默契。作为省委机

关报的负责人，李锐一直参加省委常委会，对全省情况、工作部署、方针政策心中有数，报纸发表言论便能有的放矢；另一方面，报社也想方设法当好省委耳目，经常把群众来信和记者采访中发现的问题编成《内部参考资料》送省委各部门参考。

说到李锐写社论，当年在李锐领导下的年轻编辑们至今记忆犹新，虽然今天他们也都七十多岁了。李锐办公室里有一个按他的要求特制的资料柜，样子很像中药铺里的药柜，几十个小抽屉里，分门别类地放着积累下来的方方面面的资料。李锐在社论中对问题的分析、判断，除依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和中央的方针政策，就是查阅历史资料。这使他能够从问题的来龙去脉推测事物的发展趋势。

新华社湖南分社资料室负责人罗厚仁记得：一九五〇年八月一日，金日成向朝鲜军民发布了“从美国武装干涉者手里解放全朝鲜，争取最后胜利”的命令。为此，李锐写了题为《金日成将军命令读后》的社论（一九五〇年八月二日《新湖南报》）。当时，他找罗厚仁帮助记录，自己口述，两千多字的社论两小时完成。

修改时他对罗厚仁说：金日成太轻敌，朝鲜人民军打得很猛，但是孤军深入，这样干要吃大亏的。

不久，美军果然从仁川登陆，一个大包围使朝鲜人民军损失惨重。

事后，罗厚仁问李锐何以判断得那样准确，李锐回答：是根据积累的军事知识以及一个时期以来的资料，分析军事力量的对比和军事形势的发展得出的结论。

李锐在《新湖南报》写社论，经常采取一种很特别的方式：他自己口述，请一个编辑或记者记录，写了几段以后，便让记录者念给他听，边听边告诉对方这里加上几个字，那里去掉几个字。写完后还要征求意见，与对方交流看法。只要你说得有道理，不管是才参

加工作的新手,还是比他年轻十来岁的“小鬼”,他都照改不误。如果发现是个有才华的“苗子”,以后他还会经常把你找来“交流”。

时间长了,大家才明白,他这样做,不光是为了文章完成得快,而且是通过这种途径了解一个编辑或记者的业务水平和思想水平,是培养人才的一个办法。当年李冰封、柏原、罗厚仁、刘海金等七八个人,都是李锐常常找去“交流”的青年。

说到“李社长”对青年记者的态度,人们褒贬不一。他太“感情用事”,对有才华的,会喜欢到近乎“偏爱”,对工作马虎的,又会严得不近人情。

有一次他派两个青年记者去浏阳采访四野政治部主任陶铸给国民党一支起义部队授旗的仪式。这两个记者因上街买早点,误了四野政治部去浏阳的车。两人赶忙跑回报社向李锐汇报情况,李锐顿时火冒三丈,他说:报社不再派车,你们自己去想办法。今天就是爬也得爬去,误了报道我就处罚你们!

两个记者急得都快哭了,他就是不同情。采访部主任谢文清知道“授旗”是件大事,耽误不得,赶忙出来把两个记者带到长沙通往浏阳的路上,截了一辆军车送走,才算了事。

报社的老同志常常这样告诫新来报社的青年:“和李锐社长一起工作,可不敢马虎啊!”好像李锐是老虎。

李锐偏爱刘海金。这位南下时被李锐挑来报社的武汉大学学生会的负责人,不仅文章写得漂亮,而且懂诗,唐诗三百首全能背,还能做诗。李锐器重他,最爱找他谈,谈文章,也谈诗。小伙子有些骄傲,便影响了群众关系。入党转正时,支部大会上只有李锐一人举手。看看周围再没人赞成,李锐举着手自己也笑了,还调侃说自己是“光荣的孤立”。可惜刘海金这个才华横溢的小伙子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还未及释放出生命的辉煌,便被癌症夺去了生命。至今提起他来,李锐还禁不住一再念叨:这个人太可惜了!

这里不妨再补一笔：一九五七年反右，《新湖南报》百分之五十以上的编辑、记者被打成右派，李锐培养的业务尖子：李冰封、柏原、罗厚仁、刘海金等尽在其中。

《新湖南报》在全国各个省报中是比较出色的。但是，依李锐在湖南这三年自己的感受，完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一书的写作及与黄克诚结为忘年之交，恐怕是更大的收获。

开始研究毛泽东

创刊于一九一七年的湖南《大公报》的老板张平子，早年同毛泽东有交往，是一位在报界很有些名气的老报人。解放后，李锐到他家去拜访，知道他保存了一套从一九一七年到一九四九年共三十二年的《大公报》合订本。交谈中，张表示愿将这套报纸送给《新湖南报》社，李锐喜出望外，即由报社赠他五百元。

湖南是近现代史上进步力量和反动力量斗争非常激烈的地方。能有一套三十多年一张不缺的报纸，这就意味着自五四运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十年内战、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这些重要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社会反映都能从中找到记载。

张平子一贯以"大公"标榜自己的办报宗旨，申明自己不偏袒某一政治势力的办报立场，各派政治势力的文章都予登载。他与毛泽东早年相识，《大公报》在五四时期发表过毛泽东亲笔写的许多篇文章。

此后李锐只要有空，就轻轻地，一页一页地翻看那些薄脆的旧报纸，细细寻找毛泽东写的文章。他交给秘书陈学沛一个任务：将自五四运动到大革命时期他自己选定的毛泽东的文章和别人写的有关毛泽东的文章抄录下来。

这些资料使他产生了一个重要的念头：研究毛泽东思想发展的过程，研究毛泽东走过的道路。于是他带着秘书到处寻访毛泽

东在湖南的同学、朋友，凡是新民学会成员还健在并仍在湖南的，他几乎都访问遍了。这种访问有两种意义：一是从这些老人的回忆中了解毛泽东早年的情况；二是在寻访中搜集散落在民间的有关资料。

寻访和征集活动的收获异常丰富，李锐是这一“富矿”的第一个开掘者，与毛泽东同时期的人也大都健在。湖南第一师范的校长周世钊不仅为他提供了长沙可以找到哪些毛泽东的老同学、新民学会的老成员等重要线索，还将毛泽东给自己的第一封信交给李锐。一九五〇年，周世钊奉召到北京去见毛泽东，毛泽东青年时期精心阅读并在空白处写下大量批语的《伦理学原理》一书的保存者杨韶华托周世钊将书带还给毛泽东。周世钊立刻将该书交给李锐，但只限三天，因三天后他将赴京把此书物归原主。

书上那些“批语”使李锐意识到：这些东西与毛泽东思想的起源有某些直接的关系。当时国内还没有复印设备，于是请人将书中凡是有批语的地方全部拍照，这些极为珍贵的资料，成为后来李锐研究毛泽东早年思想状况的重要依据。

王前是李锐武汉大学时的同学，在湖南第一师范任教务主任。土改时，他到一师老校长孔昭授的家里，找到了毛泽东在一师读书时的有关资料，如《学友会记录》、《夜学日志》、《一师校志》等交给了李锐。毛泽东故乡的亲戚、乡亲还将《讲堂录》、《祭母文》和几本有手迹的课堂讲义，甚至毛泽东当年的借书条统统交给李锐。李锐在延安《解放日报》时期，就极其熟悉毛泽东的手迹，两篇社论的手稿一直带在身边，这使他能够准确无误地对那些手迹进行鉴定。

一九五一年初，李锐将毛泽东早年在《大公报》发表的世人罕见的二十多篇文献编成《毛主席旧作辑录》，在报社印了五十本，并将样本寄送中宣部。不久，中宣部回电：有害无益，全部上缴。

显然，在中宣部领导人看来，这些毛泽东早年很不成熟的文章如果流传开来，对毛泽东的形象似乎不利。

但李锐的本意是想通过这些文章,反映一代伟人的思想发展过程,并为深入研究提供依据。因此对回电耿耿于怀。三十四岁的李锐,血气方刚,岂肯罢休? 索性发奋著书。《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一书由此投入写作。该书在李锐一九五二年秋离开湖南之前完稿,一九五三年在《中国青年》杂志上连载,一九五七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至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停印,共发行了一百万册以上。

忘年交

黄克诚比李锐大十五岁,由于高度近视,人又显得苍老,四十几岁就被大家尊称为“黄老”。在一九四八年三月东北局召开的平分土地运动总结会上,李锐第一次见到黄克诚。开会前高岗到热河去了半年,这段时间凯丰主持工作,结果许多地方“左”倾泛滥,李锐印象最深的便是黄克诚在会上与凯丰的激烈争论,以及黄对“左”的偏向声色俱厉的批评。

到了湖南,李锐和黄克诚接触的机会就多了,特别是一九五一年初周小舟到湘西主持区党委工作,推荐李锐任省委宣传部长以后,他和黄老除了经常在一起开会研究工作,李锐还常去他家,同他无话不谈。在李锐眼中,黄老是一个“从思想作风到生活小节,待人非常随便随和,真正平等待人,也从不掩饰自己观点的人”。

李锐对党史有兴趣,便常常问及黄老这方面的问题。例如,他曾向黄克诚请教:在江西,打“AB团”到底是怎么回事? 还问过:在江西反围剿中,毛泽东的威信那么高,为什么王明路线一来就把他排挤掉了,难道中央领导层中没人出来支持他?

黄克诚说,红军时期,毛泽东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很服人,但他的组织路线及个人的性格脾气确实有缺点,因此失掉了一部分人心。毛泽东过于信任顺从自己的人,对待持不同意见者,整起人

来，决心大，手也狠，不及朱老总待人宽厚。

黄老还告诉李锐，当年有一个反对毛泽东被下放到他那个师的干部何笃才对他说过：有一个叫李韶九的人，品质很坏，就因为会顺从，骗取了毛泽东的信任而受到重用，权力很大，干了坏事也不被追究，很多人不服。此人成了江西时期的“康生”，在红军中大肆捕人，刑讯逼供，最后激起富田事变（乱抓乱杀引起军队哗变），进而造成大打“AB团”的错误肃反（“AB团”是一九二七年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段锡朋等人组织的一个上层反共组织，存在时间不长，一九二八年国民党内部统一后就自行消失了）。

在两人无拘无束的漫谈中，黄老也谈起自己的经历。原来，黄老参加革命以来，因同“左”倾路线顶撞、斗争，受到批判、降职等处分不下十来次。

战争年代，党有铁的纪律：下级必须服从上级。但是每当看到“左”倾路线给革命队伍、给民众造成的损失，黄克诚总是忍不住要抵制、要争论。四十年后我们从李锐写的《一辈子讲真话的人——记黄克诚》一文中，可以看出当年这些交谈深刻在李锐心中的印记：

> 第三次反围剿之前，开始了第二次大规模肃反打“AB团”运动。黄时任第三师政委，上边命令抓捕所谓“AB团”分子，他就拒绝执行了。可是当时肃反委员会权力太大，三师中还是杀掉了一批干部，其中有不少很优秀的干部，如前面提到的何笃才便是。何是湖北人，师范学生，参加过南昌起义，对一军团的情况很熟悉，黄同他相处中，无所不谈。以后再要抓人，黄就硬着头皮顶住，坚决不从，还对肃反委员会的人说：你们要抓的人中，并没有一个地主、富农分子。后来实在顶不住了，就悄悄通知名单上的人上山躲藏起来，打仗时再下山参加战斗。

但最后这些人还是被找到杀掉了。他为此无限痛心，悲愤地质问肃反委员会，为什么滥杀无辜？同他们大吵了一通。因此黄也被怀疑是“AB团”、“托陈取消派”，决定将他抓起来“审查”。在三军团，黄同彭德怀之间已建立了相互直言的关系，有时吵了架也相安无事。这时幸亏彭深深信任这位打仗和进言都勇敢的部下，进行了干预，他才幸免于难，保全了性命。但仍然被戴上一顶“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撤掉了他三师政委的职务，分配到军团司令部当秘书。他对彭德怀的干预从来不知道，彭也从未跟他谈过此事。后来庐山会议上受批判时，说他支持彭的《意见书》，是为了报救命之恩，他才知道这件事情的原委。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开始纠正肃反“扩大化”之后，黄才又被起用，任一师政委。

一九三五年九月，长征的红军向陕北作最后的进军。指战员体力消耗很大，伤病员很多，行军时掉队的人一路不断。保卫部门怀疑这些人情绪不振，会投敌叛变，决定严办。当时黄已降职担任军事裁判所所长，对这些同志实在不忍处理。有一位受过重伤的管理科长，只因过草地时丢掉几名伤员，也要交付审判，他就去找上面求情，却遭到了狠狠的训斥，撤掉了他的所长职务。总结了这些沉痛的教训，抗日战争中他在新四军时，在华中局扩大会上作报告，谈到审干和锄奸问题，提出了“宁可错放，不可错杀”的主张。

李锐曾同黄老谈过自己在延安被“抢救”，坐了一年多牢的情况。黄老就谈到他当年是如何抵制这一运动的。

一九四三年四五月间，华中局奉中央令开展“抢救运

动”时，黄就建议，要接受打“AB团”的教训，不要执行，以免发生逼供信的错误。可是，华中局不能不执行。他没有办法，只好在自己所属的第七旅，亲自去搞试点。有几个人软逼时即不正常，抓起来一审讯，就乱供一气，不着边际了。黄于是立即让停止“抢救”，将被“抢救”的人统统释放，做好善后工作，同时立即通知所属部队和管辖地区，一律不开展“抢救”运动，从而在苏北和三师避免了这场灾难。

前辈的教诲，自身的经历，当李锐把这些感性的直觉上升为理性的反思时，一种对“左”倾路线深层的认识，即对“左”倾本质的彻悟，便成为他世界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一塌糊涂的“家政”

“新湖南”时期，李锐在思想和工作经验方面都发生了“质”的飞跃，而他的“家政”却是一塌糊涂。

婆媳关系一开始就不好。母亲的封建家长作风确实严重，范元甄以革命干部自居，对婆婆及李锐的姐姐遇事不忘阶级分析。每当“战事”爆发，李锐的处境就非常可怜：一边是母亲、姐姐，一边是妻子，越是两边都不敢得罪，越是两边都得罪：母亲骂他“怕老婆”，姐姐怪他“一边倒”，妻子则痛斥他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范元甄讲的并不全是气话，而且这一斥责也不仅止于家庭关系方面，对于剥削成分的、有历史问题的以及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等这类人所持的态度，她与李锐的确存在着难以弥合的重大分歧。

第七节　却曾八载醉于斯

改行成功

多少年来，在李锐的潜意识中，一直在寻找着一个舞台。尽管他的文字生涯已证明了他在这方面的出众才华，但他始终觉得，那决非理想的寄托。当年南下时，尽管陈云一再挽留，李锐还是表示："让我自己去干点事情吧。"

机会终于来了。一九五二年，经过三年休养生息的新中国即将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投入大规模经济建设。中共中央准备让有专业知识的干部"归口"，李锐便以自己在大学学习机械为由，要求转业到工业系统。

李锐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促使自己转业的原因，一是对宣传文字工作的厌倦：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将近十三年，难免会染上眼高手低、坐而论道的习气；二是国家要全力发展工业，因此他希望去负责一个厂的工作。

其实李锐一九三四年考入武大，一九三五年"一二·九"。运动以后就基本上成了职业革命家。但这仍然是一条很过硬的理由，以致省委不得不同意。黄克诚却有不同看法，他认为李锐应当朝理论方面发展。然而李锐决心已定。几天以后，黄老不再坚持，原来他自己也被调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长了。

省委开会，给调中央的干部作鉴定。经过黄克诚审定，李锐的评语中写道："正派、聪明、有原则性，有能力，但实际锻炼不够，不愿作宣传工作。"李锐说："聪明"是没有意义的，不应写入。

一九五二年九月中下旬，黄克诚邀李锐同车上京赴任。他提醒李锐：要善于处理干部关系。要懂得中国的人情世故，对下级要

宽,从工作、生活到感情,都能融洽才好。尤其对上不要硬顶,实际上多数上级对此是受不了的,有时反而误大事。他还特别向李锐强调:"批评权不要太大。"

为了压压李锐的少年气盛,好心的黄老已经不是第一次对李锐讲这类话了。

十月十日,李锐到燃料工业部报到,他被分配到水电工程局任局长。住在招待所时,胡乔木打来电话,要李锐到中宣部搞党史,说中宣部没抓紧,消息知道晚了。电话中仿佛在向李锐作最后呼吁,李锐以"听从组织分配"为由婉言谢绝。

这次改行成功,使"李锐"这个名字,于半个世纪以后,作为"新中国水电事业创始人"之一,载入《中国大百科全书》。

趁到任前还可以做几天"自由民",李锐去看望了老板(陈云)。几天来,因为生小病,陈云一直未见客。"三年南下,冤不冤枉?"当年陈云不赞成李锐离开他,今天故有此问。不久前,陈云还问过他的秘书周太和:李锐的工作定了没有?他不愿意到我这里来?

谈到今后的工作,陈云警告李锐:"如果搞不好,就要准备让位。"还说自己在几个地方都讲过这话。周太和也在一旁叮嘱:人家都在看你的本事,必须做好种种准备。当初李锐为了转业成功,曾托老周帮忙,现在他又给李锐提了醒。

当晚李锐在日记中写道:

> 我该做些什么准备呢?先了解些什么呢?
>
> (一)五年计划蓝图,根本方针的体会。(二)燃料工业部概况。水电局干部情况。过去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困难。(三)当前进行的主要工作。(四)我的任务,从何着手?(五)先从哪些地方学习。

新来的局长

陆钦侃、程学敏都是原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的水电工程师，也是中国早期水电专家。这两位三四十年代分别留学美英的专家，在李锐领导水电工作前后十一年中，在专业知识方面对他帮助很大。

我曾问过这两位老人：李锐最初给你们的印象是什么？

最初的印象往往是令人难忘的。何况李锐给人留下的印象又是那么强烈。所以虽然事隔四十年，两位年届耄耋的老人谈起来仍然记忆犹新，不费踌躇。

程学敏说："李锐来之前，水电归燃料工业部计划司管。他们根本不懂水电，却有权力管水电。他们对我们不能用平等的态度，开口就训人。在他们眼里，我们这些国民党留用人员就像俘虏一样。

"一次一位刚从苏联参观回来的领导把我找去，不客气地问：'你们到底会不会建水电站？人家苏联古比雪夫水电站施工用电要十四万千瓦，你们狮子滩施工用电怎么只要七千千瓦？'他根本不懂，苏联之所以施工用电如此大，不仅因为这个工程规模特别巨大，还因为他们在电站周围建了一个很豪华的城市，以显示共产主义的成就。这已超出了水电站的建设范围，也不符合我国国情。但他那种态度使我不愿多跟他解释。他还武断地说：我看给你们多加一倍也不一定够。跟这种领导共事自然是很难受的。

"因为有这样的背景，第一次和李锐见面印象就很深。他对我说，他是武大的。正好我的好几个朋友也在武大学习过，这样一说起来就感到亲近。

"李锐问：'你看咱们跟水利部的关系怎么处啊？'当时为了官厅水库建电站的事，水电、水利两个部门正在闹矛盾。他一见面就

和我谈这么敏感的问题,使我不禁有点吃惊,也为他的信任深深感动。但我们这些人被人歧视惯了,难免存些戒心。我想:部门与部门之间闹矛盾,他们党员之间再怎么争也不会有麻烦,我们要是卷进去,将来出了事肯定都算在我们国民党留用人员的头上,所以没敢多谈。

“过了几天,报社送来一篇我写的水电方面的杂文清样。我吃过午饭回来,发现清样被人改动过,而且改得很好,就问是谁动过。李锐走过来说,是我改的。还说删掉的字数和加上的字数我都给你算好了,报社如已排好版,大样都不必动。

“我这个人就喜欢弄弄笔头,他的文章这样好,自然就更愿意和他接近了。

“总之,和他一接触就觉得在五十年代的共产党干部中,他身上具有更多的知识分子的气质。”

陆钦侃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谈的。他说,有些懂政策的共产党干部对我们也很客气,可不知道怎么就是不大谈得进去。李锐却让你一接触就觉得合得来,愿意和他谈。他也不像其他党员干部那样动不动就找我们谈思想,他从来也没专门和我们谈过什么思想。但就在共同研究那些规划、设计、工程方案中,我们彼此都了解了对方的思想。

我曾将这些工程师的看法与李锐交换意见。李锐回答:爱国,有事业心,尊重科学,就是这些,使我和他们找到了共同点。

要不是写这部书,李锐自己也不知道,在最初的接触中,这些共同点通过一件件琐碎的小事,被那些老知识分子们统统珍藏在人生的记忆库中。

他们说,李锐一来,就让我们给他推荐讲水力发电的专业书籍,每天晚上钻研到深夜。在许多党内领导都在以外行自居,以外行为荣的年代,他这种学习精神真让人感动。

李锐上任不久，便由陆钦侃陪同，去浙江、福建出差。一路上，他让陆钦侃给他讲关于水力发电的基本知识，一个多月的旅途，无论是在列车上还是在旅馆里，只要有空，他就要陆钦侃给他讲。

显然，李锐急躁、火气大的坏脾气，并没有因为到水电局就改好。因为据陆钦侃回忆：那次出差，他们同行的三人中，还有一个党员干部好像还是个处长什么的。李锐经常因为他在工作中的不慎严厉地训斥他。“他训起人来可真凶。”陆钦侃说。可李锐对程学敏、陆钦侃这些老工程师却一次都没有发过火，即使他们在工作中也会有失误。显然，他在潜意识中是把他们当做老师看待的。按照中国“尊师”的传统，学生官当得再大，也不能对老师发脾气。这种感情的偏向，在五十年代初的党内领导干部中真是太特别了，难怪后来有人要告他。

很快，陆钦侃对这位新局长的好感转为钦佩。他发现，李锐身上那种创业的魄力和活动能力，是他们这些工程师所望尘莫及的。比如为了建立新安江水电工程局和古田溪水电工程局这两个机构，他找了好几个战争年代就认识并已在地方政府工作的南下老干部，请这些老关系给他帮忙，还请他们在工程局挂职，这样便使这两处工程建设能够更好地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和重视。

没有几年时间，李锐的专业水平便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以致使与他同年同月出生的程学敏由衷地感慨：“如果他读大学的时候不是去搞革命，而是像我们一样好好念书的话，一定会比我们念得好。”

然而最使这些老工程师在感情上同李锐靠近的，恐怕还因为他们发现这位新局长同他们一样，都是那种对科学的虔诚超过对政治偶像虔诚的人。

抗美援朝前后，国内掀起一股反美浪潮，这股浪潮从政治领域波及思想领域直至学术领域。而搞水电的那些旧资源委员会的工

程师们，绝大部分都曾留学英美。特别是一九四六年美国垦务局设计总工程师、世界著名大坝权威萨凡奇博士，完成了对三峡的踏勘之后，邀请五十四名中国水电工程技术人员赴美，进行三峡工程的研究设计。一年以后，因国内政局动荡，设计中辍，但这一计划却培养了一批熟悉、了解美国水电工业先进水平的中国工程师。

在大力批判亲美、崇美思想的政治浪潮中，这些人都被批得够呛。从欧美学来的东西再不敢提了。

其实在这个问题上，被我们尊为共产主义楷模的苏联专家倒比我们客观得多。他们知道苏联的水电工程赶不上欧美，所以当他们发现旧资源委员会存有一批欧美水电技术资料时，便兴高采烈地拿走了。

"一边倒"是那些年中国政治的一大特色。在从政治到科学技术对欧美一概否定的同时，苏联的东西则一概被认为是最好的，最先进的。有些工程技术方面的意见从陆钦侃、程学敏这些人口里说出来，根本得不到信任，但从苏联专家口中说出就成了金科玉律。

李锐来到局里以后，工程师们很快发现，欧美在水电方面的先进经验，跟别人不能讲，跟这位新来的局长却尽可以讲。他不仅听得进去，还鼓励你讲、希望你讲下去。后来程学敏干脆建议李锐办一个内部杂志，专门刊载介绍欧美水电方面的好文章。李锐欣然同意。这份在反美浪潮中诞生的《水电建设参考资料》出版后，居然很受欢迎，后来还汇编重印。

不受政治环境的局限，多方面汲取世界先进科技成果的营养，是李锐的专业水平迅速提高，出类拔萃的重要原因。老革命、老党员的牌子，成了当年李锐在科学领域中偷食禁果的护身符，着实令戏称自己是国民党"残渣余孽"的陆钦侃、程学敏们羡慕不已。

蹩脚的舞台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的水电建设完全处于启蒙状态。旧中国南京资源委员会的水力发电工程总处,虽然网罗了不少外国回来的技术人员,但也确实没有修成几座像样的水电站。这也是一些共产党干部看不起旧资源委员会那些水电工程师的原因。怎么说呢?科学碰到政治,科学家碰到政治家,有时真像秀才遇见兵,苦水只能往肚子里咽。但科学家毕竟是科学家。国家衰败、政局动荡、资金短缺,他们无法扭转乾坤,却有着对事业的执著:四十年代,黄育贤工程师在四川长寿县主持修建了桃花溪、下硐水电站;张昌龄工程师主持修建了西昌、天水水电站;覃修典工程师主持修建了西宁水电站;张光斗工程师主持修建了瀼渡河水电站。这些水电站虽然很不起眼,都不过几百千瓦至一两千千瓦的规模,但总算走出了中国水电史上从无到有的一步。这些工程师也都成了中国水电建设的元老。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水电工业的惟一上层机构水电工程局,隶属燃料工业部计划司。为了弄清水电在这个部里的地位,首先要对这个部的格局有一个基本的了解:燃料工业部包括三大总局:煤炭、电力(火电)、石油。水电工程局虽然也是一个局,但与上述三大总局并不是一个层次,是“部内局”。也就是说,它没有独立规划、部署、指挥水电系统各部门的权力,它的责任是针对水电工业中的问题,向部里提出建议和执行部里的决议。因此它实际上是个办事机构而非领导机构。难怪人们说,水电局与煤、电、油三大总局比起来,只是一个小弟弟。水电的同胞兄弟水利,地位更是比他高得多,不仅是堂堂皇皇一个部级单位,而且因为部长是傅作义,有事可直接去找周恩来、毛泽东商量。

创业

李锐到任不久,便发现这个格局极不利于水电事业的发展:部里搞电力的和计划司的几位领导只熟悉火电,对水电不了解也不重视,水电在他们的管辖之下很难有所作为。

从华东考察回来后,经过与局内同事反复研究,李锐向部里提出:同其他三个总局一样成立部领导下的水电建设总局,独立负责领导全国水电建设的规划、勘测、设计、施工。各地施工处均设工程局,由水电总局统一管理。

这一方案立刻引起很大争议。部、局、司各层领导中都有反对意见。电力总局的领导就认为:水电力量太小,不宜独立成立总局。不少人都赞成水火合并,即把水电局划归电力总局。而这实际上是给水电从计划司那儿换了个新婆家,水电仍然摆脱不了被歧视和束缚的小媳妇境地。李锐当然不能接受,成立水电总局方案的充分根据,使他底气十足。

原来,李锐在钻研专业知识的同时,一直没有忘记对于水电在国民经济以及在中国能源结构中应处的地位这一宏观问题的研究。他组织人力,利用现有的资料对全国水力资源进行了一次统计,结果表明,中国的水力资源蕴藏量为世界第一,达五亿四千万千瓦(八十年代普查结果为六亿八千万千瓦)。大大超过国民党时期调查的一亿五千万千瓦的数字。

开发条件之优越,也为世界少有。从构成水力发电的两个基本条件——流量和落差来看,中国大部分地区雨量丰富,河水流量较大,地形的西高东低,使河流大多坡降很大,而且上中游多经过地形狭窄的峡谷地区,落差大而集中,可以用较小的工程量得到很大的发电能力。苏联在欧洲地区的水电站河流平缓,筑坝地点河面宽阔,工程量异常巨大。

不利的一面主要表现为河流泥沙多和淹没损失大,但这些问题可以在规划选点时尽量予以避免。

从其他动力资源来看,煤炭和石油储量全都是有限的,用掉一部分就少了一部分,而水力资源是再生性的,用之不竭,又没有污染。不利用,任其白白流走,极为可惜。

不发展水电,就只好靠烧煤发电。而这些煤和油本可以在冶金、化工等领域发挥更多用途的。所以搞水电的人有一句顺口溜:江河的水,滚滚流,流走的都是煤和油。

掌握在李锐手里的,就是这样一份家当。

水电必须大发展,不然就对不起上苍赐给华夏民族的这份宝贵资源;水力资源不是文物,不能存起来"压箱底儿"。文物存着增值,水力资源不利用就是浪费。何况国家要大规模发展经济,对电的需要如饥似渴,如此优越而用之不竭的资源哪能让它睡大觉呢?

要发展就得有一个有利于它发展的体制和机构。这就是李锐要建立一个能够领导水电工程的水电建设总局的根据。而这也是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以后,批判李锐"大水电主义"、"搞独立王国"、"宗派主义"的依据。

为了实践战略部署,李锐不仅找了燃料工业部部长陈郁、副部长刘澜波进行疏通,而且写信到中央,找到了"老板"陈云。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李锐总算拿到了"尚方宝剑"。一九五三年初,刘澜波和李锐正率领中国电力访苏团在苏联参观学习。那天,李锐在日记中写道:"一月下旬给陈云同志的信,薄(一波)主任批回来了:'此事可予原则同意'……有了圣旨就好办了。"

回国后他才听说,陈云在说服燃料工业部部长陈郁成立独立的水电总局时,套用了李锐对自己说过的那句话:"你让李锐自己去做点事情吧!"

水电建设总局成立后,李锐的第二步棋便是招兵买马。他把散兵游勇式的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几支水电队伍及其工程,统统收

编旗下。为了解决勘测力量薄弱,而有限的技术力量又过于分散,使地质工作质量难于保证的问题,李锐把各地主要设计人员集中到北京,由苏联专家进行培训,让旧资源委员会的工程师们共同参与方案的研究把关,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北京设计总院。

接着,李锐又在全国按西南、西北、华东、华北、东北、中南各大行政区和上海、广州等重点城市分别成立了八大设计院。把在北京参加过集训的设计人员,作为各大设计院的骨干派下去。

这又是具有战略意义的一步棋:水电建设尤其是大工程,勘测设计的时间需要很长。因此,水电要上去,勘测设计一定要先行。各大设计院分别对自己所属区域的水力资源进行查勘、规划、设计,上项目就有了前提,局面就可以打开了。

事业的发展使技术干部日益显得捉襟见肘。旧中国留下的水电技术人员一共二百来人,新中国成立后两三年分配来的大学毕业生,也因为部领导不重视而寥寥无几。更可气的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初步方案中,除丰满水电站的修复工程以外,再没有一项水电工程被列入计划。水电在整个工业系统中,仍是一个不被人重视的弱小力量。李锐常常为给水电争投资、争项目、争大学毕业生,在部里和计划司吵得面红耳赤,甚至伤了感情也在所不惜。最后,狮子滩、新安江、上猶江、流溪河、以礼河等一批水电站硬被李锐"争"进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本来只准备将某届有关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分给水电总局四分之一,由于李锐亲自出马,那势在必得的气势吓得其他单位的人事干部只得甘拜下风,大学生让他"争"走了一半。他不管别人对他怎么看,也不讲究方式方法,就是要发展水电!用李锐自己的话说:"新生事物只有在大吵大闹中才能获得自己的地位。"

"走麦城"的时候也不少,好几次李锐在部里开会回来都是怒气冲冲——某项工程没能如愿上马,他又和别人吵翻了。"大水电主义"、"独立王国"、"搞宗派"之类,恐怕没等一九五九年大批判,

就已经是一些人腹诽的内容了。

水电在中国的历史太短了。虽然这株小苗应该有着栋梁的前途,但现实中的它毕竟太稚嫩了,以至于从国家领导人到部以及相邻行业如火电、水利部门的负责人对它都不够了解,李锐的处境真难啊!他那句名言"水电是在水利与火电的夹缝中求生存",真是道尽了个中的酸甜苦辣。

光靠"争"当然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一年之中,李锐便派人在全国办起了五个水电学校,并请清华、地质等大学为水电代培了几期技术干部。这些学校均成为中国水电工业的摇篮。听说李锐担任名誉校长的北京水电学校,在一九九三年庆祝四十周年校庆的时候,校友已达六千多人,其中成为高级工程师、总工程师者,不乏其人。

李锐认为,一些领导干部对水电支持不够是因为他们不了解水电。例如一九五三年李锐明明已向部里提出水电方面的地质工程师全国只有一人,是最感困难的问题之一,而在分配地质专业的大学毕业生时,主持会议的刘澜波只知道煤炭需要地质人员理所当然,却不了解地质也是水电建设的要害。结果水电只分到两人。气得李锐中途退席,以示强烈抗议。幸亏刘澜波是厚道人,事后对李锐这一无礼举动也没太介意。但为了诸如此类的事情,李锐与其他领导却结怨不少。

一九五四年初,李锐之所以积极动员刘澜波率团去苏联,目的之一,就是要把刘澜波争取过来。部里没有一位领导了解水电,工作起来实在有诸多不便。在苏期间,他们始终以参观学习水电为主。当时在苏联动力学院学习水电的毕业生李鹏等四人参加了他们在苏联各地的参观活动。在莫斯科的基辅旅馆,李锐与刘澜波同吃同住一个多月,晚上常常谈到半夜。这次活动结束后,两人在发展水电方面的意见,就完全一致了。

为了让更多的人特别是领导干部了解水电,李锐重操旧业:搞

宣传。在人手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水电总局办起了《水力发电》、《水电建设通讯》、《国外水电技术》等刊物,并组织拍摄了《丰满水电站机电安装》和《狮子滩水电站堆石坝施工》两部科教片。李锐亲自为刊物组稿。他不仅经常出题目让那些老工程师们写,而且还要他们作出计划:每年要写多少万字。李锐自己更是笔耕不辍,老工程师们都说:他文思可真敏捷,我们有时只简单跟他讲了几句,他一会儿就写好一篇文章出来,道理讲得非常透彻。一九八一年电力工业出版社出版的李锐的水电论文集《论水力发电与河流规划》,其中除少部分是他在一九七九年恢复工作以后写的,其余二十几篇都是五十年代李锐的著述。一位八十年代末留学美国学习水电经济的中国研究生告诉我,他们读书时是把李锐的那些文章当做教科书来读的。因为李锐五十年代的文章就已具有很强的现代管理意识和高水平的经济分析。

除此之外,李锐还著有《水力发电建设》、《工业的动力——电、水力发电》、《黄河的治理和开发》、《学习苏联水力发电建设的经验》等一系列科普小册子。

为了使少年儿童从小了解和热爱水电,一九五九年,李锐让技术人员在北海公园建了一座装机容量为十千瓦的少年先锋水电站。

一次,在局务会上,大家谈到水电投资总是不能得到满足的问题时,有人提出,石油部不久前搞了个展览会,朱老总去看了,当场表示:“只要你们能搞出油来,要多少钱给多少钱。”是否我们也搞个展览会?李锐立刻肯定了这个意见,并当场指定了筹办这件事的负责人。

一九五七年十月在北海公园举办的这个展览会,成为中国水电史上的一次盛举:周恩来、朱德、宋庆龄、林伯渠、彭德怀、贺龙、陈毅、李富春、邓子恢、聂荣臻、谭震林、薄一波、郭沫若、徐向前以及中央委员和各部部长一百多人前来参观,其中周恩来、李富春、

彭德怀等来参观时李锐亲自陪同。

豪爽的陈毅参观后,题词道:“利用水力发电是最大的水利,不可不知。”

李富春是熟人,李锐不单就展品向他进行解说,而且谈了中国水电建设中的种种问题。李富春深有感触地说:“通过这次参观,我对中国水力资源的地位和水电的重要性,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周恩来总理是在一天下午来参观的。他看完展览,又坐下来看了水电总局拍的那两部宣传水电的科教片。当天晚上周恩来总理在出席宴会时对来宾们说:燃料部在北海搞了个水电展览会,搞得既节约又好,比到全国跑一圈还好,你们副总理和各部部长应该去看看。

于是,又有许多领导人陆续赶来参观。

三个月里,来参观的群众达三十万人。清华大学水利系等学校的学生是分批集体来参观的。当年参观了展览的一位清华水利学生,现在已是水电系统的负责人。他说,当时水电展览会那种生机蓬勃的局面太吸引人了,我就是看了那个展览会,毕业时才主动要求到水电系统工作的。

许多水电界的老人不约而同地向我谈起这样一个感受,他们认为,中国的水电事业发展最快、最兴旺的时期是五十年代,说他们到现在都非常怀念那个时代。

“水主火辅”话方针

“水主火辅”是李锐五十年代根据中国能源情况提出的发展电力工业的长期方针。在“因人废言”的年代,这条方针与李锐同浮沉。

在电力工业中,水(电)火(电)之争,中外皆然。不同的是,资本主义国家争市场,社会主义国家争投资,争技术力量。

李锐认为:动力资源的条件,是影响世界各国水电和火电比重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中国水力资源的丰富和开发条件的优越均占世界首位。火电的发展决定于煤炭的供应和运输条件。中国煤炭资源也是丰富的,但由于分布不均,北方多于南方,西部多于东部,运输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多年形成的北煤南调和长距离运输的现象,不仅给运输造成很大压力,而且在长距离运输中浪费很大。

"水电比火电投资大、工期长。"这是当年火电攻击水电的一张王牌。新中国成立以后,一直"火主水辅"的根本原因,乃是用电急迫,因此每年总是将有限的投资用于收效快的火电。

李锐认为,这种计算投资和工期的方法是不科学和缺乏全面经济观点的。对于水电,投资是将修水库、建坝、盖厂房、装机统统计算在内,工期也是从头算到尾。而火力发电却只计算建电厂、装机的投资和工期,煤矿的勘测、开采,以及煤的运输这几项投资和工期却不计算在内。如果把这些因素都加进火电成本的话,以中国水力开发的优越条件,再加上水电站的机电设备比火电便宜等因素,水电和火电的投资就几乎相差无几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水电都比火电贵几倍,只有中国,水电和火电的造价相近。中国水电造价低廉这个优势,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何况开始发电以后,火电必须继续增加煤炭开采和运输方面成本,而水电则不需要再投资,水电站的管理人员也只占火电厂的十分之一。

在投资效益问题上,还有一个在国内被人们忽视了的问题,就是人们往往只考虑了发电的因素,而没有考虑到一个水电站的建立,往往可以在防洪、灌溉、航运、发展耗电工业、水产养殖、工业给水等方面发挥综合效益。

水电是最便宜的能源为世界公认。因此,各国无不优先发展水电。尽管他们的资源和开发条件不如中国,但在五十年代,水电却在许多国家的能源结构中占到百分之五十以上,有些甚至达到

百分之九十，而中国只占百分之二十五左右。

所以，李锐坚持认为：对于水电的建设及其投资问题，应当有一个全面的看法，就是要算总账，要看远一步，不仅看到今天的投资，还要看到将来电站运行费用和煤的节省。如果总是急功近利，一遇投资紧张，就把重要的水电项目往后推，中国的水电工业便永远难以得到发展。

只有让水电逐步发展起来，才能改变用过多的好煤来发电的不合理状况，使今后火电的发展更合乎经济合理的原则。因此，电力工业的长远方针应该确定为“水主火辅”。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发展火电：有大量劣质煤要利用；用电急迫，水电建设赶不上；电力系统需要有一定的火电容量调整配合，以及实在找不到较好的水力资源。

对于这一方针的实施，李锐认为：首先，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这是需要和可能的；其次，由于资金短缺，用电急迫，而水电一次性投资大、电站坝址的勘测需要耗费的时间较长等原因，这个方针不是短期内能够实现的，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只能以发展火电为主。但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来看，算一算大账，(五十年代)提出“水主火辅”的长远方针是完全合理的。

根据这一方针，李锐还为中国的水电工业绘制了一幅蓝图：“为了实现水电为主的方针，关键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由于勘测设计能力、机械设备和技术领导经验不足等原因，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水电站建造数目不得不受一定的限制)因此我们应当尽最大的努力，使得对重要工业发展起关键作用的一大批水电站，能够在一九六〇、一九六一、一九六二这三年中陆续开工。这样，我们就有可能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使水电大大跃进一步，开始中国电力工业的一个根本转变；第四个五年再接再厉，到一九七二年以后，水电的比重就能超过火电。”

这一方针在一九五七年的南宁会议上得到毛泽东等与会中央

领导人的肯定。但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李锐受到批判以后,这个方针也被戴上了“大水电主义”的帽子,优先发展水电几乎成了思想禁区。

水电“帅才”

如果说,李锐在新闻、宣传事业中虽然颇具才华,却很难讲有多少重大贡献的话(说实在的,在这个领域,共产党内比李锐更具才华的人物,又有多少重大贡献呢?! 李锐不欠文债,已经是很不错了),那么他在水电建设这个舞台上的作用,就大不相同了。许多水电界的老专家都说:五十年代,李锐对中国水电事业的许多贡献都是开拓性的,那几年要不是李锐,中国的水电不会发展那么快。

中国水电建设的起点是很低的。比如对河流的整体规划、综合利用、开发程序等,在欧美三十年代就已经成熟,但五十年代初的中国在这些方面基本上还是空白。直到一九五四年,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中国才第一次进行了黄河规划。李锐就是在亲自参加这次规划的过程中,学到了这方面的实际经验。有了这个基础,一九五四年底至一九五五年初,李锐在苏联考察学习期间,对苏联在规划中的经验、教训便特别留意。虽然苏联的水电工业水平不及欧美,但是对于开始起步的中国,那些经验还是非常重要的。

针对中国初期建造水电站不成系统的问题,以及在这个水患深重的国度根深蒂固的“治水就是单纯防洪”的片面观点,李锐在理论和实践中强调了一整套以实现综合利用为原则的河流整体规划思想。

不知读者可曾有过这样的经验:当你读一本杰出的军事著作时,即使你对战争毫无兴趣,但作者在对问题的思考和分析中所表现出的严密的逻辑、机智的推理、精彩的议论,仍然会使你受到强

烈的吸引。此时，那些议论的具体对象已不重要，也就是说，不管他是在讲战争还是政治，物理还是化学，都已无关紧要，真正使你兴趣盎然的是他那超越了具体对象，在抽象思维中表现出的卓越的智慧。

在读李锐的《论水力发电与河流规划》这部纯粹的专业论文集时，我就有这种感受。请看，他在谈到规划与具体工程的关系时写道：

> 正确地设计一座水电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正确地决定一条河流的开发方案更为重要。如果在整条河流的规划中并不处于最佳位置，即使水电站设计得很好，也不一定是成功的方案。
>
> 我们可以用战略战术的关系来比喻这个问题。一个是关系到全局性的问题，关系到政治、经济和自然条件等各方面；一个是比较局部性的问题。这就是说，建设水电站的任何技术方面的决定，必须先从全局经济作根本的考虑，特别是大水电站的修建，它同整个国民经济是联系在一起的，必须先根据整个电力工业和有关国民经济的布局及发展作全面的分析论证，然后才能决定它的建筑物的位置和本身的参变数：水位、装机容量、年平均发电量、淹没损失等等。

几十年以后，李锐根据这一原则，认为一九七〇年上马的、被人盛赞为“世界第一流的、杰出的工程”，同时却在规划方面问题甚多、经济效益不佳的葛洲坝水电站，是“战术上的成功，战略上的失败”，是“由于没有做好综合规划，并非必然开发目标而仓促上马带来的被动。”

在水电总局一次谈规划问题的会议上，为了让与会者了解河

流开发综合利用思想，李锐在讲话中打了这样一个比喻：

> 例如我们没有钱另外再盖礼堂，现在开会的地方旁边有一座很大的饭厅，于是设计时地面稍有一点坡度，是同时考虑到既要便于吃饭，也可以开会、看电影、演小剧。假如仅仅考虑到吃饭，就叫做没用综合利用思想。当然盖一座饭厅，即或在设计时没有考虑其他方面的要求，这些要求在饭厅建成后也还可以勉强得到满足，对一条河流来说，假如规划时没按综合利用的原则考虑，那么工程建成后，再想实现综合利用，常常是非常困难的，势必给国家造成不可补救的损失。

李锐所举的教训是官厅水库。过去水利部修建这座水库时单纯防洪，没有考虑发电，搞水电只好在左岸另起炉灶，再挖一条导流隧洞发电，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和浪费。佛子岭水库、梅山水库建设时也都存在类似乃至更糟糕的情况。

李锐关于综合利用思想的最充分、最精彩的表述，大都集中在关于三峡工程同林一山论战的一系列文章中。因其最为精彩，所以虽然前面有所提及，这里不妨再引用一次：

> 什么是河流规划中的综合利用原则呢？那就是要以国家最小的投资修建水工建筑物，最合理地利用天然资源，综合地满足各有关经济部门的要求。
>
> 现代科学的发展对于技术的可能性几乎是越来越没有限制的，但是有个最大的限制，这就是经济上的合理性。有人打过一个比方，现代的水工技术可以叫太平洋的水流到大西洋去，但是需要答复两个问题：这样做有没有必要？这样做要花多少钱？如何求得技术和经济的统

一，这就是每个规划人员的职责。

陆钦侃、顾文书这些中国水电工业的老前辈都有这样一个体会：过去接触的几位领导都是重视抓工程，只有李锐，一来就懂得抓规划，有强烈的战略意识，是个“帅才”。因此，那几年水电建设克服了临时抱佛脚、想到一处做一处的毛病，在相对较短的时间里形成规模。

“丈量七次再剪裁”

李锐认为，只有正确的宏观分析，没有扎实的微观管理，一切正确的战略思想只能是纸上谈兵。李锐在热河当报社社长的时候，就看不惯分局某些浮泛的、大而化之的领导作风。如今自己走上领导岗位，他和局内其他领导及老工程师们，共同制定了一套严格的、制度性的水电建设工作程序。在初步设计之前，所有有关水文、气象、地形尤其是地质以及有关国民经济等一系列基本材料，无不进行认真收集分析和研究；勘测、设计、施工无不严格遵守技术规程。

在具体工程所涉及的环境中，李锐对勘测特别重视，这大概同他到任之初，就遇到黄坛口水电站工程发生重大事故有关：由于没有做好勘测工作就草率设计、匆忙施工，只根据几个钻眼，就认为水下河床岩石整体相连，并推测两岸不致有变化。直到挖开十万立方米以上的土石方，才发现西山岩石破碎不堪，不适于连接坝头。水文情况也没弄清。结果停工一年，从头勘测。

李锐去苏联学习考察，在这方面又了解到不少触目惊心的教训，于是他多次召开勘测工作会议，反复强调：

对于水文、地质、地形以及其他有关情况没有彻底了解之前，是根本不能进行正确设计的，否则水工建筑就会建立在不可靠的

基础上。许多教训说明，勘测工作的疏忽，往往要造成大大延长工期和给国家带来巨额的损失，地质工作落后是我们今天的致命伤。

一九五六年，李锐读了以苏联斯大林格勒水电站勘测中的真人真事为素材的报告文学《一个伟大建设的开端》。该作品对水电勘测中需要周密的"丈量七次再剪裁"的精神表现得非常深刻。李锐写文章介绍这本书，还将此书大批买来，分发给勘测设计人员阅读，要大家把"丈量七次再剪裁"作为勘测工作者的座右铭。

这些工作在中国的水电界影响是深远的，它们不仅使水电建设的机构日臻完善，更重要的是，一种老老实实、严谨科学的工作作风在这支队伍中蔚然成风。

与李锐严厉、爱训人的外表截然相反的是他在工作中从善如流的民主作风。各部门的意见、建议，他总是仔细研究，有一定的道理，便尽量采纳，他只是不能容忍工作中丝毫的疏忽。所以他的部下们都说：虽然在李锐手下工作要挨训，可仍然感到干得非常痛快。他在局里公开宣布：工作中有不同意见只管与我争论。事实上，别人和他争得面红耳赤他也从不介意。久而久之，他的部下得出一条和李局长相处的经验：不管他多凶，只要你有理，便尽可以有恃无恐地和他争！

在政治运动中保护了一批老专家

任何事业都是人干出来的。团结、爱护、信任人，是成功领导者必备的素质。三四十年后，水电界人士特别是那些老工程师们谈到李锐，这是一个津津乐道的话题。但是，采访中第一次引起我对李锐这方面情况注意的，却是地地道道工农兵出身的保卫干部于文的回忆。

于文一九四一年从冀东参军，一九四五年以后一直在侦察连

当连长，一九四六年他以每天认四个字的速度在部队扫盲。一九五三年从朝鲜战场回国后，来到燃料工业部水电建设总局，任务是保卫首长和苏联专家，所以对李锐很熟悉。

“李锐这人脾气大，可我最佩服他。我们搞保卫的常要向他汇报一些可疑情况，他听完总是把手一伸：‘拿证据来！证据不足不能给人立案。’他常嘱咐我们：‘千万不能误伤人，你在一个案子上搞错了，就要害他一辈子！’

“他对工程技术人员可真爱护，我就不行，五十年代为这还犯过错误。

“解放头几年，国家要对干部、技术人员的出身、经历、政治情况摸摸底。摸底就要看档案。我们干保卫的属人事科，也参加了这项工作。那些工程技术人员的档案一个个看，越看越火：这帮搞技术的没一个是好出身，还都在国民党旧机构里干过事。如今个个工资比我们高，我们一早儿参加革命，反没他们拿钱多！

“就为这，我们八个部队转业人员一块儿往上边告李锐，部里来人调查，我头一个放炮：李局长路线不对头！要求上边给我们提薪长级。结果挨了上边一顿批。

“事后，李锐找我谈话：你们这些当兵的看问题太简单，在战争年代，需要靠你们拿枪打仗，在和平时代，就得靠他们的技术搞建设……在旧中国那样的社会背景下，他读了大学、学了技术，不在国民党、资本家的企业里干，又怎么办？你共产党当时又没掌握企业。即使有历史问题，他愿意为新中国搞建设，为什么不用他呢？

“经他这么一说，我想通了。他也并不因为我告了他就记恨我。一年多以后，根据我在工作中的表现，他向人事科建议，提拔我当了行政科长。”

黄育贤先生一直被中国水电界尊为元老。他一九二四年毕业于清华大学，一九二六年赴美留学，并在美国做水电工程多年。三

十年代初，他回国后，一直受聘于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担任全国水力发电工程总处处长。曾代表国民党政府去英国伦敦参加世界动力会议，在中国水电界有相当的声望。

新中国成立后，黄育贤是水电工程局第一位局长。李锐到任后，他被任命为总工程师。李锐对这位老前辈一直是非常尊敬的。他知道旧中国从事野外水电建设十分艰苦，他们为开发中国水力资源搜集了不少宝贵的基础资料，十分不易。

一九五六年，李锐派黄育贤率领中国电力代表团去维也纳参加世界动力会议。之前，李锐也曾想过是否派一个共产党员干部率团，那样周围的人不会有非议，自己在政治上也不必担风险。但是，他又觉得，党内干部中没有能和黄育贤匹敌的专家，而且应该让世界看到：共产党也重用人才，专家在新中国同样能发挥作用。所以还是决定让黄育贤任团长。

果然到国外以后，反共势力想对黄育贤进行策反。一天晚上，有人来敲黄老的门，问他想不想见在美国的女儿。黄的女儿是萨凡奇带出国的，并被萨凡奇认作干女儿。黄老表示想见女儿。于是来人亮出中央情报局的牌子。黄老立刻拒绝与来人再谈下去，并请他离开了房间。

可是回国以后，黄育贤为此受到有关部门大大的怀疑，几乎成了黄育贤的一大政治问题。对此，李锐大不以为然，他态度鲜明地表示：我们只能相信他本人讲的情况，其他任何推测都是没有根据的。在李锐的保护下，黄老在反右派运动中终于平安过关。

对于某些惯于非好即坏直线型思维的人事干部来说，于开泉的历史是十分令人头疼的。他在哈尔滨工业大学读书时，与抗日名将赵尚志一起从事过革命活动。后来又到日本帝国大学学习水电。日本侵占东北时期，他是日本在中国兴建的丰满水电站惟一的中国工程师，因此有些中国人把他看做“汉奸”。但于开泉有日

本帝大的资本,他是工地上惟一敢跟日本人顶撞的中国人。当年,他曾为日本人殴打中国民工和日本人干过架。日本战败后,他一直担任丰满水电站的总工程师。

肃反运动中,当地公安局把他作为有严重历史问题的人立案,并列为那种一有风吹草动随时可抓的对象。所以当他从吉林到北京汇报工作时,吉林省公安局派人暗中盯梢,一直跟到北京。李锐得知此情况以后,立刻找到刘澜波,两人一起出马,向吉林公安厅担保此人并非汉奸特务,直到他们撤回盯梢。由于领导明察,于开泉在五十年代的政治运动中始终没有受到冲击。

胡福良毕业于交通大学,是水电建设总局北京勘测设计院总工程师。肃反中有群众反映他有一只皮箱,常常不离身。保卫干部便怀疑箱内装有电台,进而推测此人有特务活动。院领导警惕性甚高,也同意保卫干部的推测。案子报到总局,李锐听罢大为光火,批评他们捕风捉影,没有根据,不同意搜查,更不同意抓人,却派胡福良去瑞典参加学术会议。别人反对,李锐力排众议:你们不是信不过他吗?这正是考验他的好机会!不久,胡福良按期而归。

李名播是水电总局的俄文翻译,负责总局专家室的工作。本来已经确定他随李锐去苏联考察、学习,肃反中人事部门向李锐汇报此人有严重历史问题,认为应该取消他的苏联之行。李锐仔细看过材料,感到其中提到的时间、年龄有些不对头,便让人事部门的人再去查,终于弄清,原来是同名同姓。

事后李锐对有关人员说,之所以敢于质疑,就是因为在延安整风期间,他在狱中认识一个叫蒋齐生的同志,就因为同一个有历史问题的人同名同姓,被错关了七年!

李锐对那些清一色出身贫苦的人事保卫干部太了解了:他们感情朴素,经历单纯,对党绝对忠诚。最大的弱点是对那个旧中国

的复杂情况了解不多,因此难免会弄出一些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情来。

在一大批搞工程技术的专家中,程学敏的语言和文字表达能力均属上乘,一九五七年整风运动开始以后,他没少给共产党提意见,结果在后来的反右中受到批判,只是李锐暗中保护,才没戴上右派帽子。半年后,由周恩来主持,国务院有关部委、有关省份的负责人,还有一部分中苏专家一起坐船视察三峡坝址。李锐让程学敏与他一起去参加会议。当初在南宁会议上,程学敏帮他画的那张水电开发示意图,曾使毛泽东等与会者一目了然,为李锐的论争胜利帮了大忙。这次又是讨论这个问题,李锐自然想到要带程学敏参加。这一决定当然又遭到众人反对:这样的人怎么能带去参加总理召开的会?

李锐不解释,不申辩,我行我素。

整个反右运动,上边要求划右派百分之五,按这个比例,水电总局至少应抓出十个以上的右派,结果只划了两个。主要的工程技术人员都保住了。拿李锐的话说:"总算没伤了元气。"但即便如此,李锐对这种搞法仍然十分反感。于是就发生了一九五九年批判大会上人家揭发他的那种情况:"李锐觉得坐在机关里日子不好过,他到湖南出差,有的同志正在专职反右,他就说:'不反右死不了人。'"

当了副部长以后

一九五八年一月的南宁会议以后,国务院决定将水利部和电力工业部合并为水利电力部。李锐被任命为该部副部长(部长李葆华)。中国水电事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短暂的黄金时期。正逢"大跃进"的形势,水电"冷"一下子变成了水电"热",全国几乎形成了一个"全民搞水电"的高潮。

李锐并没有被冲昏头脑。为了保证有限的资金能用在重点工程上，他亲手砍掉了好几项未经科学规划、没认真进行地质勘查、又不具备施工条件的“发烧工程”，再一次保住了水电系统的“元气”。

最后，还是让我们用李锐的诗章，来为李锐自己也感到最为得意的水电八年画个句号吧：

九州无水不相知，
湖泊江河沟洞溪。
最爱长滩回溜险，
尤怜高峡瀑流奇。
山川顽石看何厌，
日夜涛声听入迷。
从未关心风月事，
却曾八载醉于斯。

第八节　重回磨子潭

出狱之后

或许读者还没有忘记，当我们沿着《龙胆紫集》的思路回溯李锐四十岁以前的人生旅程的时候，李锐还正在京郊秦城坐牢。

一九七五年，是李锐在狱中的第八个年头。他在牢房里度过了他的五十八岁生日。

不久前，大墙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转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起用"文革"初即被打倒的邓小平为国务院副总理，在周恩来总理养病期间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四月底，在周恩来、邓小平的推动下，中央作出决定，除与林彪集团有关的审查对象和其他极少数人外，对绝大多数被关押受审查者予以释放，搞错了的进行平反。

这个决定，使得长期被关押的高级干部三百多人走出大墙，李锐有幸跻身其中。

一九七五年五月三十日，是李锐出狱的日子。当天的情景有诗和日记为凭：

此门走出也无家，
一阵春风两眼花。
老汉单身重上路，
耕耘三度旧生涯。

一九七五年五月三十日，星期五，晴

下午三点动身，王宪举同志同至北京(设计)院取书，

已改为成套公司。鼓楼取钱买药物等。又去工业学院找大胖(灼姐长子)。云已去沪三日。体北饭店晚餐，见到安徽省水电局朱世尧、周晋详二同志。王吩咐数事，我表示决不辜负党的希望。八点半开车，终夜未眠。

李锐出狱后当天夜里在列车上“终夜未眠”，恐怕不只是因为环境的巨大变化，更大的可能是因为想念孩子。白天，他曾提出过要在离京前看一眼三个孩子。王宪举也去李锐家里通知了，可三个孩子终究没有露面。是通知时他们刚好全没在家？还是孩子们不愿见他这个爸爸？李锐不愿再往下想。

北京已无家，李锐出狱前夕，王宪举曾和磨子潭联系，磨子潭“革委会”怕李锐再给他们找麻烦，不愿接受。王又找安徽省水电局领导做工作，请他们说服下面。如此，磨子潭才算同意。日记中说，出狱的当天晚上在体北饭店就餐，遇到安徽省水电局朱、周二人，他们便是从王手里接管李锐者。

第二天晚七点抵合肥，磨子潭水电站派车来接。朱、周把李锐转交给水电站派来的人。临走，周代表省水电局向李锐交代了三点要求：1.力所能及参加劳动；2.尊重领导，在工区范围内活动，超范围外出要请假；3.禁止单人游泳。李锐表示服从。

夜十一点到达磨子潭，仍安排住老房间。李锐打开抽屉，拿出八年前剩下的安眠药片。这一夜，他睡了三小时。

第二天，是六一儿童节，孩子们在窗下嬉笑打闹。李锐一出房门，立刻被一大群孩子围住，有的还喊着去招呼同伴：“快来看北京来的老头儿！”

蹲了八年，李锐感到此间变化很大：新盖的宿舍、办公楼，原来的邻居青年都已成家添丁。那群看热闹的孩子便是他们的后代。“人们见面，无不亲切，使我如返故家。”(李锐日记语)

下午，诸领导约谈话，约法三章，内容如昨。李锐再次表示服

从。

接着，李锐开始整理内务。他去仓库取出自己的衣物、用品。使他感到惊喜的是，八年前蒸过的蜂蜜居然一点未变味儿，而另一瓶辣椒因上边有香油，居然也新鲜如初。李锐下河洗衣，第一次就洗了十多件。一九六四年初来磨子潭时，他就对这种下河洗衣的方式感到分外亲切，因为这使他想起了延安生活。

第二天，过度劳累的李锐犯了“血压高”。躺了一天，他又开始给两位姐姐写信，到邮局订报，买塑料纱窗、草席，整理房间。每天都累得头晕脑涨，通身无力，到底年纪大了！

一周以后，李锐被通知参加副业组劳动。只干了一天，便哮喘大发作。回到宿舍，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服药睡下后，夜间三点再次大咳喘，把邻居们都闹醒了。

医务所批准病假三天。然而只躺了一天。仍然气喘吁吁的李锐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偷偷干起了一件大事。

原来，出狱时，李锐在牢房中读的马恩列著作竟然发还，并允许随身带走。那上面有他用棉签和紫药水在天头地尾空白处写的几百首诗。他的人生经历、信仰追求、气质人格，都凝聚在上面了。现在，他想把这些诗作抄写整理出来。“夜开始抄秦吟，过瘾之至！”（日记语）

在以后的几个月里，李锐的生活大体形成周而复始的“三步曲”：劳动、生病、病中抄“秦吟”。病情转轻后复又劳动，劳累引起病发，便又病假抄“秦吟”。

八年的牢狱生活，李锐百病缠身。重回磨子潭后，李锐几乎无日不病，无日不与药为伴。山中的气候，使他每年六月到九月哮喘最为严重。六月，正是夏锄季节，每次病情稍稍缓和，他就被派去山冲锄田埂草。这种草极不易锄，李锐常常累得几乎走不回来，他随身带着治喘剂，以应付不时之需。

过度的劳累又使他常常没了胃口，各种疾病乘虚而入。动不

动就感冒,动不动就腹泻,经常感到头晕目眩,不久又闹起了令人痛苦不堪却反复发作的皮炎。有时各种疾病轮番进攻,有时则是"全线出击"。

一次李锐从厕所回房时突然浑身痉挛,走不回去。人们都在看电影,幸遇职工小宋跑去报信。医生们全来了。连打两天点滴,病情才得到控制。以后每遇李锐病情严重,当地医生便用此法对付。

第三天吊瓶一撤,李锐下床后第一件事,便又开始抄"秦吟"。

总之这一时期的劳动对于李锐是极艰难的,并不像《龙胆紫集》里一些诗句描写的那般轻松。

回到磨子潭的第二十天,李锐接到琬姐的来信。这天他因连夜哮喘不止请假在家。

八年了,"兵荒马乱"之中亲人音讯杳然,今天终于重又得信!那熟悉的字体、温暖的话语,顿使李锐热泪直淌。连读数遍,仍然流泪不止。

他从信中得知,原在辽宁省委党校担任领导职务的灼姐,因"与李锐划不清界限"受到党内警告处分,"文革"遭批判后夫妇迁居老家平江。

不久,琬姐在另一封信中说她要和灼姐一起来看望弟弟。

李锐即向"革委会"主任请示,得到同意后便连夜给姐姐写了回信。然而因为八十多岁的母亲突然生病,她们未能立即成行。

"秦城"来人了

八月十九日,即李锐出狱后三个月零十九天,王宪举来到磨子潭。

这天晚上,李锐被召到水电站招待所。王宪举拿出专案办的结论给李锐看。两条老账:一九三七年七月六日被捕事被定为叛

徒、阶级异己分子，维持一九六〇年原案；在磨子潭"坚持反动立场，毫无改悔之意。"

李锐当着在座的分站诸领导做了口头分辩，并将书面意见连夜写出，第二天交给王宪举。他心里明白：如果这两条成立，必戴帽定性无疑。那时自己的处境将更加恶劣，要想寻得出路，则更是难上加难！

这个打击对李锐来说有点意外，出狱时他满以为自己问题不太严重。他得知：专案组说自己在磨子潭"毫无改悔之意"的主要根据之一，是他在磨子潭的日记本中，有记述当地群众向他讲"困难时期饿死许多人"的文字。从此，李锐的日记简而又简，一九七六年三月以后，干脆中断了九个月。

山中的李锐并不了解，他个人命运的逆转和山外大环境的政治气候密切相关。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起用，粉碎了江青之流在周恩来病重期间想乘机"组阁"的阴谋。但他们并不甘心失败。一九七五年四月一日，《红旗》杂志发表了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长文，接着又以《批经验主义》为名，大肆影射、攻击周恩来。

然而，北京来人的消息在磨子潭一传开，好心的人们都猜测李锐要回北京分配工作了。

山中的雨季使李锐的病情复又转重。稍有劳作，即喘息不已，夜间尤甚。有时只好整夜坐着。有时坐、立、靠、伏各种姿势皆无以为安。心理、生理相交的作用，已使药物的效力大大减弱。

这真是一段极为灰暗的日子。难道余生就只能在这样的煎熬中"混"下去吗？当年不少身陷谷底的人就是在这种绝望情绪的驱使下，自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此时此刻，惟一能使李锐暂时忘掉痛苦的，便是整理他的"秦吟"。

至亲手足再次送来无微不至的关怀。

从沈阳迁居平江老家的灼姐，自己经济状况已十分拮据，但得知弟弟出狱，寄来的第一个大包裹就有十几公斤重！

山中的十月，秋被已嫌薄了，灼姐的包裹里又是棉被，又是药，又是水果和食品，甚至还有一部《红楼梦》！

原来李锐回到磨子潭后，一直要求归还一九六七年被红卫兵抄走的从北京带来的书，但就是不能如愿。李锐苦闷时是"嗜书"如命的。他大概在信中流露过这方面的牢骚。多么细心的姐姐啊！

从李锐的家信、日记中可以看出，他在磨子潭的几年中，没有一个月不收到一两件两个姐姐寄来的包裹。如此深情，李锐怎敢不珍惜自己的生命呢！周围的人无不对李家姐弟这种亲情感到惊异！

这天，李锐收到包裹后在给姐姐的复信中写道：

亲爱的琬姐：

收到包裹。为什么又寄奶粉、糖呢？你们对我的关心实在太过分了！灼姐也寄来了灵芝精、脉舒静等，因此得绝句一首：

健康全靠精神爽，
岂有灵芝延命长。
为感多情阿姐意，
不惭身贱服仙汤。

他在另一封信中告诉姐姐，他已将所有寄来吃不完的腊味挂在学校彭老师的厨房里——"否则我的房间就变成副食商店了"。

病情转轻，李锐便去买回五十斤木炭，弄火煎药。

读书边煮药，
这也是生活，
滋味两般香，
老夫知满足。

“秦吟”抄写、整理完毕，李锐又翻出《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改写稿，这是他去京郊秦城监狱坐牢前改写完的。关押八年，放在磨子潭的书籍多有遗失，所幸这部书稿安然无恙并被“恩准”发还。一看便不忍释手。在日记里他写道：“是本好东西，何日能公诸于世？”

姐弟团聚大别山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六日，是李锐终生难忘的一天，上午琬、灼二位姐姐突然到来，带来衣服、药品、食物等几大包东西。一九六三年李锐离婚后独居北京六铺炕八号楼时，两位姐姐曾去看望过他，以后便天各一方。十三年后再度相见，竟是在这天高地远的大别山中，姐弟三人均以泪洗面，好久好久相顾无言！

水电站的人们似乎觉得这是件高兴事儿，他们像一九六四年招呼初来的李锐那样，热情地招呼着两位山外来客。

李锐陪姐姐漫步山冲，饱览山中美景，又爬上大坝参观水库风光，还到山里农家去做客。真是十多年来从未有过的高兴！两位姐姐皆称赞这里风景如画！

尽管李锐宿舍隔壁就住着奉命监视李锐的人，但是或许因姐弟之间的平江话外人听不懂，或许“看守”一时“良心发现”，总之，他们未感到有任何不便。

如果不知内情，对于《龙胆紫集》中那首记述这次姐弟相聚的

诗,是不太容易全看明白的:

相会无期终有期,
谁家手足昵如斯。
十三夜尽叮咛语,
四十年来风雨时。
剖尽胸中肝与胆,
解完世上惑和迷。
山中兰草不嫌野,
大别幽香喜采归。

十几天中,姐弟三人天天促膝谈到深夜。她们带来的各种消息,有两个方面的情况给李锐的震动最大:

一是周恩来总理在一九七二年国务院召集有关部门研究葛洲坝事故的会上,问起李锐,要水利电力部的领导将葛洲坝方案拿去征求李锐的意见。

周总理这一指示,不知是因为工作疏忽还是个人恩怨,有关人员并没有把它传到狱中,否则李锐可以早出狱好几年。不过这一切已无需深究,重要的是周总理没有忘记李锐,周总理还记得李锐!

二是关于外面群众大骂江青,江青挨了毛泽东批评以及邓小平和江青对着干等社会传闻。曾在高层政治圈里工作的李锐敏感地意识到:大局在变化之中,形势在变化之中,这种变化很可能对自己的命运产生影响。

世上的"惑和谜"终有大白于天下的日子,好好活下去,才能看到这一天!"十三夜尽叮咛语"给了李锐多少希望与安慰!

十三天很快就过去了。李锐送走了姐姐。他在姐姐离开后致她们的第一封信中写道:

……送走你们之后，回到房中，感觉有点空虚；依依招手，犹在眼前，不禁泪下。这说明我们这十三天过得非常充实，也非常愉快，心情之舒畅真是平生少有。中午将剩下的面蒸食时，发现几节香肠你们一根也没吃，眼泪竟又止不住滴在碗中。这大概只有写一首诗或词，才能平静下来。

晚上看新片《第二个春天》。我是否还有第二个春天？……（十一月十八日夜）

今早六点起床，我又过起刻板的生活。

你们的殷殷叮咛，切切嘱咐，我已铭记在心。一生之病，谨慎不足，任性有余。庐山一错，遗患无穷，我也真可算一个小小的"罪魁祸首"。所幸心田已生善根。一切均望放心。

山里真有好心人。招待所谷奶奶硬是不收两位姐姐的房费，她们几次把钱送过去，都被退还。姐姐们硬是留下钱离开后，谷奶奶又把钱退到了李锐手里。李锐只好拿着钱去找领导，领导也认为应该照顾。李锐大为感动。

噩　耗

一九七六年，共和国历史上一个多事之年。

一月十日清晨，李锐六点起身，正在做气功，忽听广播里传来哀乐，接着是播音员沉痛的声音。没料到，下面听到的竟是周总理的名字！李锐顿觉如晴天霹雳，双泪直流。

这消息引起了李锐太多的联想：四年前，总理在葛洲坝会议上还提到了他，这给了李锐多少希望和鼓舞，接着又想起"大跃进"、

庐山会议中与总理的多次接触,甚至想起他与前妻同总理夫妇的一段私交。一连几日,李锐心潮难平。在给姐姐的信中他写道:

> 我的怀念文章是无处投的。譬如有这样的私情(限于你们知道):三八、三九年,元甄在重庆新华日报当记者时,大概被认作周恩来夫妇的干女儿,"小超"(即邓颖超——编注)看过我写的情书。我们三九年底进延安,他们不在重庆,过成都时特照了一张相片寄与他们。五九年夏在庐山前期"神仙会"时,元甄特将一家孩子们照片寄与他俩,他们高兴之至。当时曾约定,下山后,带孩子们上他们家做客。如此旧梦,终成一梦,呜呼!……

二月。《十里长街送总理》的记录片传到山里,前后放映过两次,李锐每次观看,都要泪流不止,周围职工虽然也热爱周总理,但对李锐的表现仍不免惊讶!

"小客人"

周恩来的去世,对于李锐的命运,可以说是雪上加霜。茫茫大地,阴霾弥漫。五十九岁了,谷底的路仍然看不到尽头。

除了给姐姐写信,李锐的情愫无人倾吐,他深深感到孤独!就在这时,一位"小客人"闯进了他的生活。

那是一九七六年除夕,家家欢乐团聚的日子。大概是见此孤独老人可怜,"小客人"不顾隔壁监视者的目光,跑来与李锐做伴。整个下午至夜,"小客人"包饺子,李锐则拿出琬、灼二位姐姐寄来的尚未开过盒的糖果请客。

从此,"小客人"成了李锐房中的常客。她帮李锐料理生活,李锐则帮她学习文化。李锐在给琬姐的信中称这位工人出身的上海

姑娘是个“很懂事而善良的孩子”。他还在另一封信中具体描述道：

这里有一个女孩子，很关心我，知道跟我接近能获得一点有益的东西，常帮我做一些我做不好的生活事情。如补毛袜、毛裤之类，还想学我的字（她未婚夫嫌她字写得不好）。

“小客人”原计划四月初结婚。李锐为了报答她平日关心照顾之情，托姐姐买了些竹笔筒、茶叶筒之类的工艺品相赠。李锐从小就喜欢竹子，在楚怡念中学时自己曾动手刻过竹笔筒。

不幸的是，那位未婚夫的病使婚期一拖再拖，终于未来得及进洞房，便被胆总管癌夺去生命。

陷入巨大悲痛的姑娘不顾一切来找李锐，请他代拟复电、信稿及悼词。一个月前，当地领导已禁止她再与李锐接触。

从这以后，姑娘便把自己的情感、关切乃至爱心，统统倾注在李锐身上。

她的爱，唤醒了李锐在多年逆境中几乎泯灭了的一种人的本能的情感，使长久失去家庭温暖的他忘记了自己的戴罪之身，“如此逆境，得此人缘，确是一种莫大的安慰”。（信中语）

后果是悲惨而必然的：两人被批斗。中国农村，对于这类事情的处罚历来是封建而野蛮的。最后，“小客人”被调到远离此地的另一个电管所。人性、人的基本权利，在那个时代的中国大陆，均属奢谈！

如果说在这件事情上李锐也有不足的话，只能说他对这个女青年的全部情况并不十分了解。或许他们的这种交往确实并不合适，但是直到今天，李锐对“小客人”在自己最孤独、最困难的日子里给予的帮助和感情，仍然怀着真诚的感激。

画家的来信

晓梦女士：

新年好！

在家读到了你的来信。你的希望引起了我的回忆，对那一段富有传奇色彩的经历的回忆。实际上有机会对你讲比写信更好些，因为我不善文笔。尽力而为吧。

七四年九月，我考入上海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七六年六月，我们去安徽大别山一带写生，磨子潭水库是最后一站。水库的卡车载着我们翻山越岭，日夜兼程。到达磨子潭的第二天早上，我病倒了。同学们每天早晨外出写生，我病愈后身体仍很虚弱，无力涉足很远去寻景，只提着画箱在水库四周寻找景物画了两张。

第三天当我提着画箱去水库食堂吃饭时，一位近六十岁的长者走到我面前，很客气地问是否能看一下我的其他作品？他说他也非常喜欢作画，问饭后能否赏脸到他的住所一次。他面对我说话时我才注意打量一下这位长者：很客气的神色，面容憔悴，灰白色的头发，口音很浓的湖南普通话。我马上产生了一种感觉：这位长者热爱艺术！决不是当地一般的职工。猛然想起昨天就曾见过他：当时他身披一件薄外套，一手撑着腰，一手揣着个小锅，站立在排队买饭的队伍中。虽不露声色，但终觉得气度不凡。当然，我二话没说就答应了他的请求，午饭后便携画作走进了他的斗室。

水库职工的宿舍是平房结构，一条黑糊糊的走廊，两边是朝南或朝北的房子。他居朝南的一间。

推门环顾四周：估计十平方米左右的空间。南窗下

一张写字台，下面堆着书和稿子，好像在编写什么书稿之类。书桌左边是一个简易的竹制书架，书架上除了一套精装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毛泽东选集》外就再没什么了。一张木板床放在靠门的右边，墙上贴着好几张内容为毛泽东诗词的书法。

他以异常的激动把我迎进了屋子。我问他墙上的诗词是否是他的手迹，他微笑点头，并说自己十分酷爱书法。我注意到书桌上的玻璃板下压着一些生活照片，其中有一张是用铅笔素描的女孩子的画像。他说那是自己的小女儿，他很喜爱。画儿虽不怎么地道，但很认真，形象也准确。他还谈及自己怎样为水库职工画肖像，为一位去世的水库职工画遗像……当他谈论自己画画的时候颇露喜悦，也很自信自己不仅喜爱艺术，而且能投入。

他懂绘画艺术。

“我为什么邀请你来？我在散步的时候看过你作画，我也看过你们其他人的画，我认为你画得比他们好，所以想看看你的其他作品。你知道，我真是十分喜爱油画的。”

于是我把自己的画取出来，一幅一幅地请他看。他不仅看得很认真，很热情，甚至能很内行地进行评价。最终选了几张他认为最好的。

他说他十分地着迷油画，因为西洋画能十分细腻地描写真实的静物。我感觉到，他最喜欢的还不是古典的绘画，而是接近印象画派的，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那些巨匠的作品。例如荷兰的鲁本斯、伦伯朗等大师的作品。

他告诉我他收藏了许许多多的画，委托别人保存，但“破四旧”时大部分被烧掉了。说到此处他竟伤心得眼泪都流了下来。我们约定，第二天我为他画一张肖像画。

与他的初次交往很是投机。他闭口不谈自己是谁，要我叫他“李老头”或“老李”，他说当地人都这么称呼他。可我觉得他不是一般人，我相信自己的观察及直觉。至少，他是位很有艺术见地的绘画热衷者。他平易近人，谈话方式和热情与他的年龄差距很大。他说他希望与青年人交朋友。当他告诉我书桌上是他正在修改的一部书稿，名曰《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时，我更确信此人非同寻常，我愿与他交朋友。当天晚上，我为他先画一张素描，以熟悉他的神情。对这张素描，他很满意。

第二天，我把他的小房间略作布置，把一面方镜摆在一个适当的地方，使他也能看到我怎样作画。在整日为他画油画像的过程中，最初他向我很激动地谈论着他对苏联巡回画派的看法，他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看过原作。他很激动地描述那些原作的彩色效果，怎样地印象深刻。后来，他终于告诉我有关他的一点点事情。

谈到政治生涯，他就显得不那么高兴。但他还是很自信地说，他的问题，是很清晰明了的，一切的一切都会搞清楚的。我相信他对自己的辩白。

我说：“李老，我在为你作此肖像的时候，正遇你人生道路坎坷落魄之际，我要把你这间斗室的简陋绘入画中，总有一天，你会渡过难关。”他激动地说：“我怎么谢你呢？我要为今天写一首诗作纪念。”

我说：“李老，如果要说谢，你就给我写一首毛主席诗词吧。”“那一定一定。你希望写毛泽东的哪首诗？”“北国风光吧！”

他对这幅画很是满意，很像，而且表现手法又是他喜欢的那种轻松、潇洒自然的风格，我也很满意自己的作品。

整整画了一天，午饭和晚饭都是在他的斗室里吃的。李老去买了点米饭，菜都是他亲手做的家乡菜。我告诉他当时的形势与中央领导班子的一些变化和上海的一些情况，他听得十分认真。

我们都不知道，我与他的交往早有人监视和汇报了。负责监视他的人是电站保卫科的。据说当时正在争取入党，他把这种揭发汇报的行动作为立功的表现。

李老给我写了首自做的诗，其中最后一句“但愿重逢已境迁”，被汇报者篡改成“但愿重逢已变天”的反动诗。

第三天傍晚，工宣队师傅找我谈话，指责我近两天的“错误”行为，要我把那首诗和肖像画全交出来。

第四天早上，我去李老家对他说：事情都被人汇报了，连那首小诗也被人篡改了。老师和工宣队让我取回那幅画。

李老很激动地说：“这是我的肖像，我决不交！”

我说：“李老，我会有机会再给您画的。”李老无奈，非常惋惜地看着我取走了画像。他留下了我家的地址，誓言他一旦复出，便来找我，决不会忘记我们的忘年之交。

当天下午，水电站党委及全班师生在会议室对我开了批判会，要我检讨。我第一次听到他们宣告李锐的“真实”身份：“彭德怀的黑干将”、“反党、反毛泽东的现行反革命”、“大右派”、“大叛徒”。对我的批判是：“立场不稳、为反动分子画像。”

回到学校以后，听说学院将我的事汇报给市教育局，当时主管市教育系统的“四人帮”爪牙徐景贤大为震怒，要学校严肃处理。于是一星期之后，舞美系师生又召开了一次对我的批判大会，称我为“白专分子”、“丧失政治立场”等等。

那以后我的日子是可以想象的……

我有些怕写长信，希望这些对你有用。字很糟糕，对不起。

王申生

一九九三年元月二十三日

王申生现在是上海油画雕塑院的专业画家。当年为李锐作画时二十六岁。彭德怀冤案昭雪后，他为李锐作的那幅画还给了主人。今天它就挂在李锐卧室中。每次我看到这幅肖像作品，心里都有一种为之震撼的感觉。

一九七九年三月李锐出差上海，让秘书按地址找到王申生，两人在上海大厦重逢，友谊保持至今。

李锐当年那首“惹是生非”的《七绝·谢画家》以及与画家重逢时用上海大厦客房里的书信纸写下的另一首《沁园春·谢画家》，都收进了《龙胆紫集》。

七绝·谢画家

夙愿如偿近暮年，
此山巧遇岂非缘。
贱颜有愧烦高手，
但愿重逢已境迁。

沁园春·谢画家

旧地重来，
人也何堪，
小树成阴。
叹并非废物，
无休逆境；

时怀赤胆，
未负天恩。
锄草田头，
牧羊沟里，
照旧操觚攻读勤。
形和影，
但猖狂哮喘，
老病相亲。

管他牛鬼蛇神，
有傻子偏教祸惹身。
竟精调百色，
为之写像；
辛劳整日，
如此传真。
我意怜才，
人云可杀，
敢作光荣孤立人。
须防备，
纵台风十级，
且莫心惊。

（一九七六年六月，上海戏剧学院舞美系师生来磨子潭“开门办学”。一学员为我作油画像，随即大受迫害。今已平反矣。）

乍暖还寒

写生的学生们离去后，磨子潭又变成一潭死水。命运对李锐

竟是如此残酷:几乎每一个向逆境中的他伸出援手的人都大倒其霉,李锐自己也一次又一次被加重罪名。

又是一个难熬的夏季来临了。才进六月,李锐不仅哮喘犯得比哪一年都厉害,而且皮炎也莫名其妙地闹得特别凶。入狱前李锐在磨子潭也闹过皮炎,那时多在两只手背,至多波及两臂,今年转向下身,成片鲜红的小水泡,火辣、疼痒,又不能抓。当地医生束手无策,姐姐寄来的中药、西药似乎也不大见效。走路时患处与裤子磨擦,劳动出汗,都大大加重了痛苦。干活再累也不能坐,否则患处被捂住,便发作得更加凶猛。

病痛折磨得不胜其苦时,李锐曾给部里写信,要求回京治疗一段时间。不幸又正赶上"四人帮"发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时局甚坏。部里冷冰冰的回答由当地领导转告:其一,不必回北京;其二,力所能及劳动;其三,有病请假。

九月九日,中华民族整整一个时代的主宰过世了。在举国上下一片悲恸的泪潮中,李锐显得格外冷静。

如果说,周恩来总理的去世在李锐心中掀起的是无限悲痛、深切的怀念之情,那么毛泽东的去世,引发的则是李锐理性的思考。

有其子必有其母。那天,李锐在长沙的母亲,这位八十六岁的老人正迷迷糊糊地坐在椅子上打盹,外孙儿跑进来告诉她:毛主席去世了!老人把眼略略一睁,只问了一句:"噢,他把权交给谁了?"

以往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电影是不让李锐看的,这大概是为了体现像他这种"罪人"同革命群众在政治待遇上的区别。这一次,当地领导经过研究,不知出于什么想法,竟允许李锐参加磨子潭悼念毛泽东的大会。

没过多久,又传来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这一巨大的政治冲击波,经过大别山崇山峻岭的重重阻隔,等传到磨子潭,只剩下一点余波了!

人们的情绪似乎波动不大，有时晚上开会传达文件，第二天照样吃饭干活。闭塞的环境使纯朴的山里人对这一似乎“突如其来”的历史性事件感到的主要是困惑！只有李锐胸中波澜起伏，他仿佛在一片朦胧中隐约看到了谷底出口透进的亮光。而那出口又好似海市蜃楼般遥远虚幻。

不能说李锐的感觉没有根据，那谷底的出口确实离他还有相当一段艰难遥远的路程。

黎明时的“死刑”

一九七七年一月一日，李锐在一个新本子上写道：“恢复日记，备忘也。”

他发现近来许多“禁歌”大大广播起来，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中的那些抗战歌曲，听来真是使人旧梦依稀！作品的重见天日标志着作者的重见天日。在那个历史时期，这是一个妇孺皆知的政治常识。因此这些歌曲的弦外之音使李锐备受鼓舞。

冬季和初春的农活不多却杂，李锐有时被派到山上剪枝，有时在山谷中牧羊，还有时去协助猪倌喂猪。

天冷以后，皮炎和哮喘都有所缓解，李锐便抓紧时间再次整理、修改《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前后数年的努力，同五十年代的版本相比，他已为这部书增添了十几万字的内容，并根据这些年来精心研读哲学、历史、经济理论书籍的体会，对原书进行了大量修改和增补。

外甥们都已长大成人，他们在母亲的教育下，个个对这个落魄中的舅舅充满热忱。他们的母亲说：书是舅舅生活中最亲密的伴侣。他们便根据自己的判断或舅舅信中开列的书单，频频给舅舅买书寄往磨子潭。于是，李锐的书架又丰富了。有书为伴，他那孤寂、刻板的生活便有了生气、有了色彩、有了欢乐。

好兆头接连不断:"夜观《暴风骤雨》,立波解放了!""夜观《刘巧儿》,廿多年不见新风霞了!""《李双双》使众人大笑不止,好像解放初见过张瑞芳。"……(均为日记语)

晚上放电影是磨子潭水电站多年来的习惯。李锐来这里以后,每年比在北京看的电影还要多得多。如今这些电影成了李锐了解山外政治信息的一个渠道。

八月五日,黄克诚的名字见报!两天之中竟有好几个人跑来告诉李锐。人们风传李锐也快要出山了!甚至有人特来宿舍看望。

磨子潭的领导不像以前那样强调李锐参加劳动。李锐便更抓紧了书稿的修改和补充工作,大约是怕一旦"出山"忙于工作再没时间写书。他经常整日伏案,心情愉快,手下也常有得意之笔。

一九七七年十月十八日,北京终于来人了。然而就在这一天,李锐对前途的憧憬被击得粉碎!

还是让我们读一读李锐这年十月十八日至十月二十二日的日记吧(括号内文字为引者注):

十月十八日星期二晴,十四至十八摄氏度

上午听结论,宣判 Dead!(死刑,指叛徒、阶级异己分子最后定性。)给灼姐信。

十月十九日星期三晴,十四至十九摄氏度

服大量眠药上床,睡至四点。五点起床。精神完全崩溃状态,勉强就餐。颇有山上(指庐山)之味。神经有错乱感觉。洗碗,竟将象牙筷子丢了,这是纪念物,莫非凶兆!

十月二十日星期四晴，十二至十九摄氏度

服眠药，四点醒来，又迷糊一阵，五点起床，作气功，整日伏案，给华（国锋）叶（剑英）信，并单独给叶信。又给水电部信，寄诗以表心迹。

十月二十一日星期五晴，十二至十九摄氏度

半夜喘醒。强服眠药。五点半起床。再看信，可定稿。夜观《永不消逝的电波》，无限往事勾起。

十月二十二日星期六多云，十三至十九摄氏度

靠服眠药了！收到灼姐信。即复。无泪可垂！

一连几天，李锐终日无言。

今天看来，李锐那时的结局其实并不特别令人震惊：

一九七七年二月七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将华国锋的思想向天下昭告："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同年八月十二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虽然宣布了"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但这次会议的新闻公报却声称："这决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结束。"

拨乱反正成为禁区：不准揭"文革"的"左"的错误，不准批"文革"前几次政治运动的"左"倾错误。

形势是复杂的。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新旧冤错案难得昭雪者何止李锐一个！

——长春市青年史云峰，在"文革"中因散发反"四人帮"传单被捕，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九日其时"四人帮"已被粉碎，他却仍被执行枪决。

——一九七七年一月，北京青年李冬民等人在长安街贴标语，

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结果以“反革命”罪被逮捕。

——这一时期各地还出现了在反右、反右倾等政治运动中被迫害者因要求平反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事件。辽宁锦西县高中校长董冷石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例。

华国锋以“两个凡是”治国，这些极不正常的现象就带有某种必然。

如果这个结论宣布在几年前，那么李锐在心理上受到的打击肯定要比这大百倍。但时代变了，形势还在发展，事情也不会就此了结。

又过了一些天，李锐重新恢复了平静。除了照样劳动、读书、改书稿，他更加精心地过起了日子。

一九六一年离婚后，李锐已经过了十几年的独身生活，这些年来，他的烹调技术日臻完美：不仅能杀鸡宰鱼、红烧清炖，还会用姐姐寄来的粉丝、腊肉烹制“蚂蚁上树”、“船拐子肉”等美味名肴。每得鲜鱼，便到小溪边剥洗，倒也饶有野趣，颇具宋人“醉翁”之风。他还学会了用邻居送的酒糟做“酒蛋”。那几年寄给母亲、姐姐的山中新茶也大多是李锐自己烘制的。

一日，李锐心血来潮，突发“豪举”，竟找来木板、斧、锯，自制了一个七层的书架。

与烹调、木工等“复杂工艺”相比，堵老鼠洞就不足挂齿了。但这却是一项经常性的劳动。

冬季将临，李锐买来雪里红、萝卜、辣椒，自制“腌菜”，瓶瓶罐罐装满四五个，以备冬季蔬菜青黄不接之需。

针线活对于李锐也不再陌生。还在牢房时，他就有过将一顶破帽翻旧如新的成就。如今为备冬装，“夜补旧棉衣，还是一九六〇年去北大荒时买的，十八年了！”“心血来潮，买半斤棉花，将破旧丝棉袄改成棉背心，晚餐后劳动至十点。”（日记语）

上诉

十二月二十四日清晨,李锐从广播中听到中央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组织部部长的消息,立即连夜写就自己要求平反的长信,第二天发出。

与此同时,李锐的亲人、朋友,也在为营救李锐到处奔走。灼姐早年参加革命,对党内的情况熟,认识的人也多,办事稳重老练,是亲人中营救李锐的中心人物。弟弟已经六十一岁了,磨子潭的气候使他的哮喘、皮炎年年加剧,再拖下去,他还能干什么? 姐姐心里急啊! 一九七七年底到一九七八年间,她与弟弟书信往来极为频繁,主题都是一个:如何争取早日平反。从下面的两封信中,我们便可对当时的情况有所了解(括号内文字为引者注):

亲爱的明弟:

……我白天黑夜地跑。因为有些人要晚上去家里才能见到,出外时我总得嘱咐传达室给等门,有时太晚门关了敲不开真急坏人。找人谈话真不容易,但我也体谅他们工作忙,的确忙。

跑的地方多了,形势、情况是完全了解的。你的事,最难之处,在那最高的地方。

刘(澜波)开始病很重,医院不许见客,现在已转危为安。我通过医生设法去看了一下。鼻子里插着两根管子。他非常关心你的身体,当然我只能要他好好保重;去找杨纯,为我出了主意;曾志处第三次才见到,又累又老,心有余力不足,她爱人(陶铸)问题尚未解决。胡(耀邦)家离我住处很近,深夜去过多次,详情不细谈。昨夜见到李(葆华)部长,人非常好。细细看过材料,立即同意办。

马上给胡(耀邦)去了电话,非常明确谈了过去处理过重,提出必须照顾(你)身体。一起商量由他将平反意见与你的材料和我的信同时寄送胡。他还要与水电部钱(正英)商量你回来治病事。今早我去电话问胡的秘书,知道李部长寄送的信和材料已收到。胡亲自看完,写了批示。交老干部局和复查局。胡批得这么快,看来十分重视。我遇到了不少困难,眼泪往肚里流,但我只要想到你,我心里难受,我什么困难都不怕,而且信心百倍。何况当前形势大好。

曾(志)的话也是实在的:时间一定会解决问题。但自己还是努力争取更早为好。

你要好好爱护自己的身体,这是最重要的。许立群解放了,但神经不好了,我前些天去找过,住在神经病院。乔(胡乔木)也住院了。你能保住身体,保住神经就是胜利……

灼姐

四月十九日

在另一封信中,灼姐写道:

你之事如何变得这样复杂困难啊!特别是七七年出现了上边的批文(指叛徒、阶级异己分子定性)给问题的解决带来极大的麻烦。李(葆华)与胡(耀邦)一开始即谈过一两次,最近又一次与胡谈了你的看病之事,并去了刘(澜波)家,李(葆华)又亲自找钱(正英)。因而关于你的事,中组部、水电部许多同志都十分熟悉和重视了。

灼姐在信中还告诉李锐:胡耀邦的具体批文是:“复查暂缓,先

办理来京治病。”

然而，事情的落实仍然十分缓慢。此时，中共高层领导中，坚持“左”倾错误与彻底纠正“左”倾错误的斗争，十分激烈。

李锐在这一时期常常见到党报上刊登一些有关解放干部的文章，感到“几乎篇篇似对我而言”。他努力克制着自己的亢奋情绪，尽量使自己保持耐心、平静。

女儿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五日，李锐的“平静”被女儿小妹的来信打破了：

爸爸：你好！

最后一次见到你已是十一年前的事了；最后一次叫爸爸，更不知过去了多少个年头。

这十一年，虽然没有再见过你，但却重新认识了你：你从我小时候的爸爸，到后来的反党分子，到今天再一次称呼你爸爸，我们的时代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也经历了非一般青年所能经历到的一切。

记得十一年前你留给我们的信中说，一定要好好改造思想，重新做人。大姑向我介绍了你这十一年不平凡的经历。我相信你不是革命的叛徒、人民的敌人，你一定会渴求再次投入到为祖国奋斗的行列中去，只是不知道是否还允许给你这样的机会。一个人哪能不犯错误？只是犯错误后，既有善意的批判，也有恶意的为保全自己而诬陷别人的诽谤。我相信你有在这种诽谤中极冤屈的一面。但是要相信群众相信党，会给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以新生和信任。我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你也许不再梦想孩子们中

会有人再叫你爸爸,可我就是在工人们中间,在工厂艰苦劳动的磨炼中,懂得了许许多多过去认为是真理,而现在看来是绝对谬误的东西。中国已经出现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又怎能不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呢?

这变化当然不是一夜之间出现的:林彪的灭亡、"四人帮"的垮台、贺龙等许多老帅的惨死以及总理去世后,我们在山沟里听到天安门事件那难忘的夜晚……

我渐渐变了,从一个天真烂漫、被人愚弄的傻青年,成为一个真正有了根基的工人。那时我曾想过,如若有人领导游击队,为推翻"四人帮"而战斗,我一定紧紧跟随,抛头颅洒热血也在所不惜。

在"文化大革命"中,"狗崽子"的帽子很少离开我的头顶,这使我一次次想到你头上那顶"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的帽子,也想起你留给我们的信及最后一次谈话的情景。我感到人们多么不理解我们这些人的衷肠啊!无情的帽子扣起来多么容易,但却不顾它是怎样摧残着一个向往革命的人的身心,损害着革命事业。

我没有因为自己的不白之冤而痛恨你这个造成我不幸的父亲,反而使我认清造成我痛苦的是那些貌似革命,实则破坏革命的混蛋!并促使我渐渐产生了思念爸爸的感情。我今天叫你爸爸,也许又会有被那些极"左"分子斗争的一天。但是现在我可不怕了,我明白自己在做什么,我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些年,你与亲人们不通消息,精神上的痛苦我是能想象的。我有时想到你尚且难过,更何况你孤身一人,又无人信任,无人关心。如果你的问题有一天能得到解决,哪怕不能解决,但是允许你自由行动,自寻安度晚年的地方,你一定到我——你的女儿这里来。我和林卫东已商

量好，一定要使你的晚年有欢乐，有幸福。我们不寻求什么辉煌的前程，只求做个正直的、真的对祖国、对人民有用的人。也要对得起自己的好亲人。

盼

信！

小妹

四月二十一日

李锐的复信，催人泪下，可惜已经不全了：

小妹，我的亲爱的女儿：

由于大姑姑通风报讯，已有精神准备，但你的来信，使我这个历经沧桑、年逾花甲的人，仍不胜人伦深情。自学做旧诗以来，每遇感情激动之时，常以觅句吟诗作安眠药，使之平服，今天连这也失效了！

信第一遍未看完，就泪眼模糊，继续看了三遍，躺在靠椅上，口占如下绝句之后，仍止不住眼泪：

火山爆发逊于斯，
我女书来独坐时。
闻唤爸爸泉泪涌，
悠悠别后廿年思。

当然，这种感情非常复杂，悲怆。不是纠缠于往事的回忆，而是欣喜于有望的将来。感情是需要音乐与诗篇才能恰当表达出来的。可惜，我不会音乐，也只能冒充风雅写写上面那种歪诗。

六九年我在北京北郊那间寂静的日守一榻的房中，想到你正是高中毕业，有一天哼过这样的四句（前几日写信告大姑姑了）：

小妹今年可下乡？
不知战斗在何方？
此身竟使孩儿累，
何事方之心更伤！

你这十年的遭遇，我这个不肖的父亲只能作些轮廓的猜想。“狗崽子”的具体处境，种种难堪，有时也简直怕去多想。你所经受的锻炼，你的思想认识的提高（应当说飞跃的质变），当然同你本人的努力……

后面的内容没有了。但我们从小妹的回信中亦可作出一些推测。

亲爱的爸爸：

你好！你的信充满着一种自信，一种希望，一种乐观的情绪。我没有看到任何沮丧、灰心的调子。我相信有你这种坚强地面对生活、面对各种考验的精神，一定会等到胜利的一天。

她还在信中鼓励爸爸：

现在关键在于自己要坚强，要顽强地活下去，“文化大革命”中多少教训，这是其中重要的一条。人一死就完了，只要活着，正确对待自己经历的一切，就总有澄清事实的一天。

那些天，分配给李锐的劳动是看菜园。李锐把小妹的几封来信都带在身边，在菜园里连看数遍。一九六三年李锐将要离开北京赴磨子潭时，她才十三岁。爸爸要去安徽，在她看来似乎是件很

有趣的事。李锐的日记中还记着她那天说的话:“这下爸爸火车、汽车、轮船都坐了!”

女儿长大了!李锐百感交集,以致闯进菜园的猪拱倒了一大片青苗他都没察觉。好在后来他一一补种的新苗都活了。

又过了些日子,小妹再次来信,提出要和丈夫林卫东一起来磨子潭看爸爸。这倒使李锐有些犹豫了。他在给琬姐的信中谈到对这件事的种种顾虑:

> 小妹要来看我。其实这地方倒没有什么不方便。我在这里的群众关系,你们来过,有体会。歧视者只少数户籍警及爪牙而已。不过,目前意见,还是不来为好。
>
> 虽然是女儿、女婿,究竟谈起话来不比同你们,谈深谈浅都为难。我的过去、关键问题、思想、性格为人等等,尽管她爱这个爸爸,可能对爸爸的情况也有所知,但总还是抽象的。她最后接触到我时,只不过是初中一年级。她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但不知道“大跃进”那一段历史。这个爸爸非常之复杂,尤其目前问题还挂着。女婿是个党员,(那个名字——卫东,我就不大喜欢,小妹向你们介绍了一下吗?)我也不能不有所顾虑。
>
> 此外,我还担心:女儿来了,难免不传开,万一传到××耳中,会使小妹非常麻烦。小妹在母亲和父亲之间的选择,应由她自己决定,我不想从中插一杠子。
>
> ……

李锐太多顾虑了。好像手中捧着一个注满爱心的玻璃杯,一个他日夜思念才捧到手的珍爱之物,生怕一不当心就会碰碎。

然而(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九日及以后几天的日记说明:那杯子是玻璃钢的。

七月二十九日星期六晴

下午琬姐、桢哥(琬姐丈夫)、小妹突然来到,欢快之至。畅谈至廿四点。

七月三十日晴,二十至二十五摄氏度

睡了不到五小时,终日畅谈。同桢哥着棋一盘,输四十子! 喘息较好。

七月三十一日晴,二十一至二十六摄氏度

睡足五小时。前廿年与后廿年的夫妻关系、母女关系,情况介绍并分析完毕。对母亲,小妹结论比我还悲观:决不可能有变化。

八月一日星期二晴,二十二至二十七摄氏度

睡眠很少,精神很好。真正享受生活的欢乐,尤其无拘无束地漫谈,加以合味的饭菜。平生少有的欢聚。多么好的女儿。沐浴。难言之事一吐,包袱一卸。

八月二日星期三晴,二十三至二十八摄氏度

五点半起床。漫谈渐深入。到生活分析。几天围棋之局皆输,但逐渐有进步。女儿批评总结极全面,完全同意。又谈到十二点。

八月三日星期四晴,二十四至三十摄氏度

睡足四小时,五点起床,招待所早点。上午照相,下午同小妹游泳。夜仍漫谈。

八月六日星期日晴，下午阵雨，二十五至三十摄氏度

仍只睡四五小时。下午和小妹买汽车票。邮局取信。两年多没走长路了。十二点始归房。

八月七日星期一晴，二十六至二十七摄氏度

五点起床，送行。欢乐的九天过去了。多么好的女儿。多么感激琬姐、桢哥的关怀。睡得少，谈得多，心情欢畅，应当有诗记之。整日喘息。

小妹从磨子潭回去以后，便加入了亲属们营救李锐的行列。她以李锐女儿的身份到胡耀邦、刘澜波、黎澍以及水电部诸领导处造访，为父亲的早日平反奔走、呼吁。

那天小妹来到胡耀邦家，胡耀邦听说她是李锐的女儿，为爸爸的事而来，立即想起："噢，就是与彭、黄一起的。"他告诉小妹："你姑姑前些日子托人交来的材料我已批给了中组部。"让小妹再到中组部去找×××，问问处理得怎样了，还耐心地告诉小妹中组部的地址。

告别磨子潭

一九七八年下半年，中央为彭德怀的冤案彻底平反已成定局。它使李锐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

十月十一日，李锐接到中组部老干局寄来的关于批准他离开磨子潭去治病的通知。因为有一九七七年的"批文"，根据当时中央"敌我矛盾不能进京"的规定，李锐只能在合肥医院就医。这使长沙的琬姐很不满意。但大家心里都明白，问题的彻底解决，只是时间问题。

十月二十三日上午八点半，李锐向前后生活了七年多的磨子

潭的山山水水告别。前两天,他曾到山冲中作最后一次散步,"如此山景,今后再难见到。"(日记语)在患难中曾真诚相助的朋友们,这几天也不断有人前来告别或帮助打点行装。虽然"通知"中让把行李"仍留此处"的说法给告别罩上了一点阴影,但人们仍然真诚地向他庆贺。

磨子潭的人们似乎早就料到会有这一天,所以当这一天来临时,一切都显得那么和谐、平静、自然。

走出谷底

第二天下午,李锐已住进了合肥医院的高干病房。那幽雅清洁的环境,医护人员周到、热情的服务,使李锐对昨天的一切已恍如隔世。

医院全面检查与初步诊断的结果:李锐患有肺气肿、严重贫血、失眠症,还有肝大、低烧、股癣等多种疾病。医生嘱咐完全休息,暂不准伏案。

这天晚饭前,同在这里住院的安子文突然来访。安前几年也在秦城坐牢,两人谈得十分投机。于是,他们住院期间便经常相互"串门儿",下围棋。

这期间,与李锐信件往来最多的朋友是黎澍。这位历史学家"文革"中当然免不了饱受冲击,除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顶帽子以外,与李锐、田家英这两个"反革命"的交往亦是"严重问题"。

黎澍恢复工作以后,灼姐、小妹都为李锐平反的事找过他,他也诚恳地为他们分析形势、出谋划策。从灼姐那里得知李锐在山中改写旧稿,黎澍即多次去信与李锐商量,欲将所增加的《思想方向》一节,发表在《历史研究》上。李锐在离开磨子潭之前,已把这

部分书稿寄给他。

如今李锐住进医院，在这位学者看来，这正是做学问的好时机。论年龄，他比李锐大五岁，论学识，李锐对这位学长敬佩有加。黎澍在信中一再鼓励李锐不要荒废了日月，并以历史学家挑剔的眼光对李锐寄来的书稿提出种种质疑。李锐不敢怠慢，每有信问，便不顾医嘱，伏案一一作答。

不久，李锐的文章在一九七九年《历史研究》第一期上发表了。黎澍又信邀李锐写一部关于庐山会议的回忆。他在给李锐的信中说：

> 你现在显然很有时间，不要荒废了。我建议你以忠于历史的态度写一本庐山回忆录，把前后背景及经过全部写下来。这是历史。现在不出版，俟将来看情形再说。我现在负责写本共和国史，你的著作对我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希望你抓紧时间赶快写出给我。

李锐将黎信与安阅，安连连肯定此事"极重要"，并联想到"文革史"应如何写法。李锐却另有苦衷。他在给黎澍的复信中说：

> （写）"庐山回忆录"曾有此念，但何敢下笔！现在虽无"余悸"，但二十年前往事，只余若干镜头，一切有关笔记、资料荡然无存。重要者如山上常委会批彭详细记录一本，主席发言甚长，清算彭全部历史关节；山上的笔记本也留在专办。困难极大。

黎澍则在回信中要李锐向秦城"专办"讨回笔记本和所有材料，说他们无权保留这些东西。

如本书第一章所述，那个"黑皮笔记本"终于又回到了李锐手中。《庐山会议实录》定稿之前，李锐当然拿给黎澍先睹。我们从

黎澍几年后写给李锐七十寿辰的贺诗中,看到了这位历史学权威对该书及李锐的嘉许:

浊世佳公子,
于今七十翁。
曾经波浪阔,
不怕火炉红。
诗传龙胆紫,
文章太史公。
所望加餐饭,
越老越英雄。

对于历史著述的评价,黎澍无论对人对己,从来十分苛求。然而,“文章太史公”却说明他对这部“历史实录”的评价是毫无保留的。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三十日下午,李锐正在与安子文下围棋,忽然传来组织部为安子文彻底平反,并立即赴京进中央工作的好消息!安子文当即撂下棋子对李锐说:“到京后,我一定为你帮忙,把你的问题解决。”

安子文离开合肥之前,再次来病房找李锐,详细问明李锐最麻烦的两件事。李锐也把当年的一些细节同他详谈。安子文认为:被捕算不上有多大问题,“偷书”之事原来就不信。最后再一次谈起,到中央后一定帮助李锐尽早解决问题。

一个月以后,中组部、水利电力部通知李锐返京。

一九七九年一月六日十四时三十分,李锐乘火车抵达北京站。原水电部的老朋友们和有关部门负责人以及小妹 、灼姐家的几个外甥、外甥女前来迎接。

第二天,水电部召开大会,为李锐彻底平反。

二十年,谷底的路终于走到了尽头。

第四章　饱经风浪解潮流

第一节　重为冯妇又三年

省亲

一九七九年二月，国务院撤销水电部，分别成立水利部和电力工业部。重新出山的李锐，被任命为电力工业部主管水电的副部长、国家能源委员会副主任。到任之前，他回了一趟长沙，去看望阔别二十年的母亲。

八十九岁的母亲痴痴地望着儿子，脸上丝毫没有喜从天降的欢愉。二十年前，儿子高大、英俊、头发乌黑、英姿勃勃的形象在她的心中定了格，与眼前这个衰老憔悴、白发苍苍的老人无论如何对不上号。望了许久，她问一直在一起生活的大女儿琬华："这个老头是谁呀?"李锐赶忙说："妈妈，我是明伢子啊!"母亲还是接受不了这个现实，过了一会儿，她又问："你这个老头是谁呀?"李锐回头对姐姐说："看来我胸前得挂块牌子才行。"

二十年漫长的岁月，"相见无期终有期"，李锐和姐姐都曾憧憬过母子相会的这一天。可谁曾料到，当这一天到来的时候，竟是这样一个让人欲哭无泪、无可奈何的场面呢?

这是李锐最后一次见到母亲。第二年春，当母亲在长沙溘然

长逝之时，李锐正在陪同美国一个水电代表团在广西红水河上游考察，不能回长沙奔丧。从广西回北京经过长沙时，李锐下了火车，站在站台上，向北肃立静默了几分钟。大姐的家位于长沙北端的麻园岭，母亲就是在那里去世的。

翻译向美国朋友解释了这一切。他们惊讶地说：被折磨了二十年还肯这样工作，实在不可理解！

新家

一直住招待所的李锐，感到总是一个人生活很不方便，想重新组织一个家庭。人们纷纷热心地为他物色，有些勇敢的女性甚至自己找上门来。一位著名的钢琴家曾为大家所赞成，但李锐觉得人家有自己的事业，自己有自己的事业，晚年难以相互照顾。李锐总结了过去的教训，他希望对方的思想倾向不要与自己相差太远，性格最好是比较平和、厚道的。

或许是上苍有意给经历了许多家庭不幸的李锐一个补偿，不久，张玉珍走进了他的生活。

"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张玉珍就出生在那个专出美女的陕西米脂县。她比李锐小十三岁。原来的丈夫是一位朴实、正直的老红军，因病去世。这位石匠的女儿自幼丧父，母亲在家境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供她读完了小学。一九四四年，十五岁的玉珍参加了革命，在绥德成为抗日军政大学最后一期学员。从五十年代起，玉珍长期在建设部做干部人事工作。

如果说，李锐的反"左"，主要是有深厚的理论修养和丰富的党内工作阅历，那么，玉珍对"左"的反感，恐怕更多的是因为她那纯朴、实在的天性。这种天性的升华便是实事求是的人生观。玉珍的同事们都熟悉这样一件事：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一位干部精神病发作时骂了人，他的话被上纲上线后，本人遭到了开除党

籍、开除公职的错误处理。玉珍对这件事始终持不同意见。她认为:对情况应该实事求是,搞干部人事工作的就必须对人的政治生命和前途负责。多年来,她一次又一次据理力争,并积极去照顾这位干部的生活和孩子。经过不懈的努力,这位干部十余年后终于得到平反。“文革”中,玉珍对那样残酷地斗争干部非常不满,她的家成了受迫害干部的避难所。

李锐与玉珍第一次见面,就对她的善良、贤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以后的生活中,玉珍不仅在政治上坚定地支持他的反“左”立场,而且成了李锐身边一位出色的保健医生。几十年的磨难,李锐身患多种疾病,玉珍把李锐每日数次、每次要吃的多种药片,一份一份配好,精心包成一个个小纸包,十几年如一日,从未间断。

战争年代曾在医院工作过的玉珍,对吃药的时间把握严格。遇到李锐忙得不可开交,玉珍就走到他身边,把药和水喂到他的嘴里。李锐的很多亲友们都说:没有玉珍,李锐的生命很难支持到现在。继母是个很难当的角色,玉珍的平和忍让使李锐很少为家事分心。琬、灼二位姐姐认为:能找到玉珍,是李锐晚年最幸运的一件事。同李锐一起生活很难省心,善良的玉珍常常要为这个“不安分”的丈夫提心吊胆,但是理智和正义感又使她不由自主地支持着丈夫的事业。

我问玉珍,同李锐最说不来的是什么?她说她最不爱听李锐讲自己小时候家庭困难的事。“他说他家穷得只他一人每天能吃上个鸡蛋;我说我家一年到头连个鸡蛋皮都摸不着。”“他们那也算苦?!”石匠的女儿和国会议员的儿子对苦的标准难以认同。李锐理屈词穷,只好笑笑,却又不止一次由衷地向朋友夸赞:“像她那样的出身经历,能反‘左’,也真是不容易!”

满目疮痍

回到梦魂萦绕二十年的工作岗位,本该多么欣慰,但呈现在李锐面前的却是满目疮痍。一九五九年受他的牵连,水电队伍损失惨重,“文革”十年,水电事业又遭受了一场空前浩劫。水电建设总局被解散,资料全被烧毁,人员遣散。八个勘测设计院只有成都院和昆明院勉强保存下来,其余的都被分散到各地工程局,院址也被其他单位瓜分。北京、杭州几所水电中专学校,连校舍都送人了。一流的工程师们戴着“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帽子,被派到工地“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像程学敏等一些“问题严重”的“反动学术权威”则干脆发配到江西、宁夏等地方的偏僻农村,修几条能灌溉几十亩、上百亩农田的小水渠。就是在这样的工程中,也只让他们在工地上抬石头!不少水电工程技术人员在颠沛流离的岁月中,对水电事业彻底寒了心,纷纷改行转业。

队伍散了,机构撤了,人心乱了,就剩下了几个在建的工程。其中还包括那个在李锐看来技术上虽有成就,战略上却是完全错误的葛洲坝。这个在“文革”中出于某种政治需要,在长江干流上兴建的包括水电站和船闸的巨大工程,每年要吞掉国家拨给水电投资的一半以上,致使其他几个在建项目因长期资金不足,多年进展缓慢。李锐上任不久,便立刻派人摘掉了那张挂在大会议厅的关于葛洲坝的“最高指示”。

毛泽东这一指示的全文是:“赞成兴建此坝。现在文件设想是一回事,兴建过程中将要遇到一些现在想不到的困难问题,那又是一回事。那时,要准备修改设计。”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在自己的寿辰日写这条指示时,李锐还在狱中。一九七九年李锐第一次看到这条指示就很恼火,并毫无顾忌地对周围的同事们说:这不是在提倡“三边”工程

吗？这么大的工程怎么能没弄清楚就上马呢?!

李锐在部里的一次讨论会上讲得更有意思，“人家国外搞经济建设用两个手指头”，他用拇指和食指捻了几下，“数钞票、讲利润、讲经济效益。我们是用一个指头：指到哪里，打到哪里！”

更让李锐痛心的是，五十年代水电队伍中深入人心的科学、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在动乱中几乎荡然无存！许多工程没有经过周密的规划和勘测设计，就匆促上马，“三边”几乎成了正常的工作程序。

当乌烟瘴气渐渐散去，后果便无情地暴露出来：

到八十年代初，全世界已经开发的水电占可能开发水力资源的比例，发达国家平均为百分之四十，高者达百分之九十，发展中国家平均为百分之七，连印度那样的国家都已开发了百分之十七，中国还不足百分之五！本来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水电在中国电能中的比重已达百分之二十五，一九七九年，这个数字却下降到百分之十七。在世界能源供应极为紧张的情况下，中国拥有如此优越的水力资源，开发程度却如此之低，国外有关人士无不惊讶！

棘手的第二次创业

毛泽东有句名言：“一张白纸，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但是，摆在李锐面前的，却是一张被涂抹得乱七八糟的图画。

李锐从重建机构入手，好像又回到了一个圆圈的起始。然而一开始他就感到：事情比二十几年前要复杂得多！

就拿重建水电总局来说，李锐毕竟离开水电部二十年了，他对这一时期的干部成长、人事情况已不很清楚。更棘手的是，一次次政治运动，使水电系统上上下下人际关系盘根错节。组建机构就要任用干部，“惟贤是举”在理论上十分简单，在实践中却往往引出

许多宗派纠纷、门户之见。

李锐从“我”做起：对过去批斗过他的人不打听、不过问，重在工作表现。如此胸怀，一些好站在派性立场、对人事安排斤斤计较的人也就没话好讲了。

重整旗鼓当然要恢复骨干设计院。户口和房子像两只拦路虎害得李锐疲于奔命。“文革”十年，千百万下乡的知识青年要返城，因阶级成分是地主、富农而被遣送回乡的市民要返城，冤案得以平反的干部要返城……各大城市为了对付人口的迅速膨胀，都在竭力控制返城。而一个设计院的人要回来，一下就要增加成百上千个城市户口！李锐不是不体谅有关部门的难处，实在是水电事业的发展等不起！他亲自出马多次去上海、长沙、西安等城市向领导游说。

“真是困难到了极点！”李锐说到这段经历，至今都很激动。

运动中被扫地出门的单位、家庭，房产被瓜分，返城后无处安身，这是“文革”结束初期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按理鸠退鹊巢天经地义，但占房一方往往会提出很多条件、很多困难，解决不了就赖着不走。不少单位和个人往往为此类“官司”一打就是好几年。眼看设计院收复“失地”希望渺茫，而外商准备投资的几处大型水电工程都要尽快拿出设计方案，李锐只得一面筹划重建设计院，一面指挥着分散在各工地的设计队伍，在极其简陋困难的条件下，各自为战。

为了补充这支损兵折将的队伍，李锐将一批知识分子提拔到主要领导岗位。这时中央还没有提出领导干部要“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按新中国成立后的传统，科级以上领导岗位的正职基本上是由新中国成立前参加共产党的“老干部”担任。但是，在李锐看来，任何传统都必须面对这样一个现实：没有高等文化水准和专业知识，搞不了水电！

李锐也抓紧为当年因受自己牵连而遭贬的人落实政策。这绝

不仅是个人感情问题，那些人专业造诣很深，事业心强，经验丰富，是中国水电事业的宝贵财富。但后来李锐却因此被人攻击为任用私人、大搞宗派主义！

在大小会议上彻底否定“文革”

李锐还有更紧迫的事情要考虑：各地工程局的混乱状况令人揪心！十年动乱，群雄四起，造成严重派性。一个个“山寨大王”都称自己代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举旗聚义”，他们坚信同对立派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因此不惜动刀动枪，“文攻武卫”。结果各派之间的矛盾不仅是观点对立，甚至还有血债深仇。“文革”虽已结束，成见岂能了结？“派性”大大分散了他们的精力，严重影响了职工队伍尤其是领导班子的团结。

李锐忘记了自己已经是六十二岁的年纪，忘记了尚未恢复健康的身体，重又奔波于大江南北的一个个水电工地。

他对付派性的办法是釜底抽薪：首先彻底否定“文革”，继而全面否定派性。既然整个“文革”的发动都是错误的，那么纠缠于运动中的一些具体的是非还有什么意义？他在各工程局的大小会议上反复宣讲这一观点。当时，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尚未出台，彻底否定“文革”的观点在思想理论界虽有议论，却还没有多少高级干部在公开正式的场合像李锐那样理直气壮地宣传。一些老工程师感慨地说：我们被整了十年棱角就磨光了；可李锐被整了二十年，还是那么锐气十足！

“这也用汇报？！”

李锐的个性和工作效率给周围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年刘澜波的秘书李志民，至今还忘不了一九七九年他陪李锐一起到

云南出差的一段经历：

到昆明那天，水电系统的勘测设计院、工程局和电力局要来汇报工作。部里的领导多年没人来过，三个单位的负责人各自都准备了厚厚一大叠汇报材料。第一位汇报者打开本本便开始念："在部党委的领导下，在省委的关怀下，在市委的支持下……"李锐最受不了这类空话、套话，他不客气地打断他的话："你在谁领导下我还不知道吗？这也用汇报?！你就讲讲有什么事要和我研究，有什么问题要我来解决，其他都不用说了。"可怜这位负责人不照材料念就不知该怎么讲，磕磕绊绊没说几句，就又念开了。李锐不客气地说：既然你没准备好，就让别人先讲。

一个上午，三个单位的问题都讨论完了。

接下来要去视察澜沧江河谷。从大理到西双版纳，要在河谷里走一千公里左右，沿途还要查看几处坝址。河谷中有些路段卵石棋布，当地领导安排吉普车每天跑一百公里。李锐一听，不行，一天不能少于三百公里。李志民回忆说，有时候，车在河滩上颠得像跳舞一样，我们都感到受不了，真为这个六十多岁的老头担心，但他坚持不让司机放慢速度。

来到漫湾水电站时，工地上正在进行建坝的前期准备工作。工程师们露天把图纸摊了一地，吃饭时间，李锐和大家一样，手里端着碗面条边吃边继续和工程师们研究铺在地上的图纸。

情况搞清了，问题研究了，饭也吃完了，开车接着跑。

这次到云南是十一月，从澜沧江河谷到西双版纳途中，却闷热得像夏天，李锐的哮喘痼疾终于爆发。医生用了氧气袋，并几小时注射一次药物，也只能使病情稍稍缓解，最后只好飞回昆明。

从一九七九年底到一九八〇年上半年，他责成水电总局连续办了几期施工经理和总工程师研究班、企业管理研究班，让大家学习企业管理的基础理论，了解发达国家电力企业管理的先进经验。

过去水电总局的最高领导除了局长就是总工程师，一九八〇年，李锐第一个提出要在水电总局建立总会计师制度。在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的一九七九年、一九八〇年，在封闭了几十年的中国这一特定的环境下，李锐的这些举动，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

他盯住了世界银行的钱袋

向昨天告别、向明天迈进的中国水电事业最缺的还是钱。

不能说中国不重视水电。新一代的国家领导人都赞成优先发展水电，这一方面与李锐重新上任后开展的宣传攻势有关（一九八〇年到一九八三年期间，李锐数次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上发表评论、文章、答记者问，论述中国能源政策中优先发展水电的重要，以及如何保证优先发展水电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这一代领导人志在发展经济，因而讲科学，重实际。赵紫阳一九八〇年十月在听取中国能源委员会工作汇报时说："水电跟煤炭、石油不同，是再生能源，不是一次消耗能源，又没有污染，要作为战略措施来搞。这是要有个战略眼光的。不能一年一年地迁就眼前困难，把时间耽误了，将来回头一看，我们犯了一个大错误。"胡耀邦也讲："中国水力甲天下，电业排头奔四化。"在制定电力建设方针时，胡耀邦提出应该逐步把重点放到水电上，使水电能有个较快的发展。

然而，他们再重视，大病之后尚未恢复元气的国民经济，又能给水电挤出多少资金呢？

李锐的眼光于是盯上了世界银行的钱袋。他知道：世界银行不贷款给核电和油电，电力贷款主要给水电，其次是煤电，其他国际贷款亦惟世行马首是瞻。

一九七九年国内许多人对利用外资还不十分熟悉，连某些地位很高的领导人都说：外债不能借，借了永远还不清。有位身为国家财经部门的领导却说："借也可以，把钱拿回来换成人民币，我想

怎么花就怎么花。”

相比之下，李锐虽然在边塞山沟、秦城铁窗里呆了二十年，却比他们明白得多。他从安徽回到北京以后，几乎每天晚上都要一头扎进堆得像小山似的国内外有关能源动态的资料，读到深更半夜。他还系统地研究了世界上几个主要国家的水电发展史。特别是一九七九年他随副总理康世恩率领的中国能源代表团赴美国、巴西考察能源工业，对他的观念更新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以前受党内传统理论的影响，他一直认为只有像苏联那样的、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实现全国水电的通盘规划。这种观点在五十年代李锐的有关水电的著述中时有所见。从来不把某种理论当成圣经的李锐在事实面前立刻转变了观念。同时他也了解到，利用外资发展水电，是世界各国普遍的做法。美国水电的股票是最稳定的，因为火电受煤价的影响大，水电却没有这类问题。

在李锐及水电外事部门的积极促进下，一九七九年底和一九八〇年初，日本海外经济协力基金会代表团和美国政府水电高级代表团来华访问。

两个代表团回去以后，分别为二滩、龙滩、大藤峡、五强溪等几个大型水电工程提供了大笔低息贷款。

水电虽然是世界银行的主要贷款项目之一，但当时世行里没有一个中国大陆派去的工作人员，这使中国在获得贷款方面十分吃亏。同是需要水电贷款的大户，印度得益就很大，当时世行里上上下下有一百多个印度工作人员，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世行也向中国要人，李锐马上想到计划司的干部曹维恭。

曹维恭是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的水电研究生，英语、俄语都非常好，五十年代就在水电总局工作，对水电业务很熟悉。李锐去美国访问时原准备由他做翻译，但人事部门不同意，说他在历史上有悬案。李锐让曹维恭把那段历史情况写一份详细的材料。原来曹维恭在中学时同一个美国神父十分要好，神父回国后两人仍保持

了一段时间的通信联系。这就是曹维恭档案中的所谓“悬案”。就为这，曹维恭多少年来始终得不到重用。

李锐由此深深感到：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我们的干部人事部门思想僵化、制度僵化的问题真是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不然他们就总是帮倒忙！他帮曹维恭澄清了这段历史，立刻委以重任。曹维恭成了世行里第一个中国大陆派去的工作人员，也是后来在世行里工作的中国人中表现最出色的一个。由于他杰出的工作能力，世界银行还派他全权负责过东欧地区及菲律宾等国家的水电贷款。

李锐很想再向世行多派些工作人员，无奈几十年来国内政治运动频繁，影响到教育质量，在当时的中青年中很难找到合格的人才。

在水电老人中极负口碑

与耿直、甚至有些暴烈的性格形成极大反差的是，李锐对老专家特别敬重。无论在五十年代还是在一九七九年复出以后，李锐的这一特点在水电界人士中都极有口碑。

在三四十年代留学英美的水电界老人中，许多都是李锐的挚友。只要李锐获悉他们之中有谁将过八十寿辰，必有诗相赠。浙江水利厅高级顾问徐洽时先生将当年李锐为他贺寿的题诗寄给我，诗中写道：

缘起黄坛口，
相交四十年。
评谈无忌讳，
关切岂能源。
自古吹牛易，

从来创业难。
江东元老在,
耄耋尚挥鞭。

李锐给水力电力研究院高级顾问陆钦侃先生的贺寿诗是:

智乐河川不老翁,
水能利用永先锋。
西江石壁如何立,
四十年来不苟同。
一九五二年刚转业水电建设时,即偕陆总出差闽浙,一路求教。此种至情,到老不衰。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陆总一直参加三峡论证。

在向这些老人采访的过程中,我一次又一次地听到这样的感受:我们水电界的老人对他感情很深,都喜欢他的为人和才华。他在我们水电界老人中威望很高。

源头活水

我问李锐:重回水电部的这三年,总的感觉是什么?他说:"不顺利,不容易。很多问题当时认识到了,却解决不了。"后来从他的具体阐述中,我感到:这种苦恼或许是因为他对事物的发展总是具有超前的理解和认识。

例如,李锐认为开发水力绝不单纯是发展水电自身的问题,而是如何合理地使用中国能源的问题。这就需要对石油、煤炭、水力、核电等各种能源的开发制定一个通盘规划和一整套合理的政策。但这要涉及石油、煤炭、电力、核工业等几个部。李锐除了能

向有关部门提出一些建议，在许多地方就力所不能及了。

五十年代，李锐把妨碍中国水电发展的主要障碍归咎于一些负责人对水电的优越性和发展水电的迫切性缺乏认识，八十年代，他不再认为这只是认识问题，他看到水电的优点是在电网的"大锅饭"体制中被吃掉的！因为火电也罢，水电也罢，只要一进电网，就不分彼此，同样出售，谁家多赚，谁家少赚，难以区分。李锐由此想到应该让水电建立起一种独立的经济运行机制，自己发电自己卖，配之一套合理的电价政策，水电的优越性就会不言自明。投资渠道也应是多元的。地方参与办水电，水电的综合效益就会被大大重视。

所有这些设想，李锐曾在八十年代初期用不同的方式作过努力，可惜，当时全国经济体制的变革还达不到这种力度，在僵硬的计划经济体制束缚下，这些设想难以实现，李锐在任内只能深深地遗憾。

所幸当历史跨入九十年代，李锐终于看到了自己当年的设想一一实现了。一九九三年，在市场经济大潮的推动下，湖北隔河岩水电站成立了独立的水电经营公司。这种经营方式大大促进了地方政府开发水电的积极性，湖北、云南、四川等省都主动拿出巨额投资开发水力资源。李锐欣慰地说：那时候就是想搞这么个东西，今天终于出现了。

生活中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一种人：年轻时头脑敏锐、思想活跃、见解深刻，可到了晚年，便呈现出某种僵化。李锐难能可贵地没有出现这种老年人常见的不幸。二十年的磨难，不仅没有使他的思想落伍，反而为他在新时期深刻理解改革开放的理论及实践奠定了基础。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六十五岁的李锐，其思想源头仍是心潮喷涌的淙淙活水！

一九八二年三月，由于陈云的推荐，李锐被调到中共中央组织

部。

李锐在给水电界老专家翁长溥的告别信中写道:“重为冯妇又三年,临去远思已了缘……不胜依依。”事实上,李锐虽然离开了水电界,但他与中国水电的“缘分”,今生今世是不会了结的。

第二节　在中共中央组织部

陈云的安排

一九八二年，经历了“文革”重创的中国共产党，在彻底革除了“四人帮”这一致命毒瘤以后，已从奄奄一息中恢复了生机。大批在新中国成立前后跟随毛泽东打天下坐天下、“文革”中蒙冤受屈的老干部得到平反昭雪，重新恢复了领导职务。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干部队伍膨胀，年龄严重老化，文化水准偏低。这种状况成为实现中共中央战略部署的严重障碍。一九八二年一月，邓小平在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

“让党和国家的组织继续目前这样机构臃肿重叠、职责不清，许多人员不称职、不负责，工作缺乏精力、知识和效率的状况存在下去，这是不可能得到人民赞同的……这场革命不搞，让老人、病人挡住比较年轻、有干劲、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希望，甚至要涉及到亡党亡国的问题。”

于是，中央采取了几大措施：完成国务院的机构精简：实现“十二大”新老交替，进行省市地区机构改革。李锐的人生，便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踅入了另一条途径。

一九八二年春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云让秘书王玉清通知李锐：“陈云要你去中央组织部任青年干部局局长，这是一个新组建的局。”

李锐了解到，这是一个负责在青年干部中挑选高级领导岗位接班人的部门。鉴于“文革”中王洪文之类“造反”起家的年轻人被提拔到党的高级领导岗位这类痛苦的教训，陈云认为，这个部门应由一位在历次党内斗争的考验中忠于正确路线、政治经验丰富、懂

经济、有才华的老同志负责，而李锐恰是他心目中的适当人选。

李锐犹豫了很久未作答复。五十年代的经验教训使他不情愿再度卷入政治漩涡，何况他对中组部的情况心里没有一点底。三月，李锐住院期间，王玉清与陈云的另一位秘书携陈云手示，再次来找李锐，要李锐去中组部。李锐想到自己一九四九年南下、一九五二年调京到这次复出，已几次拒绝了陈云的好意安排，这次要是再辜负他的重托，于情于理似乎都有些说不过去。

三月，李锐到中央组织部报到。

进入十二大中央委员候选名单

一个月以后，中央书记处决定李锐参加中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人事筹备小组。这是十二大两个筹备机构之一。任务是为十二大准备三个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候选人名单。另一个筹备机构的任务是起草十二大文件。人事工作小组共十七人，组长由胡耀邦兼任，副组长是余秋里、程子华。组员有章蕴、曾志、高扬、陈野苹、甘渭汉、韩先楚、韩光、李昌、蒋南翔、朱云谦等。

这届代表大会，将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新老交替规模最大的一次。人事小组每天根据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提供的候选人名单及介绍材料逐一审查讨论，任务十分繁重。

李锐还要负责指挥他从组织部带来的工作班子，将每天讨论的情况编成简报送书记处。

审查工作进展得相当缓慢，对于“文革”中的某些著名人物如陈永贵、韩英等应否继续保留候选资格；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思想和行动上仍有“左”倾表现者能否保留候选资格，讨论中常常发生激烈的争论。李锐嫉恶如仇的反“左”立场一如当年，给周围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六月三日,是李锐一生中的一个重要日子,这天他在日记中写道:

今朝可谓平生最大安慰之日:上午章(蕴)大姐推荐,近在咫尺,在座者一一发言,各方面都谈到,最后(余)秋里总结,我终于未置一词。怎么说好呢?还不是追悼会,却亲耳听到如此称誉。

那天发言的具体情况,李锐的日记中也略有记载:

三日诸公评介:

章(蕴):正直无私、有水平,陈云推荐,当前工作重要,正需此种人才,德才兼备的榜样。

蒋(南翔):回忆三八年认识,延安乔木的关心(很热情的人)。三次受压。

李(昌):锐气不减,难能可贵。写毛主席的书的广大影响(指《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引者注)。

韩(光):主席赏识,鼓吹海瑞。

曾(志):德才兼备,延安时期好丈夫。

程(子华):热河办报,对高岗有看法,及早离开。

高(扬):讲真话。

这天的讨论结束后,李锐被列入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

六十五岁的"青年头"

几十天后,人事小组中委候选人名单审查工作告一段落。十

一届中央委员保留了百分之四十五，被划掉者，除了去世，一部分是因为压缩了劳动模范的比例。这些人往往本质虽好，却限于阅历、经历和文化程度，没有能力参与宏观决策。“文革”中，这部分人在中央委员会的比例迅速扩大，也是极左路线得以顺利推行的一个重要条件。此外，年龄大的占了一批，他们当中许多人将成为中央顾问委员会成员。

但书记处认为名单上平均年龄偏高，于是产生了一个年龄划一的方案：七十岁以上除元勋外，全退；六十六以上者除个别人全退。议及李锐的六十五岁，某人插话：“青年头。”

根据这一原则，人事工作小组又去掉了名单中的四十九人，并要求各部委、省委补报。在议及文艺界候选人时，反右派以后一直受压、拨乱反正中表现出色的作家王蒙有人提名。李锐打电话向几位著名文艺界人士了解情况，亦表示赞成。李锐找来王蒙小说《蝴蝶》，读完后觉得像个故事大纲，最后两节才有点人物语言。但仍觉得是位有才华、有思想的作家。当晚便约王蒙到中宣部谈话。后来在代表大会的正式选举中，王蒙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在小组会上的发言

一九八二年九月一日，经过几个月筹备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正式开幕了。在这次会议上，中共中央制定了到本世纪末，全国工农业生产要翻两番的奋斗目标。李锐感到：这个目标对组织工作的现状提出了严重挑战。新的历史时期，必须讲究新的用人之道。

九月五日，李锐在小组会上做了“选拔中青年干部”的发言。根据邓小平、陈云对领导干部提出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李锐着重介绍了各级领导层现状的差距。他认为：严重的问题在于原来已严重老化的领导班子，经过这几年的努力，

年轻化的进度不够抵消干部年龄的自然增长,而在文化程度方面,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一年两年中,各省都提拔了大量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干部,占新提拔干部的百分之四十二。针对这个问题,李锐强调:提拔中青年干部,主要是提拔中青年知识分子。

关于领导干部的"革命化"问题,他除了强调要按中央要求的主要是"文革"中表现好的和基本好的以外,又提出:是否"三种人"("四人帮"爪牙、"造反派"头头、打砸抢分子),并不难查清,特别值得注意的倒是思想是否还保留了"左"的一套,思想感情是否同"三种人"划清了界限。

尽管李锐的这一思想在实践中遇到很多阻力,但是那独到的见解,对于新时期阻止和清除各级领导中的极左分子,还是起到了重要作用。

八日上午,发生了一件李锐未曾料到的事情。在一份小范围的会议材料里代表团对中委名单的反映中,水利系统的一名代表对李锐大加指责,说他是品质恶劣之人。所举事例,无非是五十年代水电系统批斗"李锐反党集团"所举的一类事,以及在磨子潭同"小客人"的交往。晚上李锐又看到此人写给十二大主席团常委的信。信中断言:李锐个人品质恶劣,不宜作十二大中委候选人,更不适宜搞组织工作。

此人与李锐在三峡问题上观点对立,但也并无个人恩怨,李锐本想不予理睬,余秋里对此事十分关心。他让李锐也写一封信将情况说明。

九日一早,李锐动笔写信,由于勾起二十年前的往事,心中甚为不快。他在辩诬信中最后说:"请派人向水电部查清这些事实和指责,我愿参加一次水电部党组的小型扩大会,将×××的信和我这封信印发,听取大家对我的意见。同时将当年开除我的党籍的条文重新审查一下,连同'李锐反党集团'案一并平反,通报全国水利电力系统。"

当天下午,余秋里来到李锐处,颇有安慰之意,晚上又同李锐一起进餐。

十日,大会秘书处通知,收回×××致大会主席团的信。余秋里告诉李锐:没有必要再开那样一次会了(据李锐日记)。

九月十三日大会的最后一天,胡耀邦在讲话中最后说:“让我们大家都坚信这么一条真理:公道自在人心。”已经当选为十二大中央委员的李锐觉得,此话仿佛对己而言。

十二大的最后一个节目,是全体政治局领导人接见三十名新当选的中青年中央委员。整个过程由胡耀邦主持、李锐司仪。李锐每点到一个新委员的名字,就做一番简要介绍。老人们都很高兴。这样一个隆重的节目,可惜当时没有一个记者参加,更没有录像。李锐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叶帅还能认得出我是李锐。同小平握手。先念寒暄。”

省市机构改革领导小组的重要成员

十二大结束后,李锐参加了省市机构改革领导小组,并成为其中排第二位的重要成员(组长宋任穷)。机构改革包括机构精简和人事调整两个方面,前者由国务院负责,李锐要做的是后者。

这是李锐一生工作比较愉快的一个时期,邓小平提出的各级领导干部要实现“四化”的原则与他的思想太合拍了。在他看来,实现“知识化”的关键是“年轻化”。当时还在任的老干部大多是解放战争后期十七八岁从农村出来参加南下的青年农民,一般只念过小学,顶多上到初中。现在最高的做到省委书记,地县委书记几乎都是这批人。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虽然讲过工农干部要知识化,但没能解决好。反右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又把知识分子贬得不能再贬,致使这批干部的文化水平几十年中普遍没有得到明显提高。

经过调查,李锐还发现,中国的干部队伍有一个特殊现象:文化低的在上面,文化高的在下面。据一九八三年的统计:中国二千二百万普通干部中,大学程度的占百分之二十一,高中程度的占百分之四十二,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百分之三十七。另外一组数字却不同了:在国家机关的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干部中,大学程度的只占百分之六,高中程度的占百分之二十二,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百分之七十二!这种情况在党的系统则更有过之无不及,当时全国县级党的领导人中,大学文化程度的只占百分之五。文化低的当领导,文化高的当职员,人们把这种倒置的状况叫"老粗管老细"。"老粗"参加革命早、家庭成分好,这与新中国成立三十年组织部门重资历、重出身的传统很吻合,因此文化低反而提拔得快。

李锐要求老干部中年纪较轻的去参加学习、培训;身体不好难以学习的,要准备让位。属于后者的在省地领导者中是大多数,因此这项工作涉及面很大。多数省市报上来的领导成员调整方案,常常几次反复仍同中央的要求差距甚大。这使李锐的工作空前繁重,他多次在日记中感叹:"一桌子文件,三个脑袋也看不完!"

为了使广大领导干部能够理解中央意图,李锐这个时期常在中央报刊上发表文章、到各地讲话,以雄辩的理论和丰富的事实大力宣传干部队伍"四化"和国家"四化"的关系。为了加强机构改革的力度,领导小组采取了"两个三分之一"的强硬措施,即省委常委中,五十五岁以下的要占三分之一,大学文化程度的要占三分之一。这个标准要推及到地委、县委,在企业和大专院校这类高文化层次的单位,比例要比三分之一更高一些。

这一措施的实施,在全国干部中掀起了一个学习热潮,这就是毁誉参半的"文凭热"。从"出身热"到"文凭热",有如中国古代从"世袭"到"科举",虽然仍有局限,但是其历史的进步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有抵触情绪的干部在社会上发牢骚:"现在提拔干部是只看文凭,不看水平";"我干了三十多年,还不如一张纸"。李锐认为这

是在拐弯抹角地否认学历，因为所谓“不看水平”的问题实际上并不存在。

李锐在一九八三年一次组织干部进修班上的讲话中指出：

> 我们不能迷信学历，但是必须讲学历。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出现了多层次和多门类的学校，小学、中学、大学、研究生院、理工科、文科，还有学士、硕士、博士等学衔，这些总是有其科学意义的。不同的学历标志着不同的知识和专业水平。过去长期对学历持有一种错误的观念，把读书看得很容易。延安整风时毛主席批评教条主义是完全对的，他针对教条主义脱离实际死读书，举了个例子，说读书是容易的事情，书摆在这里，不会动，也不会跑，杀猪，猪还要跑。如果把他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某个问题极而言之的说法变成一般性的概念，那就错了。

也有人指责李锐的做法是：重学历不重经验。李锐对此毫不苟同。他说：

> 过去挑选干部常常把有没有经验看得很重，而我们已有的经验其中特别是近二三十年的，都受过“左”的影响，或是在“左”的影响下形成的。这些经验有许多今天已不适用了。比如“大寨经验”，今天还有什么用呢？现在不少大企业要靠闭路电视指挥生产，所以讲经验离不开现代科学文化知识。

然而使李锐声名大震的，还是他在坚持领导班子“革命化”原则中参与的两件事：一件是在《人民日报》领导班子调整时，他和中央几位领导一起，否定了几个思想“左”倾的人物进入《人民日报》

领导班子；另一件，是阻止了在"文革"中写过"揪军内一小撮"和批判彭德怀一类文章的人进上海市委。李锐也因此成了广大知识分子心目中一面反"左"的旗帜。

全面分析红卫兵

如何看待"红卫兵"，是当时干部年轻化、知识化遇到的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这一代人当时正是四十岁上下，不仅年富力强，而且整体文化素质大大强于六十岁左右的上辈。然而，在"文革"中被他们揪斗过的老一辈是决不放心把权交给他们的。这是一个尖锐的矛盾：比他们小的一代或者还在读书，或者刚刚走上社会；比他们老的一代大多已不能适应新的建设时期对领导者文化、年龄等方面的要求。历史要跨过这一代看来是很困难的。李锐不同意对这一代人完全否定。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三日，他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轰动一时的《尽快起用一代新人》一文。李锐所说的"一代新人"主要是指一九六六至一九七〇届的大学毕业生，即"红卫兵大学生"、工农兵大学生中的"老高中生"（"文革"前三年考入高中的）以及这个年龄层自学成才者。

这篇文章中最精彩之处在于，他客观地分析了这一代人的成长过程，以及在这个基础上对这一代人作出的公道的评价：

> 他们是五十年代的红领巾，六十年代初期的共青团员。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兴盛时期开始接受共产主义的启蒙教育，经历过"大跃进"的热潮和随之而来的困难时期，投入过"学雷锋"的运动，也受过"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影响。总的说来，他们世界观的形成时期，正是我们党威望最高、社会风气最好的时期。"文化大革命"中他们与我们党、我们国家一起经受了灾难和考验，对

"左"的流毒和打派仗终于极为厌恶。他们中虽有极少数成了"三种人"或犯了其他严重错误,但也有些人很快觉醒过来,奋发起来,还有些人对林彪、江青一伙的行为有所怀疑,进行了抵制和斗争;而多数则由盲从而渐趋"逍遥",进而由"逍遥"进入对现状的冷静思考,通过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更加自觉地把个人的命运同党和祖国的命运连在一起。粉碎"四人帮"后的两年徘徊,三中全会后的拨乱反正,近年来的开创新局面,使他们政治上逐渐成熟。应该说,这一代人的基本特点是认真思考、勤于学习和奋发向上的。就文化知识来说,他们在"文化大革命"前后至少都基本完成了严格、正规的中等教育,大部分人还经过严格的高考上了大学或读完大学,他们接受教育的时期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教学质量最高的时期。由于长达十年的动乱,这些人里面有相当一部分主动或被动地学习、掌握了社会科学和知识,也有相当一些人刻苦地继续学习自然科学知识,现实逼迫他们锻炼了自学能力。"文化大革命"给他们造成了不正常的经历,倒使他们具有了较多的求实精神,较少受框框套套的束缚,也得到了一些增强实际本领的机会。"四个面向"(面向基层、厂矿、边疆、农村)的分配,使他们大多来到边远地区的小单位、小厂矿(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他们常常不得不独当一面,亲自解决生产管理上的繁杂问题,从而脱离了过去一些老知识分子"单纯技术型"模式,走上了"管理型"的发展道路。他们一只脚踏进了中年,另一只脚还留在青年,年轻人的锐气和热情没有消失,又略具中年人的审慎和经验。总之这是我们国家承前启后的一代人……

文章发表后,李锐收到上千封读者来信,其中大部分是中青

年，他们在信中感谢这位前辈对他们的理解和信任，感谢李锐为他们说了公道话；还有不少人在信中向李锐诉说他们在自己的单位如何得不到信任……

后来，在选拔各级领导后备力量的工作中，这些“红卫兵”中的不少优秀分子走进了这个行列。

介绍朱正的一封信

李锐已经记不起朱正了。

一九八〇年的一个傍晚，一位年过半百、操着一口浓重长沙方言的人来敲李锐的门。那几年，在“文革”中蒙冤受屈的人实在不少。张玉珍说：有时候家里简直就像接待站。听见门铃响，开门但见腋下夹着雨伞，手里拎着包袱的，不用问就知是来求助的。

曾经有过类似经历的李锐和心地善良的玉珍，对这些人的遭遇深深地理解和同情，上班回到家不管多累，他都要耐心地倾听求救者的诉说，他多次亲自向有关部门写信，责成他们解决这些人的问题。一次没解决的，他又再三地去信。

一位告了几年状，饱尝世态炎凉的干部，回忆起当年的情景，感叹道：“李部长这人真实在。我碰到过多少当官的，当面答应你，把你胡弄走就算完事，可李部长答应办的事，那就非替你办出个结果不可。”

遇上有些来访者要求过于不切实际，李锐也有发火的时候，善良的张玉珍一面向对方耐心解释、好言相劝，背地还要提醒丈夫不能再犯那个坏脾气。好就好在李锐发过脾气后，该替人办的事还照样办。玉珍好喜欢这个心像孩子般纯洁的丈夫。

眼前的这位不速之客外表也有点像位上访者，一番叙旧，李锐才想起新中国成立初自己主持新湖南日报工作时，办了一期新闻干部训练班，朱正就是当时考进来的一百多名学员之一。一九五

二年李锐离开报社,朱正并没有给他留下什么印象。这次朱正来北京看望老社长却带来了自己新出版的著作《鲁迅回忆录正误》。

此时朱正已是中国鲁迅研究学会的理事,他所经历的四次冤案不久前都已平反。他不是来找李锐帮忙落实政策的,然而他对自己经历的简明叙述,却在李锐心中引起了极大的震撼。他感到朱正走过的路,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极其典型,是教育广大人事干部的好教材。于是就要求朱正把自己的经历详细写来。

一九八二年八月,李锐收到了朱正的来信。

朱正在信中叙述道:他在中学时期就读完了鲁迅著作,在政治和思想方面深受鲁迅的影响,因此新中国成立前就参加了地下党的外围组织。可是,一九五一年,在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工作时,由于给《人民日报》写信,批评电台党支部书记去香港采购器材期间,挪用外汇为自己买生活用品的事,被认为反党,开除了团籍,交新湖南日报社控制使用。朱正在中学时期就想写一部鲁迅传,在被控制使用期间,他不间断地进行着这项工作的准备。就在资料收集准备接近完成时,一九五五年肃反运动来了,他成了肃反对象。剥夺行动自由期间,他就用写交代材料剩下的稿纸,凭记忆中的材料构想《鲁迅传略》一书,一个半月的时间里完成了十万字的书稿。母亲来报社探望他,他就背地请母亲将书稿带出去投邮了。这就是经过冯雪峰的审定、一九五六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我国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鲁迅传记。出版前报社人事科曾致函出版社,建议不要出版朱正的书。

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中,报社一百零几名编辑记者,打成右派的就有五十多名,朱正自然在劫难逃。给他的处分是:开除公职、劳动教养。这是对右派处理中最严厉的一种,但这些仍不能使他忘情于《鲁迅传》的修订。他寄钱去出版社邮购有关书籍,又写信让家里寄资料来,不料其中几本被没收了,说是民国时期出版的书,不能看。他叫苦不迭,以后再不敢让家里寄书。一九六二年劳

动教养解除后，因为开除了公职，只能到处做临时工，以体力劳动维持生计。劳动之余，他继续考证鲁迅传记材料的真伪，写下了大量笔记，这些笔记就成了后来出版的那本《鲁迅回忆录正误》。一九七〇年"文化大革命"中的"一打三反"运动中，朱正又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刑三年。节衣缩食购来的书籍(包括很不容易得来的三十年代的初版书)都被抄走了，手稿片纸不留。但是，这些让他肝肠寸断的痛苦并没有使他精神崩溃。在劳改队，幸好还不禁止阅读鲁迅的书，他就又写了鲁迅传的若干片断。

一九七三年冬，朱正刑满释放，交街道管制，每天劳动之余，他又重写被抄走的《鲁迅回忆录正误》，并将书稿寄冯雪峰、孙用请教。一九七七年底，人民文学出版社派人来找朱正，欲借调他去那里工作，派出所的回答是：这是一个现行反革命，你们找他干什么！

一九七九年，朱正在各次运动中的罪名均得到平反，他到湖南人民出版社做了编辑，陆续编发了好些鲁迅研究专家的学术专著，一九八〇年，他被借调赴北京参加编注新版《鲁迅全集》的工作。就在这时，他去拜访了老社长李锐。

朱正在给李锐的这封信中最后说：

> 我想在这一代知识分子中，我并不能算是怎样不幸的。至少现在，我还能向您倾诉这一切，我知道还有若干人，也遭受了或多或少的不公正的待遇，可是还欲告无门。向您汇报这些，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即研究干部工作的方针政策是您业务范围之内的事情，是不是可以解剖几只麻雀，也从我的遭遇中总结若干带规律性的东西来？我希望，今后在我们的国土上，在涉及任何一个干部乃至任何一个公民的命运问题上，任何一个个人都不要享有太大的权威。我们希望人处在逆境时应当尽量坚强，但是我更希望不要无端地把一个人置于逆境之中。

李锐将朱正的信拿给中央组织部研究室的人看，后来这封信加上很长的按语，在《组工通讯》(一九八二年二百二十九期)上发表了。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阅后，写下批示。李锐还写了《介绍朱正同志的一封来信》一文，文中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以来，中央领导同志对于起用知识分子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许多知识分子意识到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振奋精神，积极工作。他们不是时时回顾过去，老是念叨自己身上的“伤痕”，而是积极放眼未来，一心想同党一道开创振兴中华的新局面。朱正在他的信里，就表示了这个意思：他希望能从他的遭遇中“总结出若干带规律性的东西”；“希望今后不要无端地把一个人置于逆境之中”，“一切不公、一切灾难都到我为止”。许多知识分子虽没有说这些话，却也用实际行动这样做了。这就是我为什么很重视这封信的原因。

不久，当李锐从上海《文汇月刊》的一篇题为《胡杨泪》的报告文学中得知另外一位与朱正有着类似坎坷经历的中年知识分子钱宗仁的事迹，又在《人民日报》上写了《请读〈胡杨泪〉——有关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和组织人事制度改革问题》的文章。

朱正的信和《胡杨泪》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轰动；李锐的推荐文章，使人们特别是组织人事干部在感动之余，更深深反思了自己的工作，因而大大推动了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

建立“第三梯队”

一九八三年六月一日，胡耀邦第一次使用“第三梯队”这个新说法。胡耀邦说：“为了国家和民族的长治久安，为了使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能有连续性，我们必须从现在着手建立第三梯队。”后来胡耀邦在和江西干部的谈话中对“第三梯队”的概念作了这样的诠释：

现在我们的干部队伍里有三代人。第一代人的主要任务是安度晚年。第二代人的重要任务，也是他们的责任，是帮助年轻干部走上领导岗位。为了使这项工作完成得更好，我有几点希望：祝愿第一代同志（即第一梯队的同志）能长寿和保持晚节；希望第二代（即第二梯队的同志）能支持和扶植第三梯队的同志；第三梯队的同志则应该全心全意地投身到工作中去……

胡耀邦要求有一千名省部级干部的后备人选，即第三梯队。这项工作由李锐主管。这时李锐已被任命为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这项任命是在省市机构改革的工作结束后宣布的。

李锐要求各省市主管干部亲自动手，把这项工作作为党组织的中心任务之一，并要求准备上报中组部的第三梯队人选名单，都要征求群众意见。

中央组织部派赴各地各部的考察小组，根据考察提纲，对列入第三梯队名单的人员逐个到所在单位进行调查、分析、谈话，人选确定之后，要以考察材料为依据，由考察小组写出五百字的小传。

这项工作进行了五个月以后，李锐在中央组织部召开有关人员会议，向他们指出：从前一段报上的名单看，年龄、文化程度大都比较注意，但整体结构不理想，缺少财经工作和思想理论、意识形态的人才。另外，相当多的考察材料对"文革"中的情况了解不细致。李锐重申：对每个考察对象在"文革"中的每一阶段的情况都要查清，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政治表现也要考察清楚，整理出准确的文字材料。

李锐对这个问题的强调，与中央的精神完全一致。在选拔接班人的问题上，老一辈领导人最担心的就是混入"三种人"。邓小平、陈云、胡耀邦曾多次强调：凡属"三种人"，一个都不能提拔。

李锐提醒大家：这些人有文化、年龄的优势，有些人清楚地知道自己的问题，就多次设法转移工作单位，甚至更名换姓，隐蔽下来。有些单位又把他们误选为后备干部加以培养。因此绝不能图一时省事，留下隐患，那样我们会犯历史性错误。但是他又说："三种人"也应该能改造过来，不过难度很大就是了。

一位当年的考察组成员回忆说：为了弄清每一个考察对象的情况，特别是在"文革"中的表现，我们必须到他工作过的所有单位调查，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对他在"文革"中的每一次发言记录、每一篇文章，以及他所参加过的每一个组织，都要认真审查。

这一时期李锐除了日以继夜地听取各省委和考察小组汇报来的情况，还到一些省市直接了解情况，同被考察的干部谈话，听取地方组织对这项工作的意见。

以往的经历使李锐特别注意从经济部门、大中型企业、国家重点工程中发现人才，他认为在这些岗位工作过的同志，其知识和经验可以得到广泛的积累，才干可以得到充分展示。国家要发展经济，高层领导中必须有这样的人才。

由于过度劳累，李锐的哮喘不时复发。一九八四年四月在四川，气候潮湿，他喘得整夜不能入睡。但他还是连续参加了十几个座谈会，秘书看他身体不好，想把会安排得短一点，他也不答应。

如今，他们当初考察过的一千零六十八名"第三梯队"成员，很多都已走上了省部级甚至中央领导岗位，在十四大代表中，有百分之五十是当年"第三梯队"的成员。

我问李锐：如何评价当年这段选拔干部的工作？

李锐说：那是一个过渡阶段。它的进步就在于它同过去选拔干部只注重出身、资历、政治表现相比，强调了文化程度和实际能力。干部年龄问题上的一刀切，是因为当时没有别的办法，不然老的怎么下得来？

他又说：严格来讲，"第三梯队"那些人都是在计划经济的旧框

框中挑选出来的。在那种体制下很难表现出一个干部的政绩，要选出出类拔萃的人才是很困难的。现在的市场经济强调竞争，人才就可以脱颖而出。人才市场、聘任制度这些都是发现人才的更好形式。

耄耋之年的李锐，到底是靠什么保持了那种对新事物永不衰退的敏锐，这对许多人都是个谜！

离开组织部领导岗位

一九八四年九月，正当建立“第三梯队”的工作进入最后阶段，李锐被正式通知从中央组织部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因为年龄到限。新任组织部部长乔石在办公会上宣布了这个决定：1. 根据陈云指示及李锐要求，免去李锐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职务；2. 工作另行安排，不再到第一线；3. 一九八二年到中组部后，表现是好的，工作是有成绩的。

退下来的李锐对他的朋友风趣地说：我是安全着陆。

事实上，李锐在组织部工作的后期，处境相当艰难，那些不合“四化”条件、没有被安排在显位的权欲熏心者，那些不顾别人死活、迟迟不给受迫害者平反而被李锐拍案痛骂的官僚，还有那些未能在机构改革中进入领导班子的“左王”们，都是李锐的“政敌”。他们联起手来，四处告状、八方活动，扬言“不整倒李锐我就不姓×”。李锐感慨地说：“我时常要像鲁迅讲的那样‘横着站’，不然背后就有人捅刀子。”有人曾善意地劝李锐“不要树敌过多”，“组织部的人应该是各方面都能接受的”。然而不善于官场周旋的李锐，在他的政界生涯中始终没有为自己营造起一个保护性的人际关系网。

不管怎样，在李锐离开组织部领导岗位之际，他回顾这几年的工作，看到干部队伍结构的那些可喜的变化，仍然深感宽慰。

第三节　再论三峡

一九九二年四月，三峡工程论证被画上句号

一九九二年四月三日，是一个必定要载入史册的日子：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在这天下午的闭幕式上通过了《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议案》(以下简称“三峡议案”)。它意味着三峡工程的兴建，在中国已经完成了法律程序；历时半个多世纪的三峡论证，被画上了句号。

来自国内外的信息带着鲜明的感情色彩：赞同者兴高采烈，反对者义愤填膺，遗憾者扼腕长叹！

据说，在这次人代会上，三峡问题虽然只是大会的十一个议题之一，但却始终以压倒的声势，成为代表们关注的热点。为了让绝大多数对水利、水电，以及对三峡工程知之甚少甚至完全不懂的代表们，能在三月二十日到四月三日这些天里对三峡工程的上马与否做出抉择，大会做了大量工作，甚至把许多学术性很强的专论，直接印到大会上去。当然还有专为代表们准备的《三峡工程简介》电视录像片以及在军事博物馆举办的《三峡工程展览》等启蒙性的直观教材。难怪有代表戏言：“这次人代会变成了三峡工程基础知识学习班。”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工作，包括从这年年初中央各大新闻媒介对三峡工程所做的大规模宣传，其主张上马的导向是非常鲜明的。就常理而言，这种导向，对于外行的抉择，其影响往往是巨大的。

表决结果：赞成的一千七百六十七票，反对的一百七十七票，弃权的六百六十四票，未按表决器的二十五票。主持大会的万里宣布：赞成票超过半数，《三峡议案》通过。

当全场热烈鼓掌的时候，当人们举杯庆贺或拂袖而去的时候，李锐在哪里？他在想什么？

张玉珍记得，那天下午，她和李锐一起出去散步，走了很久很久，李锐没说一句话。此时，李锐的心情很复杂。由于他对中国高层政治的情况比一般人更了解，这个结果对他来说是预料之中的。如果说，三十四年前的南宁会议，三峡工程主上派与反对派的较量中，后者占了上风，那么今天的结果显然是相反的；如果说，南宁会议关于三峡争论的结果，使中国避免了一场灾难，那么今天的结果又会给中国带来什么呢？李锐的忧心正在于此。三十多年了，科学技术水平与当年已不可同日而语，在许多人眼里，现代高科技几乎无所不能，国内政治经济情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难怪就连李锐的一些挚友，也劝他不妨超脱一些。然而，李锐和那些反对派们，又为何如此执著？那也是一群出类拔萃的专家和渴望"中国水力甲天下"的赤子啊！

一九七九：山雨欲来风满楼

李锐再次卷入三峡论争，几乎与他的复出同步：

一九七九年一月，李锐从磨子潭回到北京。

二月，林一山向国务院写报告，要求长办统管长江流域的规划、治理、开发，其主要理由之一便是"有利于搞好三峡工程的准备工作"。

三月，李锐就林一山的建议，上书国务院，提出反对意见。

四月，林一山向国务院汇报三峡问题时建议：三峡工程一九八一年正式开工，一九八八年开始发电。水电部长钱正英直言："现在提出三峡，首先是为解决长江洪水。如果专为发电，不一定在三峡搞。不搞三峡，解决长江防洪，谁有办法，我给他下跪。"国务院

领导华国锋、邓小平、王震、谷牧、王任重等都赞成建，惟四川省委书记赵紫阳提出异议。赵紫阳说："大家知道就这么多钱，这里一集中，其他地方就不能搞了。"认为三峡工程可以推迟，先在长江上游的金沙江、大渡河、雅砻江较容易施工、淹没较少的地方搞。这些看法，与李锐不谋而合。

李先念强调对三峡工程要慎重。他主张组织一千个专家，各行各业都来辩论。

五月，林一山主持三峡工程选坝会议。会上，电力部的防洪专家、水利科学院的泥沙专家、交通部的航运专家从各方面对三峡工程提出质疑，坝址的选择未取得一致看法。不少人认为：三峡工程上马的时机尚不成熟。新华社记者如实反映了这次会议的情况之后，中央做出指示：三峡工程不宜急于上马，许多问题需要抓紧继续研究，多听取不同意见。

七月，遵陈云嘱，李锐写了《再谈三峡问题》一文。陈云之所以让李锐对三峡问题写个意见，也是因为他对这一超特大工程有很多问题放心不下。李锐在这篇文章以及后来写的《关于三峡问题的几点补充意见》中，针对主上派这次催上三峡的主要理由"防洪"强调：三峡防洪效益有限，而且投资过大，还有许多重大技术问题不易解决，应做多种方案的比较。

邓小平的表态

主上派与反对派旗鼓相当的拉锯战又持续了近三年之后，邓小平的表态打破了这一局面。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邓小平听取国家计委汇报实现本世纪末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计划。当谈到为适应翻两番的要求，将兴建三峡工程时，邓小平表态：我赞成修建低坝方案，看准了就要下决心，不要动摇。

大坝正常蓄水位的规模,从来都是三峡工程争论的重点。五十年代,长办最早曾提出过二百三十五米特高方案。考虑到移民数量巨大、淹没面积太多,一九五八年,中央成都会议提出:三峡蓄水位不能超过二百米。但多年论证表明:二百米方案在移民、投资等方面,问题依然很严重。邓小平赞同的"低坝方案",是经万里、李鹏等现场调查,拟定的蓄水位一百五十米的方案。与二百米方案相比,一百五十米方案投资和移民可大大减少,陈云、李先念、胡耀邦、赵紫阳等都先后同意了邓小平的意见。

在李锐所有关于三峡工程的文章中,一九八三年四月写给国家计委的《关于低坝方案建设的意见》是惟一一份有赞同之意的文字。李锐回忆说,他在写这篇东西时,心情是很矛盾的。

他在一九八九年《三峡工程二十一世纪再定》的文章中写道:"如果说我过去曾经同意过一百五十米低坝方案,那也是因为听说这一方案当时党中央常委已经通过,难以再提意见;此外这个方案需两级开发,还得在上游再建一级,这正是'长办'从来没有做过工作的,势必要补充勘测研究并引起新的论争,延缓开工时间。所以我当时对人说过,我的同意是'缓兵之计'。'但据我所知,毛主席和周总理生前从未说过三峡工程可以上马。周总理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听取葛洲坝工程汇报时,曾对林一山说:'你说的高峡大坝(指三峡工程)是我们子孙的事,二十一世纪的事。'毛主席说过填过'更立西江石壁'词,对三峡工程很感兴趣,但在一九五八年一月,他在南宁会议大反'反冒进',要搞'大跃进'时,关于三峡论争,也还是在听取了正反两面意见之后,赞成了我的意见,批评了林一山不切实际的想法(滑稽的是,有人在档案上歪曲史实,说毛主席在南宁会议上采纳了林一山的意见)。可见,只要言之成理,连毛主席在那种时候,也还听得进从事具体工作的人的意见的。"

八十年代的林李之争

一九八四年四月，国务院批准了三峡工程一百五十米低坝方案可行性报告。施工队随即开进工地进行准备工作，争取一九八六年正式开工。

这下李锐着急了。五月，他再次上书中央，对马上做施工准备、一九八六年正式开工表示反对。理由是：投资、泥沙、航运、移民和许多重大技术问题的研究都还很不成熟。仓促上马，将引起无法估计的严重后果。

一个月后，针对李文，长办主任林一山也上书中央，题目就叫《对李锐关于三峡工程的意见提出不同看法》。林认为，南宁会议以后又经过二十几年的潜心研究，三峡工程现在是要加快行动的问题。林一山此时的论战水平，已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

李锐自然不会等闲视之，他找来几位老水电专家，对林一山的《不同看法》慎重研究。之后，由李锐再次上书中央，对林一山的《不同看法》提出全面的不同看法。双方的分歧主要表现为：

关于投资效益，林一山认为：就算把三峡工程费和移民费都算上，也就是一百四十亿左右，平均每千瓦的投资不过一千零八十元；而一九八一年全国正在建设的大中型水电站每千瓦投资为一千五百元，所以上三峡是优选的结果，根本不存在"挤掉其他水电工程"的问题。

李文除了指出林所说的一百四十亿根本打不住以外，特别引用了赵紫阳不久前就投资观念讲的一段话："我们中国搞建设没有个资金周转观念，就是只有投资多少。光讲投资多少是不正确的。你说投资多少啊，比如六十亿元投资，建设周期十年，算上利息就是一百二十亿元，要是五年就是九十亿元。资金要从动态上看，它不是个静止的东西。光投入不产出，十年不产出和十年中间有产

出就不大一样。”李锐认为:“应当充分估计到三峡工程工期很长,积压资金严重的问题;在开始发电以前的十多年内,只有投入没有产出,而这十多年乃是我国建设资金非常紧张的时期。积压这么多资金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不能发挥效益,值得慎重考虑。”“三峡工程争论了近三十年,至今仍有不同意见,就是因为三峡工程的提出,不是优选的结果,而是缺乏全面的切实的经济论证和技术论证。”

关于泥沙淤积碍航,林一山认为:解决三峡水库泥沙有几个有利条件:一是长江水量大,水库呈河道狭谷形,有利于排沙;二是夏季水库为了腾出防洪库容,将大量放水,此间水量既可发电,又可把泥沙冲至下游。

李锐则认为:大坝建成后,库区比降变缓,淤积将比天然情况增多,而汛后又要蓄水发电,冲刷又将减弱,由于淤多冲少,泥沙将逐年淤高。

林一山根据电算结果预言:三峡水库将在七十年后达到冲淤平衡,那时仍可保持基本库容,也不会出现碍航。

李锐则指出:宜昌至重庆的航运并不会因修了三峡而畅通,部分河段还不如天然情况。

林一山充满信心:我们已掌握了长期观测的水文资料,有日趋成熟的水库泥沙淤积电子计算程序,并由国内进行泥沙模型试验有经验的单位和长办一起进行模型试验,还有葛洲坝、丹江口实际运行资料作为参考,三峡水库泥沙淤积问题与葛洲坝同样可以得到圆满解决。

李锐却指出那些实验“有的还在修建模型或实验厅,有的刚开始调试。现在就拍胸脯,科学根据不足”。

林一山将葛洲坝工程作为建库后航道明显改善的成功例子并且言之有据:据航运部门统计,地方客运船从宜昌上行至巴东原需十八小时,建库后缩短到十小时;下行原需九小时,建库后缩短到

六小时。

李锐则不以为然：现在葛洲坝工程为了防止引航道淤积，有时还要停航冲沙清淤，船闸也多次发生故障。据交通部代表组在三峡可行性报告审查会议提出的材料，"葛洲坝的二号船闸，自一九八一年六月十五日通航以来，到一九八三年三月三十一日为止，在六百五十五天中，断航一百七十四天"，至今泥沙淤积对航运的影响，还不能算"得到圆满解决"。

关于防洪问题，林一山一如既往，强调三峡水库对于防洪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李锐亦一如既往，强调三峡对武汉防洪不起什么作用；长江中下游防洪主要靠堤防和湖泊蓄洪区分洪蓄洪。

……

交替读着林、李二人的论战文章，我仿佛置身于一场电视辩论会。辩题为："三峡工程上马利大于弊"。正方由林一山担任主辩，反方由李锐担任主辩。场上高潮迭起，妙语连珠，精彩绝伦。当然这类联想，只能是假想，令人费解的是，五十年代至今，三峡工程始终没有在新闻媒介上进行充分的讨论。

来自重庆和全国政协的意见

正当主上派和反对派的两位主帅辩得难解难分之际，斜刺里又杀出个重庆市的一百八十米方案。谈起这个方案的由来，重庆市委政策研究室难免有点牢骚。

一九八四年四月，重庆市收到国务院关于三峡工程进行施工准备的文件，由于三峡水库直接关系到重庆市的未来，市委立即组织有关部门成立了专门班子，调查研究三峡工程对重庆市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三峡工程一百五十米方案，水库末端淤积在长寿附近，将影响长江航道进出口，给重庆市的发展造成不利。

重庆市看到长办一九八四年作出的一百八十米方案，据说重

庆港水深可增加，三峡大坝至重庆的航道可望得到改善，万吨船队一年之中有几个月可达重庆……便向中央提出了这一方案。但是，他们又发现：这是以重庆以上航道的恶化、扩大淹没面积和加剧上游洪水灾害为代价的。因此，当全国政协经济建设组赴重庆调查时，他们表示：我们提出一百八十米方案，是在已经决定修三峡工程的前提下，"两害相权取其轻"。

然而，主张低坝方案的一批专家却认为：一百八十米方案对重庆危害更甚。

与此同时，交通部也向国务院报告了三峡工程可能对航运产生的一些不利因素，希望对此进行充分的分析论证和必要的试验研究；全国政协经济建设组以孙越崎老先生为首，赴三峡调查三十八天后，向中央提出"三峡工程近期不能上"；一些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也在几次大会期间提出许多意见和疑虑。

重新论证

鉴于来自党内外的强烈呼声，中共中央、国务院于一九八六年六月发出的十五号文件中决定：对三峡工程进行重新论证。文件明确要求："要注意吸收有不同观点的专家参加，发扬民主，充分展开讨论。"

中央决策层的这一重大举措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面对前来采访的记者，李锐表现出由衷地喜悦："我衷心拥护中央关于重新论证三峡工程的决定，否则，真上马了，那将是非常麻烦的事。""现在许多人热烈地议论三峡工程，反映了他们对人民、对历史的可敬的责任感，同时也反映出我国民主政治生活确实与过去大不相同。党中央与国务院鼓励人们对重大决策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搞真正的群言堂，不再搞一言堂了。因此，我们不但为三峡工程将得到正确决策感到兴奋，更为我们的党风国运感到兴奋。"

但是,李锐对让水电部负责论证还是不大放心。因此,他在这篇答记者问(载《群言》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中“借花献佛”,特别用万里的一段话献给参加这次论证会的全体人员:“软科学的研究应该只尊重客观事实,崇尚真理,不迷信权威,不屈从个别领导人的意志……有的领导人往往喜欢把他们主管的部门,当做为他们的任何决策拼凑各种‘理论根据’的工具。这种所谓‘科学’的决策论证,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和危险性,比没有论证更坏。软科学研究必须有不受决策者意志影响的相对独立性。它只受实践的检验,只对人民和历史负责,而不能看领导者的眼色行事。”

这以后,李锐在其他关于三峡论证的文章中,多次引用了万里的这段话。

水电部主持的三峡论证机构,聘请了国务院所属的十七个部门、单位和中科院所属的十二个部门以及二十八个高等院校和八个省市专业部门有各种专长的专家四百一十二名,共涉及四十个专业,水电系统以外的专家二百一十三人,占百分之五十。还从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国家计委、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协、国务院三峡地区经济开发办公室聘请了十二名特邀顾问(后又陆续增加到二十一位)。水电部领导在给中央和国务院的报告中说:这是为了“接受各方面的指导监督”。然而,对三峡工程曾深入研究、一直持不同意见的李锐却没有被聘为顾问,对此,水电界一些老专家深感遗憾。

“我仍忧心不已”

一九八八年十月,三峡工程重新论证两年之后,李锐把忧心和不满再次诉诸《群言》杂志:

对于三峡工程论证是否真能贯彻民主化科学化,我

仍忧心不已。

我之忧心不已，是因为现在三峡工程论证由一贯急于上马的原水电部领导在领导，而且所论证的主要是解决上马中的问题，而不是充分研究经济上是否合理，技术上是否可靠，国家财力能否承受，是否经得起历史的考验等根本问题。下设各专业组组长也大都为该部成员。这种局面自易于贯彻长官意志，易于形成“一家之言”。人们担心的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全国政协孙越崎、林华、王兴让等十名委员在给中央的上书中，也在这一问题上表示了与李锐相同的看法，并对一些具体情况做了补充：

由原水电部领导组织的三峡工程领导小组成员十一人，全部为原水电部正副部长、正副总工程师和长办、三峡开发总公司的领导人，他们都是一贯主张早上快上三峡工程的同志。在领导小组下属的十四个专家组，其中十个组的组长是水电部系统各部门负责人……即以这次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出席者一百七十七人统计，其中一百零三人为水电部系统的同志，也占多数。这样的组织方式难免形成“一家之言”。

会上虽有不少不同意见，但总结时总以绝大多数同意，原则通过论证报告。而且历次论证会，都是一面倒的三峡工程一切都好，三峡工程不可替代的发言，稍有不同意见很快就抓住一点进行反驳，民主空气是很不够的。因此，我们认为到目前为止的论证，实质上是一个部门对其所属工程的论证，难以做到超脱的综合论证。

对上述看法作出反驳的是三峡经济办公室主任李伯宁。他在全国政协第七届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的书面发言中说：

> 这些责难，很难让人理解。中央已经决定了的东西，要重新论证，就重新论证。而论证水电工程，不交给水电科学家最集中、最有实践经验、最有发言权的国务院水电主管部门——水电部，而交给水电部以外的非专业、非主管部门，才叫民主化、科学化吗？中央的决定有什么错误？何况水电部也充分吸收了本系统的不同意见者。至于占多半数以上的水电系统以外的专家，包括了各个有关部门持各种不同意见的知名人士，他们都是有独自见解的，不受任何人左右的，在论证过程中也充分发表有自己不同观点，怎么能把他们说成是受水电部控制的呢？

就重新论证的结果答记者问

四百一十二位专家的论证已接近尾声。按照论证机构的设置，领导小组下设有防洪、泥沙、航运、移民、生态环境、投资估算、机电设备等十四个专家组，各专家组经过研究、讨论，在本专业提出专题论证报告。对专题论证报告有不同意见者，可以拒绝签字，另提出书面意见作为专题论证报告的附件。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三十日，历时两年半的重新论证终于有了结果。此后，各种新闻媒体包括文学作品，均按照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进行热烈的宣传："参加论证的四百一十二位专家，以四百零三人赞成，九人反对的结果通过了论证报告。"于是，即使是有反对倾向的作品或媒体，也只能在承认这一结果的基础上，加上"科学是不能以多数少数定是非的"这类说法，以示抗争，只有圈内的一些人对此愤愤不平，认为"四百零三位专家赞成，九人反对"这种提

法与事实不符。然而那些细节就连李锐也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才知道的。面对“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有利”的论证结果,反对派们不仅没有沉寂反而论争得更加激烈了。

一九八七年将反对派意见汇编成《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一书时,该书主编、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田方和该所研究员林发棠,曾被告之“上面的意思”:“希望停止公开发行”。但 1989 年他们又编出了《再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性质和前书完全一样,为此他们遭到诬告。该书收集了李锐的大作《三峡论证有感》。另外,《长江　长江》这部三峡工程的反对派专家、学者答记者问专集,也相继出版。李锐在这部轰动一时的集子里,通过与记者的问答,详细阐述了与重新论证的结果完全不同的观点:“不建比建好,晚建比早建有利。”在这篇标题为《三峡工程二十一世纪再定》的文章中,李锐除了坚持一九五八年他在南宁会议上的一些基本观点之外,还对一些看法做了更充分的阐述,并谈到当年他未曾涉及的一些问题。

当记者问:力主上马者在论证报告中,有“三峡工程与长江支流工程互为补充,既难互相代替,也不互相排斥”之说,提倡“根据需要与条件适时积极兴建”对此有何看法时,李锐答道:

这种理想局面,以中国今天的条件,只能算是“画饼充饥”。以现有的国力,大型工程,建哪个不建哪个,总得有个先后次序,不可能同时都上。

李锐回顾了一九八四年的情况,当时国务院原则上同意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三峡工程开始了施工准备,结果湖南拟建的五强溪水电站、四川拟建的二滩水电站都上不了。后来三峡工程需重新论证,这几个电站才得以安排。这充分说明三峡工程和其他支流工程不可能同时兴建,不是先建三峡,就是先建支流工程,二者只居其一。当前一批已经开工的支流电站,每年投资都是很不够的;其他一批已作好初步设计或可行性研究的支流水电站,都在等

钱开工，怎么可以说三峡与支流电站“互不排斥”呢？众所周知，支流工程没有那么复杂的泥沙、移民、生态问题，不应当为了上三峡把本来急需且现实的支流工程搁置起来。为解决急迫用电，需要快上快建成一批支流电站。

当谈到他当年论述较多的防洪措施问题时，李锐压不住火气，对水利部的工作提出了直率的批评：

“一九八〇年，赵紫阳曾作一批示：关于长江防洪，应切实加以研究，不能等待上三峡工程来解决。据此，水利部提出加高加固堤防标准，并安排了各省的防洪蓄洪区。应该说，只要做好这些工程，是可以解决一九五四年型的洪水的，并不需要三峡水库。可惜主其事者，志不在此。难怪一九八五年全国政协调查组到沙市视察时，亲见为加固大堤的四条进口挖泥船，竟有二条调作他用，其他二条工作缓慢。这情况你能解释吗——已经修了分洪蓄洪区，不用，又想着建大水库；买了先进的挖泥船，不用，拿去干别的营生，这到底算什么章法？我不得不说的是，在三十多年催促三峡工程上马的同时，水利部门对堤防和分洪蓄洪区的建设没有抓紧，一九八〇年确定的十年任务，至今已过去八年，还没有完成一半。对于防洪，九十多岁高龄的孙越崎先生说过：明人张居正堵死北口，舍南保北，犯了第一错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的‘蓄洪垦殖’方针，导致两湖广大湖泊围湖造田，使原有滞洪分洪区缩小了一半，犯了第二个错误；如果要修三峡，则可能犯第三个错误。这一见解是相当有道理的。”

谈到生态与环境问题，李锐同意三峡论证生态环境组长、生态环境专家马世骏的论断：三峡工程对环境的影响弊大于利。他还与植物生态学家侯学煜怀有同感：三峡一带具有我国少有的亚热带气候，将数十万亩肥美良田与独一无二的旅游资源淹没掉，是永远不能恢复的。以今天人类所具有的科学手段，没有人能预言这一改变长江水流状况的巨大工程，将如何引发整个流域生态环境

资源等一系列问题的连锁反应。作出三峡工程对于生态环境“没有影响”、“影响不大”这样的断言,未免太轻率了。

当记者问:“依你所说,既然长江流域的防洪、发电、航运都不是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替代,泥沙、移民、生态还将构成巨大的、无可挽回的损失,到底为什么非要上三峡工程不可?”

李锐说:

我们抛开所谓“好大喜功”、“树碑立传”这类议论不谈,从粗浅的道理说,主管水利工作的同志,害怕水灾尤其是特大洪水,怀着对人民负责的崇高观念,一心想减轻或消除水患,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党中央领导历来抓紧此事的原因。但不论革命还是建设,搞政治还是经济,根本原则是实事求是,要按客观规律办事,不能凭主观愿望决策。从五十年代开始,三十多年来,一次又一次掀起上马高潮,其根本教训在于这项工作的负责人指导思想的主观主义和“左”的急躁情绪。我的见解与水电部领导论证的结论正好相反:三峡工程,不建比建好,晚建比早建有利。

国家领导人认为: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的

一九八九年四月四日,在国务院召开的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上,一位荷兰记者向李鹏总理提问:在人大刚开始开会时,一些人大代表对三峡水利工程提出一些批评意见;前几天,一些代表还在说,这项工程如果搞的话,将会影响社会和经济的秩序,我想问李鹏总理:您是否不管有什么情况,还继续搞这个工程?

李鹏答:我请姚依林副总理回答这个问题,他是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主任。

姚依林显然早有准备,他从容不迫地说:“三峡工程现在有争论。主张建三峡工程的人是有道理的,反对上三峡工程的人也是有道理的,因此这个问题还需要经过详细的论证。我认为,三峡工

程在今后五年之内是上不去的。在现在治理整顿期间的计划以及将来的‘八五’计划都不会有大规模上三峡工程的计划。因此现在不必花很大的精力去争论。将来如果要上三峡工程,肯定是要经过人大批准的。所以我建议现在这个问题不必继续讨论。”

鉴于三峡工程在重新论证结束之后,意见分歧仍然很大,以孙越崎、周培源、李锐为代表的反对派一方,和以钱正英、林一山、李伯宁为代表的主上派一方,各执一论,论战不已,社会各界更是议论纷纷,国务院于一九九〇年七月召开了三峡工程论证汇报会。指定参加会议的二百多名代表中,既有论证组的,也吸收了论证组以外的一些专家。这次会议林一山出席了(未发言),李锐和反对三峡工程上马最激烈的黄万里均未被邀请参加。

各种不同意见发表之后,姚依林为这一次会议做了总结。他说:三峡工程规模大而影响深远,对于这样一个巨型工程的利弊得失和各类经济技术问题,有这样、那样的不同看法和意见是正常的,可以避免决策上的重大失误。姚依林还强调长江防洪不能只等三峡,各项措施都要抓紧。

李鹏最后讲话,他说:“三峡工程上马不上马,什么时候上马?既有技术上的可行与否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在经济上是否可行,国力是否能承担。”

会后,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进行了改组。主任由邹家华取代了姚依林(邹家华是国务委员兼计委主任),副主任是国务委员兼财政部长王丙乾、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国务委员陈俊生。各部委和有关机构负责人任委员。一年后,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通过了重新写出的三峡工程可行性的报告(即后来在人代会上通过的一百七十五米方案),同时建议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并提请全国人大审批。

一九九一年,江泽民在李伯宁的一封强烈要求三峡工程立刻上马的信中指示:“看来对三峡工程是可以下毛毛雨,进行点正面

宣传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向新闻界传达这一指示的同时，布置了正面宣传的要点。随之而来的是报刊电台一齐行动，上马之声紧锣密鼓。

定案前的最后一次上书

对广交友的李锐来说，平日家中尚且宾客不断，每逢年节，更是友朋如云。然而一九九二年元旦，他却一反常规，闭门谢客，伏案疾书：

> 泽民同志并常委诸同志：
>
> 关于三峡上马问题，中央似已或即将做出决定。心所谓危，不敢不言……请允许我最后一次上书：建议此事推迟到适当时间做最后决定……我建议国务院、中央和人大最后论证时，一定要让赞成和反对的双方，如同法庭两造对质各有辩护律师，能平等地充分地各抒己见，并事先印发两方面的主要资料，以便主持论证者能全面切实了解两方的根据和论点……十三大报告曾说：“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让人民讨论”……最近报刊和电台又如此空前宣传（三峡工程）尽快上马，可是几十年来，优先开发上游支流、反对上马的意见却极难见诸报端。现在已到最后关头，是否反对上马的意见也应平起平坐，在报纸电台露露面呢？不让反对意见同公众见面，这种“一边倒”并非上策……

回顾当时的心境，李锐讲了这样一番话：“一定要有人讲话，庐山会议后期就是因为后来没人再敢讲话，所以酿成大祸，这个历史教训，一定要记取。”

五十年代的庐山会议，由于党的最高领导者破坏了本来就不健全的民主制度，酿成了中华民族一场空前的人祸；九十年代动工的三峡工程，其结果能否与之相提并论，还有待历史的检验。但是从李锐的上述心迹中，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到：他之所以在这次以至以后的一系列上书中向决策者一再强谏，实在是出于比一般人对历史教训有更痛彻的切身感受。

"句号"后面文章长

等到我去采访李锐对一九九二年四月人大通过《三峡工程决议》的看法，已距此事三年半了。当初我对三峡工程只是略知皮毛而已。谁会料到有朝一日我会去给一个反对三峡工程仓促上马的代表人物作传呢？然而，让一位七十八岁的老人回忆三年半以前的一段心情、感受和看法，不论怎样刻骨铭心的事情，也只能讲出个粗线条。好在《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的记者王德禄，于当年五月，两次登门造访，留下了《三峡工程定案后答记者问》一文。使我得以详细了解当时李锐的所思所感：

问：今年四月三日，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兴建三峡工程的议案。作为反对三峡工程仓促上马的代表人物，您对这次表决结果的反应，为国内外所关注，请您谈谈对这次表决结果的评论。

答：在人大开会前，所有报刊电台全部舆论工具，如此铺天盖地向社会宣传"三峡工程应立即上马"，此种舆论导向，乃多年以来主其事者人为造成。多年以来，反对三峡工程仓促上马的意见，始终不能在报刊充分表达，确令人无限遗憾，也使人感到奇怪：几十年来，三峡工程为什么这样害怕不同意见呢？为什么要舆论一边倒呢？真理，是决不害怕驳难的。

问：你对投票的结果有什么看法？

答:提交大会的议案和邹家华副总理为此作的报告,都是正面的说明,发给代表看的论证材料,也基本是正面意见,加上会前的舆论导向,表决结果,仍有一百七十七票反对,六百六十四票弃权,另二十五票未按表决器,共近总数三分之一。我认为这是人代大会讨论国务院已予批准的重大提案,前所未有的现象;这就说明三峡工程问题太大,人们疑虑,担忧很重;何时开工,必须慎而又慎,有待一切条件成熟。三分之二的代表投赞成票,当然是从信任已批准的提案出发,但也应承认会前"一边倒"的舆论导向也起了作用,人们的习惯还是容易受报纸和电台影响的。

问:看来您对这次决策的程序表示满意?

答:我对表决的结果相当满意,并不意味着对决策的程序表示赞同。我看,像三峡工程这种关系国家安危的重大问题,在所有要害问题彻底(我说彻底即对要害问题不能冒任何风险)弄清楚并做出可靠结论之前,是不宜作出上马决策的。李先念生前曾说过:"一定要保证做到整个建设工程万无一失……否则一旦出了大事,反利为害,将造成空前的灾难。"这种问题是否应提交人代大会通过,许多代表对此提出疑问。四川代表提出:"三峡工程这样一个大问题,是否应采取人民代表按键表决方法?因这会给代表带来压力,一旦出了问题,实际上就要人代会负责。"(引语都摘自大会《简报》)浙江七位代表联名说:"要代表们在这短短的几天中对如此复杂、如此重大的工程问题做出决断,难度很大。科学技术的东西是无法由外行人来表决的,也无法用票数的多少来决定其正确与否。有时正确的意见往往是少数人的意见。三峡工程交人大讨论、审议是必要的,但是否交大会表决,建议大会主席团慎重研究。"另一位代表说:"兴建三峡工程一直存在反对意见,对此,议案说明中都没有提及具体情况。"还有一位浙江代表说:"在科学问题上不可简单地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人大审议是必要的,但让人大来通过一个技术性很强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是否合适?"四

川一位代表说:“报告中说三峡工程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见,我认为还很不够。去年以来,在四川省级机关里未讨论过,连省人大常委会也没人来征求过意见,只在这次开会前才收到一些资料。全国人大视察团去视察时,走的地方不少,日程安排很紧。据反映,有的县汇报时只能讲二十分钟,很多意见没有机会发表。”

问:三峡工程论证共组织了四百一十二位专家参加,是否回避了持反对意见的人?

答:这个问题应当由主持论证的原水电部负责人来回答。据我所知,这四百一十二人中,三分之二以上是由原水电部领导指定的,即符合他们意图的人。水电系统许多老专家由于持不同意见,就没有被邀请,其中包括五十年代参加过长江和三峡规划的专家,如胡慎思、张进谦、安申义、杨渭文、朱藻文、徐洽时、邹思远、王尹复等;还有水利系统和地质等方面的一些专家、教授,如李驾三、张书农、王宗源、金永堂、朱鹏程、邓明聪等,他们多是公开写过文章或曾向中央上书持有不同意见的。例如金永堂博士为水科院高级工程师,水利专家,发表过一篇《三峡工程不应建也没有必要建》的文章;中科院李驾三老水利专家,曾在五十年代向中央建议,在荆江北岸恢复一部分古云梦泽,分洪蓄洪,以减轻荆江大堤所受威胁。其他还有哪些持不同意见的人被排除,我不知道。当然,黄万里教授是反对最激烈的一个,他亲自同我谈过,主持论证的先生是他本家同族,“夫妇俩可以到我家中来看望我,就是从来不让我参加论证”。

问:你前面讲的决策程序有这些问题,对论证程序您怎么看?因为“三峡工程论证”现在被称为“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范例”;主持论证工作的人尤其着重宣传的是,参与论证的四百一十二位专家,以四百零三比九的结果,通过了论证报告。

答: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成员和多数专业组的负责人,都是原水电部和长江水利委员会的负责人,他们都是极力主张尽快上

马的,各种不同意见尤其反对方面的意见,不能在论证过程中得到充分反映(自然也不能充分向上反映),得出的结论实际上是以“民主、科学”作外衣的“自我论证”。论证结果并不能真正反映三峡工程问题的本质和要害。否则,就不会出现我前面谈到的表决结果,近三分之一的人不投赞成票,而且各地代表提出了那么多严重问题。为解决长江的防洪、发电、航运等综合问题,总应当有几个不同方案来比较论证吧。皇帝选妃,总不能就让一个美女作对象吧,总得有若干个美女让选择吧。现在的论证是“孤证”。

问:你还没有谈到四百零三比九的这个结果的含义。

答:前面已经谈到参加论证的三分之二以上专家,是指定的天然赞成者,这个绝对多数是预先保证了的。所谓四百零三比九是这么一回事:论证中共有防洪、电力、航运、地质、泥沙、规划、施工、投资、经济等十四个专题组,每组专家只对本专题的论证结果签字,并非对整个三峡工程方案赞成与否签字,这同人代大会表决不同。打个比方:我可能会认为一幢大楼中的电梯部分设计是合理的,但不等于我对整幢大楼的设计都满意,更不等于我对大楼的地点、开工时间、经济效益都赞成。显然,“四百一十二位专家以四百零三比九的结果通过论证报告”的说法,是言过其实。何况有的人声明对本专题有保留意见,但也签了字;有的人发言有不同意见,但也签了字;有的人本身是原水电部一个业务方面的负责人,意见很大,也只能签字。这种签字的情况是很复杂的。

问:您一再提出,三峡工程二十一世纪再说,看来您对改变三峡工程上马的时间颇有信心,为此您将如何努力?

答:我已退居二线,人家又并不看重你的意见,心想何必老为此事所干扰,近日尤疲于应付。不过,此事的确关系国家安危、子孙后代,不少人又常来询问,还接到关于此事的来信来件,使我确又放不下来。这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对于自己认定了的道理就要坚持,就要鼓吹,决不改变初衷。正如屈大夫所说的:“亦余心之

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现在我接受你们的访问,又讲了这么多,目的在努力让更多的人,特别是决策部门,更多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必须继续弄清楚一些要害问题。

我提出三峡工程到二十一世纪再定,是寄希望于那时更民主,更开放,更讲科学,国家经济实力更强,对三峡问题会更理性地处理。我对此充满信心。

不久,李锐又接受了《科技发展与改革》月刊记者李慰饴采访,他明确表示坚持“现在不能上马”的观点,不同意把防洪作为早上快上三峡工程的主要理由。他说:“现在虽然与50年代条件大不相同,但并非在经济、技术和生态环境上都绝无问题了,特别是泥沙、淤积等不少关键问题,还难下最后决论。世上有些事情包括战争允许冒一定风险,可是三峡工程关系四川、长江流域乃至整个国家安危,绝对不允许冒一点风险。当务之急是要认真抓紧完成历年提出的长江中下游防洪方案,因为这是最有效、最省钱的办法。中外古今的防洪,实践最有效的是采取综合措施,即工程措施和非工程措施的选择和最佳结合,这主要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自然和社会条件,必须实事求是,因时、因情、因河、因地而异。我认为三峡工程还是到二十一世纪多方面条件成熟时再决定为好。”

“袖手难为壁上观”

人大通过了《三峡议案》以后,三峡工程上马的各项准备,便从舆论上的紧锣密鼓,进入了实质性的准备阶段。决策者们坚信对三峡工程的各种意见已经胸有成竹。正如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主任邹家华在七届人代会上所讲的:

审查委员会认为,无论赞成的、疑问的或者不同意的

意见,都是为了如何更好地解决长江中下游的防洪和治理,都是从对国家和人民负责出发的。这些意见对增加论证深度、改进论证工作以及完善论证结果都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对待所有意见都应采取博收其长、吸取其合理部分的态度,而不应采取排斥对立的态度。因此,在论证、审查中,对有关部门、地方和社会各界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进行了认真研究,采纳了许多有益的意见。审查委员会一致认为,在重新论证基础上编制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其研究深度已经满足可行性研究阶段的要求,可以作为国家决策的依据。

行动,是对这种信心的最好注解。一九九三年,国务院颁布的第一号文件,便是成立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李鹏总理亲自出任主任,邹家华、陈俊生、原湖北省省长郭树言、四川省省长肖秧和李伯宁等为副主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原水利部部长钱正英任顾问。为了做好移民工作,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专门设立了移民开发局。为了保证工程的顺利进行,三峡工程采用国际上通行的建设项目业主负责制。国务院为此成立了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负责三峡工程的建设和经营。这年七月,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又批准了三峡工程的初步设计方案。

然而这一切,都不能阻止李锐继续上书不已。相反,对情况了解得越多,他的态度就越坚定。

在李锐的三峡工程材料袋里,有一篇中国军方元老张爱萍寄给他的文章。这篇文章是张爱萍写给《解放日报》主办的《报刊文摘》并转企业家杂志社的:

贵刊一九九三年六月二十四日三版载三峡如何应付核战争一文,其中提到有关我的一些事,与史实不尽相

符,今特去函说明,请于适当时机予以澄清。

我是一九五八年九月初奉周总理命与张震寰等同志赴宜昌研究三峡、三斗坪大坝的防空问题。经从空中、两岸陆地和江面勘察后,并与“长办”共同研究,结论是:一般防空无问题,但对核导弹轰炸,则无有效办法。一旦被炸,江水一泻千里,直下南京,包括洞庭湖、鄱阳湖两岸当遭灭顶之灾。惟有在遭敌导弹袭击之前放水,但危险性大。因为我们无法测知敌人何时进行核导弹袭击。另,三斗坪大坝建成发电,无利于四川,更谈不上大西南;而大坝上游水势淹没万县,直到重庆江北;同时不利航运畅通;且使长江上游淤泥堆积,更年复一年加剧,以致造成水患。

当时,向周总理汇报了防空问题,也提及上述某些不利情况。总理问我具体意见,我直言:等我们第三代、第四代再去考虑吧。

你报载文说“早在一九五九年,周总理指定张爱萍组织研究三峡工程防空试验的研究工作”。当时实际情况是:在官厅水库南岸工程兵试验场,只是以手榴弹、炸弹对模型水坝进行模拟试验。在该狭窄地区又怎能筑起一个“较大的水库、大坝模型”,而又“进行了水中爆炸、空中爆炸各种不同距离的模拟试验”呢?也未“在另一场地进行各种直接命中试验”,更没有“针对某一当量直接命中的破坏情况,提出了抗直接命中的大体积混凝土方案和大体积堆石坝方案”。(此段引号内均为《报刊文摘》载文原话——原注)

一九六四年后在新疆所进行的几次核武器效应试验中,并未进行过直接命中水坝的试验,只是试验放射性污染和冲击波的承受能力。但由于戈壁滩缺水,未取得应

有效果。

总之，一九五九年后进行的防空研究，因为要修三峡水坝，我们就只能研究如何在未来战争爆发时预防核导弹袭击的措施。由于核武器战争的突然性，我们是难以预测的，所以，我们当时主要是从消极防御方面想办法，如：加固坝基，战时提前放水等，以减少国家和人民的损失。但这些也不是有把握的措施。至于说什么“战争征候是可以发现的”，更不知从何谈起！

这里，我顺便说明个情况。记得一九八九年或一九九〇年国务院召开研究三峡工程上马问题的会议，我曾冒昧地给会议写信，说明过去研究的简况和我不赞成上马的意见。一九九二年人大讨论时，我又冒昧上书江泽民总书记陈述上述意见。至今，我仍不赞成修筑三峡水坝（过去修筑葛洲坝水坝我也是不赞成的）。专此致函。

张爱萍

一九九三年七月二十一日

《报刊文摘》于一九九三年八月十六日刊登了此文（发表时删去了最后一个自然段），标题为：就《三峡，如何应付核战争》一文，张爱萍来函澄清史实。

我注意到这篇文章的右上角，有张爱萍亲手写给李锐的几行字，便问李锐以前可曾与张爱萍有过交往？李锐说：我们以前没有什么交往。庐山会议时他讲了公道话，在老红军中威信很高，是个很重视民主和科学的人。他知道我是三峡反对派的代表，就把文章寄给了我。

定案后四年上书诤谏四次

一九九三年三月，李锐发出了人大通过《三峡议案》后的第一份上书：

从报纸上看到，国务院已成立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三峡工程已经正式开始了各项施工准备工作；即将出任该公司的负责人表示：将三峡工程的大江截流时刻提前一年，使之与香港回归祖国的年度同步，让一九九七年成为双庆之年。

去年元旦我曾上书，力陈种种利害，三峡工程现在不能上马。人代会通过的兴建三峡工程议案的报告说明中，最后有一段话："在今后的工作中，对可能出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应有充分的估计和足够的重视，谨慎从事，认真对待，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使三峡工程建设更加稳妥可靠。"我希望这决不是说说而已。

一年来，我所接触到的有关意见，最重要的一条是：现在通过的一百七十五米方案，必将引起泥沙淤积，影响重庆港，阻碍航运。我问过负责论证航运的交通部同志，他说三峡一百七十五米方案有关船闸修建的具体技术问题，有的并未落实。长江航运关系四川当前改革开放与今后长远发展，至深且巨。在选定一百七十五米方案的论证时，泥沙淤积问题究竟如何解决，并无可靠的保证。

最近看到《党的文献》一九九三年第一期，上面刊载了毛主席、周总理当年对三峡方案的多次批示意见，内有一条：一九六六年四月十日，王任重为报送林一山关于修建长江三峡大坝的报告，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毛主席

在这封信上批了八个字:需要一个反面报告。

一九六六年距今虽已二十七年,但我认为这个批示并未过时。因此我郑重向中央建议:请中央找一些有代表性的、持有各种不同意见的、反对三峡工程(或一百七十五米方案)现在就上马的专家学者,开一次会,认真听取一次他们的意见。兼听则明。

李锐在这篇上书的后面,还附上了一份列有近百名持反对意见者的名单。

两个月之后,李锐又同陆钦侃、李驾三、金永堂、廖季立、薛葆鼎、庄启东、田方、林发棠等九人联名上书:

关于三峡工程,多年以来,我们一直是忧心忡忡;面对目前局面,更是忧心如焚。七月九日,我们几个人一起议论了三峡工程已经上马的情况。总的希望是三峡工程能暂缓上马,考虑反面意见,避免在这个问题上犯大的错误,将来出了问题,人代会是负不了责任的。

我们认为应当让三峡的反面意见见诸报端,这并非政治路线问题;就是从党的影响来说,这样做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三十年代开始的世界河流水电、水利大坝工程,其利弊得失,尤其有关生态环境的影响,各国都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因而无不对此保持慎而又慎的方针。美国、苏联、巴西、印度等国,都已放弃不少已经开工和规划中的河流大坝工程。一九八八年在旧金山召开的国际河流系统会议,总结过世界已建高坝大库实践中的重要教训,诸如土地淹没,土地变化(贫瘠、盐碱等),生态破坏,环境恶化,导致地震,及其他社会影响。会议列举了世界上二

十座可怕的大坝工程，中国的三峡被列为第一名。

我们最忧虑的问题是，三峡成库之后，河流泥沙（包括砾卵石）淤积的影响如何？库区地质、地貌的稳定如何？整个流域直到下游出海口，生态环境包括河流本身变化如何？这些问题在论证中都没得出可靠的结论。这些问题关系到四川将洪灾频繁，引发桑田沧海的变化；关系到位于库边的重庆会不会成为死港？重庆人民和社会生活将发生什么困难和危害（如排污、取水、酸雨加剧等等）？要知道世界尚无此先例，即一个大城市位于一个水库之旁……

三峡库区内的人口已经超载，开垦已经过度，自然生态已遭严重破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于七月九日晨报道，成都地理所专家的结论是："三峡地区地质条件复杂，危险岩体多，已经查实的崩塌、滑坡共四百零四处之多。根据三峡移民就地安置方针，需要搬迁的移民将分散在库区沿岸及河岔两岸二千平方公里的地域内。为此，地质矿产部强调，三峡工程移民迁址要保护该地区的地质环境，防止人为因素诱发地质灾害。同时建议对新选址区的稳定性、山体斜坡稳定性问题，应专门进行论证，并以法规条文形式加以明确。"（《人民日报》没有刊载这则消息）由此可见，此类严重的库区地质稳定并有关移民问题，在论证时都没有作过结论。

……

资金短缺从来是我们的难处。目前国家正处于严峻的经济形势。我们的钱必须用在刀刃上，不能再不算经济账了。为解决能源紧张的形势，应当尽快上投资少、见效快的水电工程。（葛洲坝工期长、投资大，曾耽误过好几座大水电站的及时上马）长江上游干流及各支流，在二

〇〇〇至二〇一五年间，可以陆续建成以适应经济发展的大型水电站很多很多；相应比较方案总投资不及三峡的一半，甚至还少，特别是移民极少，所得电量还大于三峡，完全可以远距离东送。同时这些水电站建成后，可以拦住泥沙，拦蓄洪水，也便于将来必要时再建三峡，就可以避免今天遇到的许多困难了。

去年人代会通过的三峡议案，只提"将三峡工程列入十年规划"，这是具有法律意义的，而且议案说明中特别声明："在今后的工作中，对可能出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应有充分的估计和足够的重视，谨慎从事，认真对待，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使三峡建设更加稳妥可靠。"我们就是据此通过各种途径反映意见，有的是直接向常委反映的，可是都石沉大海，没有回音。现在出现已经上马的局面，这样，将置人代会于何地！在这样多要害问题没有弄清楚之前，就通过初步设计，也是违犯基建程序的。

我们大都是行将就木之人了。三峡这样急急忙忙硬干下去，出了大问题贻害无穷，我们也看不到了。我们不过是深知利害，心所谓危，不怕冒犯，率直而言，再次尽一点心意而已！

一九九四年二月，李锐与覃修典、徐洽时、陆钦侃、李驾三、金永堂、薛葆鼎、庄启东、田方、林发棠共十名反对派的专家第三次上书中央，题为《再次建议三峡工程继续论证》，就三峡工程出现的种种问题补充了新的情况和意见。

这份上书的最后一段写道：

上次我们九个人联名，不幸的是，书末所言我们大都是行将就木之人，竟成谶语：廖季立于一九九三年十二月

> 十四日去世了！他已不能参加这次上书了！这次名单中增加的覃修典、徐洽时，是水电、水利界的老前辈，都已经八十多岁，是十人中最年长的。

读罢令人感慨不已。

在这一节的写作即将结束之际，李锐参加完在成都举行的中国水电学会第四次大会，回到北京。见面后他告诉我，他在会上如何大放“厥词”，说着还找出那份发言稿送给我看。

我的目光在字里行间匆匆扫过，立即明白这份发言代表了李锐几十年的一贯思想：主张优先发展水电，反对急于上三峡工程。粗粗看来这似乎有些矛盾，因为三峡是中国最大的一处水电资源。但仔细分析，便不难看出：李锐的这一思想不仅具有严谨的逻辑，而且包含着全面的经济战略意识：

> 大家知道我长期不赞成三峡急于上马，是个顽固分子，因为长江上游投资少、移民少、见效快，优于三峡的大水电站多得很。三峡存在投资过大，移民太多（也太困难），防洪作用有限，航运是难关，泥沙问题未解决，还有生态等问题。三峡与水电开发的关系，使我想起白居易《长恨歌》，写唐明皇与杨贵妃的故事，贵妃死于马嵬坡。前八句是：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前面四句似可改为：中央看重防洪策，三峡多年上马说，某家有女最坚持，人大投票惊全国。后四句不必动了。三峡开工之后，如我所料，许多亟待开工的水电项目如龙滩等，只得靠边站了，在建工程也将因投资紧张拖延工期。“回眸一笑百媚生”，我非常担心“媚”字变成“病”字，最近又两次

上书中央，谈三峡泥沙问题，并未解决，连当事人也说不清楚。

许多好水电项目上不去了，“六宫粉黛无颜色”，作为对联的下联，可以这样相对：“三峡工程有问题”啊！

没等我看完，李锐又说：“你看今年长江中下游湖北湖南水灾多严重，同三峡有什么关系嘛?！今年的情况再次证明我的看法是对的。”我争辩道：“人家也是说三峡工程只是防洪的措施之一嘛。”“可是钱呢?！”李锐占理不让人：“三峡工程占了那么多投资，别的措施钱从哪来?！”

又过了些日子，李锐告诉我，他已把这次去四川了解到的一些三峡工程的问题向中央写了第四次上书。

第四节　研究毛泽东

语惊四座

在中国，毛泽东的研究既是学术问题，又是政治问题。因此这一研究的形成与发展，始终同国内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历史进入八十年代以前，国内几乎很难讲有真正意义上的“毛泽东研究”这一学术领域，那时人们的思想长期被禁锢于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之中。领袖是绝对真理的化身，人们要用领袖的思想来规范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任何人只能对其颂扬、维护，甚至顶礼膜拜。李锐五十年代出版的《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一书，虽然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但在分析评述过程中，仍不免带有那个时代的痕迹。在毛泽东时代，毛泽东是不可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的。

直到一九七八年，一场“真理标准”的讨论，在国人心中产生了石破天惊的震动，从而树起了中国思想发展史上的一块里程碑。这场讨论，冲破了思想领域中长期设置的种种禁区，包括毛泽东研究这一最大的禁区。

个人崇拜的基石在这场讨论中被动摇了，但刚刚走出几十年政治运动时代的学者们，还难以把握政治的原则性和学术研究的严肃性之间的关系这一极具时代特征的问题。因此，这一时期的学术研究基本上让位于政治评价。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中共中央开始着手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中一项重要内容便是对毛泽东一生的是非功过做出评价。这项工作由邓小平、胡耀邦主持。

一九八〇年十月到十一月，《决议》草案在四千多名高级干部中讨论。李锐参加了这场大讨论，并在讨论中担任国务院系统第

十组——“能源组”组长。

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党内这样大的范围内，对毛泽东一生的功过进行畅所欲言的讨论。出于对极左路线的痛恨，会上出现一些偏激情绪。例如，有人主张：毛泽东思想部分干脆不要写；发动“文革”主要原因是毛泽东的品质不好；“文革”前和“文革”过程中的错误，完全应由毛泽东一人负责等等。

针对这些情绪和看法，邓小平在十月二十五日对中央负责人谈话时说：“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对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各种不同的情况，不能把所有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毛泽东同志不是孤立的个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们党的领袖。对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十月二十五日，李锐在小组讨论会上首次发言。一方面，他对《决议》草案中对毛泽东一生的评价功是第一位，过是第二位的说法表示赞同，同时又用大量史实，分析了毛泽东晚年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逐渐变成一个独断专行的唯意志论者的过程及主客观原因。他希望《决议》对这一历史悲剧做出很好的总结，以便子孙后代引以为鉴。他特别强调：一个革命政党，必须有办法对党的领导人实行有效的监督，否则，领袖一犯错误，就会变成全国性的错误。

李锐的发言使许多老同志非常感慨，他们纷纷议论：李锐受“左”倾路线的迫害深重，但他能不计较个人恩怨，以党和国家的大局为重，对毛泽东功过的分析，表现出很高的历史责任感。

十月三十日，应大家的要求，李锐又在小组会上介绍了庐山会议的情况。尽管是党内发言，这一讲话材料，却不胫而走，通过种种渠道流传到社会。如前所述，这次发言，便是后来《庐山会议实录》一书的雏形。

十一月十一日，李锐代表能源组起草了历时一个多月的讨论

总结。《总结》对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的分析,已在思路和观点方面,为他日后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李锐在这次大会上的数次发言,还在国内思想理论界产生了震动,一些社会科学研究单位和高校请他去作过毛泽东晚期思想研究的专题报告,更有不少学者登门拜访或通过信函与他进行这方面的学术交流。

硕果累累

一九八一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也指出了他晚年的错误,分析了产生错误的主观因素和社会因素。《决议》的公布对国内毛泽东思想学术研究领域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作用,特别推动了毛泽东晚年的研究。李锐当时认为,《决议》的公布,是研究晚年毛泽东的真正开始。一些大学开设了这方面的选修课,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成立了毛泽东晚期思想研究课题组,召开了毛泽东晚期思想研讨会。有关论文纷纷见诸刊物,还出版了一些专著。

与此同时,李锐对毛泽东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陆续出版的研究成果计有《庐山会议实录》、《早年毛泽东》、《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以及《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等近百万字。同五十年代相比,李锐在毛泽东早年的研究中不仅增加了五十年代只能回避的一些史料,而且更加注重毛泽东早年思想对其一生思想历程之影响的探索。然而,在所有的研究成果中,最受到人们重视的,还是关于毛泽东晚年思想的部分,尤其是《庐山会议实录》和一篇八万多字的论文《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

《庐山会议实录》是迄今为止有关这一历史事件最权威的史述与史论相结合的著作。它不仅被看做是一部信史,而且被国内外众多学者公认为是一部研究毛泽东的传世之作。它与一般回忆录

体裁的作品其迥异之处在于:该书在记述这一历史事件的过程中,充满了理性的思辨。它深刻地揭示了产生这一历史事件的由来及在历史上产生的影响。一些研究者还把李锐对庐山会议的个案分析,视为"过程探讨式"研究的不可多得的范例。在这一个案研究中,毛泽东的关于空想社会主义一整套理论体系及作为实现这一空想手段的阶级斗争理论,已不再是空洞抽象的观念演绎,而是将其中蕴含的内容相当具体地彰显出来。

由于李锐当年所处的特殊地位,他对毛泽东研究和中国当代史研究做出的这一独特贡献,是别人无法代替的。

关于国内毛泽东晚年思想的研究,李锐一九八八年为《晚年毛泽东》一书所作的序言中有过一段非常中肯的论述。他说:"在毛泽东研究中,最复杂、最困难、也是最重要的而且是过去研究最少的,是他晚年思想和活动(主要是晚年'左'的错误思想)的研究。因为,这一位曾经凝聚着中国人民的危难、希望和力量的伟大人物,在他晚年的长时期中,确实犯了很大的错误,给他的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的灾难,也为他自己造成历史的悲剧。""我认为,研究毛泽东晚年实践和毛泽东晚期思想,这件事在今天有十分迫切的现实意义,这应当是探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中的一个大题目……我们的口号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似乎不应当老纠缠旧账,回顾过去,以免分散精力,或者如通常所说的,不要影响安定团结。然而破旧立新,两者是密切相联的,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我们说开放,说改革,开放什么?改革什么?我以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从毛泽东晚期思想指导下长期形成的封闭状态开放,就是改革毛泽东晚年定型的一些既定的政治经济模式。既然毛泽东的晚期思想同我们今天改革的目标、改革的对象、改革的文化背景,改革的社会经济基础和改革的历史负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那么,我们就无法回避对毛泽东晚期思想的研究。""毛泽

东已是一个历史名词，不论是研究他早期、中期或晚期的思想，都应当看做是对中国社会的研究和中国历史的研究。我们在中国实行改革，不研究中国，不研究当代中国，岂非笑话？在这方面是不应该有什么禁区的——只要它是科学的研究。”

李锐的这番议论，意在与同道共勉。实际上，他最关注的还是毛泽东晚年思想的研究。对他来说，这是一种责任、一种使命。其中集中他多年思考成果的，是他的《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这篇系统分析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的论文。李锐本人和学术界均认为：这篇东西是他对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研究的代表作。八万多字，五易其稿，花了两年多时间。李锐认为这是他所有著作中下功夫最大的一部。

此文最初是在一九八八年年末，一批中青年党史研究者邀李锐座谈晚年毛泽东，事后他们将录音寄给了李锐，以后几经充实修改，断断续续整理成文。一九九二年，此文后收进李锐的论文集《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有人议论：与其说这本文集收录了这篇论文，不如说是为了发表这篇论文而出了这本文集。此说法或许有欠准确，但当时恰逢毛泽东百年诞辰前夕，李锐的确担心这篇并不是唱赞歌的文章与“正面宣传”的调子相违而发不出去。从这个意思上讲，有人猜想李锐将文章收在集子里发表是为了更加稳妥，也不是全无道理。

其实该文虽然不属于“正面宣传”，政治上从哪个方面讲均无可指责。李锐说，尽管文中的许多观点多年来一直在思考，但真正下决心发表出来还是受了一九九二年邓小平视察南方讲话的鼓舞。因此，他把这篇作品称作“学习邓小平一九九二年视察南方讲话的笔记”。

文章开宗明义，便引用了邓小平的话：“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八七年，我们吃亏都是在‘左’，从一九五七年开

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

李锐则指出：“‘左’的错误之所以根深蒂固，这同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有直接联系。”“为了加深对‘左’的历史危害性的认识和理解，我们有必要在《决议》的指导下，对这一问题作深入探讨。”

全文遵循这一基调，立论有据，阐述严谨，尖锐而不失于偏颇，深刻而实事求是。文章超越了对晚年毛泽东作某种政治评价的模式，把视野扩大到毛泽东所处并与之息息相关的中国社会、文化、历史背景，去寻找这位历史人物晚年失误的社会条件，开掘他性格、心志深处的文化积淀。

社会对这篇体系完整的长文，很快有了反响，贵州人民出版社第一次印出的五万册书，不长时间便销售告罄。在理论书籍滞销难销的当时，这不能不使人生出许多感叹来。或许若干年后，人们会认为其中某些观点，其思想解放的程度还不够彻底，但在当时，国内“左”的一套在思想理论界还颇有市场的条件下，既要对毛泽东“左”的错误思想进行清理，又要考虑到被允许的尺度，能写到这个程度，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下自成蹊

李锐的研究成果在国外境外的影响似乎更大。因为国外境外对毛泽东的研究，特别是对毛泽东晚年思想的研究比国内起步要早，其中不乏卓有见地之作。但由于思想文化方面的隔膜和历史资料方面的限制，其片面性、表面性以及主观臆测的问题也比较普遍。在这种情况下，像李锐这样掌握着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并能冲破思想藩篱的中国学者的研究，很自然地引起了他们的高度关注。

在从事毛泽东研究的中国学者中，李锐的文章几乎是被国外、境外引用最多的一位。国际著名学者、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刘述先

先生在东京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说：毛泽东是一个极端复杂的人物。现实有关毛泽东的研究已经汗牛充栋。“文革”后，内地学者对毛泽东的研究，有的素质不差，如李锐、汪澍白尤为其中之佼佼者。他们掌握的资料比较实在，解释也比较合理，在官方尺度容许的范围以内，对毛泽东的局限以及他在晚年所犯的重大错误，有所批评。（刘述先：《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的分析》）

西方长期从事毛泽东研究的著名学者S·施拉姆在一九九四年三月号伦敦《中国季刊》上发表的著作《毛泽东研究：回顾和展望》中，对李锐的代表作之一《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评价较高，认为它是一本“在许多方面最丰富、最重要的著作”。

一九八九年，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所以及芝加哥、密歇根、斯坦福、加州伯克利等大学纷纷邀请李锐前去作学术演讲；一九九三年四月，应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及墨尔本、麦科里等大学邀请，同年五六月又应美国科罗拉多、明尼苏达、哈佛等大学邀请，前往讲演和参加中国问题研讨会。

施拉姆、麦克法夸尔以及前两年去世的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等学者几次到北京，都要同李锐见面，共同探讨对一些问题的看法。

在中国学者眼中，李锐对毛泽东的研究，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他具有亲历者和学者双重身份。作为亲历者，他有着比一般学者对毛泽东其人更为真切的感受；作为学者，他又有着一般亲历者所不具备的理性。一些人甚至认为：对于从事毛泽东研究的学者，任何人都不可能置李锐的研究于不顾，而期望走出一条通向更高境界的捷径。

独具特色

丰富的史料是李锐的研究成果引起中外学者巨大兴趣的重要原因之一。李锐对毛泽东的研究，是力求掌握尽量多的资料。他

总是将自己的结论建立在大量丰富可靠的历史资料的基础之上。

读者或许还记得，六十年代，他在家赋闲读《通史》时，就曾经在笔记中表达过这种看法："所谓材料与观点。不掌握材料，对此无深功夫，观点无从发挥其作用。如两者不可兼得，宁肯材料充分，有独到之处，而观点有所错误，读者还是可能得益，可以各自淘金。"李锐五十年代初在湖南工作时，就开始搜集毛泽东的资料，当时与毛泽东同时期的许多亲友还健在，一些散落在民间的、极珍贵的原始资料，如果不是李锐的及时抢救，恐怕早已散失。一九九〇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与中共湖南省委共同合编的《毛泽东早期文稿》一书出版。这本书是目前研究毛泽东早年最权威的资料集，书中近三分之一的资料是李锐五十年代搜集的。在这种搜集和整理工作中，李锐使自己成为这个世界上对毛泽东了解最多的人之一。他既为自己的研究工作打下了基础，也为中外研究者创造了条件。

在毛泽东晚年的研究中，李锐所运用的资料大部分来自毛泽东的实践。他在一些文章中说明了这种做法的必要性：今天我们研究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文字方面的依据多是他的一些片断零星的讲话、指示等，然而更重要的是从他的实践中，可以寻出他思想发展轨迹、基本轮廓和主要内容。一些外国学者在这一点上与李锐的看法颇为一致，例如美国学者沃马克在讨论研究毛泽东的方法时就认为：应当把毛泽东所形成的政治概念同这些概念与原来所针对的事物结合起来，并且讨论毛泽东作为一个政治行动者而面临政治上的关键时刻所认为的紧迫和重大问题。这种研究方法特别适用毛泽东，因为毛泽东的理论概念经常是在实践经验的过程中产生的，而不是在理论研究的步骤中形成的。施拉姆也认为，对于毛泽东，这才是最合适的研究方法。

这种"最合适的研究方法"不仅适合于研究对象，也适合于研究者本人。因为，李锐可以充分发挥"亲历者"的优势。除了《庐山

会议实录》之外，在李锐的其他一些研究成果中，也可以看到这种优势的存在。

系统性是李锐研究工作的另一个特色。《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一文，可说是这一特色的代表作之一。从纵向来看，《初探》对毛泽东“左”的错误思想如何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七年的初露端倪；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五年在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中发展形成；又在一九六六年的“文革”浩劫中发展到巅峰这一过程进行了详细的理论回顾，从而得出结论：毛泽东晚年考虑最多的是两个问题：即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前者的答案是人民公社和“五七”指示所描写的空想社会主义，而后者的答案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即阶级斗争的理论。它们既脱离了中国社会的实际，也背离了马克思主义。

从横向来看，《初探》围绕“空想社会主义”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两个构成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的主要内容，列举并分析了由此派生出的一系列思想观点，诸如：

在关于政治同经济、精神同物质、革命同生产、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中，强调“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不搞政治工作、不搞革命化，不走突出政治的道路，我们的社会就会停滞，就会倒退，就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把重视生产力的主张作为唯生产力论加以批判。

在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平衡和不平衡，破与立、乱与治之间的关系上，把矛盾等同于对立，对立等同于斗争，从而导致从理论到实践的斗争哲学；把“不平衡是绝对的”这一哲学概念绝对化，在“大跃进”中人为地破坏经济工作中的综合平衡，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强调“不破不立”，“斗则进，不斗则退”，这些形而上学的哲学思维使得社会总是处于“不断革命”的动荡不安状态。

在知识分子问题上，仅仅根据大多数知识分子是非劳动人民

家庭出身和解放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就确认他们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从世界观这种抽象概念来确定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始终将知识分子视为异己力量。

在民主和法制问题上，奉为圭臬的是列宁所说的“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在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和商品经济问题上，认为八级工资制、商品交换、按劳分配、物质利益等都是所谓“资产阶级法权”，是资本主义温床，应加以限制和取消。

论及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成因，李锐认为有六个方面：一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形势的逆转，即五十年代中期波兰、匈牙利等国要求改革和苏联批判斯大林。在毛泽东看来，这是背叛了马克思主义，从而开始在国内外反对修正主义。二是中国小农经济的影响。三是现行体制的障碍与封建专制主义的土壤。四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负效应。五是搞个人崇拜。六是狭隘的经验主义与教条主义。这些分析意在说明，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的形成，既有他本人的问题，也有中国历史及环境的局限。

对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是一项难度很大的工程，除了需要掌握大量详实、准确的资料外，作者还必须具有相当的理论素养。或许李锐的选择不如进行专题研究或个案分析更易于深入，但这种角度无疑是非常必要的。正如他在《初探》中所言：在一九五七年以前，毛泽东一些“左”的做法和提法虽然已初露端倪，但还没有形成系统的错误。“在这以后的二十年中，他一个接一个（当然中间有间歇起伏）提出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张和设想，以此指导实践，实践反过来又充实思想。在这样一个循环过程中，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逐渐发展为较系统的形态。”李锐认为，对于形成系统的错误思想，只有进行系统的清理，才能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

寻觅一个历史伟人从早年到晚年的心理轨迹并用以揭示其思想渊源，是许多人感兴趣的研究方法。但并不是所有的研究者都能通过这一途径得到理想的收获。一位朋友在给李锐的信中告诉他这样一个例子：几年前，他读过一本《人格与心理潜影》的书，其中有专章研究少儿时期生活经历对形成一个人的人格类型和行为模式的作用，并以基辛格等名人为研究对象，读者既有所得，亦增新疑。困难之处，不仅在于早年史料的匮乏，而且难在描绘出早年生活与后来人格之间固有的心理发展轨迹的根据。

但李锐在这方面的成功探索却形成了他的毛泽东研究的又一特色。他认为："毛泽东早年的思想初恋，似乎在晚年又燃起了某种'怀旧'之情。这就是说，毛泽东晚年的'左'的错误思想及其实践，同早年思想性格是很有关系的。"

他在有关论著中举例：毛泽东早年深受康有为的影响，以至于晚年把人民公社当做康有为《大同书》的翻版。康有为早就提出消灭家庭以达到消灭私有制的最终目标。少年时代的毛泽东一九一九年写的《学生之工作》一文中提出的新村，就是"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中有公共的育儿院、蒙养院、学校、图书馆、病院等。工作事项规定有"种园、种田、种林、畜牧、蚕桑、鸡鱼等"，这同《大同书》中描绘的在消灭家庭后的理想社会中设胎教、育婴、蒙养、养病、养老诸院；男女成年后，由政治指派分任农工等生产事业；设公共宿舍、公共食堂等如出一辙。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达到大同的道路。"一九五八年，毛泽东自认为找到了人民公社这条达到大同的道路。因此，各地大办人民公社时，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门的负责人曾经把《大同书》和《哥达纲领批判》一起送给徐水县人民公社的干部，一九五八年在北戴河会议讨论人民公社问题时，毛泽东还讲过，空想社会主

义中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

再如，毛泽东对斯诺说过：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他的心中，使他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以及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①] 这三本书给了毛泽东怎样的影响呢？李锐引毛泽东自己的话说："我只取他四个字：阶级斗争。"到了晚年，这"四个字"竟成了他的治国之本。

李锐还从毛泽东早年在《讲堂录》中说的"帝王一代帝王，圣贤百代帝王"以及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说的"吾人一生之活动服从吾之活动而已"，"吾只对于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负责，非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吾概不负责焉"。这些话中，寻出了形成毛泽东晚年性格的轨迹。

对毛泽东早年资料的大量占有和对毛泽东晚年实践的深刻剖析，使李锐在对毛泽东早年与晚年关系的研究中顺理成章，水到渠成。

旧雨新知

同李锐的许多年轻朋友一样，萧延中是先读了李锐的书之后才结识了李锐本人的。萧延中一九七八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这期间有两本书对他影响很大。一本是李锐的《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一九八〇年版）；另一本是李泽厚的《近代思想史论》。这两本书使萧延中感到党史中有很多问题可以探讨，党史有学问可做！特别是李锐的那本书，据说当年读党史的大学生很多人都读过。

"造神"运动中长大的萧延中，在这本书里读到了许多以前从

---

① 参见《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第三十九页。

没听说的关于毛泽东的事情，从而激发了他在这方面继续探索的强烈兴趣。大学毕业做论文，他所选择的《毛泽东早年的共和国思想》这个题目，就是李锐书中略有涉及的。一九八二年，萧延中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治思想史专业读硕士研究生。一年后，他通过班里一位湖南籍同学，把自己的一篇论文《毛泽东早年思想研究》送给了李锐，意在以文会友，以文拜师。当时不少年轻学子都是通过这个方法结识这位前辈的。没过多久，萧延中接到了李锐的邀请电话，约他到家里谈谈。虽然这次见面已过去十多年了，但萧延中至今记忆犹新：

> ……李老对我说："文章看过了，《伦理学原理》批注你读得比我细。"后来，我们又讨论了我的文章中的另一个观点：梁启超对毛泽东的影响很大，直到五四前这种影响甚至超过了陈独秀。李老似乎不太同意，但他鼓励我继续研究下去。

一九八九年，萧延中主编了一部研究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的论文集《晚年毛泽东》，不少人认为该书代表了国内对毛泽东晚年思想研究的最新水平。出版前，李锐应萧延中之邀为该书写了一篇非常精彩的序言，先在《人民日报》发表。后来这篇序言以《毛泽东晚年的思想与实践》为题，收入李锐的《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一书。

"文革"中，一个偶然的机会，青年刘洪涛得到了李锐五十年代撰写的《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一书。他惊异地发现：当时正被红卫兵批得体无完肤的、被称为"四旧"的传统文化，在塑造毛泽东文化性格时，竟起过那么重要的作用。他甚至想到"伟大领袖是否在运用晚年获得的至高无上的威望和权力，按照早年某些思想观念，进行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大试验"。从那以后，他就非常

注意搜集李锐的文章和著作,并把自己对毛泽东晚年研究的收获,一一写信,向李锐讨教。

李锐身边有一群青年朋友。他们之中,大部分是专业研究人员,也有的是业余爱好者。九十年代的青年特别是那些青年学者,对权威不再是一味地崇拜。一方面他们视李锐为毛泽东研究的大家,钦佩他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另一方面他们又认为:做学问好比逛故宫,有多种逛法。既可以一个殿一个殿地逛,也可以坐飞机观察故宫的建筑格局,还可以拿着放大镜,去看柱子上的龙,研究它的质地、形态、象征意义……一方面他们把李锐在毛泽东研究中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探索真理的勇气和科学态度作为自己的楷模,另一方面他们又感到李锐的优势正是他们的劣势。一位青年学者说:以李老那样的经历、阅历,如果我们只用同样的研究方法亦步亦趋,永远也不可能有新的突破。但是我们知道孟德斯鸠、弗洛依德;学过符号学、结构学……我们可以用新的知识结构开辟新的研究途径以求取得新的研究成果。

李锐对青年们活跃的思想是赞赏的,他之所以乐意结交青年人,也是因为他们可以不断为自己注入活力,而且他也认为:研究毛泽东的人,需要拓展知识领域,才能使这项研究更加深入。李锐在《毛泽东晚年的思想与实践》一文中写道:“当前许多新学科、新知识和新观念的传播,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当代哲学等为人所重,中西文化比较研究成为热点,重新学习有助于这一研究的开展。”但他也时常提醒青年们在学习和借鉴国外的研究方法时,要力戒形式上的花里胡哨和文字上的诘屈聱牙。

李锐的骨子里毕竟是个老共产党员,这使他与某些青年学者产生分歧。一位青年学者在他的文章中,批评李锐的研究模式总是先确定一个被视为正确的理论立场,例如改革开放以来官方认可的正确思路,然后具体分析毛泽东与这一正确标准的偏差距离;

而对毛泽东早年的研究则是先确立一个标准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理想类型，然后根据这一理想类型评判毛泽东的思想成长状况。作者认为，这一思路是国内学界对中国共产党早期人物思想研究的常规，其浓厚的目的论无助于人们探讨问题的具体性、特殊性。

李锐则认为这种看法太“自由化”了。

与李锐进行着更深层次学术交流的，是一些功底深厚的老学者。他们亲历了毛泽东晚年发动的各次政治运动，对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有着更深刻的感受和理解，加上深厚的理论修养和严谨的治学态度，改革开放以来，他们各自都做出过令世人瞩目的研究成果。在这种基础上进行的切磋交流，无疑是理性火花的撞击，人生智慧的升华。

八十年代与李锐在这方面交往最多的是老朋友黎澍。作为理论工作者、著名的历史学家，黎澍和李锐一样，有很强的独立思考精神。他是最早探究产生“文革”、“四人帮”这类历史现象原因的学者之一。在他看来：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社会主义革命在我们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取得了胜利……我们还没来得及彻底改变我们国家的落后面貌，经济、文化落后的结果，就为封建、愚昧为主要特征的落后思想的存在提供了物质条件。早在一九七七年，他就从发展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角度，提出了防止“文革”重演的问题。他对毛泽东提出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这两个在世人心中“绝对正确”的命题提出质疑，认为它们无论与历史事实还是马克思主义的论述都不相符。

李锐与黎澍不仅是心灵相通的挚友，还是近在咫尺的邻居，两家分别居住的公寓楼相隔五十米。他们之中无论谁有了新的想法，便立刻跑到对方家里去高谈阔论。那些年，两人之间上下古今、纵横世界无所不谈。从暴力论、阶级斗争论、“左”倾思潮的历史根源，到封建恶俗的到处再现……用李锐的话说，“那是真正的

毫无禁区的漫谈”。但涉及最多的话题还是清理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占统治地位后的中国历史，清理近几十年学术界被搞得混乱不堪的思想。作为一个严肃的学者，黎澍还常常对自己的学术思想进行反思。他们共同讨论过的一些看法，往往就是日后学术成果的雏形。李锐对黎澍的一系列见解非常欣赏，他常常说与黎澍交谈是一种享受。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九日，黎澍因血压高突然晕倒在书案旁。李锐接到黎澍夫人徐滨的电话后立刻赶到黎家，帮忙将黎澍送进医院。三天后黎澍因诸病并发抢救无效去世。李锐在他的悼念文章中称这位挚友为学、识、才兼而有之的、他本人最为信服的思想家。

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长期从事毛泽东研究的专家汪澍白，五十年代曾在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与李锐共事，对学问的执著与为人坦诚的个性，使他和李锐在晚年共同从事毛泽东研究中相互砥励，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一九七九年，李锐的《青年毛泽东思想方向》一文在黎澍主编的《历史研究》上发表。这是李锐在磨子潭修改了近十年的《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一书中的一节(该书一九八〇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再版)。同年九月，李锐在长沙见到了刚刚从香港讲学归来的汪澍白，便向汪澍白征求对此文的意见。时任湘潭大学副校长的汪澍白教授在毛泽东早年的研究方面颇有造诣。他直言不讳地指出：文中有几处对毛泽东的评价过高。例如新民学会只是一个敬德修业的团体，并非李锐文中所说的革命团体；毛泽东也并不是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之后就迅速彻底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而是直到一九二〇年，五四运动爆发后才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此前他的主导思想一直是改良主义。李锐说：“北京的朋友都认为我的文章比过去更实事求是了，来到长沙以后听到的也是一片肯定

之声，独独你说评价偏高。好吧，这次去韶山修改书，就请你一道参加，多提意见。”李锐对学问的虚怀若谷，汪澍白每每忆及，都要赞不绝口。此后，他们每有新作，便相互寄赠，直陈己见。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汪澍白的《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一书出版。李锐于一九八八年三月二十八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以《为毛泽东思想研究开拓新领域》为题的一篇书评，对这一著作给予了较高的评价。文章说：“关于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关系的研究，在国内外学术界并非空白，但多限于从文史角度的语句索源之类，拙著《毛泽东同志的早期革命活动》也只是在这方面就他的早期思想有新论述。像汪澍白这样将两者作系统深入的比较研究，还属于开创性的工作。”“弄清楚它同中国文化传统的关系，这不论是总结过去、对待当前或瞻仰未来，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九九二年年底，李锐将自己刚刚出版的《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一书寄给汪澍白。汪澍白在给朋友的信中介绍该书时说：“这本书中篇幅最长、分量最重的是《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这是当代国内学者对毛泽东晚年‘左’倾错误思想所做的一篇比较系统的研究性著作。在‘左’的思想在社会上仍然大有市场的条件下，发表这样的著作是要有很大理论勇气的。李锐登张家界黄狮寨的诗中有云：‘登山从不居人后，言事敢为天下先。’这篇著作所表现的正是这种精神。”

在与朋友的交谈中，李锐常常提及黎澍讲过的一句话：“真理的发现是不能一次完成的。”当年，李锐把自己的学术研究深度限定在《决议》的框架之内，这是十分必要的。否则他的文章就不能面世，也就不能在反对“左”倾思潮中发挥作用。李锐毕竟不同于纯粹的学者，尽管他有着学者敏锐的思维、深刻的见解、独立思考的习惯和蔑视禁区的探索精神，可多年从政的生涯使他更注重理论对推进现实社会的实际作用。在理论探索中，他务求彻底，但在发表作品时，他又比较注意尽可能为现实社会所接纳。他不希望

自己的著作藏诸名山，只愿能为社会的进步起一点作用。“社会能不断地改良也是好的嘛。”李锐多次表述过这一思想。

晚年的李锐似乎更赞成以渐进的方式推动社会的进步。所以熟悉他的朋友都有这样的感觉：他的理论思考要比他所发表的作品彻底、超前。他曾不止一次地对朋友说过：“我希望我写的那些东西将来都变得一钱不值，因为那将说明社会又进步了！”

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在对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的研究过程中，李锐便开始了对马恩列斯学说的系统反思。可惜的是，在组织部工作的后期，他就中断了写日记的习惯，因此他的那些在当时看来骇世惊俗的思考，只能在与朋友的交谈中传播。例如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局限、列宁如何曲解了马克思主义之类的话题，我是几年前就听他讲过的。因此当我看到他发表在一九九六年第二期《东方》杂志上的、为顾准文集的出版撰写的《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文时，深感两人思想的一拍即合绝非偶然。

顾准，这位一九三五年参加中国共产党，解放初曾担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局长、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等职的老革命，这位曾为经济研究所（后属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的学者，与许多善于独立思考、勇于探索真理的人士一样，从五十年代开始，其身心便“历尽折磨”。一九五二年的三反运动，他受到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处分；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五年，又再次被划为右派分子；“文革”中，被迫害得家破人亡。他在常人不能设想的孤寂和清贫的环境之下，孜孜不倦地读书和开展研究工作。一九七四年死于肺癌。李锐把他的一生概括为“受难使人思考，思考使人受难”，这又何尝不是对自己一生的写照！一九九四年，贵州出版社出版了顾准一生思考的结晶《顾准文集》。

一九九五年，李锐的朋友，五十年代被定为“胡风分子”的著名学者王元化来京参加《顾准文集》的出版发行座谈会。这位既醉心于《文心雕龙》，又对黑格尔的哲学思想研究情有独钟的学者，在与黎澍的交往中认识了李锐。一九八三年，王元化担任过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学者从政，是李锐在组织部负责建设领导干部“第三梯队”期间的主张之一。座谈会期间，王元化来到李锐家中看望老友，并将《顾准文集》相赠。

这一天，与其说李锐得到的是一本书，不如说他获得的是一位可以神交的挚友！七十八岁的李锐在读这部论文集时的激动、欣喜、钦佩以及痛快淋漓之情，淋漓尽致地表现在《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文中。不难看出，他对顾准的评价，也是自己人生取向的表白；他对顾准研究成果的述评，融入了自己的理论思考。显然，继《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之后，这篇东西是了解李锐思想发展的又一把钥匙。文章照录如下：

《顾准文集》是王元化同志送我的。这之前我不知道顾准其人其事其文。他大我两岁，我们是同一代人。但九一八事变时，我在长沙刚上高中，他在上海已经进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我们都是在民族危亡的关头投身革命的。面对日本侵略，不满蒋介石的统治，就要引起思考，就要追求新的东西。那时新的东西，就是苏联，就是马克思主义，就是共产党。虽然每个人的环境不同，性格不同，兴趣不同，受教育的程度也不同，但我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的追求有很多共同的东西。

受难使人思考　思考使人受难

作为一个思想家的顾准的出现，当然有特殊的主客观条件。革命胜利了，作为革命者的顾准，却要受革命的

苦难。从三反，到反右，到“文革”，大的磨难他就经历了三次，并且戴了两次右派帽子，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异化吧。这种受难，这种异化，全国成百万成千万的人经历过。可是他们，也包括顾准在内，恐怕谁也没有这种思想准备。又是马克思说的：受难使人思考，思考使人受难。于是，许多受难者成了思考者。可是，就知识分子来说，在受难后的思考，一般不过是“反省”自己的“错误”，乃至有“原罪感”，想不通也得想通。而顾准的思考却是大异其趣，他始终在思考一系列最根本的问题。对于人们习惯地不思索就接受了的一些成说，对于一些几乎被看做无需加以证明的公理式的成说，他都重新思考，提出质疑、补充、限制和修正。

一九五九年以后，我也在难中，也在思考。顾准写《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时，我正独处秦城囚室，八年中的最后两三年，也让读《资本论》、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等书了。我也对一些问题，例如我党历史上的一些是非得失，一些人物的功罪，反反复复地思考；对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哥达纲领批判》等，发生一些怀疑，也有心得。但是顾准的思考深得多，广得多，也更有成果。有关许多根本问题，于我来说，他是先知先觉。这自然同他系统地研究过经济学有关，他首先是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关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商品经济和价值论等，像他思考得这么深、这么透的人，当年大概是极少的。八十年代，孙冶方是我的对门邻居，我们很谈得来，他五十年代即倡导尊重价值规律，是很重要的贡献。现在才知道，这方面他是受顾准的启发，顾准比他更厉害。单说这一点，顾准这样的人就太难得了。顾准晚年的思考，不局限于经济，而是涉及政治、历史、哲学、文化等广泛的领域，着

眼于中国和人类命运的根本性问题。他一直在思考“娜拉走后怎样”,“无产阶级夺得政权后怎么办”,“中国的现代化民主化为何命运多舛”等根本问题,苦苦思索,寻求答案。所以他不是一般的经济学家,而是了不起的思想家。他不只是对自己负责的人,而是对中国的历史和人类的历史负责的思想家。人们啊,这种历史的责任感多么可贵!

元化说顾准的思想超前了十年。不止同一般学者相比,顾准的思想大大超前;同善于思考的学者相比,顾准的思想也是超前的。不久前,我见到一位曾积极投身于改革开放事业的老同志,他也极口称赞顾准是一位了不起的思想家。

顾准读的书很多。他不仅读经济学方面的书,还读中外历史、政治、哲学和自然科学,他的英语很好,有不少译著。他着意研究西方文明起源的希腊历史,《顾准文集》中第一部分即十几万字的《希腊城邦制度》。他研究中国古代的“史官文化”,研究老子、孔子和韩非。他的知识很广,很全面,这是他成为了不起的思想家的重要条件之一。

另一个重要条件是他的理论勇气,实事求是的勇气。他对一切现成的、权威的、被人们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东西都不盲从,对马、恩、列、斯、毛都不盲从。他从现实、从历史、从前人已经达到的思想出发,对权威肯定无疑的东西,都放胆重新思考。顾准思考围绕的中心是如何克服专制、实现民主和发扬科学精神。他身处“四人帮”封建法西斯专政环境之中,写出这些心得,需要多么大的勇气,这是一种布鲁诺甘赴火刑的崇高精神。

对这一百年的历史有一个反思

我们这一代人，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人。二十世纪发生的变化，我们这一代人基本上都经历了，我们这一代人一生的道路快走完了。在这样的时候，应当对这一百年的历史有一个反思。顾准是最早开始这种反思的。从古希腊、古罗马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从马克思到列宁、斯大林，从孔夫子到毛泽东，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他都作了深入的反思。他研究了中国古代的历史，又亲身经历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他的理论修养加上他的理论勇气，使他的反思达到了一个惊人的深度，这都反映在《顾准文集》尤其是其中《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这部著作中。他的工作，应当由活着的人继续下去。如我们应当弄清中国本世纪的历史是怎么回事，开国以来的历史是怎么回事，前苏联与东欧的变化是怎么回事。

本世纪人类最大的变化是从马克思那里来的。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也有空想。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制度不能容纳的产物。而俄国革命与中国革命，都发生在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发展水平远远低于西方。从列宁到毛泽东建立的社会主义，同马克思设想的并不一样。可以说，从马克思到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都过分强调了阶级斗争的作用；所有无产阶级革命家，从俄国到中国，对马克思主义又都有不少误解和曲解。迷信精神变物质、上层建筑改变经济基础，苏联失败了，斯大林失败了，毛泽东也失败了。列宁所痛斥和批判的第二国际，在北欧、西欧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倒是注入了新的血液，也影响到北美，使资

本主义并没有到“垂死阶段”，资本主义生产力尤其科学技术的作用，还在发展还在进步中。马克思设想的缩小三大差别，首先体现在这些国家，顾准对这些情况和问题都有深入的研究和阐述。人类所有好的东西都应当继承，错的东西也不应当回避。马克思哪些是对的，哪些是空想的、行不通的；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搞对了哪些，搞错了哪些；到底是什么问题，理论问题还是实践问题，不弄清楚还会犯错误。马克思的社会理想是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这包括精神的自由和物质的自由。马克思理想的共产主义，是要创造一种全新的人；自由是人的本质，“每个人的自由是一切人的自由的条件”；人将成为自然、社会和自己的真正主人。我们所处的历史时代，还有很多重大问题没有解决，比如战争问题、发展问题、贫富问题、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国家与国家之间发生矛盾的问题，此处还有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等，我是又乐观又不乐观。但有一点看得很清楚：人类社会在前进，资本主义也还在前进。

自从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中国的社会主义在前进。当然，在这个社会经济结构转轨的过程中，不会没有艰险，没有痛苦，没有失误。只要我们在坚持改革开放大方向的前提下，采取适当的对策，修正错误，坚持正确，相信这些都是终归可以克服和消除的。可是有人(冒充权威的人)看到这些情况，一不去分析产生的原因，又提不出克服的办法，却要危言耸听，说什么已经影响到我国国家的安全啊，说什么未来十年不可能是政治上风平浪静的十年啊，从而全面否定改革开放的大方向。可是，这些“理论家”能够开口唱的，仍只能是老调重弹，仍只能叫叫“向左转”，“向后转”。我们已经付出过那么巨大的代价，

回到过去的老路决非出路，这难道还需要论证吗？再说，谁有此“回天之力”呢？

现在，对于打击市场上的假冒伪劣商品，已经下了很大的决心，并且已经看见了成效。而在文化出版领域里，却未见同步开展“打假”活动。一些假冒伪劣的所谓“理论家”，还备受保护，颇为风光。宣扬假冒伪劣“理论”，以对抗现行开放改革方针的书刊，仍照出不误。

不久前，看到经合组织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的摘要。[①] 报告回顾了世界经济二百年的历史，指出一八二〇年时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经济强国，排在印度、法国之前，更在美国、普鲁士之前。后来是落到后面去了。报告分析了各种类型国家经济发展的情况，也分析了中国落后的原因，我以为很能启发我们的思考。很需要有顾准式的思想家来思考。这份研究报告预言，中国在今后十年中可能重新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力量。这也正同顾准所作的一个预言是吻合的，他在辞世前一年，在个人丧失一切、困顿至极的情况下，乐观地预言：只要我们“清醒地看到问题所在……实事求是，而不是教条主义地对待客观实际，我们国家不久就会在经济上雄飞世界”[②]。这些话是一九七三年六月十一日说的。由此可见，顾准不但是一个深刻的思想家，同时还是一个准确的预言家。

敢于思考最根本的理论问题

恩格斯说得好：“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

① 见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三十日、三十一日《参考消息》。

② 《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第三百三十页。

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1] 又说:"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2] 我们民族可以自豪的是,站在科学的最高峰作理论思维的,有顾准这样的思想家。他从研究希腊文明入手,对东西方文明,科学与民主,直到马克思主义的起源,都作了历史的考察:研究了资本主义为什么在英国发生的原因,看出了马克思受到的历史局限,对马克思所下的一些定义和设想提出了质疑。当然,他更关心的是他的祖国。顾准说:"这一百多年中,中国人深深具有马克思当时对德国的那种感慨:'我们……为资本主义不发展所苦'。"(其实,列宁在十月革命前,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前,都说过这样的话。)顾准提出,"要确立科学与民主,必须彻底批判中国的传统思想"。不论从民主与科学,他都反对权威主义。他谈到民主集中制的利弊,"如果说,科学研究在这种制度下多少受到阻碍的话,那是人文科学和哲学,因为这个领域,正是权威保留独占的判断权的领域。但是,权威,为了'集中起来'有可集中的意见的源泉,有时候也可以开门,不过门总不是敞开的,充其量也不过是半开门而已"。"我不赞成半开门,我主张完全的民主。因为科学精神要求这种民主。"顾准指的科学精神包括五个方面:

"①承认人对于自然、人类、社会的认识永无止境。②每一个时代的人,都在人类知识的宝库中添加一点东

---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第一版,第三卷,第四百六十七页。

② 同上书,第四百六十五页。

西。③这些知识没有尊卑贵贱之分。④每一门知识的每一个进步,都是由小到大、由片面到全面的过程。……所以正确与错误的区分,永远不过是相对的。⑤每一门类的知识技术,在每一个时代都有一种统治的权威性的学说或工艺制度,但大家必须无条件地承认,惟有违反或超过这种权威的探索和研究,才能保证继续进步。所以权威是不可以没有的,权威主义则必须打倒。这一点,在哪一个领域都不例外。""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是民主的基础,而不是依赖于民主才能存在的东西。因为,说到底,民主不过是方法,根本的前提是进步。惟有看到权威主义会扼杀进步,权威主义同科学精神是水火不相容的,民主才是必须采用的方法。""惟有科学精神才足以保证人类的进步,也惟有科学精神才足以打破权威主义和权威主义下面的恩赐的民主。"① 这些话说得多么好啊!

顾准写的许多东西都没有保存下来。《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是他与弟弟的通信,没有想到要出版。现在,经过改革开放,中国经济领域里的实践,有些方面也许顾准还不曾想到。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否定市场经济、否定商品交换和没有货币的,但市场是一只无形的手,不能逾越。中国今天的经济改革已经超过马克思,这很了不起。但政治上只搞了点行政改革。在民主化进程方面,离顾准的思考还差得很远。腐败同权力并生,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今天出现王宝森现象是不可避免的。实际上,有一些地方,大大小小的"王宝森"不少。有些乡村干部对农民竟有生杀予夺之权,使人怵目惊心。早在一九八〇年,邓小平就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

---

① 《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第三百四十四页至三百四十五页。

革》这篇重要的讲话中，针对历年有关的积弊，提出了一系列以贯彻民主为基础的改革措施，可惜多年来未能一一落实。只要能真正全部落实这个讲话的措施，如权力导致腐败这类问题，相信必能逐渐得到解决，我们的政治、社会环境，必将出现一番新气象。

《顾准文集》能够出版，是历史的安慰。这样一本书让我们大开眼界。中国要改革，要发展，没有理论，没有思想，是不行的。顾准的思考，只会启发我们的智慧，只会有益于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有益于我们的国家和社会的进步。他是真正理解马克思的，也是真正爱国的。但他被迫害到家破人亡的程度，这种悲剧自不应再重演。我们一定要造成这样一种环境，使顾准式的思考者不再遭受迫害，使顾准精神能够得到传播和发扬光大。孔繁森了不起，应该提倡学习；顾准更了不起，他是当代思想史上的先驱，更应该提倡学习。

学习顾准，我想，首先，要学习他对自己、对历史、对中国和人类前途负责的精神。理论思维，不应该是一种远离现实的抽象概念。顾准在他读《资本论·原始积累章》和《共产党宣言》的笔记中说："历史的探索，对于立志为人类服务的人来说，从来都是服务于改革当前现实和规划未来方向的。"[①] 他是这样赞许马克思，其实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

其次，要敢于思考最根本的理论问题。顾准就是这样做的。每一个有出息的理论工作者都应该这样做，而不能躺在无论何人(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现成的教义上。令人高兴的是，近年来这样做的人渐渐多起来了。最近

---

① 《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第三百一十一页。

读到一位我尊敬的理论家的长篇论文，他根据本世纪以来世界历史的变局和当前的现实，来回顾马克思主义（包括列宁主义）一系列原被认为是无可置疑的基本原理，对之作了新的理解和批判，并澄清了长期以来的一些误解和曲解，论证深刻，有说服力，读后觉得深受启发。希望我们的理论界在百家争鸣的学术气氛中，出现更多的顾准。

在文章的最后一行下面，有十一个字的注释：

作者：李锐，中共中央组织部

一位并不了解李锐经历和其著述的朋友，看了这篇文章下面的这行注释后感到万分诧异，甚至在电话里对我说：写出这样的文章的人，竟然在中共中央组织部，简直不可思议！

作者的话

为李锐作传，无论是成是败，是吉是凶，于我都是一生中一件极有意义的大事。无奈，由于记者职业的繁忙，我只能用业余时间断断续续地推进这项工作。如果说，多年前，我是出于被李锐的人格和气节所感动，从而走进了李锐的世界，那么经过多年的接触与思考，我感到这个世界比我当初的认识要深邃得多，也丰富得多。支撑这个世界的是追求真理至死不渝的精神和坚持独立思考、独立人格的现代人的品格。这种精神和品格对于中国人是极其难能可贵的。而这种精神和品格贯穿了李锐的一生。

在李锐的品格中又明显地积淀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精华。"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种对国家、民族的强烈的责任感，筑就了中华民族子孙中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

今天，当我们即将步入二十一世纪信息时代之际，中国不光面临着科学技术、经济实力方面的挑战，同时也面临着民族素质的考验。如何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和现代化意识有机地融合，使我们的民族精神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丰富和升华，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以为，李锐的经历会给人以启迪。

给人作传，等于同传主又活了一回，同李锐一起将过去的几十年再活一回，不是件轻松的事。我曾对李锐说："你的经历要是放在别人身上够死好几回了。"他瞪着眼睛说："自杀，我这个人可是不干的。"坎坷，于他是构成了生命的一种景致。

为李锐作传，有一个最大的便利，这便是“引子”中提到的那套日记。在他跌入谷底的那些年里，或许是时间比较充裕，或许是那种日子特别需要一个感情载体，那日记一天挨着一天，数年不断。因此，本书对几十年前的人物活动、对话、心理描写以及其他细节，除了部分取材于书信、当年的揭发检查材料和对当事人的采访以外，主要根据日记。

为李锐作传，有一个最大的不便。曾闻这样一副对联：上联为“大丈夫能屈能伸”；下联是“真君子多友多敌”，横批已记不清。对于李锐，“能屈能伸”已成为历史，“多友多敌”却与现实密切相连。因此写作中我不止一次地听到这样的劝告：这样的传记最好由隔代人来写。是的，隔代人有隔代人的优势：时间的流逝会使社会对历史的态度变得超脱，但隔代人写李锐却见不到李锐，即便是心有灵犀，也难免缺少了许多真切的感受，这便是同代人写传的优势。李锐的挚友、历史学家黎澍曾说过：“真理的发现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如将此话的意思推及本传记的写作，我想我做的只能是抛砖引玉。

在写作过程中，我采访了李锐的亲属，大、中、小学的同学，各个时期的朋友、同事百余人次。牧惠、邵燕祥、童大林、李冰封、朱正、黄韦经、楼适夷夫妇及水电专家陆钦侃、程学敏等人，他们阅读了部分或全部书稿，并给予我热情的鼓励与帮助。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原湖南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柏原，八十年代初他曾准备为李锐作传，但因被诊断为癌症，此事便搁置了。一九九三年，我去长沙采访李锐的大姐和他的同学、同事，去医院看望柏原时，他将自己万余字的采访笔记交给了我，鼓励我一定要完成这项工作。湖南人士俞润泉，也是身患绝症，听说此事后，抱病为我写来长信，提供线索。陆钦侃、程学敏、翁长溥等水电界老人，都以耄耋高龄，为我写来万余字的长篇材料。1998 年此书以《党内有个李锐》为名在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出版后，《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丛书的

主编之一林发棠先生，又为本书提供了几份宝贵的材料。值此书在内地出版之际，谨向所有帮助过我的朋友、老师、前辈们，致以深深的谢意！

宋晓梦

部分参考书目、资料

①《龙胆紫集》李锐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②《庐山会议实录》李锐著　春秋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

《庐山会议实录》(增订本)李锐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③《怀念二十篇》李锐著　三联书店出版

④《往事长短录》李锐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⑤《窑洞杂述》李锐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⑥《热河烟云录》李锐著　新华出版社出版

⑦《起用一代新人》李锐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⑧《延安记者》方蒙主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⑨《延安整风始末》华世俊、胡育民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⑩《一二·九运动在武汉》郭佩珊文

⑪《报史通讯》承德群众报史工作组编

⑫《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董边等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⑬《一辈子讲真话的人——记黄克诚》李锐文　《文汇报》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⑭《接管沈阳记事》李锐文　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⑮《陶铸传》郑笑枫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⑯《胡乔木》叶永烈著　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

⑰《论三峡工程》李锐著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⑱《三峡问题资料汇编》　电力工业部办公厅研究室编

⑲《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再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三论

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田方、林发棠主编

⑳《长江 长江——三峡工程论争》戴晴主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㉑《论水力发电与河流规划》李锐著 电力工业出版社出版

㉒《长江三峡——中国的史诗》卢跃刚文 《中国作家》一九九二年第六期

㉓《三峡工程议案是这样通过的——一个全国人大代表的日记》黄济人著 重庆出版社出版

㉔《炎黄春秋》一九九二年第八期

㉕《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李锐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㉖《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李锐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㉗《晚年毛泽东》萧延中主编 春秋出版社出版

㉘《自然辩证法通讯》一九九三年第五期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李锐其人
作者=宋晓梦著
页数=404
SS号=10324338
出版日期=1999年6月第1版